

The Poor are the Church  
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

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 親吻窮人

若瑟·赫忍斯基 神父 著  
楊淑秀、蔡怡佳、林怡伶 譯



丁松筠 / 王幼玲 / 王增勇 / 李家同  
孫大川 / 陳來紅 / 郭吉仁 / 楊 索  
黎建球 / 鐘 喬 / 顧瑜君 誠懇推薦

當人們為了摧毀赤貧而團結一致，  
赤貧就節節敗退。若瑟·赫忍斯基 神父

思想觀念的帶動者

---

文化現象的觀察者

---

本土經驗的整理者

---

生命故事的關懷者



## Caring

生命長河，如夢如風

猶如一段逆向的歷程

一個掙扎的故事，一種反差的存在

留下探索的紀錄與軌跡

# 親吻窮人

## 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The Poor are the Church

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

作者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訪談者

吉爾·阿努以

譯者

楊淑秀、蔡怡佳、林怡伶

## 此致

奧莉雯·德·佛絲<sup>1</sup>、

第四世界運動的持久志願者、

一路上相互扶持的夥伴們

以及使我深信「窮人就是教會」的第四世界家庭

譯註 1：奧莉雯·德·佛絲 (Alwine de Vos van Steenwijk)，荷蘭派駐巴黎外交官，於一九六〇年代初加入第

四世界持久志願者團體。

# 目次

0 0 7	中文版推薦序一	人性尊嚴的僕人／孫大川
0 2 3	中文版推薦序二	安貧樂道／韓大輝總主教
0 2 5	名人推薦	
0 3 1	英文版推薦序	窮人就是「我們」／克里斯多福·溫許普
0 4 1	法文版序文	以「盟友」的身分，提供微小的服務／吉爾·阿努以
	前言	與若瑟神父相遇 0 4 3
		若瑟神父的見證一 在可怕的暴力循環中長大的小男孩
		若瑟神父的見證二 除一己之身，我們無他可奉獻
	第一章	教會是窮人的教會 0 6 5
	第二章	赤貧者的生命是恩寵的泉源 9 9
	第三章	化身在一群子民中間 1 1 5

第四章	第四世界，上天的子民	131
第五章	他們來自何方？	159
第六章	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工人世界的苦痛面貌	185
第七章	這個時代的坎坷路	209
第八章	第一批盟友：讓自己受牽連的勇氣	227
第九章	「划向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	249
第十章	赤貧者優先	285
第十一章	解放神學	311
第十二章	獻身的生活	341
附錄一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簡介	355
附錄二	若瑟·赫里斯基小傳	359
附錄三	家，是我的成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劉靜芳	363
延伸閱讀		365

【推薦序一】

## 人性尊嚴的僕人——閱讀《親吻窮人》

孫大川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第四世界運動在台灣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間，因比利時籍耶穌會修士德保仁的引介，我開始認識「第四世界運動」（International Movement ATD Fourth World），知道它是一個為赤貧者服務的國際性組織。第一次到巴黎，就是到第四世界運動總部（Pierrelaye）拜訪，直到如今我仍深深感恩能以這樣的方式、角度與巴黎相遇，看到花都的另一面，領略另一種看待風華和繁榮的眼光。在持久志願者的引導下，我參觀了他們的窮人歷史紀錄館<sup>1</sup>，那裡存放了法國赤貧家庭長達三十多年的訪談資料，是「運動」全部靈感的來源，他們



說：「要把歷史還給貧窮人。」座談分享的過程中，我談到我的原住民身分與經驗，他們也介紹自己的故事和工作的內容，我們都同意台灣原住民與世界赤貧者之間有著許多相似的遭遇和命運。一九八六年，第四世界運動的創始人若瑟神父（Fr. Joseph Wesinski, 1917-1988）到比利時南部納悶城（Namen, Namur）演講，我有幸與他見面。矮個圓臉，目光堅定卻十分謙和，站在他面前，總有一種被擁抱的感覺，後來讀他的書、翻譯他的小傳記，才了解為什麼他有那樣強烈的人格特質。一九八八年初春，就在我束裝回台的前夕，得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二月十四日），我當時三十六歲，非常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後半生將全力投入原住民族的事務。很難分辨這樣的轉折和決定，是受到什麼樣因素的影響；但，十分確定的是，第四世界運動和若瑟神父面對赤貧者的態度、方式和思想，始終是我行動和自我檢驗的明鏡。

在德保仁熱心的聯繫、敦促下，回台那年（一九八八）秋天，我們組織了一個分享第四世界運動精神的小團體，有洪萬六修士、宋祖思小姐、韋薇修女等。閱讀資料外，我們拜訪台北火車站的遊民、探望半夜流落在龍山寺附近的流浪漢、參與樹林原住民基督徒的主日禮拜、訪查七號公園預定地（今大安森林公園）的「違建戶」……；我們渴望描繪出大台北地區赤貧者被抹除的面容。在那段日子裡，我在《首都早報》、《中國論壇》、《聯合報》、《中國時報》、《中時晚報》等報章雜誌寫了不少介紹第四世界

運動的文章，不斷見證赤貧者在台灣的存在，當然回應不多，那正是李登輝總統自詡「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

透過幾位關心貧窮問題朋友的幫忙，一九九〇年三月，當時第四世界運動的秘書長佳碧葉·艾必肯小姐（Gabrielle Epicum），和志願者唐弟子先生（Bruno Tardieu）來訪，我們還和《中國論壇》辦了一場學者、專家的座談會，記錄以「封面主題」的方式，刊登在當年四月號的《中國論壇》，我想這是華人社會第一次和第四世界運動的成員相遇。因於這樣的彼此鼓舞，一九九〇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志願者楊淑秀小姐，比利時籍的潘文瑾（Isabelle Perin，現任第四世界運動秘書長）與德國籍的劉豫虹（Rosemarie Hoffmann）等志願者也相繼來台學中文。一九九二年在台北成立志願者團體（ATD Chinese），持續答覆若瑟神父的召喚。之後，我因越來越忙碌於原住民的事務，參與活動的機會便少了，不過仍不斷收到來自第四世界運動的訊息。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為響應

註釋1：「窮人歷史紀錄館」這些年已經發展成「國際若瑟·赫忍斯基中心」（Joseph Wresinski International Center），使命是讓世界各地的至貧家庭有機會意識到他們集體的身分與共通的歷史，一個他們跟社會其他成員對話的先決要件。也因此可以傳承給自己的子女一段充滿勇氣與韌性的歷史，讓子孫可以自豪，得以藉此在社會上取得一個有活力的位置。此外，也讓整體社會得以更新他們看待至貧同胞的眼光，更新抗貧的知識與行動。

一九九二年聯合國大會宣布十月十七日為「世界拒絕赤貧日」的呼籲，台北志願者團體和貧窮家庭代表在大安森林公園植樹、立碑，狄剛總主教和台北市長陳水扁皆前來支持。今年（二〇一三）十月十七日我參加了同樣的紀念活動，沒有政治人物，但見到了李勝雄、郭吉仁兩位律師、王增勇教授、王幼玲女士、洪萬六神父、姜樂毅先生和一些老朋友，當然，還有統籌本書翻譯的志願者楊淑秀。

## 誰是第四世界的子民

我之所以囉囉嗦嗦地敘述自己和第四世界運動相關聯的一些有限經驗，並不是為突顯自己參與的功勞；正好相反，其實我是最沒有資格談論這段歷史的，楊淑秀、洪萬六、劉豫虹以及眾多飽受飢寒威脅的台灣赤貧者，才是這段歷史的主角；更足以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實和細節，他們才是最有力的見證者。不過，我多費一些筆墨誇大描述自己的經驗，主要的目的是想提醒我們的讀者，台灣和第四世界運動的相遇不是突然現在才開始的，早在二十五年前，若瑟神父就向我們寄出了邀請卡。如果你對《親吻窮人》這本書的翻譯、出版感到突兀、陌生、不舒服，正好又一次驗證了若瑟神父一直不斷重複告訴我們的主題：世人大都拒絕承認第四世界赤貧者的存在，也不會認為赤貧者可以成爲

我們的導師，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公義的社會；他們是我們的包袱，一個我們極力想擺脫的陰影；他們的存在，問題不在我們，而在他們的無知和懶惰。閱讀《親吻窮人》，想進入若瑟神父的精神世界，這樣的心態是我們首先要去面對的障礙。

「第四世界」這個用語，有它法國的淵源？。法國大革命時杜傅尼·德·維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等議員，企圖在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上，爭取代表農村短工、乞丐、貧病者等處境最不利者所組成的「第四階級」來參與會議，結果其他三個階級的人，當然都否決了他的提案。其實這個提案背後揭露了一個事實：在人類的社會裡一直存在著一群輪廓模糊、始終無法嵌進我們整體社會框架的人，他們四處流竄、無家可歸，比弱勢的農民、工人階層還弱勢。馬克斯稱他們或他們的子孫為「衣衫襤褸的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若瑟神父有時用法語的表達方式稱他們是「下層無產階級」。這些極端貧窮的人和相對物質匱乏的人之間有著天壤的區別，若瑟神父在訪談中這樣說：

以相對貧窮為例，你可以看到他們被剝削的情況，這些受害者至少還能揭發不

註釋2：在人類學和政治學界，也有用「第四世界」來指稱全球「原住民」，意思是說他們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這和「第四世界運動」的用法有所不同。但，原住民的經驗，許多地方和第四世界運動描述的赤貧者有著相近的處境。

公平的待遇：『我的薪水太低，我失業了，這都是資本主義和老闆唯利是圖的結果！』但是，極端貧窮的這一邊，你看到的是全然的壓迫，是被合法化且完全沒辦法反抗的壓迫：『你很清楚，這些人變不了，做什麼都沒有用！』赤貧，並不是因為被剝奪了權利而低人一等，而是它毀損了你身為人的品質。

赤貧者被「排除」在我們社會體系之外，本書中若瑟神父花了四個章節集中反覆分析、反省這些「結構性排除」的社會、心理、歷史背景及其澈骨的影響。政府部門對他們束手無策，教會和慈善團體雖然願意提供援助，但很快的會發現赤貧者有著非常複雜且難以掌握的家族歷史，沒有人有耐心和時間為他們停留；這些組織和團體的成員肯定充滿愛心誠意，但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前提下，「赤貧者對他們來說是個負擔，不但拖累行動，也會弄皺漂亮的分析」。我們通常會以我們自以為適宜的作法，急著讓赤貧者上架，我們很難以赤貧者為核心去思考問題；聆聽他們的故事，只能算是一種善意的敷衍。我們根本不認為赤貧者的想法是有意義的，那只是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妄念而已。如果能夠用錢、用救濟的方式塞住他們嘟嘟囔囔的嘴，問題就算解決了。事實上，我們還真的相信，事情頂多就只能這樣！觀察台灣近二十幾年來社會發展的狀況，行政、立法部門和民間的輿論，大都聚焦在勞工、農民、消費者、環境和動物保護等議題上，這些團體和個人是「強而有力」的弱勢；甚至原住民人權也逐漸找到了越來越多支持的盟友。

我們的「街友」呢？那些貧病孤獨、徘徊在精神崩潰邊緣的第四世界子民呢？他們得到照顧了嗎？我們找到他們嗎？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社會和制度為他們改變了什麼？根據法國經濟研究局的最新統計，法國單單街頭遊民的數目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自二〇〇一年起，人數成長近五〇%，二〇一一年時已突破十四萬人。台灣的情況呢？

## 將歷史還給貧窮人

若瑟神父晉鐸為神父時，選了《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的一段話為座右銘：「划向深處去，撒下你們的網捕魚吧。」這後來也成為他鼓舞第四世界運動志願者常用的話。對若瑟神父來說：「划向深處去」意味著離開原地往更陌生、更遼闊的人性深處冒險。意識世界所呈現的邏輯構造，往往讓我們故步自封，失去對生命及社會深度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這些具有原創性的人性風景，大都隱藏在我們慣性思維的意識底層或背後。赤貧者做為我們逃避的陰影，潛藏了理解人性、改造社會最原始的能量。迎向它，就是「划向深處」的意旨所在。這需要極大的勇氣、決心和毅力；它有可能瓦解我們對人性、對社會既有的理解和想像。若瑟神父告誡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接受赤貧者和其家庭，意味著不替自己保留任何安全感。「划向深處」，要付出代價！

問題是：要如何划向深處呢？我們一般被告知：赤貧者整個生活太混亂，無法建構歷史，他們根本沒有歷史。想想也是，看看我們的歷史何其井然有序啊！

赤貧者挫敗的處境，通常會讓他們不相信任何人；訴說自己的歷史，只會自曝其短，加深外界的指責和羞辱。赤貧者的歷史，消散在左躲右閃、互不信任的碎碎唸中。早在六〇年代初，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便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並覺悟除非能將歷史還給貧窮人，否則永遠不會有真實的相遇，運動也將喪失其堅實的基礎。若瑟神父回憶說：

如果我們想要一起走一條長路，有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訴說自己的歷史，他們的父母及祖父母的歷史；並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的生活經驗是令人敬佩的。當這些家庭告訴我們越來越多關於他們過去的故事時，我們越發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們越是專注，他們就透露更多自己的歷史。藉由口述重新走過這些歷史，對自己的經驗感到驕傲，而非羞愧，是這個運動當時非常突出的方法學。

為此，若瑟神父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並推動一項特別的訓練：每天傍晚寫下赤貧者及其家庭說過的每一句話、發生的每件事；志願者們決心一點一滴重建一個以赤貧者為中心的歷史。若瑟神父說：「書寫幫助我們內化這一切，我們想像一種完全划向這些家庭的日常省察。」多麼動人的文字！對赤貧者來說，有人願意聆聽並珍惜自己破碎的

歷史，不被潑冷水、不是問訊、不打斷、不訓誨……，只有分享和參與，形塑出大家共有的歷史。若瑟神父以罕見的自我陶醉的語調，讚嘆當時的狀況：

這個罕見的熱情，對家庭和志願者來說，都是喜悅的來源：（對志願者而言）要有多大的福樂，才能發現這樣一個充滿生存意志的歷史，那種護衛尊嚴、維護家庭權利的硬頸精神？……（對赤貧者來說）要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要使出多少把戲，才能在資格審查時拐個彎，既不會失去濟助，也不至於被慈善團體訓斥說教。還有，原本失去聯繫的親人，在重新探尋家族歷史後，親情得以重新連結，與父母或姊妹團圓，真是不亦樂乎！在六〇年代，志願者的生活充滿了喜悅，他們會在週六晚上到馬恩河畔（River Maine）跳舞；放假的時候去愛爾蘭、以色列或非洲旅行，雖然口袋裡只有幾塊法郎。不認識志願者的人，會以為他們個個心情沉重，最後卻發現他們年輕、幽默，充滿幹勁與膽識。

請讀者見諒，我情不自禁抄錄這麼一大段若瑟神父的談話內容，因為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觸動了我靈魂的深處。台灣原住民原本就沒有文字，從小我就有失去歷史的焦慮。我無法理解、也難以接受台灣歷史和文化的敘述中，為什麼獨漏了早就生活在這裡的原住民。坦白講，這二十幾年來我原住民工作的主軸，其實就是想贏回原住民的歷史。一九九三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之後陸續舉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主編《台



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七冊，印刻），策畫《台灣原住民族神話與傳說系列叢書》（中英對照，十冊，新自然主義），和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合作編譯《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日譯本系列叢書》（十冊，日本草風館）；二〇〇九年至行政院原民會服務後的那幾年，設立「台灣原住民族文獻會」、辦理《原住民族文獻》；凡此種種，目的皆為強化原住民「介入書寫」的力度。整理自己的歷史，就是重建自己的存在。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常在原住民作家身上，看到那種創造歷史的喜悅；聆聽耆老訴說自己部落遷移的歷史、指認每一處傳統的領域時，他們淚光中閃爍著自信的喜悅，或許更應該說是「存在的喜悅」，一種真實的自我肯定。在第四世界運動志願者推動將歷史還給貧窮人的行動中，一定也碰觸到了同樣的感動。

## 第四世界與教會

本書的英文原名是 "*The Poor are the Church: 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主標題翻成中文應該是：「窮人就是教會」。我很早就有這本書，二〇一一年春當時的第四世界運動秘書長尤金·布蘭德（Eugen Bran-d）來原民會看我，又送我一本，並表示譯者楊淑秀等人的翻譯已接近尾聲。今年初，淑

秀寄來了全書的譯稿，也非常感激王浩威醫師、王桂花總編輯的支持，慨允由心靈工坊出版社出版，這需要勇氣。定書名時，編輯同仁建議將主標題改為：「親吻窮人」，避免讀者誤以為這是教會內的讀物。做為若瑟神父晚年親自主導完成的重要文獻，淑秀頗擔憂書名的更動會不會扭曲若瑟神父立論的初衷。我支持編輯同仁的看法，以若瑟神父行動派的作風，應該可以諒解他的書在一個非基督宗教國度裡的小小轉彎。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障礙，華文世界的讀者，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這本書呢？

只要稍微翻閱一下第四世界運動自一九五七年創立以來的歷史，我們會很快發現：若瑟神父從一開頭就將這個運動視為一個跨越宗教、黨派、族群、國家和意識型態的組織，志願者當中有無神論者、共產黨員、外交官、科學家、律師、媒體工作者等等；形形色色，有極大的差異性；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接受「窮人優先」的信念，而結成一個團體。即使如此，撇開與天主教的深刻淵源及其神職的身分，若瑟神父仍極其堅定地嘗試引導我們重新去認識一個不一樣的教會，回到基督本身在世之前所樹立的芳表，從存在和普世的角度，讓我們和赤貧者面對面（face to face）。如果單從「護教」的立場來看「窮人就是教會」這個命題，我們將錯失若瑟神父送給我們的禮物。

我沒有深入研究若瑟神父創立第四世界運動組織以來，他和基督各宗派之間互動的情況，也不清楚天主教會對他的志業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若瑟神

父堅信，基督宗教的本質與貧窮直接相關；耶穌一生的行誼，從出生到死亡，一次又一次的見證了這一種關係。換句話說，窮人就是教會，捨棄窮人，教會只剩下世俗的軀殼。從基督信仰的歷史來看，這是一個很難反駁的宣示。當教會越來越遠離貧窮人，便一步一步走向腐化；隨後總會有一批人以貧窮之名，要求教會改革。聖本篤、聖方濟、聖依納爵……；乃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總結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精神，宣告：「教會乃窮人的教會」。這都在在顯示，窮人是教會的鏡子。若瑟神父說：

教會的每一個時代，而且對她來說這樣的時代並沒有真的結束，她不斷宣稱最貧窮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實。但教會要完美無缺地活出這個事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為此，我既不焦慮也不氣憤。教會就是最貧窮的人，最貧窮的人就是她的本質。也因此，最貧窮的人遲早會被她所認同，被她優先接待，以多少來說是具體且持續、或私下或公開的方式進行。

這正是我從童年時代，對教會銘刻最深的圖像：教會始終和我們弱者站在一起。在那政治高壓、物資匱乏的時代，神父、修女和牧師們奔波於偏遠部落，以簡樸、受苦的形象，和族人共同生活。駐守堂口，說我們的族語，試著了解我們的習俗和想法。從中國的立場來說，或許有人對近世以來基督宗教的普世傳播，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但從弱者的角度看，儒、道兩家的思想，似乎都沒有「走向貧窮」的傳統；漢代以後的發展，

大致和朝廷上層建築糾纏，徹底成了士大夫知識分子腦袋裡的義理思辨和境界觀照。我常懷念周遊列國如喪家之犬的孔子，也心儀「何必曰利」的孟子，更佩服「磨頂放踵」的墨子，甚至疼惜河決鄭州投入救災充滿俠骨的老殘劉鶚。近年來，佛教以其聞聲救苦、大慈大悲的心懷，在台灣開展出一條和貧窮人對話、連結的道路，令人讚嘆。而我們的儒家呢？在高談儒家第三期、第四期發展的同時，儒者如何找回貼近生活、掌握民間疾苦的原始動力，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若喪失對生活苦難的敏感度，則經典的閱讀與詮釋，只是一場源頭枯竭的概念遊戲。

這樣看來，第四世界運動的召喚，就不完全是教會或西方文化的事；它也可以是台灣甚至中國文化自我檢驗的起點。

## 我們的答覆呢？

在巴黎初遇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時，我心裡就一直存在著一個重壓：我要怎麼答覆第四世界赤貧者的邀請呢？我想這也是讀者翻完這本書，要面對的最後也是最難堪的事。若瑟神父在末章〈獻身的生活〉裡，坦率地提出了他的觀點，甚至強力批評天主教會目前獻身生活的種種狀況，看來他是嚴肅且毫無妥協的。想划進人性的深處，當然不

能帶著半調子的心態，這是維繫整個運動最底部的磐石。也只有像耶穌那樣的堅持，甚至不惜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夠有那麼龐大的吸引力，兩千年來讓千千萬萬的追隨者，前仆後繼度著獻身的生活。所以，要做這個答覆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答覆得了；它需要機緣，也需要一些過程。閱讀志願者獻身的故事，彷彿在重溫耶穌和門徒們之間的聚散離合。以我的經驗來說，起碼先對這個邀請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會開啓一扇門，讓你過去沒看到、沒想到的事，一一呈現在你的面前。在和第四世界接觸之前，我從來沒有在意過台北火車站是不是有遊民存在。一九八八年之後，不論我走到哪裡，台灣、大陸、日本、紐西蘭……，目光總是會被街頭那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第四世界朋友所吸引，覺得親切，也盡力在可能的範圍內和他們交談幾句。赤貧者的召喚成了我每天會去面對的事，也許我無法成爲全身奉獻的志願者，但我至少可以成爲赤貧者的盟友，我的生命的確確一點一滴在改變。

一九八五年我寫過一篇自我反省的文章〈與我會晤〉<sup>3</sup>，爲回應第四世界志願者的挑戰，我對「承諾」(commitment)做了如下的剖白，就當做是若瑟神父爲赤貧者種在我心田裡的一棵希望之樹吧：

承諾的決斷包含舊生活的死亡，我們一旦決意要專心致志於某一種生活，就不得不同時放棄那與新的計畫不能並立的態度、想法與習慣。一個人的生活之所以黯

淡無光，乃是因為他缺乏下定決心、敢於割捨的勇氣；『他們常常猶豫不決，常在期待確定的到來；但其所期待的確定卻永無到來之日。』當然，這種決斷、放棄，不是光靠勇氣就能成事，刻苦與紀律，是隨之而來的考驗。人因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因而雖然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未來開放，但是另一方面卻又得背負自己的過去。一個坦誠、健康的人格，絕不可將自己的承諾交由專橫的意志來管轄；我們得首先承認自己的脆弱無能，將我們的承諾置放在一連串衝突、對話的實踐歷程當中。謙遜因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完全是一種德行，而是一種人生的基本態度，使我們始終能保持我們心靈的柔軟度，免於去度一個自欺欺人的生活。承諾的光輝因而必須由謙虛與隨之而來的對人性脆弱的敏感度中浮現出來。

註釋3：該文收錄於拙作《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民心靈世界的摹寫》一書，頁五七至六五。台北市：聯合文學，二〇一〇，二版。

【推薦序二】

## 安貧樂道

韓大輝總主教

（天主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

我進了慈幼會已有四十多年，一直努力學習和參與傳福音的使命，最近兩年多，我在萬民福音傳播部工作，這使我在另一個層次傳福音，也開闊了視野。讀了本書初譯稿，獲益良多，一方面對安貧樂道的精神深有感受，另一方面更體會清貧簡樸的見證肯定提昇福傳的素質。基督不但向貧苦的人傳福音，自己也選擇了清貧的生活，教會自當緊密相隨。感謝若瑟·赫里斯基神父的無私和慷慨，有助散發福音的光芒。的確，傳福音需要言行一致和活生生的見證。

窮人的生活很辛苦。中國的「窮」字意味著人因生生活的種種欠缺和困難，即使在自己的屋簷下仍要「弓身」，受盡委屈。若瑟神父用了「第四世界」稱呼最窮困的族群，他們和第一世界的差距又多了一層，但並非和教會分開，反而「窮人就是教會」。

此說不無道理，窮人仍有他們的魅力，因為他們更容易了解和同情其他有需要的人。中國的「貧」字，由「分」和「貝」組成，可解作分享財物的意思；而「貪」則由「今」和「貝」組成，令人聯想只顧今日財物的心態。前者是德行，使人惜福、節制、同情、善心、助人，而後者則是自私的惡習，令人只執迷今日的錢財，不顧來生的寶藏。

若瑟神父從信仰角度談到貧窮。聖子降生成人，祂甘願成為貧窮的，為使人成為富有的，教會應走同樣的路，因為在清貧淡泊的生活中更容易體驗人與人、人與天主的愛，這愛不但在信仰團體中冒起，而且也由團體所慶祝的聖體聖事所滋養。

愛是無償的自我奉獻。錢財固然有其重要性，畢竟是身外物，愛情不能只停留在膚淺的事物上。所以，我很喜歡書中的一句話：「除一己之身，無它可奉獻」。這話正道出奉獻的精髓。

我相信讀者會在本書中拾取更多人生智慧！送上祈禱，祝願更多人能體驗「貧窮的人是有福的」，「施比受更有福」，「主愛樂施的人」。

主內平安！

二〇一三年聖母誕辰節



【名人推薦】

## 在動盪不安的生命海洋，那麼努力地漂浮著

丁松筠

（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副社長）

每年農曆春節，我都會參加一場台北最棒的圍爐活動，由創世基金會為街友和孤獨的朋友主辦的尾牙。雖然每年我開心地和他們共度幾小時，但是，我很慚愧地意識到，我平日的生活離他們如此遙遠；這個距離讓我忘記他們、忘記他們每天面對的困難，有時甚至是悲慘的遭遇，健忘讓惻隱之心也跟著消失。我忘了我與他們的生命息息相關，不可分割，他們的不幸是我的不幸，他們的力量也是我的力量。

《親吻窮人》除了介紹第四世界運動和他先知性的創立人，若瑟·赫里斯基神父，也幫助我們每一個人意識到貧窮、被孤立的鄰居；提醒我們，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他們在動盪不安的生命海洋努力地漂浮著，邀請我們走出安全和舒適的生活圈，加入他們團結關懷和友愛的行列。

## 親吻窮人

王幼玲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親吻窮人，因為赤貧者的生命是恩寵的泉源。

若瑟神父在書裡面說，赤貧者的生命是恩寵的供應者，我們可以發現（如果你夠用心），赤貧者在最匱乏、困頓的環境，仍然可以給與。照顧有病痛的、相依相持的街友，努力守護家庭、執意要替孩子做晚餐的母親，勞累打工賺錢要給孩子溫飽的父親，他們要重申身為天主子的尊嚴，而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可惜的是我們都只看到他們的貧窮，排斥鄙視，拒絕承認赤貧者的能力和生命經驗。

《親吻窮人》這本書像一片導引泉湧伏流的沙礫地，若瑟神父的第四世界如何跟赤貧者在一起的智慧，如同大大小小的細砂及石礫，過濾出對赤貧者的歧視和偏見，還原他們最初的本質，關照到我們內心也有一片赤貧之地，需要他們給予。

# 與窮人同在：助人工作的靈修操練

王增勇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受到基督的啓發，大學畢業後我放棄機械念社工，我以爲我追隨了基督的腳步。

進入社工後，我學習一整套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以及各種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案，並成爲其中的專家學者。但，我卻離自己當初發心的基督信仰越來越遠。

社工做爲一種強調客觀中立的社會科學，案主，是要被幫助的人；是要被解決的社會問題；窮人是被我們分析的客體；我們從未把他們當成主體來認識。

但，若瑟神父說：「要成爲被排斥者的鬥士……我必須在人群中認識他們，必須體認到自己屬於這群子民」、「教會是窮人的教會；教會就是窮人」。原來，窮人不能只是社工口中的「他們」；社工必須成爲他們的一份子、社工必須在他們身上看到基督、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高牆才能倒下。

在若瑟神父的身上，我看到助人工作就是與天主親密同行的禱告；若瑟神父是個不一樣的助人工作者，他邀請我們進入助人工作長期忽略的靈性世界。

讓我們一起共赴這場盛宴！

## 窮人就是教會

黎建球

（大考中心主任、輔仁大學講座教授、輔仁大學前校長）

貧窮不是罪惡，貧窮是社會制度的產品，社會制度不能照顧所有在此制度下的人才，是罪惡。教會的目的之一在彌平因制度不公所造成的痛苦，只有擁有神聖意義的教會才有能力成爲貧窮的母親，才能從貧窮中學習到意義與價值。

## 真知，才能相助

顧瑜君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第一次接觸第四世界運動，是閱讀若瑟神父寫的《給明天的話》——匯集貧困兒童話語的書。若瑟神父說：「第四世界孩子們的真心話可以改變人心，改變世界。」

那天在客廳，舒服地椅子上看著書，我先生走過來一探究竟：「你爲什麼哭？」我沒有察覺自己落淚。

作爲一個長期陪伴弱勢孩子與他們家庭的人，常感受到我所擁有的專業訓練（社工、教育）並不能真正的給他們幫助，關鍵在我並不真正理解與懂得弱勢者的處境，反倒是孩子與家長給了我很多學習、啓發與力量。我常無法具體地對旁人描述從弱勢家庭中所獲得的經驗與經歷。當我說：「孩子教導我們的勝於我們給予的幫助」時，常引來的回應是：「你很謙虛」。這種沒有交集的對話使我陷入更難以溝通的深淵。

我跟我先生說：「若瑟神父直指核心，切入要點把很多我從弱勢孩子與家庭身上的觀察與感受，以最簡單的文字描述清楚，也把我跟孩子們接觸中最難以陳述的觸動講明白。」

因爲對貧困弱勢者缺乏真正的理解。我常發現，這群孩子與家庭長期承受著「受壓迫的幫助」——以爲對他們好的各種「協助」，有時候卻給他們帶來更大的苦楚與無奈，使其陷入更污名不堪的處境，且無法表達與抗拒。

淚水並不是因爲悲傷，是書中字字句句都撼動我的心——更懂得如何可以接近孩子的心而開心。

若瑟神父說：「理解窮人，刻不容緩」，因爲「真知，才能相助」。

## 學看「第四世界」

陳來紅

（台灣兒童閱讀學會顧問、大溪愛鎮協會顧問、婦女運動先驅）

《親吻窮人》這本書讓我了解，要成為赤貧者的盟友必須專注又深切的投入。先讓自己明白，了解「赤貧」需要專業知識。當赤貧的存在是社會事實，作為社會的異議份子將成為義務，為了讓社會了解赤貧，要不惜讓自己成為異議分子。赤貧者是道成肉身的聖神，他們教會我們：將極端貧窮歸罪赤貧者是社會嚴重的迷失。須問，誰造成赤貧？不思考結構性的問題，就難以理解赤貧的產生。還有，必須理解在勞工的底層，有一群失落在地平線的勞工。要走一條人跡罕至的路，試著去認識赤貧。要給出盟友之愛，就要理解愛是同在，而不是收受關係。沒有身入赤貧現場，就無法深入理解赤貧。最底層改善的是一種救根的絕對需要，這樣一來，才能達成最徹底的解放，也才能理解獻身的價值。

主在若瑟神父身上所動的工，是我要學的功課。感謝主，讓我與他的這本書相遇。謝謝志願者淑秀與艾山一家人在台灣的第二世界所做的。

【英文版推薦序】

## 窮人就是「我們」

克里斯多福·溫許普

(Christopher Winship,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美國人習慣用兩種看似南轅北轍的方式來思考貧窮。

第一種思考方式，廣泛流傳，就是把貧窮看成個人或家庭的匱乏與不足，收入或財富短缺，能力或教育、資源不足。在這股思潮裡，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右派人士，他們經常強調，窮人之所以窮，是由於他們道德上的缺失。這些預設分別導致了不同的政策，都試圖改善窮人的處境：一方面給與補助、施以教育和職業訓練，另一方面，抑制、懲罰不合規範的行為。即使預設林林總總，但是共通之處就是：都把貧窮問題視為個人與家庭問題。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有著獨特的個性與特徵，以至於無法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出人頭地。

另一種激進的思考方式出自左派，他們認為貧窮是結構性的問題，個人之所以會貧

窮，是因為他們被掌權者所壓迫。在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裡，窮人替資本案提供了過剩的必要勞動力。由於種族主義與歧視作用，美國黑人與其他少數民族淪落貧窮的比例比較高。第一種思考角度，強調個人的缺失與不足，第二種角度則堅持貧窮是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結果，而非個人因素。

即使這兩種解釋貧窮的方式看似迥異，一個強調個人的不足，一個強調社會結構，但是，兩者共通之處就是把貧窮與窮人當成「事不關己」的他者。若瑟神父的追問，特別是他在《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The Poor are the Church: 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這本書裡的追問，就在於，這兩種理解貧窮的方式，不管是各自孤立或結合起來，能否真的讓我們理解貧窮。如果我們閱讀第四世界運動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神父和記者吉爾·阿努以的這本對話錄，我們就會發現答案是否定的。

## 高姿態的憐憫分化世界

《親吻窮人》是一本基督宗教味道十分濃厚的書，甚至可以說是獨門的天主教風味。它告訴我們，除非我們默思耶穌的抉擇：像窮人般生活在窮人當中，否則我們無法了解



基督。若瑟神父斷言：「窮人就是教會」，他告訴我們的也是，如果教會離開窮人，她就不再是真正的教會。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遠離天主，是因為我們無能與窮人來往，無能分擔他們的苦痛、無法理解他們的傷痕也是我們的，或者更徹底地說，因為我們不能理解到：窮人就是「我們」(The poor are "us")。天主一直與窮人同在，如果我們無法和窮人合而為一，我們跟天主的關係就失敗了。

可是，這一切，對一個像我這樣的猶太人，甚或對一個不信神的人，有意義嗎？這本書只是寫給天主教徒看的嗎？在《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2001年四月十日的專欄，曾是天主教神父的知名作家卡洛 (James Carroll) 談到今天在美國風行的一種價值，叫做惻隱之心 (compassion)；某種程度來說，很接近若瑟的思想。卡洛想傳達給歸屬於各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惻隱之心的意思是「苦人所苦」(suffer with)，跟可憐他人 (pity) 不一樣。可憐是一種刻意保持距離的高姿態表達；可憐窮人意味著，他們值得同情，而且他們有失尊嚴。可憐之情把世界區分成救援者與可憐人，這樣一來，我們就維持了兩者的不平等。施捨同情的人常常比接受同情的人得到更多好處。

卡洛的論點是，惻隱之心意味著以平等之心，和窮人一起理解痛苦。這就要求我們改變自己和窮人的夥伴關係；也因此，決定改變是否發生的關鍵，不再是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或是我們願意給什麼，而是窮人要什麼。如果我們真有惻隱之心，我們會一視

同仁，將自己與窮人同等。這樣一來，以政治哲學的語言來說，我們會理解到，他們跟我們，都在同樣的道德層次裡面。我個人認為，這是《親吻窮人》的核心思想。如果我們以為自己和窮人的生活是不一樣的，以為我們的道德層次不一樣，那是我們自己的道德視野受到了遮蔽。

### 自以為義，會有什麼危險？

如果不能理解窮人就是「我們」，有什麼大礙？沒有真正的惻隱之心又怎麼樣？其實，我們跟窮人的關係是否合於天理，關係重大。如果我們以為自己跟窮人有關連，只是因為我們想試著補正他們的匱乏（不管是在哪個層次），我們就有可能自視優越，以為自己高他們一等；我們是施捨者，而他們是受助者；我們以為自己之所以投入，是出自高貴的情操。以這種方式幫助窮人，我們聲稱自己道德高貴，但是，同時，我們貶抑那些我們想要扶助的同胞的道德尊嚴。

如果我們把貧窮當成是一個結構性的不平等或是政策的不正義，我們落入的危險就是自以為為：窮人之所以落入這般處境，是別人的責任，與我無關。我們這就落入一個嚴重的陷阱，就是把自己當成有審判權的人；在這一點上，若瑟神父看到左派革命者所領

導的各種運動中有一個問題。若瑟神父強調，天主臨在於窮人之中，一如祂也臨在於富人之中；不應該用醜化富人的方式來美化窮人的道德地位。若瑟神父也認為，各種革命很少真正對窮人有過什麼助益，獲益的反而是革命分子本身。

如果我們只是隨意翻閱《親吻窮人》這本書，很容易會以為若瑟神父所談的窮人，那些處在極端貧窮中的人，那些被社會排斥的人，是如此悲慘與順服。他們在悲慘中清貧生活著，我們應該同情他們，一如我們也會同情被拋棄的悽慘小動物。這就完全搞錯若瑟神父的思想！他勇於見證說，那些他曾經一起比鄰而居、一起共事的人們，生活在赤貧中的人，有好幾次，他們動手打起架來。家庭暴力是活生生的，生活在各個層面都異常艱難，與他們分享生命同樣是困難重重。

或是，醜化窮人？

如果我們把場景轉換到美國社會，若瑟神父談的窮人，至少在某些定義上，就是美國人所謂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一九六五年《莫尼漢報告》(Moynihan Report)擔心非婚生的非裔美國兒童遽增，這份報告造成論戰之後，左派的學者光是談窮人的行爲就會被批評成政治不正確，更談不上分析了，因為只要你一開口就會被指責，

被認定在「歸咎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

威廉·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真正的弱勢者》(*Truly Disadvantaged*)一書之後，情況才有了改變。威爾遜力挺《莫尼漢報告》的研究角度，以及他對單親家庭的關切。如果說莫尼漢因為非婚生的非裔美國兒童的比例遽增到近乎三〇%而感到不安；二十年後，在威爾遜出版新書時，這個比例幾乎已經攀升到七〇%。對威爾遜來說，貧窮不僅僅是由於經濟的貧窮，它也跟非婚生子女的出生、長期失業、福利依賴、犯罪等因素有關。簡言之，越軌行為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下層階級」這個用詞現在被批評得很厲害，它認為是一種貶抑、醜化窮人的語詞。可以參看邁可爾·卡茨(Michael Katz)寫的《真下層階級的爭議》(*The Under-Class Controversy*)。爭議的焦點在於，下層階級這個詞語，隱含窮人在道德上有所缺失，也因此，缺乏完整的人性尊嚴。根據卡茨的用語，我們把窮人當成他者(the other)。

## 否認的誘惑

若瑟神父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他有辦法肯定、承認赤貧家庭，也就是他口中的第四世界，他們的生活真的是充滿種種難題，但，他同時斷言他們的尊嚴完整無缺。在某

些地方，他甚至說窮人的尊嚴超越我們。

我們怎麼能夠肯認第四世界，又不至於把他們當成與我無關的「他者」，甚至，視他們如自己?! 不要忘記，他們的生活充滿難解的問題。對若瑟神父和許多第四世界的志願者來說，這意味著和窮人比鄰而居，成爲他們的一份子。窮人就像你家庭中的一個成員，一起過活不容易，他可能一直製造難題，一輩子一無所成。他就是家裡的這個兒子或女兒，或這個姐妹，或這個老爸，是全家人一直想要否認、掩藏的一份子。但是，如果我們深刻地理解到，他終究是我們的家庭成員，我們就不得不依照他原本的面貌來接受他。若瑟神父的論點在於，（即使他並沒有特別使用這個類比）其實，我們不肯承認窮人是我們的一份子。爲了導正我們自己的道德，我們應該再次肯認他們，好讓他們也能肯認我們。

若瑟神父的論點打破老梗的陳腔濫調，對他來說，如果我們把窮人當成外人——不管他們的貧窮是源於哪一種型式的匱乏，或是受到其他人結構性的壓迫——我們都永遠無法跟第四世界，也就是跟生活在極端貧窮中的人，建立起真正的關係。只有當我們理解到，第四世界的人，在道德上跟我們是同等的，而且把他們視爲社會的完整成員，意思是，當成鄰居與朋友；或許在那時候，我們才有辦法開始面對極端貧窮的問題。這是一個激進的建言，意味著，光是慈善救濟、施粥送米、支付更多的稅金、明智投票、政

策倡導等等，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我們不肯根本改變我們跟窮人的關係，真正的改變是不會發生的。

## 人是一連串關係編織而成的網絡

即便在哲學方面，若瑟神父的立場都是激進的，他揚棄傳統的啓蒙／自由主義的概念，意即把自我當成一個獨立個體的概念。在這種哲學論點裡，窮人就是一些失敗的個人（或家庭），不管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缺失，還是其他個體不正義的行動所造成；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這種哲學論點認為，爲了減少貧窮，是這些個體要做出改變。

然而，在若瑟神父的分析裡面，貧窮表達的卻是整個社會的失敗，窮人只是（而且是悲劇性地）承擔了這個失敗的後果。依我看來，在若瑟神父的分析中，有許多方面是建基於貧窮的社群主義理論（communitarian theory of poverty）。社群主義的哲學與傳統的自由主義哲學的反差在於，他並非把人定義爲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一個個體被嵌入一個承上啓下的關係紐帶裡。由此可知，個人之所以貧窮，不是他們自己的個性特徵造成的，而是肇因於他們和社會其他成員的關係（或是他們缺乏關係）。貧窮的人，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之所以落入這般處境，是因為我們把他們當作「他者」。

我想透過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社群主義的立場。非裔美國新保守派經濟學家盧里（Glenn Loury）常常談到一個悲劇性的情況，就是有太多年輕黑人在美國因為輕微的毒品犯行被長期關押。盧里並不是說要讓他們通通離開監獄，因為他們畢竟觸了法，但是，讓他憤憤不平的是，整個社會默許這種情況。他的論點是，如果這些年輕人出自中產階級的白人家庭，這麼長的刑期肯定不會被接受，我們這整個社會應該尋求其他的解決方式。正是因為我們把黑皮膚的年輕人當成「他者」，我們才會接受用關押的政策來處理他們的毒品犯行。

## 拒絕社會孤立

若瑟神父根據一種深刻的天主教角度來理解窮人的處境，但是，他所傳達的訊息卻不只是爲了天主教徒，而是爲了我們每一個人。他召喚我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理解貧窮，不光是把它當成一種窮途末路和社會壓迫，同時也是理解它造成的社會孤立。而這樣的社會孤立，是我們一起造成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份；就是因爲這樣，我們的生活和窮人遠遠分隔開來，到最後，我們甚至沒有了悟到，他們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

在猶太文化裡面，生活在極端貧窮中的人和被社會孤立的百姓，被描述成「異鄉人」

(the stranger)。中世紀偉大的猶太智者麥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 在他系統介紹《猶太法典》的《密西拿·妥拉》1 (Mishneh Torah) 中說：

珍愛那個投奔於上主羽翼下的異鄉人，就履行了兩條積極的戒律：首先，因為這樣一來，他就被融入了我們的鄰里（我們必須義不容辭地去愛鄰人）；其次，因為他是異鄉人，而《妥拉》說：「為此，你也應該愛異鄉人。」（《申命記》10:19）上帝要我們充滿對異鄉人的愛，一如祂要我們愛祂。經書說：「你當愛上主，我們的神。」（同上 6:5）祂是唯一且神聖的，祂愛異鄉人，就如同經書記載的：「而且祂愛異鄉人。」（同上 10:18）

若瑟神父和麥蒙尼德，在我看來，有一個很深的共識，那就是，天主要求我們尊敬窮人。

譯註1：《妥拉》(Torah) 共有五卷，又稱《梅瑟五書》，是《舊約聖經》的前五卷，即梅瑟給以色列人宣布的法律，包括〈創世紀〉、〈出埃及紀〉、〈肋未紀〉、〈戶籍紀〉與〈申命紀〉。誦讀《妥拉》是猶太人生活的重心，「妥拉」的原意是「射中目標」，引申出來的意義包括「教導」、「指示方向」、「引導」。猶太人傳統說法裡面，梅瑟寫下成文的《妥拉》之後，上帝又口授給他另一本不成文的妥拉，稱之為《口傳妥拉》，《密西拿·妥拉》是《口傳妥拉》的第一部編纂集，共六十三篇。



【法文版序文】

## 以「盟友」的身分，提供微小的服務

吉爾·阿努以

十二年前，我在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de Paris）任教時，一位優秀學生在一次期末考結束後，請我幫忙引薦他進入新聞界工作。透過朋友的協助，我順利幫他爭取到一個國際知名報社的實習機會，於是我馬上打電話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謝謝您的幫忙，」他回答我，「但是我改變志向了，我決定要到貧民窟工作。」「你真熱心！你是要為非洲馬格里布來（Maghrébins）的移民服務，還是到其他移民聚居的貧民窟呢？」我問他。「都不是，是和您我一樣的法國人，他們成千上萬，隱身在法國的各個角落。」

當下驚訝的心情至今依然記憶猶新，身為記者，在職業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訊息，因此我聯絡上了若瑟·赫里斯基神父，並且認識了他所創立的「第四世界運動」，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我們的社會中，卻被人們忽略遺忘的第四世界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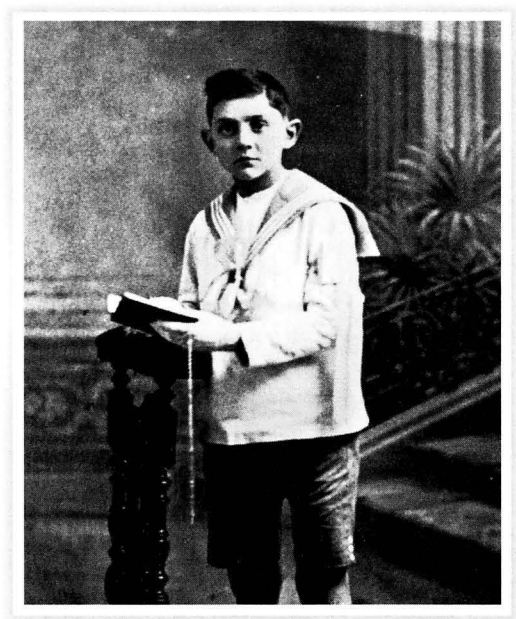
當我的學生成為第四世界運動的持久志願者時，我也以「盟友」的身分，盡力提供一些微小的服務，正如第四世界運動對盟友的定義——在自己的崗位上，竭盡所能地參與這場抗貧運動。

然後，有一天，為了以盟友的身分做出更多貢獻，我用自己唯一的工具：記者的專業，向若瑟神父提議以訪談的方式撰寫一本書，神父秉持一貫審慎的處世態度，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爽快答應了。我永遠忘不了那段在第四世界總部皮爾雷（Pierrelaye）共度的訪談時光，通常是在週六的上午，若瑟神父堅定的圓臉充滿感情，他總是以專注又深切的眼神，既謹慎又充滿熱情地回答每個問題。在訪談工作告一段落時，他經常問我：「您覺得這些訪談讓人感興趣嗎？」對此，我從未產生任何疑慮，讀者自有公斷。況且，光是「讓人感興趣」，實在不足以形容若瑟神父所要傳達的訊息。

很遺憾，我無法和若瑟神父一同完成這本訪談錄，因為新工作的關係，我被派任到日本，世界的另一端，而早已習慣收拾善後的若瑟神父，後來是在志願者奧莉婁·德·佛絲的協助下，完成了此書的定稿。

最後，衷心感謝若瑟神父接受訪談。事實上，這不是神父和我之間的對話，而是和所有本書讀者的對話。

前言  
與若瑟神父相遇  
1



孩提時代的若瑟神父。

初次閱讀若瑟·赫忍斯基神父與吉爾·阿努以的訪談錄，便覺得這是一本撼動人心的書，一篇能和每個人的核心信仰產生共鳴的見證。若瑟神父在本書一開始便直指核心，切入最重要的問題；而神父的簡介，及其一手創立推動的第四世界運動的重要事蹟，則一直到書末才提起。遇見過他的人，即使僅有一面之緣，都知道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就是見證窮人的教會——不是教會歸一邊，窮人歸一邊，而是教會與窮人密不可分，兩者實為一體。

矛盾嗎？剛開始我們會如此認為，因為在我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教會與權貴掛勾而背棄窮人的畫面，我們對教會充滿了反感。是要為教會辯解或找藉口嗎？這不是本書的重點。經由若瑟神父，我們突然有了另一種看法：教會是窮人的教會；教會就是窮人，僅此無他。教會最真實的面貌就在於此，因為這是她的權利，也是事實；是她的使命，也是存在的理由；這就是她的本質。

若瑟神父用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談教會，一個可以回溯到童年的體驗。沒有激動的語調，他以自然、實在的口吻來談論貧窮者、被排斥者的教會與運動，談論他們赤貧的生活、他們喪失的權利和遭逢的羞辱；他跟我們談第四世界，這個詞彙，是由若瑟神父所創，現已被廣為採用。他所說的一切，推翻甚至顛覆了我們對教會、對基督宗教的印象、看法和感覺。或許，就如同耶穌再次來到我們面前啓示〈真福八端〉<sup>2</sup>。事實上，〈聖

《經》中的諸多教導，與歷史上眾多教會賢哲不都曾見證過這個訊息？瑪利亞透過《謝主曲》<sup>3</sup>所表達的，還有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çois d'Assise）、聖文生（Vincent de Paul）、余剛貞（Jeanne Jugan）、嘉祿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等等，事實上，這就是福音的教會，耶穌的教會，這正是若瑟神父透過本書想傳達的。

在這強而有力的訊息面前，我們編輯慣有的憂慮顯得多麼平庸！我們提議重新編排本書的順序，將介紹若瑟神父生平的故事和第四世界運動的事蹟放在最前面。敘述性的故事不是較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嗎？以編輯的標準（一些不見得多有道理的標準）來說，我們原本打算調整章節的順序。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極可能使若瑟神父原創的視野走了樣，我們很可能打亂他強有力的直觀，把他的訊息包裝成隨著事件的發生而建構的想

譯註1：由於本書完稿時吉爾·阿努以人在日本，所以前言由察爾·艾霖吉（Charles Ehlinger）擬定。

譯註2：〈真福八端〉又稱〈山中聖訓〉，被視為福音的精華，記載於《新約聖經》〈路加福音〉與〈馬太福音〉（又譯〈馬太福音〉），聖訓的第一句便是：「你們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譯註3：瑪莉亞的〈謝主曲〉記載於《聖經》〈路加福音〉1：46-55，「（……）祂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祂曾使飢餓者飽饜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法，以為那些思想純粹是事後省思與合理化的結果，而將他思想的精華放在補充性的次要位置。然而，這些直觀、這份訊息實在是光照行動的力量和緣由。它們必須放在第一位，在書中理當居首位，幸好本書的編排最後還是保持原貌。

接著，要在正文前面放一篇介紹第四世界運動的短文。如果放一篇描述性的文章很可能會再次扭曲原本的視野。起初，我只是建議神父接受一場初步的訪談，請他簡短談論一下他的計畫；有一天早上，他來到出版社，我已經準備好幾個問題要問他，但是，若瑟神父卻直接交給我一篇見證，自然而平實。這篇見證是如此重要，如此具有啓發效果；其文筆之流暢深刻，我只能一字一句地忠實呈現，只在三、四個細微處稍加潤飾，並將之收錄於後，即〈除一己之身，無他可奉獻〉。幾天後，若瑟神父又寄給我另一篇文章，即本文後的〈在可怕的暴力循環中長大的小男孩〉，內容描述他的童年與他的母親，事實上，他就出生於第四世界的教會中。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們很快便感覺到，若瑟神父談到自己時並沒有表現絲毫的自滿與驕傲，他沒有對自己多做著墨。在以生平、自傳為主題的文章中，這樣的謙遜態度實在是件稀有及令人驚訝的事。我們在閱讀伯鐸神父 (l'Abbé Pierre)、以馬內利修女 (Sœur Emmanuelle)、德蘭修女 (Mère Teresa)、戴伯鐸神父 (Le Père Depierre) 及其他神父、修女的故事時，也有相同的感動，他們如同一個指標、一個召喚，帶頭獻身

於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將所經歷、所得到、所成就的一切，皆歸於天主的恩賜，好像他們的一切作爲平凡無奇，好像他們先知般的舉動，只是天主在各種環境中水到渠成的結果。他們不求自抬身價，只想與世人分享一個遠景、一個恆久的掛慮、一項行動、一份使命，就好像這一切不專屬於他們。聆聽若瑟神父和其他類似的人物，我們會以爲他們好像沒有憑一己之力做過什麼，即便有也非常少，近乎一種無爲；他們幾乎感到抱歉，因爲他們認爲自己剛好被放在這個光明和慈悲滿溢的十字路口、這個爲人類奮鬥的戰場前線。他們在那裡與現實會合，這現實迫使他們去反應、去創造、去行動，總而言之，就是眞眞實實去愛他們的兄弟。他們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向前推去，無法抗拒。他們是無爲而爲的「被動者」。多麼有福氣的被動者，那絕非冷漠，反而是一種平易近人、任憑處置、脆弱易傷，且樂於接受的態度。那恩典，是任憑自己被攫獲、是徹底「承擔」，是「受苦」，「承擔」與「受苦」兩者意義相近。這樣的一種被動的「無爲」(passivity)包含了英文中 *passion* 這個字的雙重意義：苦難與熱情，任憑內在被攫獲並且毫無保留投身其中。正是這種無爲的被動和熱情，產生了他們超群果敢的行動。

爲了幫助您進入本書，我們將若瑟神父親自撰寫的兩篇文章放在正文之前，第一篇敘述他的童年生活，第二篇則是若瑟神父的直觀，那是第四世界運動賴以建立的基石。

## 【若瑟神父的見證一】

### 在可怕的暴力循環中長大的小男孩

追溯童年最遙遠的記憶，我仍記得醫院的長型大廳，還有母親在照護我們的護士修女背後大叫，我當時患了佝僂病，為了矯正我那雙腿而住院。

那天我告訴媽媽，醫院的修女不肯將上個禮拜天她帶給我的包裹拿給我，媽媽知道後非常憤怒，因為她當時一定費了好多力氣，才為我買了這些糖果。媽媽當場把我從那些修女們的手中拉走，二話不說就帶我回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至今仍是弓形腿的原因。年少時，我必須不斷忍受這個殘缺帶來的嘲笑和愚弄，也常因輕微的跛腳而感到丟臉，特別是在青少年時期。

也因此，在我的記憶中，與他人的第一次接觸，就是不義與傷害，而這傷害肯定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痕。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無法無視今日在達建區、貧民窟和緊急收容中心裡，那些流著鼻涕的臉龐、那些用鐵器固定的雙腳，還有那些年紀輕輕就已傷痕累累的身體。

我的母親在修女背後喊叫，這並不讓我驚訝，我早已習慣了這些吼叫。在家裡，



爸爸不時破口大罵，他常常打我大哥。讓我母親感到痛心的是，大哥總是用頭顱來抵擋爸爸的拳腳。他也常辱罵媽媽，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很久以後，一直到我成年，一直到我分享了其他像他一樣的男人生命，遇到其他處境與我相同的家庭時，我才理解到，我的父親是個受傷受辱的男人，他一生挫敗連連，所以受苦不已；他因為無法供給妻兒安全與幸福而感到羞愧。

赤貧的惡就在這裡，一個男人在面對這樣的羞辱時，不能沒有回應。而貧窮的男人，今日一如昨日，都是以暴力的方式來回應。

當時，對我這個小男孩來說，那種環境將我導入一種可怕的暴力循環中，暴力是回應每天遇到的各種障礙和困境的方法。而在我還沒意識到之前，一如我父親，暴力已成為我洗刷羞辱的慣用手法，而赤貧帶給我們的羞辱多如牛毛。

即使過了這麼多年，至今仍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的父母終日談錢，他們沒有錢，但卻不停為了錢爭吵。當家裡有一點錢時，他們又為了花用的方式起爭執。

不久之後，父親離開我們了，孤單的母親竟日與我們談的還是錢。每當她談到那些我們有機會交往的人時，她總是說：「他們很有錢。」堂區的那些神父，在她眼中是有錢人，甚至連街角那個小雜貨店老闆，在她眼中也是有錢人。不是因為母親心懷嫉妒，而是因為當一個人處於饑餓與匱乏時，只能寄望那些有能力填補匱乏

的人。這種情況一直沒變，在我們所處的大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所有的利益、爭吵和交易，最後總會回歸到錢的問題上。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已投入這片為餬口而奮鬥的戰場。當時我才四歲，就得帶著家裡那頭山羊去低地吃草。那頭羊養活我剛出生的妹妹和我們其他幾個小孩。在放羊吃草的路上，我總會經過善牧修女會會院的大門前，有一位修女偶爾會和我說幾句話。有一天，她問我願不願意擔任每天晨間彌撒的輔祭。那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受僱，對我而言，那真是一種僱傭關係，因為每天彌撒結束，我都可以得到一大碗咖啡牛奶、麵包和果醬，在節慶的時候，還會塗上奶油。另外，修女每個星期還會給我兩法郎的報酬，就是這兩法郎讓我做了決定。

就這樣，在五歲之前，我已經開始負擔家計。有將近十一年的時間，媽媽每天早上得叫醒我，好讓我趕赴七點的晨間彌撒。至少需要十分鐘，我才能跑到修院牆垣後面的小教堂。冬天總是很冷，漆黑的清晨也讓我感到害怕，但不論颼風下雨，為了讓媽媽每天都能收到四十分錢，即使睡眠惺忪、蜷著身體，有時甚至憤怒咆哮，我都得沿著聖雅各路，然後經過牧場附近那條偏僻又可怕的波爾特路，才能抵達修女們的修院擔任彌撒輔祭。我想，不能說我從未缺席過，但我整個童年的回憶幾乎都圍繞著這件事。

我們的飢餓一定令媽媽痛徹心扉，她才忍心將小小年紀的我，日復一日地推送到這條路上。我也一定感受到她的慌亂與不安，才會接受這項差事，而沒有變得乖戾，也沒有詛咒上天。

不久之後，我連中午也得往返這條路。因為我們當時是社區裡最貧窮的人家，所以每天中午一放學，我就會趕快再跑到修院，用飯盒或罐頭盛裝修女們吃剩的飯菜。乾豌豆、小扁豆、馬鈴薯，有時候會有幾塊肉，這就是善牧修女們給我的食物，不能忘記還有那一大塊麵包，那是我們一家人最主要的食物。

就這樣，為了讓家人免於飢餓，我青少年時期的每一天都被善牧修女們的生活、祈禱和食物所牽引著。

今天，每當我看到那些在垃圾堆裡撿破爛，或是跟在父親推車後面，正要上路去清理別人家地窖或閣樓的小孩時，我常常會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們穿越大街小巷，收集破銅爛鐵，而我則是去當輔祭，在修院門口等待食物。今日一如昨日，貧窮的孩子沒有童年，他們的雙腳才剛會站立，就必須開始分擔責任。

當然，就像今日所有的窮孩子一樣，我也曾玩耍嘻笑。當然我也有自己的秘密基地，有自己的冒險路線，還會和玩伴們一起想像在昂熱（Angers）這個舊社區裡的一些迷宮走法。但是除此之外，還有這條每天不得不走的修院之路，這條童年的

自卑之路，它們完全抹去我記憶中那些值得欣慰的回憶。

自卑之路不僅一條，卻都和每天糾纏不清的食物需求有關。我眼前浮現自己還是小男孩時的身影，我將那瓶胡桃油帶回去給雜貨店的老闆，之前我花了五十分鐘請他裝滿。如果油沒有滿到瓶口，媽媽就會要我回去老闆那裡，要求再多添幾滴。這就是窮人為了填飽肚子所做的奮鬥，一場永無止盡且充滿羞辱的奮鬥。

後來，換成必須把太硬的馬肉拿回去給肉鋪老闆，因為我七歲時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幫肉鋪老闆娘瑪莉·露意絲跑腿購物，而她則每天給我價值兩法郎的馬肉做為酬勞。媽媽要求這塊肉必須新鮮、柔嫩，所以當我帶回家的肉太太硬時，她會毫不遲疑地要我折回肉鋪，去替家裡爭取品質最好的馬肉。

為了洗刷深沉的自卑，我們是強悍的，我總是不自覺地以拳腳來減輕負擔家計的重擔。還記得六歲時，我就曾在矮樹叢裡以拳腳壓倒過一個小對手。

當媽媽到幼稚園去找修女，問她我可不可以上小學時，修女回答道：「當然，帶他去上小學吧！這裡沒有一個小朋友沒被他打過的。」

就這樣，打從幼兒時期開始，金錢的匱乏、自卑與暴力早已連結在一起。

我不記得放學回家時看過母親的笑臉。她被我父親遺棄在法國，含辛茹苦，獨自扶養四個孩子。而父親卻一直音信全無，尤其是他該寄回家的錢遲遲沒有下落，

家裡卻有瓦斯費要付、冬天的煤炭要買、廚房的鍋子該換……。

家裡一年到頭都很冷，我們住的是以前的打鐵鋪，到處都是穿堂風。風從門縫下方、從牆板的空隙鑽進來，其中的一面牆板是由包裝紙糊在木箱上做成的，當牆紙破裂時，風就猛烈地抽打在我身上。

家裡之所以冷，也因為我們的公寓每一戶人家的煙囪通風管都相通，這個通風管經常堵塞，每次我們家生火時，樓上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就會怒氣沖沖地下來罵我媽媽，因為他們家會因此而煙霧瀰漫。為了不招惹是非，媽媽只好把火爐裡那些我們從瓦斯工廠的廢料堆裡找到的煤炭拿出來。那些我們辛辛苦苦撿來的煤炭，不但沒有幫我們抵擋屋裡的寒氣，反而讓我們感到更加寒冷。

如何解釋我母親這種消極的態度呢？今天，我在各地遇到的許多貧窮母親身上，也發現同樣的態度。她擔心與鄰居交惡，這憂慮可能來自於疲憊，但更可能是因為恐懼。母親自知身為移民需要更加謹慎，她一直害怕別人會將她遣返回她的祖國西班牙，怕警察會以莫須有的理由將我們抓走，一如那些緊急收容營區裡的母親們，總是害怕有人會來傷害她們。

那個裁縫師的女兒德蕾莎，常因生火的事來找母親的麻煩，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火鉗對著她揮舞吼叫，那時我還很小。我已經忘記當時在憤怒中對她說了什麼，

但從那次之後，我們家那可憐的爐火得以在殘破的爐灶上繼續燃燒。為了修補爐灶，我們得不斷地到附近的牧場去撿拾黏土。

我母親經常向旁人抱怨一切讓她苦惱的事，抱怨我給她添的煩惱，抱怨我落後的成績，還有我尿床的事。這又是我背負的另一項恥辱，因為整個社區的人都知道這些事。窮人不會遮掩他們的傷口，他們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掩飾那些令他們筋疲力竭的困境。

不過，我能夠順利參加小學畢業資格考，全都得歸功於我的母親。在這所獨立招生的天主教學校，我們是少數幾位沒有支付學費的學生，我們一直都是班上成績最差的孩子。也因此，在畢業考時，校長不願冒險幫我報名，之前他也沒替我大哥報名，那時母親並沒有任何怨言。但是輪到我時，她不再甘心屈服，她知道我不笨，她知道我身上背負太多責任、太多痛苦，也遭受太多不公正的對待。慈善救濟一直是以施捨的態度送到我們身上，它從不被視為我們應有的權利。也因此，不義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母親不願意在我身上多加一樁。是她幫我報名畢業考的。

直到今天，我才體會到母親為了保護她的孩子們飽嚙憤慨，需要多少勇氣面對。當堂區善會的女施主計畫將我送到歐特耶（Autueil）的孤兒院去時，母親再一次頑強地保護我，她緊緊靠著牆，將我藏在她身後，不讓我被帶走。這計畫表面上看起來

合情合理，但對於出身貧窮的兒童及他們的母親而言，讓自己的小孩脫離家庭被別人撫養是多麼大的羞辱。

我清楚地見識到母親這次爆發的尊嚴，她拒絕了女施主的好意，她寧願放棄堂區善會的救濟。

事實上，我們早已脫離了其他人的生活圈，我們太窮了，是被社區摒棄在外的一群，其他人和我們接觸不是基於友誼，而是出自救濟。

我們不是社區裡唯一的窮人，我還記得那個經常醉倒的母親和她的私生子。傍晚回到家時，他經常發現自己的母親醉倒在廚房，他會把她拖到床上，幫她蓋好被子。有時他會到我們家來，母親會讓他與我們同坐，和我們一起分享麵包和熱湯。

還有那個被稱為巫婆的老太太，她不肯讓狗兒在她的窗前停留。我們這些孩子卻總是把她家的牆面當成撒尿處，她常為此痛罵我們。其實我們很喜歡她，所以才會故意逗弄她，我們就不會故意去惹火屠夫黑帝，或是木匠西斯；他們是社區的頭頭，不屬於我們這個世界。

有一天，人們發現巫婆餓死在自己的破屋裡面，長達十五天的時間，都沒人詢問她出了什麼事。那天傍晚，母親哭了，因為這事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她說：「誰會在乎我們呢？有一天我死了也不會有人關心。」

我是否從母親那裡學會奮鬥？不是為了洗刷自己所受的屈辱，而是為了讓一群被排斥的子民獲得自由。

有一天，一個名叫西賽的男孩，學校裡身材最壯碩的學生之一，他在狂怒中痛打一個遠比他瘦弱的小朋友，把他逼到廁所的牆角，對他拳打腳踢。當時我到底怎麼了？我見狀立刻向前撲去，換成我對他拳打腳踢，我甚至猛抓他的臉，直到老師趕過來，用力把我從他身上扳開。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那個瘦弱的小男孩和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為他打架？然而，深植在我記憶中的並不是我所受的懲罰，而是他。當時我被學校退學，但打架之後發生什麼事，我幾乎都記不得了。留在我腦海中的，是這個弱小的男孩，被一個比他強壯好幾倍的西賽欺負。對我來說，那是個轉捩點，是一場奮鬥的起點，在這場奮鬥中，我可能會失敗，但固執如我，會一輩子堅守到底。

但是，要成為被排斥者的鬥士並不容易，因為我們之所以要成為鬥士，不是為了分散四處的個體，不是為了這邊一個酗酒的母親，那邊一個被視為巫婆的老太太，或是一個弱小的孩子。我必須在人群中認識他們，必須體認到自己屬於這群子民，必須在成年後，在我們城市邊緣垃圾場周邊的社區裡那些男孩身上認出自己，從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憤怒的哭泣中認出自己。他們繼續生活在我童年的赤貧中，他



們告訴我，一群衣衫襤褸的子民持續存在著。

我們有能力終結這個持續存在的赤貧，如果我們願意伸出援手，明天，赤貧將不復存在。如果我們願意幫助這些年輕人，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零星散落各處的個體，而是一群子民；如果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將他們的暴力轉換為目標清楚的奮鬥，協助他們以愛、希望和知識為後盾，如此才能終結無知、飢餓、施捨，以及被社會排斥所帶給他們的羞辱與痛苦。

這將不僅僅是政府的事，也是那些願意與被排斥者並肩同行者的事，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生活與赤貧者連結在一起，有時甚至放下一切，只為分擔赤貧者的命運。

## 【若瑟神父的見證二】

### 除一己之身，無他可奉獻

以下，若瑟神父將為第四世界運動存在的緣由做一個簡短的說明。

我們並不是開創者，我們只是繼承者。前人開路植樹，在現代教會中、在法國及世界各地，創立了一些運動，來和窮人、被社會排擠的人接觸相識。高丹神父

(Abbe Godin)、戴伯鐸和伯鐸神父<sup>4</sup>等人，早已開啟了一扇扇通往赤貧世界的門。我們處於一股精神靈性的潮流、一股內心智慧甚於理論思想的潮流之中，這股潮流帶領我們與窮人、與赤貧世界的人相遇。那些為了爭取和平、糧食和正義而出現的運動與抗爭，多少都有一些共通點，就是他們都關心最弱勢的人。我們不是開創者——雖然赤貧迫使我們不斷地開創新局——或許可以稱我們為改革者。

那麼，我們的特殊之處在哪裡呢？在第四世界運動創始之初，這個社會是充滿自信的，所有人都相信，社會福利方面的發展進步，必然會消滅赤貧，每個人都確信成功在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般人怎麼會相信我們所言關於赤貧的種種呢？這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伯鐸神父特別強調那些飽受困苦者存在的事實，第四世界運動則著眼於赤貧者的家庭面向。在當時，這是非常大膽的舉動，因為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對家庭失去興趣，社福機構和政府機關也一直不明白我們為何如此重視家庭。我們為何如此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因為當一個人失去一切，家庭是他唯一的避風港：唯有在那裡，還有人會迎接他；唯有在那裡，他還是某某人。在家庭中，他找到自己的身分，他的家人、子女、配偶、伴侶……構成他最後的自由堡壘。就算子女從自己身邊被強制帶走，父母親仍會時時刻刻惦念著自己的孩子。我們因為堅持這樣的家庭觀念，而被歸為保守派；為此，我們受了很

多苦，但我們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動搖。

第四世界運動從一開始最關鍵的一點，便是我們除一己之身，無他可奉獻。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既不是平價住宅組織，更不是社福單位的社工人員，我們唯一可奉獻的就是一顆熱血沸騰的心。我們極端地貧乏，身無長物，所以赤貧家庭接納了我們。我們毫無勢力，既無政治權力，也無社會力量，更沒有宗教團體的支持與保障；我們赤手空拳來到赤貧的核心。我們所能奉獻的，只有我們自己，我們這群男人和女人，決定奉獻自己的生命，來和那些被遺棄在赤貧中的人共同奮鬥。

人，以及提昇人的價值，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我們從一開始就期待，這些生活在赤貧中的家庭，能夠挺身護衛同樣落難的同胞。我們來自遠方，什麼人都不認識，卻和窮途末路的家庭相連。他們中大多數的人，一生所經歷的，只有貧窮、無知、

譯註 4：高丹神父（1906-1944），法國「工人神父」的先驅，他和另一位丹尼爾神父（Yves Daniel）在一九四三年出版了《法國，使命之國》（*France, pays de mission ?*），他們發現法國的天主教會嚴重地脫離工人階層。戴伯鐸神父（Père André Depierre, 1920-2011），也是「工人神父」風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九五四年羅馬天主教下令禁止工人神父運動，認為「神父」與「工人」兩種身分無法並存。戴伯鐸神父是少數相信禁令可以複審的工人神父之一，他不斷上訪，一九六〇年才獲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ean XXIII）的接見。一九六五年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結束時，工人神父的禁令才解除。

疾病和失業，總之，就是被拒絕與排擠。我們希望他們團結的熱忱能夠變成一種保證，使這個社會願意重新接納這些家庭，讓他們能夠和大家一樣為自己負責，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言語負責。這份團結的熱忱，就是要證明人有種種的可能，因為終點未到，大家都還有機會。如果在赤貧纏身的情況下，最貧窮的人仍能共生共榮、團結一致；如果比無產階級更窮的人能夠相信，消費和利益不是生活和社會唯一的動力，那麼每個人眼前都將呈現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徹底改變的遠景。我們提出的是另一種人際關係的形式，和另一種奮鬥的目標。

但這計畫真是困難重重！這些困難，來自富裕的社會既不願意也無法看到赤貧，他們宣稱赤貧已被徹底消滅了。因此，我們必須為我們之所見所聞做證，但光是用心去宣揚見證還不夠，還得讓這個時代的人能夠理解信服，為此，第四世界運動成立了研究中心。我們握有證據，不但能夠證明赤貧者一直存在於我們中間，而且他們本身就是證人，指稱我們違背了自己的信念、宣言和理想，使他們生活在如此的赤貧中。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項政治行為，透過證據來揭發真相，並且提出建議。它也證明，赤貧族群能夠讓不同背景的人團結在一起、共同奮鬥，好讓處境最不利的窮人有辦法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它也指出，妨礙這些赤貧家庭負起他們對家庭、社會、政治及宗教的責任，徹底背離人權。

另一個必須強調的重點是，面對這個設法圍堵赤貧的富裕社會，我們的運動一開始就決定要成為「跨」宗教、「跨」政治，而不是「非」宗教、「非」政治的運動，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我自己體驗過，天主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友所受的教育引導他們去愛周遭的人，是何等幸運。我曾拜訪過一些機構，他們雖然渴望為赤貧者的解放奮鬥，卻力不從心。我想，我們應該把我們這些信友的好運散播給每一個人，要讓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信仰、觀念和文化為何，都能走到社會的最底層，對我來說，這是公平正義的問題。我們歸屬於一個教會，我們很難想像對於那些沒有機會體驗教會氛圍的人，這一切有多麼不容易。每個人都應該能夠將最貧窮的家庭視為相遇的焦點，凝聚在一起，積極參與解放他人的行動，救贖彼此。有些人從小沒有機會學習到把眼光轉向別人、轉向最不幸的人，我們很難體會他們面對赤貧時遭受的痛楚，因為他們無法理解耶穌基督認同了赤貧者，且毫無保留地選擇了赤貧者的處境。關於這點，我們也並非時時意識到我們得之於教會的種種。

第四世界運動的第一位法籍持久志願者是名無神論者，在面對赤貧時，她依憑的只是正義感和強烈的人道精神。那些家庭的失敗折磨著她，甚至擊潰她的心志。她無法超越這一切，她無法接受失敗，因為對她來說，失敗之後便無出路。如果我說，「跨宗教經驗」對那些從小沒有機會學習把眼光轉向旁人的朋友，是一項正義

之舉，這句話並沒有任何傲慢的意思。每個人心中都有溫柔寬厚的一面，需要被發掘出來，並付諸行動，而這項特質必須從小就被訓練養成。慈悲之舉，就是一種與他人分享的需要，能夠對別人最深沉的痛苦感同身受，能夠背負別人所受的苦，並將這痛苦化為希望，這就是教化或皈依的效果。

在第四世界運動，我們先看到人，直接與人來往，而不是透過服務計畫或組織結構。只要我們不將自己侷限、封閉在一個組織裡，我們便能靈活地和其他人一起活出理想，分享一個社會性的計畫。如此一來，你便可以將最貧窮的家庭置於世界的核心；將最窮苦者置於核心，便是在一個人身上擁抱全人類，這並非是目光短淺、視野狹隘，而是要將目光視野推展到愛的邊界。然而，愛沒有界限，愛不封閉自己，愛無法控制，愛是瘋狂的。

首先，必須大膽地將赤貧者與耶穌基督相連：他們實為一體。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遺棄任何人，不論貧窮或富裕，不論他該為自己的貧困負責，抑或他是赤貧的犧牲者。在愛中，是沒有疆界之隔的；每個人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每個人的命運都緊緊相連。

當我終於抵達諾瓦集貧民區（Noisy-le-Grand camp）時，我對自己說：「這些赤貧的家庭，絕對無法單打獨鬥，靠自己翻身，如果我留下來，我要讓他們走上總

統府，一直到梵蒂岡、聯合國，以及各個大型的國際組織。這些家庭必須成為完全的參與者。」有些人會認為，這個浮現於一九五六年仲夏，出現在諾瓦集這個不毛之地的奇想，多麼荒謬可笑！哥耳哥達（Golgotha）<sup>5</sup>的基督環顧世界，確信祂已戰勝了世界。凡是將最貧窮者置於視野核心的人，無法不看到全貌，無法不擁抱眾人，他更不會將任何人棄置一旁。就某方面而言，也可以說他已戰勝了世界。

若瑟·赫忍斯基神父以近乎告解般慎重的語調，分享了他的心靈世界，以及他的想法與堅持。能夠記錄下這樣一份「告白」（avowal），一份結合人道關懷、教育、教會信仰等視野的分享，是一次動人的經驗。如何才能讓這份撼動人心的分享不僅僅是一種過眼即逝的情緒？如何才能讓這些見解深植你我的心靈？這就是本書出版的目的。若瑟神父在做完最後極端細密的校訂工作，並將完稿送交出版社之後，在書上留下了這句話：「祈願本書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使世人愛上教會，並且激勵更多人一起參與這場對抗赤貧的奮鬥。」他讓我們看到、聽到生活在第四世界核心的那些男男女女，他們的所見所聞，和所經歷的一切。如果沒有第四世界運動，那些在生活與工作上再三遭受排擠的

譯註5：哥耳哥達乃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又譯加爾瓦略、各各他，意思是髑髏地。

人，很可能被屏除在這個社會的團結關懷之外，甚至被遺忘。果真如此，人類與教會將是何種面貌？仁慈、博愛、正義、慷慨這些冠冕堂皇的言詞，都將成爲謊言，最嚴重的謊言。果真如此，文明勢必沉淪，教會就背離了真理。本書見證一種堅定的拒絕，拒絕人類的團結關懷遭到破壞。



# 第一章 教會是窮人的教會

最貧窮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實。



若瑟神父（右二）和法國東北部的蘇瓦松（Soissons）修道院的修士們，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修院後來被解散。

吉爾·阿努以：

出版一本書，特別是一本這樣的書，並非平凡的舉動。若瑟神父，你為何接受這本書的採訪？

若瑟神父：

首先，我認為二十五年來第四世界的家庭教給我們的一切，必須被報導出來。這些處境最不利的家庭教了我這麼多，我沒有權利將這一切保留給自己，我有義務要將他們轉達給這個社會，使其從中獲益。我也必須將之傳達給教會，好使她充分意識到她之所是。一切有價值的言語不都有權訴諸文字嗎？有權成爲其他人能夠接收的訊息，特別當這些言語來自處境最不利的人群時。進入文字也就是進入了歷史，如果我們能夠寫下第四世界的訊息，我們就在消滅赤貧的路上邁開了一大步。

再者，身爲教會的一份子，我的生命獻給了她，而且我的看法及思想並不屬於我自己，甚至那些我在最貧困者身邊展開的行動也不是我的，它屬於教會，至少那是我最深的渴望。在我的神職生涯中，我的種種行動都出自協助建立教會的意念，我必須將一塊又一塊的石頭堆砌起來，不只是將最貧窮的子民領進教會，不只是讓教會更積極地參與窮人的解放，我應該做的是：將這些家庭放在教會的基底，放在她賴以建立的根基。

這就是爲何我日復一日，一直想書寫赤貧者歷史的原因之一。我和那些圍繞在我身

邊的朋友從六十年代開始這項嘗試，我們確信可以藉此找到教會原本的面貌。事實上，一路走來，我還是需要時間，才漸漸發現到天主透過赤貧與第四世界表達出來的召喚與焦慮。

你說第四世界是教會原本的面貌，這些家庭對天主的呼求比當代一般人還強烈嗎？

我實在無法直接回答，但是我可以見證這些家庭在受邀分享他們對生命、死亡、對人、對天主等重大問題的思考上，所表達的濃厚興趣。今天我可以見證他們對天主與教會的渴求。

我隱居在諾瓦集無住屋者營區那段期間，這種渴求的強度常常讓我感到驚訝。這些家庭處於極度的匱乏之中，他們家裡經常連炊具、椅凳都沒有。可是，當人們談到教會時，他們卻把她當成自己，他們會說：我們的彌撒、我們的本堂神父、我們的教會……他們抱怨神職人員沒去拜訪他們，抱怨無法在教堂感到自在，就好像別人從他們身上奪去他們的財產；他們如此抗議，就好像他們被拋棄在自己的家門外。總而言之，聆聽他們之際，你理解到他們成為教會的權利被否定了。對他們來說，教會並不是一種機構，也不只是陪襯的背景。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感覺到自己屬於教會，而且他們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

但是我花了不少時間才了解到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我開始書寫最貧窮的人每天的生  
活，那是爲了讓世人重新認識窮人在歷史上的地位，我這麼做，首先是爲了教會。在我  
的想法中，教會能夠藉此找到一個具體的方法，在一個活生生的族群中重新認識自己。  
當時，我曾經跟積極鼓吹在鄉間任職的神父要重視堂區社會生活的布拉議事司鐸（Cha-  
noine Boulard）談到這個看法，思考過後，他回答我說：「別做太多的幻想，在教會內，  
不會有很多人看您的書。」我因此感到困惑，但並不氣餒：這是真的，教會首先是生活  
之處而非讀經之處。

不過布拉議事司鐸的這番話並不是一個判決，他不也說過，如果教會對最貧窮的百  
姓失去興趣，她就背叛了福音的精神？

教會並沒有對最貧窮的百姓失去興趣，她無法如此。當然，有時候她會背對著他們，  
但必須去理解其中的緣由。赤貧看起來好像相反於恩寵。對那些不認識赤貧者生命的人  
來說，赤貧者在他眼中不是受苦的人，而是備受輕視、屢被鄙棄的人。生活在一個被壓  
垮的家庭，他看起來危險、沒有學識，而且絕望，因此他對我們自以爲清白但軟弱且時  
而怯懦的良心形成威脅。如何一開始就視他同爲我們一樣的人？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允許  
他對我們提出許多追問，對我們所屬的這個社會、對我們生活與信仰的一切提出追問。  
我們將承認他背負著我們的罪過，理解到一視同仁的真義，從某種層面來說，這迫使

我們去擁抱痲瘋病人（編案：此處借用福音中的「痲瘋病人」一詞比喻赤貧者，世人因恐懼而排除、拒斥赤貧者，一如耶穌時代的人們鄙棄痲瘋病人）。

基督宗教真該允許所有被他所感化的人活出這樣的英雄主義。在此之前，被赤貧者置於尷尬的處境並不是件容易經受的事，他們甚至會激起我們的背棄或譴責。那個賦與乞討者價值、賦與容貌被毀損者意義的時代已經不再，那個聲稱痲瘋病人是天主之子的時代已經過去。

## 窮人就是教會

你指的是哪個時代的教會？

教會的每一個時代，而且對她來說，這樣的時代並沒有真的結束，她不斷宣稱最窮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實，但教會要完美無缺地活出這個事實而無任何缺失，並不是那麼容易。為此，我既不焦慮也不氣憤。教會就是最貧窮的人，最貧窮的人是她的本質。也因此，最貧窮的人遲早會被她所認同，被她優先接待，以多少來說是具體且持續、或私下或公開的方式進行。

我敢說透過她自身的歷史，教會注定要不斷地憶起、不斷地重新意識到：她就是貧

窮、被鄙視與被排斥的這個事實，她就是不被世界所愛、被世人所拒絕的那一位。爲此，她不得不與最受貶抑、被衆人所排斥的族群重逢。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曾說：「對我們這些教會人士來說，我們的明鏡就是耶穌基督。」這意謂著教會的明鏡就是喪失權利與地位的人。她不只是與最貧窮的人合而爲一，她就是最貧窮的人。

她就是最貧窮的人，這是天主的決意。這個決意是什麼？那就是毫無例外地拯救所有的人。當我說毫無例外時，我想說的並不是：也包括最貧窮的人，而是也包括最富有的人。爲了拯救所有的人，耶穌基督決意在窮人的人性內加入他們，那最真實的人性，不被財富、金錢、榮耀所纏擾。他取了脫除所有經濟、政治與宗教權力者的人性、脫除所有非人性的人性。擁有這個人性的，是最貧窮的人而非富人。在赤貧者身上本質之物仍未損傷，這就是爲何基督能毫無困難地化身在他們的人性中。

可是，你自己也說最貧窮的人是被毀傷的人？

那是真的，非常貧窮的人是被磨損、擊碎、挖空的存有。赤貧阻礙他們發展智慧，有時甚至把他們化約成一種完全依靠他人的狀態，以至於他們羞於爲人。但我敢說，即便如此，他們仍處於純粹的狀態，他們因爲被輕視而深深受苦。他們知道自己被捨棄，但他們拒絕被捨棄。也因此，希望的萌芽一冒出來，一旦先知出現，他們就圍繞著他，

緊盯著他，踩擠他。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情況。爲了得到拯救，他們想要觸摸他，他們拒絕這種身不由己的生活狀態，他們不會停止盼望。耶穌無法化身在其他生活圈，因爲他們的人性被所擁有的優勢及好處所壅塞而難以運作，不論這些好處是大是小。因爲世俗的各種好處占據人心，它使人變得高傲自滿，所以世人再也不願爲了變得像最貧窮的人及接待最卑微的人而有所捨棄。爲了擁抱與拯救人類，耶穌不得不讓自己成爲卑微中的最卑微者。否則他可能被擁有財富的人所認同，這麼一來，那些備受羞辱的人就無法在他身上得到肯定了。

別人會說你是悲慘主義者<sup>1</sup>。

耶穌這個最貧窮的男人是完全相反於悲慘主義的。他取了奴僕的形體，處於完全的赤貧狀態，爲了聲明人永不再被摧殘，爲了聲明人依然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解放他的兄弟。或許我們還不夠強調耶穌不只是來解放人類。他來到世界上，被窮人所環繞，他與他們一起解放人類。他要他們跟他一起保證所有人的解放，富人一如窮人。

不過，我們首先應該認出天主的抉擇，他決意要完全承擔最受輕視者的狀態，意即

譯註1：悲慘主義者指電影、文學中描寫最悲慘的社會生活現象的傾向。

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者的狀態，不只在他出生和死亡時如此，他一輩子都是如此。他面對周遭的人、事所做的反應及行事的方法，都出自這個被看輕、被拒絕的出身。他的言語、他對問題的回答、他的行動，在在顯露出他是個不斷被鄙視的男人。福音為我們刻劃出一個真真實實在世上極不得志的耶穌基督，一如今日無產階級中的最底層，他像他們一樣受苦，因為他面對周邊人、事的表現和他們一模一樣，所以也招致異樣的眼光和議論。在這一件事上，基督不是佯裝如此，他實實在在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教會並不因此成爲一個乞丐與小偷集中的窩巢，或是一個在原地踏步的團體，她是天主本身，祂自己成了貧窮的，祂願意讓最貧窮的人成爲天主神權的護衛者，也因此成爲人權的護衛者，祂願意他們愛人的程度深到足以爲所有人犧牲他們的生命。耶穌不只是提醒我們尊重每個人的人權，因爲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孩子；他更願意藉由窮人，讓愛擴大蔓延。因一切束縛、阻礙、堵塞本質的東西，在愛的面前都將化烏有。教會是這個天主，爲了愛，讓自己化身爲貧苦者，被嘲弄、迫害及排擠。對祂來說，人權建基於愛，否則這些權利就只是騙局及拐彎抹角的壓迫。爲了使貧窮的人保留他們的真實性，並成爲救贖者，祂在塵世時不斷地教導、分享愛。爲了不使任何人迷失，祂召喚門徒們獻出生命，一如祂犧牲了祂自己的。但只有貧窮的人能夠立即接受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爲祢對聰明及博學的人所隱藏的，卻啓示給了地位卑微



者。」<sup>2</sup>

## 教會的雙重面貌

總之，你在這裡引薦的是一個雙重的想法。一方面，被赤貧壓碎的第四世界家庭必須是教會的基石，他們象徵教會所要傳達的訊息；另一方面，被排斥、被捨棄是教會的本貌。

是的，教會將被世人嘲笑、拒絕。我還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事實，我的母親當時是昂熱市聖雅各社區最貧窮的婦女。我學習到對教會的愛，因為我母親是個祈禱的婦女。每天早上她派我去善牧會修女那裡，我四歲半就在那裡當輔祭，我一直喜歡教會的優美及修女們的安詳。即便如此，雖然還只是個幼兒，我的存在已表達出這個團體的脆弱性，及她與整個社區間的疏離。我告訴自己，以前人們曾試圖趕走這些神職人員，這事還可能再次發生。大家可能還記得，在當時，很多人毫不隱藏他們對教會的敵意，所以去參加彌撒的人為數不多，而且總是幾張同樣的熟面孔。我們也看到，那位聲稱非教會學校的校長，因為怕被議論，繞道去另一個堂區參加彌撒……這一切都激發我日思

譯註 2：《新約聖經》〈路加福音〉，十：21。

夜想。在路上到處都是嘲諷神父修女的海報，有時候在商家，人們會嘲笑那些篤信宗教的人；教堂和它所處的社區格格不入。當然，在路上人們還是會向本堂神父問安，但我覺得那些問候一點都不真誠。我暗自思量：「這些人，根本沒把教會看在眼裡。」

長大後，教會的脆弱性在我眼中變得更為顯明，她是那樣地被批評、詆毀。我看到神父與修女們成爲人們嘲弄的笑柄，有時甚至在馬路上被辱罵。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編案：召開於一九六二年，會議任務是「使教會自我革新，並推進基督的合一」，被視爲天主教二十世紀最受人矚目的歷史事件。）前後，我又一次聽到人們譴責教會過於自大，擁有太多金錢與權力。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自己因一身黑色的神父教袍遭受過多少辱罵，我不會被人們對教會權勢之議論所蒙騙。如果基督徒從記憶中尋找，他們就會知道，教會一如耶穌及窮人，乃是在各種金融、政治權力及意識型態的控制下生存。

你當時還小，這一切會不會妨礙你對教會的觀感？

這一切並沒有嚇倒我，因爲對我來說，教會就是我母親的祈禱，是她的沉靜和默想；教會也是善牧修女會的指導神師，一天中上百次覆誦：「我的天主，我愛祢；我的天主，我愛祢……」她也是本堂神父對我母親的尊敬，我從來沒看過鄰居對母親表達過同樣的敬意；即使母親這麼窮，本堂神父還是前來向她要求獻金，並以極大的敬意接受母親

給他的零錢。

回顧往昔，用我兒童的雙眼觀看，教會的人格就跟我母親一樣卑微而脆弱，教會的真相是人們對她的蔑視。也許是這個緣故，今天我在觀察赤貧世界時，能毫無困難地告訴自己：「這就是教會。」

沒有人能夠對抗這個貧窮且為人服務的教會，因為她的剛強就存在於她的脆弱中。只要她像基督一樣被中傷、被攔打、被人在臉上吐唾沫，她就是愛的盟約，而且最貧窮的人將在她內得到認同。她越是喪失權利地位（我堅持用這個字眼），最貧窮的人越能知道她屬於他們，他們也越能準備好重返教會，並加入她，為能拯救富人及其他與富人相像的人。

這難道不是相反於悲慘主義？耶穌並沒有任由跛腳者、殘廢者及患病者繼續處於痛苦的境遇中。他除去了他們的絕望，他使聾者聽見，使啞者開口說話。而且他還向他們建議一個真正的社會計畫：將新火放到世上，為了使擁有者放棄自己的陰暗、財富、特權、防衛，放棄一切阻礙他們成為全人的東西，意即放棄身外之物，世俗的外物阻礙他們為別人的得救而獻身。

譯註 3：獻金（denier de culte）：天主教徒捐給神父的年獻金。

當教會緊隨耶穌基督覆誦：「凡是因我及他們的名，捨下了自己的家園、田產、妻子兒女並變賣你們擁有的一切……」<sup>4</sup>時，所表達的既不是一個譬喻，也不是一個象徵，這意謂著你們要盡量放下己利與特權；因此教會聚集的是一群知道解放就握在他們手中的信友。她是一群擁有希望者的團體，這群人知道自由早已被成全，因為「啞巴能夠說話，痲瘋病患得到治癒」。這不只是建議與預言而已，而是劍及履及，馬上行動。而且最貧窮的人是首批認出基督的人，因為耶穌像他們一樣的思考與渴望，而且答覆了他們的盼望。

群眾不是在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拋棄了祂？

他們拋棄了他嗎？或者他們在面對制度與權勢時躲藏起來了？不論如何，我所知道的是：窮人懷念教會，他們越是窮就越渴望教會。她是那麼地被中傷，那麼多關於她的謠言被流傳，窮人無法不在她身上找到認同，我就是這事的見證人。每當他們感受到她的臨在，他們就得到安慰，覺得放心。她臨在他們當中讓他們得以成長。教會仍舊是他們的基礎團體，爲了被這個團體接待與理解，他們甚至不需多說什麼。也因此，當她不忠於他們時，他們會是多麼地失望。

到今天我仍想，如果教會的神學、靈修學、機構、建築物等，不展現出赤貧的意涵，

遲早會消逝。但是，永不會消逝的是我母親靜坐在椅子上的祈禱，永遠不會被掃除的是這個諾瓦集無住屋者營區的男人的祈禱。那時候是清晨兩點，我剛為一個家庭調解完紛爭，要回到我的住處，途中看到一座棚屋的燈仍亮著，便敲門進去。這個男人坐著，雙手抱頭，他抬頭靜靜看著我，然後對我說：「我真高興你來，我正在祈禱呢。」他的女婿剛剛溺斃了。我在他身旁坐下，然後我們沒再出聲，只是一起祈禱。在這個赤貧營區的黑夜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摧毀這個祈禱。你會明白為何我從來就不擔心教會到底會不會接納窮人，她無法拒絕他們，她就是他們。

你難道從來沒有對教會的各種管理機制與行政組織產生反感？對她的政治角色感到憤慨？

說反對教會的充分理由並不存在的不是我，是天主自己。教會並不在我們所尋找之處，天主知道她在哪裡，祂不會搞錯。教會既不是一種器具，也不是一種權力，即使擁

譯註 4：〈馬爾谷福音〉（〈馬可福音〉）十：29, 31，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了我，為了福

音，而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親、或父親、或兒女、或田地，沒有不在今時就得到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親、兒女、田地——連迫害也在內，並在來世獲得永生的。但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

有兒童的直覺，我還是花了許多時間才明白這點。

教會就在窮人中間，無疑地，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在我所到之處，我總是爲了當地教會硬體設施的狀態而操心。沒有硬體設置的地方，我就想辦法蓋一個小教堂、一個祈禱所，爲了使她的臨在被顯示出來。就這樣，在諾瓦集，營區的男人們及分屬四種不同宗教信仰的志願者一起建造了一座小教堂。看到這些男女在聖誕節、聖週五（耶穌受難日）或葬禮時來到小教堂，有時我會想：「雖然他們來教堂，但是他們在這裡沒得到任何好處，他們對教會沒有任何期待。」這個想法完全錯誤，他們來是因爲他們知道自己需要她，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根本不被別人看在眼裡，或者更糟糕，他們一直被視爲一種麻煩、負擔，一種多餘的、最好不要存在的人口。可是，透過整個歷史，教會聲稱天主的存在，她斷言人的救贖來自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對這些男人、女人及兒童而言，這個教會是他們翻身的唯一機會。唯獨她是，因爲她相信他們，她囑咐他們要拯救自己的兄弟。

大家都同意，所有的人都應該在別人眼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應該有機會表達自己的信仰，並知道自己會被認真看待。

在鋪天蓋地的貧窮中，最嚴重的是，你所相信的都被封殺在靜默中，但是教會卻邀請你把它表達出來。諾瓦集的家庭很清楚這點，這就是爲何他們會去小教堂的緣故。教

會機制、教會組織對最貧窮的人並不會造成真正的阻礙。有一位諾瓦集營區最貧窮的母親告訴我：「神父，您懂嗎？雖然我不去小教堂，但是知道它就在那裡，我就放心了。」

看到教會沒能更盡力忠於自己所傳遞的訊息，不是很難受嗎？

我再次重覆這點，我並不感到憂慮，因為我知道她無法長久迴避去認同這個族群。透過許許多多的基督徒、神父、修女，她已在他們身上認出自己的本貌。有一天她將強烈聲明這點，以至於這個世界將完全改觀，這一天遲早會到。這是屬於她本身的預言，而且有一天她必須再次表明她正是這個世界所摒於門外的。這一天，她就拒絕並駁斥了「世界的罪過」，這個製造赤貧的大工廠。

在這方面，你是否看到了進步？

我不知道有沒有談論進步的必要，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傾向，我實在看不出這事為何不會成就。福音不斷重覆這點，並在化身為人的耶穌基督身上強調此事。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在福音中如果不是看到一個飽受折磨的男人，一個被社會拒絕的男人，那是看到了什麼？他反對這群赤貧子民被迫背負的命運，他的神性因此表露無遺，他就屬於這群子民。他在法學士、大司祭與政治人物面前既不替自己辯護，也不與他們同謀。他的

談話、行止與他經常來往的人，進一步肯定的不僅是窮人的尊嚴，更表達出最受排擠者的優先地位。他的生命及他所行的奇蹟，唯一的目標就是要聲明赤貧者是優先者。讓他在權貴眼中聲名敗壞的窮人，是被廟堂神殿摒棄的人，如果我們靠近仔細觀看，我們會在這群飽受輕視的百姓身上找到赤貧的記號，一個失權失勢的世界。

我強調：請仔細凝視他們。那些尾隨他的人、想觸摸他的人、追隨他卻忘記帶乾糧的人，他們不只是一些「窮人」，在他們身上我們經常認出一些印刻著赤貧痕跡的男人、女人及兒童。環繞在耶穌周圍的，都是法利賽人和法學士無法信任或難以認同的一群人。在那個時代，公權力既不排斥也不輕視那些生活在貧窮中的老實人，世界否認的是看起來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人、邊緣人、無法融入貧窮農村的人，然而耶穌基督常常就是在這些人身上認出自己的面容。

話說回來，如果說教會有不忠信的地方，對世人來說，依然是一個良機。因為教會面對赤貧族群的立場不夠清楚的時候，她自己心知肚明。這迫使她意識到自己令人失望的地方，有時甚至可以說她必須去面對自己的失敗。如果她承認自己的失敗（誰敢聲稱自己從未會失敗？），她不得不改正、更新自己，她可以成爲這個失敗世界的明鏡。儘管這讓教會感到不自在，教會仍是一個提醒，提醒世人赤貧者向這個世界提出異議。況且，比照過去，事情並沒有兩樣。即使在中世紀，我不認爲最貧窮的人曾經和教會或這



個社會達成真正的共識。不過，就算是失敗，對這個世界都是一種宣告。教會是，而且她知道自己是窮人的教會，如果面對窮人時她坦承失敗，那麼，這個世界又將如何呢？這個面對窮人時不太知道如何與之相處的現世社會，又會如何？經由教會的失敗，她也提醒了這個世界自己的敗績。

## 馬克斯主義式的解放

是否可以把教會的失敗跟馬克斯主義做一個對照？它也有一個解放的訊息，它在現實生活中也失敗了。人們反對它的最主要理由是：它的實際運作每次都偏離初衷。這個馬克斯主義是否也像教會一樣，表達了對世界的異議並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良機？

我不確定這樣的類比是否恰當。某些馬克斯信徒是一些超凡的男女，他們相信自己所說的，而且準備好要為此奉獻，甚至犧牲生命。即使如此，與教會相比，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重要的差異。首先，馬克斯主義的訊息並不是以赤貧族群為對象，至少我在它和福音間找不到相似之處，因為福音宣告的對象就是赤貧百姓。但是，有時候人們以太輕率的態度談論馬克斯主義，這倒是真的。人們將它的歷史解釋為一個不忠於人性的歷史，一段失敗的歷史。事實上，如果馬克斯主義失敗了，這是一個大家共同的失敗，

至少在面對窮人的時候是如此。因為整個西方在面對赤貧時一直敗績連連，資本主義也沒有給最受貶抑者及最受壓迫者帶來解放。人們有時會說，西方排擠內部不符合它價值判準的人，但我認為事實比這更嚴重而深刻：它排斥了那些不符合它弱點的人，意即它對幸福、利益、個人成就的追求方式非常病態。

就這層意義來說，馬克斯主義的失敗對每個人、對整個西方都是警世格言：我們一起失敗了。就像如果教會失敗了，這同時也是我的、我們的失敗。因為我們避著不去貫徹自己的信念。但是在馬克斯主義與教會間，最深刻的差異在於耶穌基督本身，祂捨棄一切、倒空一切，祂要求我們跟祂一樣，爲了能夠與最貧窮的人重逢，並再一次以他們爲師。

馬克斯信徒以爲拯救人的是制度和結構，他們不相信處境最悲慘的人有一天能夠爲了淑世而做出貢獻。他們也不相信有一天富有的人會爲了處境最不利的人而離棄一切。馬克斯主義者是否貫徹他們對人的相信？這個問題將繼續伴隨他們。對基督徒來說，失去自由，一個奴隸無法生存。爲了獲得自由，他不斷想方設法，他愛這個自由，他要這個自由，對他來說那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需求。但他可以走得更遠，在爲自己爭取自由的同時，他也能夠爲所有人去爭取。一個完整的自由，意即在天主前是自由的，自由地去愛、分享、服從、拒絕。在這當中，基督徒認出愛，他們相信愛對所有人都是具有感染

性的。對他們來說，制度與結構讓人成爲奴隸，它們從來就不是持久的解放的方法。

可不可以說人類從不曾貫徹自己的理想？

倒不如說人類不斷追尋天主向他承諾必將實現的預言，當人們爲了一個遠大的目標而投身時，他們誠摯地相信將達成目標。我所認識的共產黨徒全心相信透過努力，人類將從壓迫與剝削中被解放出來。如此一來，他們體現了這個世界的部分希望，他們也活出一個預言：這將會來到，這將是，這就是。

馬克斯主義的困難在於它沒有一個讓現世生命得以開展的彼世，它被迫要在現世馬上成功。教會的情況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已經成功，而且她的成功無法被否認。即使教會有著各種軟弱，窮人已經被解放。他們的解放不只已在耶穌基督內完成，也在所有信友身上完成。所有的信友，不管他是誰，假使他做出一個信仰的行動，假使他處在祈禱的狀態或對不公義提出異議，透過這些行止他就是解放者。爲什麼？因爲他加入了窮人的信仰、祈禱與異議。他就是貧窮與赤貧。但並非每個人都意識到他被賜與的良機。然而信友在塵世的存在就是赤貧的事實與見證，赤貧在這些男女面前體現並顯露出來。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開幕式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告：「教會乃窮人的教會。」這使我們回憶起這個預言：「窮苦的人聽見了喜訊。」對我來說，這就是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本質，這個宣告本身已足夠，它總結了整個會議的精神。我並不認為這個宣告已在此世實現，而是在天主內這預言已經實現，如果教會要拯救所有的人，她唯一要成就的便是履行這個宣告。這個預言不斷提醒我們：窮人及被棄者，就是我們；悲慘者、被排斥者，就是我們。不去認同這點，比不忠信還嚴重，那是與罪過同謀。

## 貧窮的意義

當你說信友們就是貧窮，那意味著什麼？他們貧窮是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在塵世定居，他們將永遠居無定所，永遠只是住在帳篷下的過客？信友之所以窮，只是因為他知道無論物質或精神，沒有任何東西屬於他？

當然，但還有別的。成爲信友意味著熱烈地追尋那個在世間見證天主真相的人。因爲福音還是給了一個命令，不只是「放下你所擁有的」，也是「走向」。不只是「放下你的家人」，也是「走向那些存在狀態已經實現了你所應該實現的人：一無所有者、被輕視者、不苟同世界者，而最終成爲一個被排擠者。」

天主並沒有說「走向那個別人所輕視的人」，而是說「走向那些甚至沒有任何人來輕視他們的人，那些完全被你及所有人拋棄及遺忘的人。走向羊群中迷失的那隻羔羊，

走向那個將成爲你的痛楚的人，因爲長久處於被孤立的狀態，他甚至不再理解自己的處境，這導致他也無法馬上理解你走向他的緣由。去向他揭示出他是天主的召喚，他就是教會本身的真相。」

說馬克斯主義傾向於由低下階層來建立平等，因此將所有的人貶低到一個次等的級位時，也許說錯了。我們忘記基督命令我們由最底層愛起，而這樣的愛不是次等的。最貧窮者的愛是最不易的。或許因爲由最底層而來的現世的平等與正義顯不出光彩？我倒不認爲如此，總之，對基督徒，對有信仰及過默觀生活的人來說，除非在他的心中及生活中重新找到世間最底層的人，否則別無拯救。而且光是自我捨棄，在窮人身上找到認同，將他視爲與自己同等仍然不夠，還必須讓他成爲你日常生活的優先夥伴。這就是爲何基督徒難以接受窮人的教會的緣由，在世人眼中她實在是太異乎尋常了。世界要怎麼承認她呢？對這個世界來說，教會本身的存在因此成爲危險的異議。那迎娶她的人因此失去所有的眷戀，他怎麼能夠不往後看，當他看到他所放棄的聲譽與各種安全感時，他怎能不感到害怕。世人感到恐懼，所以盡一切的力量阻礙教會宣告這個訊息。

教會本身沒有阻撓耶穌基督的這個訊息嗎？

不，是這個世界爲此感到顫慄，並且塞住耳朵不願傾聽。基督徒倫理，這個世界一

點也不關心；教條，人們卻能長篇大論。但是，世界不能否定教會的真相，她的訊息表達出最貧窮的人與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稍早提到痲瘋病人，我們必須將他緊抱在心中，並把他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不只將他視為兄弟，也將他視為日常生活的夥伴。教會承載著這個訊息。不管她是否願意，她宣告了這個事實，而世界所拒絕的就是這個。

但是，你也說赤貧是恩寵的反面；現在，你反過來說赤貧就是恩寵本身？

我曾說赤貧是恩寵的反面，因為它是罪過的果實。一個人掉在水裡，成了溺水者，這溺水者是站在河岸上的觀望者的反面，溺水者的圖像讓他感到恐懼、怯步。不過，溺水者是要拯救的，而且耶穌說他是首先要拯救的。他肯定地說：我們的救贖端賴他是否得救。他說這個溺水者是衡量指標，衡量我們對天主、對天主的拯救計畫的投身是否確實。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個溺水者化身為一個被赤貧蹂躪摧毀的人，他是這樣地被糟蹋，以至於我們認不出他來。在世人眼中，他在物質、社會與靈性層面上都處於一個缺乏開發的狀態。赤貧就像一個絕對的未充分開發狀態。然而天主首先拯救的卻是赤貧的犧牲者，而且對教會來說，恩寵是透過他們而流通的。

讓我們用圖像來說明：最貧窮的人是人體的動脈，透過它，血液得以暢流全身。如果動脈被阻塞了，整個身體就枯萎了。對教會來說，處境最艱困的人是動脈，拯救動脈

使之得以暢通，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如果恩寵透過他們而流通，整個身體都將得到滋潤。

我曾經跟你談過那個非常貧窮的男人，深夜我發現他在無住屋者營區裡默默祈禱，我走過去，坐在他身旁，透過他，恩寵湧流。我在那裡，象徵著教會替所有人盛接這個天主的恩寵。基督清楚告訴我們，沒有這個男人，沒有最貧窮的人，就沒有教會，如果第四世界不在她內，教會就不存在。沒有了他，盛宴無法開始；他使恩寵得以豐沛湧現，沒有他的參與，宴席將是空洞的，而且將永遠如此。

福音就是此事的明證，而且基督在人群中顯露出的人格所表達的，就是這個。我們樂意聽從他傳福音及付洗的命令，但是我們忘記天主說：去為那些在巷弄胡同盡頭，沒被邀請來赴盛宴的人付洗，他們因為赤貧的處境而成為受辱的人群！基督也說：去拜訪那些長期失業的人，他們的父執輩那一代的工作已經是被肯定認同的「賤業」；去拜訪無法在學校好好學習的孩子、身無分文的母親、住所破敗不堪、社區聲名狼籍的家庭。我們常常忘記重新與這些人建立聯繫，然而基督的命令卻是為了這些人而發的。

耶穌基督透過他的出生與死亡為自己定位，無可置疑，所有的人也是這樣定位自己。他的訊息及他的生命也因此被定義。在天主之子誕生時，第一批為天主之愛做見證的，是那些牧羊人。他們是被輕視的一群人，一群謀生方式落後的人，他們被當時已從遊牧生活定居下來的以色列子民所藐視。這些牧羊人既不參與宗教儀式，也不在節慶中出現，

因為其他人在組織宗教生活時並沒有將他們的生活境況考慮進去。整個社會沒有允許牧羊人在他們能夠抽身的時段參與宗教禮儀，他們是如此地被輕視，以至被禁止在法庭上做見證。牧羊人的話不被看在眼裡，因為他們被視為天主所懲罰的，以色列子民視這些牧羊人為恩寵的反面，然而，耶穌基督卻透過他們傾注恩寵。

當時也有從東方來朝拜聖嬰的三位國王……

三位國王在尋找真理，我們一定會回過頭談談他們。但是，福音首先提到的是這些牧羊人，他們沒有尋找卻白白領受了，他們甚至被置於福音的開端，在基督還沒有講話的時候就出現了，基督生命於一開場就在身邊聚合了最被排擠的一群人。我已經提過，我們將不斷在他的生命中發現他們，而他自己將不只活出一個流離失所且不斷被追捕的生命，他將成爲一個被排斥者，一如那些最受排擠者，他將死在被詆毀、被辱罵、被喝倒采的景況中。這就是哥耳哥達，基督被釘的那一幕爲一切做了總結，他跟那些邊緣人在城外，置身於被社會鄙棄的人群當中。對基督來說，這裡意味的不是充當窮人或佯裝成賤民，而是成爲真正的赤貧者，並使赤貧者成爲天主在世上特有的見證人，按今天的語彙來說，就是人權的護衛者。祂是屋腳的基石，並且祂使最貧窮的人世世代代成爲教會的生命、祈禱與信德。



這就是爲什麼教會必須不斷地重新將第四世界這些被摒棄的羊群，領入羊棧的緣由，如果她不將他們重新領進她的建物內，這些建築終會崩塌。然而對基督來說，這事不會發生。所以即使教會由於某些成員有時顯得不夠忠信，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我不在乎這些。在我所有的奮鬥中，在勞工界，先是做糕餅，然後在工廠，最後在第四世界，我在教會內一直感到十分自在，她不斷鼓舞著我，她本身就是恩寵。

你所理解的會不會比較是教會應有的模樣，或是有朝一日將達到的理想狀態？

不，我所理解的是她深刻的本然面貌，她不得不選擇的存在狀態。她無法不成爲窮人的歌曲、祈禱，她無法不成爲他們的社團、他們的解放。我已跟你提過，我還是孩童的時候就已有這樣的感受，不管怎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在天主子民的某個群體，她被迫要處於靜默與被棄的狀態。在世界的某一處，一直存在著完整的預言，她透過被禁止舉行彌撒的神父而存在，也透過這些被捨棄的基督徒而存在，他們之所以被摒棄並不是因爲某種人性的奮鬥，而是因爲他們昭示出貧窮教會喪失了權利與地位的真相。

這些人真的是被排擠，有一個例子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富高小兄弟修會的修士們被禁止赤足進入埃及的開羅港。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他們試圖與開羅一群無棲身之所的赤足子民一起工作，當地政府並沒有禁止他們與靠乞討過活的子民工作，但拒絕

他們赤腳去，因為赤腳成爲一個完全認同窮人的教會的外在記號，世人拒絕教會這樣的面貌。

## 不該被阻塞的動脈

讓我們回到另一個圖像，那個動脈不該被阻塞的圖像，你想到的是基督的奧體（編案：奧祕的身體）及諸聖的相通功（編案：「諸聖通功」意指基督恩寵所拯救的天國子民彼此之間，在超性生活中連成一個互通功德的團體——在基督的身體（教會）中，各人的德性與善功為全體所共享）？

如果在世界的某處，有一群赤貧的子民被排斥，我相信是整個教會被排斥；當某處一個隱藏在陋巷的家庭，或一個處在貧民窟最偏僻角落的家庭，因為拆遷的威脅而受苦時，是整個教會在受苦，是整個教會在奮鬥以對抗這個驅離。如果教會不提出異議，她就是與罪過同謀。我並不是說教會應該無所不在，應該時時供應不足的麵包，提供金錢、住房及工作等等。她最重要的使命，是把天主帶給人。但是，如果她沒在饑餓者、流浪者、困乏者及無法受教育者身上認出自己，她就不是教會，那麼這世界上也就沒有教會的真相。果真如此，恩寵無法暢流，也就無法使世界活躍有生氣；失去了恩寵，教會與人類要怎麼過活？

我曾提過的那個在徹底赤貧中祈禱的先生，他是將整個教會與天主重新連結起來的線，是一個渠道。由於他們被棄與自卑的狀態，最貧窮的人是基督奧體最重要的一部分。由於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處境與痛苦，使他們身上帶有極其重要且獨特的訊息。如果我們沒有考量最貧窮的人所傳達的關於受辱、關於遭受釘刑的基督的一切，我們就無法在教會內做出有意義的反思。即使只是一個喊叫、一個呼救，即使他們的話語經常模糊難辨，這對訊息本質沒有任何影響。我甚至要說這個喊叫越是不經修飾，這個言語越是粗糙，它越是真實，它越是有所有人類的財富。這個訊息越是質樸，它越是飽含著經驗與生命，它對教會就越是不可或缺。少了這個訊息，教會無法建立她的神學，也無法建立她的靈修及禮拜儀式。

這樣一來我們會不會有這種危險的想法：幸好窮人存在，不然我們會變成怎樣？

我所說的不是滿足於窮人的生活條件，而是以窮人為參與夥伴及引導者，以便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基督耶穌認同祂那個時代最貧窮的人，一直到今天，祂仍然認同每個時代最貧窮的人，也因此我們的靈修乃源自他們的生命，即基督的生命。如果我們不以最被赤貧的人為起點，我們有可能建立人的神學嗎？沒有了窮人的呼喊與祈禱，禮儀又將呈現何種面貌？如果教會無法從被排斥者的世界所獻上的財富獲益，她在世間的表達

將不只是殘缺不全，更嚴重的是，她將不再是基督的奧體。

但是，若瑟神父，你對福音所做的這個分析並不特屬於教會本身，在論及當代社會不同形式的人道主義時，我們也可以做出同樣的結論。

我不這麼認為，人道主義者目視他眼前的人，這是一個對人的眼光。它與教會最大的不同在於：教會並不把人當成終極目標，他們是她的明鏡，她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真相，她自己就是當事人，她不是某種對人的想法，也不是一種團結關懷的感覺。

這對人道主義者來說不是一樣嗎？至少在論及它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懷這一點上是如此。

但是教會並不是團結關懷，她是人類的痛苦，那裡有赤貧及痛苦，原諒我重覆，那就是教會在受苦，因為基督耶穌受苦。人道主義者只能給其他人帶來濟助，他們給第四世界的家庭物質或教育上的幫助，幫助他們學習一技之長、獲得住所。他們提供一個社會所具備的資源，並護衛人權，而且正該如此，如果他們有所疏忽，某些人會責怪他們沒有做出團結關懷的舉動。但是教會完全不一樣，她愛並帶來救贖，她默啟人們：他人和我以相同的身分被拯救。我甚至要說：他人在我之前被拯救。

教會並不是一個行善積德之處，也不是一個授予的權利，她是一個與兄弟友伴在旅程中共榮共進的事實。我們不應該責怪教會不滿足於護衛人權的角色，她的角色遠超過人權的護衛。對她來說，問題在於她是否在最貧窮的人身上認出自己，他們是否透過她獲得救贖。最重要的不是先去看她帶來什麼，而是去檢視她認為自己該如何彰顯她的真貌。而在她內首先關係到的，不是我們公民的角色，而是我們的存在本身，我們身為天主子女的事實。

聖伯多祿（又譯聖彼得）提醒我們：我們都是天主之子，都是天主的司祭。不管我們如何解讀這些稱號，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出自同樣的血緣，背負著同樣的使命。天主要我們認出祂來，這比承認鄰人的人權還來得深遠。如果我們一字不差嚴格來解釋，會讓事情變得更難。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這樣做了，而且這個大公會議完全進入了教會預言性的歷史，它宣稱：教會是窮人的教會。

不過這個預言本身並不是那麼具有先進性。

抱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告的方式是全新的，他以此宣告做為某種先決條件，也就是教會信度的試金石。他宣告，這個大公會議與明日教會的成敗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個真相。這個預言是如此先進，以至於有些人甚至有點失去方向，這也許是因

為過去神父們並沒有一直認真探詢最被捨棄者的位子何在。一條新的道路在我們面前展開，為使我們與他們的痛苦、祈禱及異議重新連結起來。我們是否步上了這條道路？

最深的詰問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教會是否讓自己重新處於祈禱、思考與默想的狀態，默思自己的真相，意即她就是赤貧者的共同體。問題不在於她是否會帶給赤貧者團結與關懷，而是她是否會成為窮人最真實的聚會所，在那裡他們可以表達他們的祈禱、詠唱與要求；透過她的崇拜與禮儀，她會不會是窮人走向天主的希望？

窮人與教會本是一體，他們不在教會之外，除了成為自己，教會不需要成為其他任何團體。如果教會完全意識到她的真貌，她的祈禱將是失權失勢者的祈禱，是那些被赤貧壓垮的家庭的祈禱。

## 為何成為神父？

自從認識了你，有時我會想：你是因為基督耶穌而成為神父，還是因為對赤貧者的愛？

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年輕的時候會有段時間與教會保持距離，我當時在學一門技藝，剛剛進入這個社會。十八歲的時候，透過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奮鬥，我重新開始祈禱，並想要使我的兄弟得到解放與自由，就在這時候我渴望成為神父。在教會內祈禱、

送聖體，都是爲了給我的兄弟及所有曾經跟我母親一樣的過來人傳報福音。爲他們奮鬥，爲了不再有任何一個家庭經歷我的家庭所承受過的痛苦，我必須成爲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的司鐸。你無法想像這段時光是多麼美好，我知道我的生命已印刻在一個永恆的計畫中，我知道窮人將獲報喜訊，而我能對改變人心有所貢獻。因爲對我來說這一切都連結在一起，重新找到信仰不只意味著找到奮鬥的意義——這個意義我已經有了——也是將我的生命獻給耶穌基督。

這麼說來你成爲神父不是因爲與窮人的團結關懷？

絕對不是。我們遲早得問自己：「我是爲了基督耶穌的愛而成爲神父，還是爲了一個社會或政治性的奮鬥？」在我與你談話的此刻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說我整個童年的經驗教我意識到教會與窮人間的複雜關係，意即他們在基督耶穌內本是命運共同體。

透過我的母親、善牧修女會的修女及我童年所遇到的神父們，我認識到這個共同體，因爲當家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果腹時，母親總是坐下來祈禱；善牧會的修女每天給我們熱湯喝；神父們則以尊重及友愛關懷我的母親。我在教會以外的經驗則大不相同，人們在很多時候傾向於輕視、忽略並嘲諷窮人，而不是將窮人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但教會不會嘲弄窮人，而且堂區的神父修女在我眼中也是徹底貧窮，無能保護自己；我一直有這

個命運共同體的感覺。我一直認為，在成為神父的同時，我回到了自己的家，置身在自己的親人中；我一直認為我加入了耶穌，祂是唯一能夠針對赤貧給與最本質、最完整的答覆的人。耶穌基督是那些最不受祖先遺惠眷顧的人所等待的答覆。

或許我應該再補充一點，這點可能會讓你覺得驚訝。從我童年起一直到後來，我從來沒在教會內遇到任何一個對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的人，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情別人或試著表現出很有良知，而是因為他們在受苦者身上認出某種親屬關係，這個親屬關係可以在原罪身上找到源頭：基督徒難道不知道在面對天主、面對他人及自己時，他也是一個貧窮、軟弱和膽怯的人嗎？

第四世界的軟弱是否就是我們自身軟弱的比喻？

完全正確。第四世界同時是我們的明鏡與象徵，它映照著我們之所能。最貧窮的人也知道這一點，而且他們是我們的良機，他們了解我們是什麼，並阻止我們幹蠢事，阻止我們成為徹底凶惡的人。不，最貧窮的人不會搞錯，我一直對他們判斷我們的能力感到驚嘆。不是經由我們表面看起來的樣子，也不是經由我們所言所行，而是透過對我們的揣測，揣測我們內在的軟弱、小氣及迂迴，但同時他們好像有第六感似的，能夠透視我們愛的能力。



總之，我是在和赤貧者一起奮鬥及以他們為優先的過程中，在教會內甦醒過來；我對這樣的教會朝思暮想，所以不得不成為司鐸。如果沒有發自肺腑地愛慕耶穌基督，沒有人會成為神父。不是象徵性的愛慕祂，而是像一個活生生的事實般在愛慕祂，透過我們周圍最貧窮的人們所表達、所希望的的世界來愛慕祂。不論經由那一種方式，一個神父不得不在基督耶穌的生命內重新鑄造自己的生命，否則他不會繼續當神父。而天主在這個世界的生命是一個誕生在赤貧中的生命，祂出生在那個只有處於邊緣的牧羊人子才會出生的地方，祂的生命就是那個沒錢、沒殼、被驅逐的家庭的生命；祂的生命就是那個失業者的生命；那個受苦時還飽受嘲諷者的生命，他的苦痛甚至被當成自己造成的錯誤。對耶穌來說，錯誤引祂走上哥耳哥達的路，錯就錯在祂愛人太過。

## 第二章

# 赤貧者的生命 是恩寵的泉源

這些家庭即使苦於種種匱乏，卻不停互助，充滿對他人的溫情。



諾瓦集的小教堂前，年輕的若瑟神父和諾瓦集的小朋友們。

吉爾·阿努以：

你曾提到暢通及無法暢通的恩寵，恩寵到底是什麼？

若瑟神父：

恩寵是上主扣住你的心弦，並讓你愛人愛到願意讓他人比你更重要、更好、更聰慧。

恩寵是愛，這愛讓你以平等之心待人，並切願別人比你更幸福，為此，你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想要他人也能夠處於全心、全力愛人的境況。是上天推動著你，讓你誠願別人能夠為了一個免於赤貧的世界而拚搏，從而免於不義、戰爭及仇恨。天主引領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恩寵是一個「滿溢」（Grace is "more"）：知道我們不只是天父遙遠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天主就在我們內，恆久臨在並生活在我們內。

對我們來說，這意謂著意識到我們和最貧窮的人來自完全相同的根源，同是天主司祭的後代。同時也願意將我們所接受的過滿的一切移注給他們，使他們和我們一樣能夠分享這一切。我所說的是天主恩寵的過滿。這會讓他們也能夠有同樣的意願，讓今後活在他們內的恩寵也在我們內。

你看，我還是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教會所說的恩寵，這對我的人生旅途有很多幫助。我是一個重行動的人，一個沒有耐心的人。我有一個意願，不僅在他人身上找到兄弟，而且視他為同等，甚至視他比我更大。這意願幫助我不至於極端或過頭，讓我克制了加

入馬克思主義的念頭。在我眼中，只有教會能夠給出真正的平等。這意識在我腦海已經存留了五十年之久，到如今我還是認為只有教會能夠給予無條件的平等，不是得到允許或獲得權利，而是像天生就擁有。這就是為何在面對聖事<sup>1</sup>時，現今某些執行方式讓我難受的緣由。

你想說的是神父們開出一些條件？

爲了授予聖事，他們要求一些保證，但聖事本身卻是恩寵的糧食。我們可以想像神父爲了洗禮、初領聖體、傅油聖事……爲了婚禮、爲了得到天主的祝福而向窮人要求保證嗎？今天如果你想讓你的孩子接受洗禮，可能會有人要你出示教友證明；如果你要讓孩子初領聖體，人們考慮的將不只是你目前的渴望，還會要你提出未來的保證，好像是天主之子本身要你出示出生證明及其他證明你的信用的文件，然而只有天主之子的死亡與復活才是唯一真實的保證。

譯註<sup>1</sup>：聖事對基督徒而言，是基督親自建立的有形可見的宗教儀式，為把天主的恩寵透過教會，賦予領受聖事的人。天主教會七件聖事，就是聖洗、堅振、聖體、懺悔、病人傅油、聖秩以及婚姻。七件聖事涉及人一生中的所有階段，以及一切重要時刻。

你不認為這些要求是在邀請信友的投入。在以前有所謂的信友必須參加的「恆毅教理課」<sup>2</sup>，你會因為教會強烈要求貫徹始終的投身而覺得不滿嗎？

我理解教會要求信友的投身，但赤貧者的生命本身難道不就是唯一值得信賴的投身？他們已獻身於上主所過的生活。向他們要求保證，表示我們確信自己與他們講同一種語言，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一點都不懂他們的語言。事實上，我們應該去理解他們真正要求的是什麼？一個人必須對赤貧的世界有很高的敏感度，才能夠理解這個母親要求她的孩子受洗意謂著什麼，也才能夠理解那位婦唱夫隨的父親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們不知道確保他們努力不懈的證明到底是什麼。我們憑什麼對他們獲得恩寵的權利提出異議？我們沒能理解他們的要求，我們缺乏判斷的依據。我們怎麼能判斷人們未來的行動？更進一步地說，我們有權判斷嗎？

剝奪窮人接受聖事的權利，並因此剝奪了一部分的天主，在我看來非常不正義。天主沒有設限地給予這一切，是爲了讓你從祂那邊領受到得以活出愛的一切憑藉——活出愛，經由愛，並爲了愛。爲什麼我們剝奪窮人，剝奪最渴望愛的人？天主並不是教會的財產，人們無權操弄祂。教會在此塵世只是耶穌基督的接班者，基督卻是天父身邊永恆的窮人，吸引所有人歸向祂。判斷之權歸於祂，當祂覺得時間到了，祂會將麥子與莠草分開。<sup>3</sup>

## 教會適合富人？

或許這些對信仰的要求比較適合中產階級？

我不知道它們是否對任何人有好處，它們肯定是比較適合富有者的處境：參與一些會議、一些交流、與一些擁有同樣文化水平的基督徒夫婦來往。當你擁有合宜的住宅、你的專業能力受到尊重，並且可以保有工作機會時，那麼你要回應這些領受聖事的要求便沒有什麼困難；但這對最貧窮的人來說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甚至無法理解我們對他們的要求。

依我看來，福音的傳播已不再觸及城市裡最貧窮的人口，他們不再受洗，他們的孩

譯註2：《新約聖經》中耶穌講過一個莠草的比喻，大意是農地長了麥子與莠草，僕人問主人要不要拔掉莠草，主人回答說：「不用了，怕除莠草時錯拔了麥穗，讓他們一起長到收成的時候吧。」（馬竇福音

（馬太福音）十三：24-30。

譯註3：在此章稍早，記者曾問若瑟神父他是否因法國教會要求信友參與恆毅教理課程而感到不滿，此課程是法國受過洗禮的天主教兒童在初領聖體後繼續接受的教義課程。這裡記者反思：是不是教會本身應該先保持恆毅，意即恆久勇毅、努力不懈。

子不被重視；這一切都與五、六十年代我在最貧窮的社區所目睹的相反。這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因為神父們這種謹慎——我甚至要說是懷疑的態度——窮人將它解讀為一種拒絕，不只是對他們的要求的拒絕，同時也是對他們整個人的拒絕。這真是無以復加：教會拒絕了她自己。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努力要做，那肯定不是對這些替孩子要求洗禮或初領聖體的貧窮父母提出投身的問題。教會要做的努力應該是問自己：我在面對這些窮人時做了什麼樣的投身？我們向這些父母要求保證，事實上，我們有機會接待一個貧窮家庭並向他們談論天主時，是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保證，讓他們知道我們再也不會拋棄他們。迎接一個比自己更窮的人永遠是一個良機，同時也是一種責任。

這意謂著教會自己應該投身於努力不懈的德性？

理應如此。我們不該要求殘廢者行走，而是要他周遭的人幫助他行走。我們請近旁的人以無限敬意來扶助，好讓這沒有腳的男人了解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殘廢者。教會該有的投身就是渴望成為器皿，我甚至要說是成為天主的善意。唯有天主能透過祂的恩寵給予保證，因為即便最熱誠的父母，都無法保證孩子會持續去愛周圍的人。我們無法事先預言，也不該在天主的事務上越俎代庖，我們不該扮演算命師代祂預示未來。

即便你一直非常尊敬教會，但你在這些規定上想率性而為？

不，問題不在於保有我個人率性而為的自由。事實上，我沒有勇氣去實踐這些規定。

即使在當副本堂時，我都沒有勇氣拒絕在我看來原本就是天賦的權利；有些事是你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拒絕的。但是，當我接受一個要求時，我會全心投入。接受要求本身已是一種責任，這責任要求我重新衡量一切，重新思考並改變我自己，避免漏接天賜良機。

問題是，當我與這個人接觸時，我是否重新皈依？我是否在他身上認出自己，看到彼此的相似性？透過與這個人的相遇，我是否對耶穌基督有更深的理解？我是否決定投身於守貧與祈禱？這個人比我更接近基督，他對基督的認識比我還多，因為他經歷了耶穌所經歷過的一切。我是否藉此機會好好認識並學習愛他？我是否讓他有機會向我揭示耶穌基督？

我想起一對沒有結婚的夫妻，他們有七個孩子，同居一段時間後，這對夫妻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接受洗禮。他們見了堂區的神父，一個很傑出的人物，但是他卻向他們提出一大堆規定：這個家庭必須參與這樣那樣的會議，他們較年長的孩子必須加入某某青年團體。他們全家順服地去了一次，然後這個男人來見我，他非常沮喪，因為在那次的會議裡面，大家談的不只是天主，那些人很快轉換話題，談起他們在政治及工會方面的投



入，他告訴我：「您知道嗎？我不能去那樣的會議，而且在那種場合我看起來像個傻瓜，他們談他們的，我卻聽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然後這個父親加上一句：「我在那裡聽到的，跟我每天在酒吧聽到的沒什麼兩樣。」

事實上，如果在那些聚會中，孩童的家長繞著工會或政治議題反覆談論，他們能夠學到什麼新穎且具有革命性的東西？那個會更新他的生命的允諾，那個應該完全改變這個男人的生命的允諾在哪裡？他再也沒去過任何一個堂區的會議，最後我得到特別的允許，祝聖了他們的婚禮，也為七個孩子付了洗。

即使你如此深愛你的教會，你剛才所說的道出你對她所立的某些規定感到懷疑。你揚棄她對赤貧者的拒絕，你自問教會對赤貧者的恆毅教理又投入了多少。你會不會認為教會由於越來越投身世俗的生活，以致於講論太多的人與社會，相對地就不太宣講天主了？

我想她某方面的作為有些菁英主義，意即教會自認為有權判斷赤貧者在愛、祈禱與投身方面的能力。事實上，她還不認識他們的語言與感受。在面對伊克蘭教徒時教會不會如此？她會尊敬他們祈禱的方式及他們特有的感受，但是面對她自己在西方的赤貧族群時，她卻沒有承認他們的獨特性，沒有公開表明他們切願相信、互愛。這確實是一片還沒被認識的土地，而且是一片等待播種的土地，在那裡所有的種子都會發芽生長。教

會既然不認識這個族群，她憑什麼將規定強加在他們身上？而且這些規定常是屬於現世而非信仰的範疇。

我並不是在定教會的罪，如果這是你提問的企圖，那你會失望。一個人可以，神父們也可以，透過工會或政治來表達他們的信仰，但是要如何知道這個工會或政治的投身是不是獻身給天主之愛的真實反映？這一切都依賴人們所受的訓練及生活的狀況而定，也要看我們透過工會或政治行動所要護衛的是什麼利益。如果我們的行動是為窮人的利益而發，那麼是的，不管有沒有工會化，我們像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樣在愛。否則，事情就不是那麼必然，而且這些現世的投身並不屬於同一範疇。

## 即使苦於種種匱乏，卻不停互助

根據福音常被引述的字句，你說在天父的家有好幾個住所？

那些住在貧民窟或社會住宅的人，他們終日生活在鄰居不會停歇的吵鬧聲及彼此永恆的爭吵中，卻仍保有容忍，你不認為這正代表了他們對旁人的愛與投身嗎？那些人一直被迫生活在僅容旋馬的擁擠中，卻依然殷勤好客，你不認為他們所表現的正是團結關懷及對他人的真愛嗎？我認識一些人，他們自己米缸已快見底，卻不會任憑鄰居饑腸轆

轆，他們會想辦法跟他分享一碗湯或一塊麵包，只要他們還有一點存糧，鄰居就肯定會分到一份。我想到一個家庭，他們不斷接待鄰居的孩子，雖然自己沒什麼東西可以填飽肚子，但絕不會讓鄰居的小男孩餓著去睡覺。這個生活在髒亂與爭吵中的家庭不也同時被恩寵環繞著？

我深信赤貧者的生命是恩寵的供給者，應該認真思考提高他們提供恩寵的各種可能性。人們不該忘記這些家庭即使苦於種種匱乏，卻不停互助，充滿對他人的溫情。我們不應該停止追尋這些謙卑的舉動，這些在靜默中不停重覆的謙卑禱詞；他們是恩寵的發電器。在超越那些令人沮喪的困境，及各種令人無法信任的生命情境時，他們早已提供了信仰的證明。他們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正當理由走向我們。因為即使生活極端困難，他們卻做出決定性的舉動，勇敢地告訴我們：「不管旁人如何輕視，我仍然愛、仍然相信，我來向您重申我身為天主之子的尊嚴。」這對任何一個神父、任何一個堂區而言，都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我們實在不該挑剔蔑視，相反地，爲了祝賀他們的洗禮、初領聖體及婚禮，我們應該舉行盛大的慶典。他們曾迷失路徑，現在好不容易重新踏上回家的路途！因爲他們有那麼多關於極端貧窮的事情要教導我們，他們會讓我們知道：摧毀赤貧是我們的義務。

## 關於政治、社會議題

教會好像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夠關心工會與政治的現實，直至今日，人們還繼續責怪她在這些領域沒有深度的投入，或許她因為內疚而走向另一個極端？

我不知道教會是否真的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反正我不會加入批評的行列。教會在每一個時代都必須按當時的情況重新塑造自己，她必須適應社會的情況來傳達她的訊息，這需要許多的時間與努力。但是，我想談的不是這個。在這些對世界情勢的適應之外，教會有一個恆久不變的責任，這個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再次去尋找最貧窮的人，並將他們迎接到她中間。教會既不是要授予窮人全權，也不是要在他們身上強加什麼，教會應該做的是：尋找他們，並將他們懷抱在她內。教會必須聆聽他們，並讓自己被他們改變。爲什麼教會要去傾聽世界，而不去傾聽窮人？她難道不知道，天主賦予窮人教導、培訓教會的使命？

這會阻礙教會談論工會或政治嗎？

一點也不，但是教會絕對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談論這兩個議題。在人與人的相遇中，

基督徒應該走到最深處，他永遠不該滿足於那些沒有包括所有人的會見，這裡的「所有人」包括了最貧窮與最富有的人。他在提問時不能不問：他的行動與探索對赤貧者的生命產生了什麼影響？基督徒在思考政治與工會時，不能不涉及教會被隱藏起來的這個部分——這個最痛苦的部分，這個隱藏在冰山下沒被世人看到的部分。他必須不斷回應正義的召回，並追尋更多的正義，問題是：爲了誰的正義？對他來說真正的問題永遠是：更多的正義，爲了誰？

有一個修女剛剛加入第四世界運動持久志願者的行列，這個志願者聯盟立意要完全獻身給世界各大洲最無人聞問的族群；但她的修會團體在接受她的渴望時並非毫無保留。身爲一名護士，她曾經是非常活躍的工會幹部，她也曾是醫院企業委員會的成員，當她告訴同會修女及工會夥伴她要加入第四世界的消息時，他們回答她說：「妳這樣做是在浪費生命，妳背叛了我們的奮鬥，妳要加入的是一個不事生產的族群。」

不管喜不喜歡，身爲基督徒的工會份子及從政者的特質將永遠是：和那些被視爲不事生產的族群一起奮鬥；不完全是爲了成爲他們的代言人，而是爲了在他們身上認出自己的本質。這位修女之所以加入我們，是因爲在她任職的那所大型醫院中，當她投入工會的活動時，她感到人們缺乏對赤貧者的認同，缺乏透過窮人來表達對基督的熱愛。她意識到她的同會修女及工會的夥伴們所在乎的通常是那些已經站起來，已經懂得表達自

己的人。也因此工會的請願通常是針對某幾個類別的職工，卻棄置打掃的太太、洗衣房的小姐及其他做粗活的工人。她身邊所有的人，她的修會及醫院的工會，他們與這個世界可見的那一部分相遇，那些讓你感到自在的人，因為你能理解他們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清楚地定義，而且無可辯駁。如果這些修女及工會幹部遇到那個要求讓七個孩子領洗的父親，他們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因為他們的奮鬥並沒有將他包括進去。這個父親需要的是：遇到一個類似這位修女新加入的團體，為了使他和他的家人能夠完全參與教會，這團體將貫徹到底，並且，我應該說：好能透過他盛接恩寵。

## 如何認出那些「不事生產」的族群

這是否意謂著我們知道如何認出那些不事生產的族群，這不可見的冰山？我身為記者，理論上應該熟知社會情況，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他們的存在，你可能會說我不願意去知道。事實上，很多時候基督徒並不知情，我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在法國有兩百萬名窮人。對他們來說，貧窮只是一個象徵性詞語，而且相當不明確，他們很可能聯想到的是彌撒結束後在大門口遇到的乞丐，或在洛林地區（Lorraine）的失業者……

就像這個世界不喜歡教會是服務與貧窮的，這個世界也不喜歡最貧窮的人——那些

最被赤貧所折磨的家庭——被看見，這個世界想辦法不稱呼他們為窮人，迫使他們成爲戴著面具的人群，成爲可笑的木偶，在他們身上冠上假的稱號，讓他們看起來像是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人，像是無法被接納的一群人。他試圖給窮人冠上一些負面的形容詞，要他們爲自己的貧窮負責，一如人們對基督耶穌所使用過的伎倆：他被視爲罪有應得，而非代罪羔羊。

世界之所以如此運作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人們總想把人性做個華麗的包裝，他們需要將窮人塞在美麗人生的紅地毯下。但是，如果那些投身於政治及社會奮鬥的基督徒也抱持同樣的態度，就讓人完全無法理解了。他們注定要將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時刻一到，他們不得不和基督面對面；不是面對復活的基督，而是面對遭受釘刑的基督，一個活像被天人遺棄的可憐蟲；他們必須面對這個不斷被懷疑的基督——祂所傳遞的訊息，祂的生活方式以及與祂往來的那群人，在在惹來懷疑的目光。

那就是我對教會深信不疑的緣由。在教會漫長的歷史中，總是週期性地走進某種死胡同，她不得不在最貧窮者的生命與血肉中重新認出基督的面容，爲此，她也不得不對她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發出公開的異議。我們後來將不可避免地再次提及這些公開迫害的時期，因爲教會無法長期迴避世上被棄的百姓，因此這些迫害將週而復始地出現。

由於不斷地必須重新體驗對被排擠者的愛，使得基督徒無法適應政治圈的凶惡，就

像賀加 (Michel Rocard) 6 有一天告訴我的：「置身在被惱恨所盤踞的政治舞台上，基督徒遲早會因為踩不到底而驚慌失措。」他們的愛在深水中踩不到底，這使他們受到的輕視多於尊重，即便如此，這也是對教會的頌讚。

這倒是真的，基督徒好像無法長期在衝突中存活。

就像在政治舞台上一樣，在面對我們經常談論的正義議題上，在某一時刻，愛會深得踩不到底。當正義的內涵變成建立薪資、津貼、退休金的等級，變成根據一個人的頭銜與專業來賦予誠信與威望時，總有一天，基督徒會無法滿足於這樣的正義，不管他要不要，他被迫要詰問自己正義的基本概念是什麼。有些人認為扮演較重要、較稀有角色的人應該得到更多報酬，基督徒看見這種情形時，就不得不為那些被輕視的人爭取更多權益，不得不為那個最不受文化與知識眷顧的孩子要求更多更好的對待。為了一無所有者、為了甚至不被認為應當擁有權利的人，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應該打破這聲稱平等的法

譯註 5：洛林地區位法國東陸與德國交界處，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九〇年間，該地因鐵礦、煤礦及鋼鐵工業的危機而有十六萬名工人失業，造成洛林地區的工業史上一段黑暗時期。

譯註 6：賀加生於一九三〇年，曾任法國領土整治規劃部部長 (1981-1983)、農業部部長 (1983-1985) 及法國總理 (1988-1991)。



律。基督徒應該扭轉在世間被過份吹噓的正義，他要建議的不是再多一點正義，不是往正義再跨出一步，他要建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正義，將優先順序全然顛覆。

這讓我對教會充滿信心，基督徒在某一時刻被迫要詰問自己關於正義、平等、自由、真理的本質，他甚至無法不質疑他在現世所歸屬並積極協助建立過的社團組織，他不得不去發現果肉裡面的蟲，並成爲永久的異議份子，一如基督與教會，並承擔被棄絕的風險。他反映的正是無言的犧牲者一再的被排拒，因爲最貧窮的人被我們的系統、結構與正義所忽視，因此一再被犧牲，我們的正義對他們而言並不正義。

我重覆，唯有教會能夠貫徹這個最本質、最全面又最具決定性的異議，我認爲只有教會能將這個異議強加給這個世界，並且——我再次回到我們一開始的論點——這對教會來說是最自然不過的。在這些喪失權利、地位的人們身上，在這些被粗暴對待的家庭身上，在那些學習旅程充滿自卑感的兒童身上，教會怎能不感同身受，她的血肉與心靈與他們同時受到打擊，因爲他們就是她。

讓我們再次回到你所提到的疑問，你說基督徒並不知情。事實上，他們的問題不是被動地接受資訊，而是主動尋求資訊。他們是該等著被別人教導，還是他們也能主動去尋找自己最深的身分，尋找他們的主？

### 第三章

## 化身在一群子民中間

我們渴望深入貧窮百姓，為了重新找到教會的真相，同時也為了發現我們之所是。



若瑟神父 1987 年 10 月 17 日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這是第一次舉辦紀念世界拒絕赤貧日活動。五年後，聯合國正式宣布該日為「世界拒絕赤貧日」。

吉爾·阿努以：

對你來說，問題不在批評教會，因為她不斷走向最貧窮的人。但是，你是否看到進步？到底有沒有進展？

若瑟神父：

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教會的某處。光是在當代，在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教會對窮人的尋找就表現在我們所謂的「埋身在人群中」。

在神學院，同時也在教會的每一個角落，神父們談的是「在群眾中埋身」，大家的理想是成爲受苦族群的一份子，甚至冒著被埋沒的風險。這股潮流給我許多啓發，我們活在體現道成肉身的希望中，這段時間是我在教會的生命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之一。

你談到戰時及戰後那段艱困歲月，這發生在工人神父運動之前？

是的。我們對教會的歷史沒有足夠的認識。在那些年代，我看到一些神父離開他們的堂區，去到貧困的社區生活，成爲他們最親近的兄弟。

他們選擇的是工人社區嗎？

他們去到貧困的社區。在整個法國：埃納省、大巴黎地區、法國南方，我看到一些

神父離棄一切。就這樣，我的司鐸生涯在一個非凡的氣氛中開始。

我們想要親臨百姓的受苦現場，當我向我的主教要求加入法國傳教會（Mission de France）<sup>1</sup>時，並不是爲了帶領充滿活力的行動，而是爲了與貧窮的百姓共融。我們大多數人渴望深入貧窮百姓，爲了重新找到教會的真相，同時也爲了發現我們之所是。我們想在窮人中宣報福音，一如基督所命令的；同時也是爲了確保基督已經完成的：「窮苦的人聽見了喜訊<sup>2</sup>。」我們當時相信，而我到現在一直都相信：窮人的福傳已經實現了。我們想要去尋找那隻迷失的羊，即使必須冒著失去其他羊隻的危險。我們想要往下走到人類受苦最深的現場，內心深知我們將在那裡重新找到教會完全的真理及光輝，我們想要在窮人的教會的核心點活出我們司祭的天職。

譯註1：該傳教會在一九四一誕生於法國，於二〇〇二年改名為 Communauté de Mission de France，傳教會成立的初衷是爲了讓教區神父們在法國的貧困地區獻身鐸職。該會許多神父渴望分享勞工的生命，成爲後文所說的「工人神父」。

譯註2：《新約聖經》〈馬竇福音（馬太福音）〉十一：11。

## 工人神父

這就是工人神父的前身嗎？

這是工人神父的第一個嘗試，他們願意在赤貧的核心活出他們的司鐸天職，並永遠紀念由受苦受難者的生命所滋養的聖體聖事。當時我們還沒有使用今天這種方式來談勞動界，我們不只是想加入工人的世界，更渴望與赤貧的世界共融。

在這個時期我生了一場病，痊癒後，我請求主教派我到一個赤貧跡象觸目可見的堂區。我向他表達加入一群受苦百姓的渴望，加入受苦最深的家庭、年輕人及兒童，在當時有許多人在主教面前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被派遣的蘇瓦松 (Soissons) 教區是個農村，我的主教回答我：「我手邊沒有你所要的，但是，我可以向你推薦一個堂區，如果你不去，那個地方就不會有神父。」那是杜易日 (Dhuizel) 堂區，座落在不列尼 (Braine) 地區，一個很棒的小村落，約有四十幾戶人家。在當時，我對農民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我接受了這個派遣，爲了讓那裡繼續有神父。我接受的原因之一也是爲了讓自己在那裡生根，我自知在這個如此陌生的農村環境中，我將會遇到很多困難。其實加入杜易日也是我加入農民工的方式，去分

擔他們艱困的生活及繁重的勞動。我們對教會的認識不夠深，否則我們會認出在神職人員當中一直隱藏著這個加入最被蔑視、最被排斥者的渴望，爲了和他們一起分擔痛苦與自卑。

對我來說，我已別無所求。稍後，在一九五六年，當我的主教派遣我到諾瓦集貧民窟時，我有種老死在當地的意願，就像當時我在蒙特耶（Montreuil）及以菲依（Ivy）所認識的神父一樣。在他們的工人堂區，他們費盡心思要與這群不認識基督卻呼求、尋找並要求基督耶穌的百姓一起生活。其實，我們基督徒十分健忘，已經忘卻這些非凡的時刻，而我在神職的開端有幸參與並見證了這段歷史。

工人神父們記得這一切嗎？在你看來，他們的初衷是源於這個道成肉身（編案：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個位格，即天主聖子、聖言或道。他透過瑪利亞降生人世，〈若望福音〉（約翰福音）一：14：「道成了肉身，寄居在我們中間。」）的需求。

我想是的，在我看來，他們一直在這條路上前進著。我有可能弄錯，但是，我相信他們繼續渴望走向最底層，走向那潛藏著教會完整的信德、望德與愛德的深處。潛向最深的底部，爲了徹底底愛這個教會，不是透過最貧窮的人，而是在他們內，這些神父們所受到的神聖召喚確實就是這個。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憂心忡忡地想接觸到非技術工人、

移民及被剝削得最厲害的族群——不是在他們那邊停下腳步，而是要不斷往前邁進。

教會的角色是讓大家意識到不公義的存在，但他的角色更是在這過程中保持警醒，不斷走向更貧窮的人，走向那些因為過於沉重的悲慘，讓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底層百姓。教會知道更貧窮的人一直存在著，而基督耶穌就化身在他們身上。教會在加入他們的行列之前無法安歇，她注定要不斷走向衆人所惡之處。

教會直到今日仍告訴我們：勞動的場合は剝削發生之處。但她也提醒我們：赤貧在別處蔓延，它隱藏在社會階梯的更下方；在那裡，這些家庭沒有住處、沒有收入，他們的尊嚴不被承認、不受肯定。教會也提醒我們：在一九六八年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的危機中，只有家庭團體在這場震撼中倖存，工人也在他們的家中等待我們，這一點工人神父非常清楚，家庭是最佳的聖地，在那裡，天主給出祂的愛，並讓這愛茁壯。

這便是我們的良機，因為有時勞工朋友們的居住地離他們的工作場所很遠，所以我們可以在工人的住宅區找到那些失業的工人。一個工人神父在與勞工朋友一起回到他的住所時，便有機會遇到這些無法參與勞動生活的家庭。

或許我們神職人員的痛苦與焦慮，就是害怕在生命終了時，上主會向我們說：「我就在這些人當中，我就在這間陋室、在這個貧民窟，在這個因過多的憂慮而動彈不得的家庭中，這些受教權被剝奪的孩子就是我。你從我身邊經過卻沒認出我，你沒有因我而

駐足停留。」

我發覺你剛剛以過去式的時態在陳述你的往事，你說：「我過去願意。」這難道是已經過去的事？

這當然不是過去的事，但是我不太敢以現在式來陳述，因為最貧窮的人迫使我成為公眾人物，那是我過去所不願意的，因為我曾經自視甚低、害羞、對自己沒什麼信心。我想成爲一個天主的人，完全隱藏起來不爲人知，就像麵團裡的酵母一樣，一如天主曾經要求我的。如今我成爲公眾人物，違反我的初衷。對我來說，神父屬於他的百姓，他隱居在百姓中，到最後甚至和他們融爲一體。在我成爲司鐸的前幾年，我與教區的那些家庭實現了這種彼此融合、成爲一體的願望，那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這之後，你不得不取道他途，但是教會是否繼續在赤貧區域走向道成肉身的路途？

透過這些工人神父，我可以肯定地做出正面的答覆。這些神父將他們的生命獻身給他們所遇到的最被剝削的底層勞工，他們爲了這些勞工的解放而行動、祈禱，即使他們的方法，例如參與工會或政黨，有時令人驚訝——人們不該忘記這些方法是當時的勞動階層僅有的，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整體而言，這些工人神父知道他們不能就此停步，因為勞工的生活不限於工作場所。他們知道不能無視勞工家庭的存在，因為家庭乃是受傷、被損毀、被置於排除名單的男人最後的庇護所。勞工也推動這些神父接近社群生活，他們與這些勞工組織有越來越多的聯結，他們吸引神父到各個社區去，在那裡，神父們比以前更投入，試著找到另一種生活與表達方式。

還有另一個理由，讓那些在工人階層獻身的神父不能原地踏步——他們發現勞動的世界並不是同質的，在它之內隱藏著這個運動所揭示的被蹂躪的第四世界。基督耶穌就隱藏在那裡，等待著他的神父們。世人說我們應該與工人階級在一起，因為他們是一個希望的世界，我們完全同意。但是，在工人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絕望的世界，它就是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的階層。他們要求我們完全棄絕塵世的利益，唯有這樣我們才得以接近他們；唯有讓自己置身於相同境況，我們才能護衛他們；唯有給予我們的生命，我們才能夠分享他們的生命。這個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的階層不也是一個愛的世界？在那裡，耶穌基督如魚得水，因為他優先選擇他們為親人和夥伴；在這個世界，教會可以盼望一切，因為和教會一樣，最貧窮的人不屬於這個世界，而且應該從凶惡中被解放出來。

我確信這些工人神父仍然前進著，並沒有放棄當初的直觀。他們向前行進，而教會也跟著進步。今天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工人神父的教會；我相信這些神父在不久的將

來也會去到那些失去工作權利並因而失去勞工尊嚴的男人中間。

## 第四世界運動並不是天主教運動

除了工人神父之外，教會在面對窮人時還有其他方面的進步嗎？

老實說，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第四世界運動並不是天主教的運動，而是一個聚集多種宗教信仰的善男信女的運動。即使如此，我在教會內看到了許多真確無誤的記號。我想到許多神職人員及平信徒（編案：即沒有聖職的一般教徒）透過第四世界來尋求對話、尋找赤貧者的聲音，尋找一條加入赤貧者的路徑。當然，這些年來他們的數目減少了，或許因為我們的投身越來越公眾化，也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不那麼需要這個運動了，因為他們在自己的修會或他們所屬的團體中已經越來越接近處境最不利的族群。

教會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向前邁進，但是她所採用的方式不見得是大家所期待的。面對教會體制內的負責人，第四世界運動與教會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平和的。我有時會因此感到痛苦，因為教會以某種方式建構自身，特別是在法國，她的體制包括了各個地區的牧靈工作、各種接觸勞工的管道以及一些協助窮人的組織。從某方面來說，第四世界運動與教會的方向並無歧異，它有點像在福音化之前，潛入一群被淹沒的赤貧子民當

中，我們想讓這群子民浮出水面，好讓教會在他們身上認出自己。但是，當我說這個運動時，我想到無數的基督徒，他們或在這個運動之內，或在這個運動之外，在赤貧的世界埋根，他們是死在泥土裡的麥子。這些人包括平信徒與神父、修女們，教會有時並不將他們視為教會整體的一分子；她也不是每次都願意和他們一起承擔風險。教會這樣做是否有道理？無論如何，在這方面教會確實遇到困難。而且我們也能理解，因為教會所建立的體制一方面是爲了有別於這個世界，另一方面又要藉此以入世的精神和世人同在。

針對教會在這方面的困難，讓我自己親身的經驗爲例，舉一個天主教法國明愛會（Secours Catholique）的例子。二十年前，在一次與創建明愛會的羅丹主教（Monsignor Rothain）的會面中，我和他談到我個人爲了認識赤貧家庭、爲了和他們一起奮鬥，所面對的無數難關，有時甚至只是爲了餵飽我自己。

我補充道：對這些家庭來說，親眼看到我這樣分擔他們的痛苦，無疑是件好事。但是，我認爲所有像我一樣抱著良好的動機、讓自己在赤貧世界生根的人不應該承受這些苦楚，因爲某些缺吃少穿的經驗是可以避免的。我也表達出我的期待：我希望以貧困者爲對象，進行跨國界、跨種族的慈善工作的法國明愛會能夠協助在貧民窟、灰暗髒亂的社區與緊急收容中心，犧牲自己的健康與生命的人。除了物質條件的拮据，這些投身者還缺乏牢靠的系統性知識。天主教明愛會難道不能成爲認識赤貧者的知識泉源嗎？還有，

從過去到現在，這些投身者總是得發出募款的呼聲才能得到物資。明愛會能不能支援這些投身者所缺乏的物資？若能如此，對那些回應受苦者呼聲的人，他就扮演了引導與支持的角色。但是，這件事一直沒能成就，而且許多投身者繼續在投身的路上顛簸行進，爲了要將最貧窮的人拉出來而筋疲力盡。看著他們像我一樣不停地向別人乞求物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痛苦。這痛苦也促使我們創立了「科學服務團」，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教會在她的體制上沒有支持我們，她也沒有試圖利用我們。教會對我們表達了許多的敬重。有一天馬蒂樞機主教（Cardinal Marty）提醒我：「您一直希望創立一個運動，讓各種宗教信仰的人能夠爲了最貧窮的人共聚一堂。協助您的最佳方法就是，立即接受此事並讓您自由地繼續這條路徑。」正確地說來，教會從未懷疑過我們的誠意，並且一直對我們保持信任。

當你還是年輕神父的時候，教會從不曾要求你懸崖勒馬？她不曾因為看著你和公權力搏鬥而忐忑不安嗎？

教會勸告那些在赤貧領域涉身的神父及平信徒們要謹慎並保持耐心。我已經告訴過你，他們的數目比大家想像的還多；赤貧一直是個吸引人們重新凝聚與相遇的磁場。他們彼此接近，試圖了解並尋求受苦者的解放。他們的行動或許不是每次都符合赤貧家庭

的深切期待，但是那些曾經和極端貧窮面對面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樣的經驗；很少人沒有因此而成為公義與和平的護衛者。你知道教會不只是放手讓他們去做而已，她讓他們自由是爲了讓他們與最貧窮的人徹底分享生命。當然，我們會希望教會更活躍、更積極、更親近那些試圖在赤貧核心觸及貧窮家庭的人。他們有時因爲所有的努力在表面上看來一無所用而感到沮喪。

## 哪裡有赤貧，哪裡就有人投身

在你的運動之外，在赤貧之地投身的人真的像你所說的那麼多嗎？爲什麼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聲音？

哪裡有赤貧，哪裡就有人投身；我從未見過一個沒有任何人关注过的赤貧之地。可惜的是，他們通常都沒沒無聞，然而他們卻是友愛的見證與重要的動力。法國輿論界因爲缺乏足夠的資訊，所以將對抗赤貧化約爲第四世界運動所引領的行動，這就大錯特錯了。第四世界運動無疑有它獨特的眼光，對赤貧者也有原創的認識；此外，它也將赤貧者的歷史還給了他們。由於這個運動，他們的尊嚴不能再被踐踏。而且，有許多許多的人從這個運動取得靈感，雖然他們名義上不屬於這個運動。

在你看來，在這個基督宗教所謂的「道成肉身」的更寬廣的定義中，第四世界運動是否身負一份相當原創的訊息？

從一開始，這個運動就誕生於一個很強烈的直觀中，在諾瓦集貧民窟時已是如此。我當時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被聚集到這兒的貧民窟的家庭並非一些個人組合，也不是當時甚至一直到今天某些行政機關或慈善組織所謂的個案、「社會性案件」。這個運動打從一開始就知道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族群，它就是在這群子民之內並爲了這群子民而創立的，這群子民塑造了它的思想、存在及做事的方式。在所有人只看到社會性案件之處發現一群子民，甚至在其他人否認社會真相的地方看到一個歷史性的身分，這和以色列子民以及他們離開埃及、穿越西奈沙漠的漫長旅程可以等量齊觀（編案：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奴役，走向自由應許之地的旅程）。和一群赤貧的子民並肩而行之際，我們要求當代歷史不再忽視他們的存在，拒絕歷史將這群子民丟進冷宮，不聞不問；我們拒絕他們被視爲個別的案件來對待，我們聲明這群子民在當代社會的陰影下生存。聲言這個歷史性的事實是爲了試圖讓這群子民獲得自由，爲此，我們必須接受鍛鍊以建立嶄新的思想及行動。

你總是以「我們」或「這個運動」在發言，事實上，不就是你創立了這個運動嗎？

是其他人和我一起創立的。當然，確實是我起了頭；因爲當我抵達諾瓦集時，我被

嚇到了，即使我自己在貧窮中成長，而且在此之前我也親眼見過許多貧民窟。但，諾瓦集的出現提供了一個頓悟的時機。

我的主教建議我試著到這些家庭中待一段時間，然後再決定要不要留下來。所以我先去試了六個月；在一開始的一個半月，我讓自己融入厄瑪烏團體的團員中，和他們一起工作、生活，因為他們在諾瓦集有工程要完成，所以我有機會親近住在那邊的家庭。

我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到達，在這片被稱為法國城堡的台地，太陽散發出陣陣酷熱的暑氣，每條巷子都空無一人，沒人在外面溜達。看到這樣空無的場景，我自語道：「從前道路交會處、教堂的鐘樓或工廠會使人們聚居一處，這些家庭卻是因為赤貧而聚集在一起。」那樣的直觀就像是一個靈感。我深知我所面對的既不是人們當時所謂的相對貧窮，也不是單純的一些純屬個人性質的困難。我在當下馬上感覺到我走到了我的子民面前，這無法解釋。

從那個時刻開始，我的生命起了轉折。因為在這一天我許下承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讓這些家庭沿著梵蒂岡的石階，經過愛麗舍宮<sup>3</sup>，一直到聯合國。」在這個令人窒息的酷熱與完全的死寂中，這個橫亙在我眼前的赤貧令我目眩，讓我苦惱。爾後，有個想法在我腦中縈繞不去：如果人們討論、議事的地方不將這群人視為一個整體、一群子民，他們將永遠無法脫離赤貧。在人們談論並決定人類現在及未來命運的每個地方，他

們都應該以平等的地位出席。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我簽下我的命運合約，雖然我一直等到十一月十一日才決定落腳諾瓦集。當時我還是保留先前的堂區工作，每個週末都回到原來的堂區。我是一個生於赤貧的孩子，赤貧一直烙印在我生命的最深處，我從它身上學到：相信一切，敢於一切，但還是在某處保留一個備份，在口袋裡放一顆可以止渴的梨子、一塊硬麵包——沒有任何一位窮人例外，我的母親就是這樣，她總是替孩子多準備一雙鞋襪。如果有人再拿一雙舊鞋來送我們——因為別人常常救濟我們——我母親總會回答：「幸好您來了，我們正好缺雙鞋。」當贈與者離開時，我總會問她：「爲什麼妳要假裝我們沒有鞋子呢？」她總是告訴我：「若瑟，你不懂，如果你今天拒絕了別人送你的東西，有一天，當你真的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可能都已經送給別人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保留住我的老本堂，就好像我的母親爲了預防萬一，總是儲藏一雙備用的鞋子。

你有過人的勇氣，也敢於冒險，但是你還是保留了這個本能反應：「晴天要存雨來糧」？

這是窮人的本能，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老是擺脫不掉深怕匱乏的念頭。這同時也

譯註 3：愛麗舍宮 (Elysee) 即法國總統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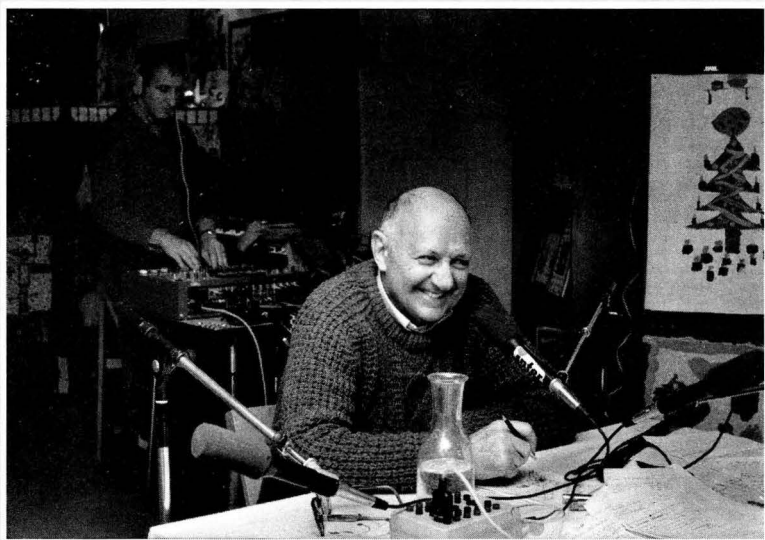
是引領你一生的智慧。我從不會花過一文我還沒攢積的錢。我們日復一日在這個運動所建立的，都秉持同一原則。有一次我們甚至因為缺錢而將一項工程停擺了三年。我不會花過口袋裡還沒存到的錢。對我們窮人來說，災難隨時都會發生，所以一定要預做準備。我們生存在恆久的匱乏中，所以即使有時運氣好，有了日常所需，心中還是留著那個緊黏身上的恐懼：萬一明天沒有怎麼辦。

你最後還是放下那條後路，只留在第四世界，不是嗎？

那是真的，不過誕生於其中的這個運動學習到了赤貧者的謹慎。它與這群子民的生存條件結合的同時，也學習到這個結合對象的行事方式，學習到某種智慧。

第四章  
第四世界，  
上天的子民

第四世界的子民一直是耶穌門徒伯多祿的翻版，他不斷重複：「我不認識這個人。」



1984年，若瑟神父接受法國文化廣播電台訪問。

吉爾·阿努以：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這群子民，你自己稱他們為第四世界。你說他們在法國超過兩百萬人，形成一群子民；很多法國人對這件事並不清楚，甚至覺得難以置信。

若瑟神父：

的確難以置信。對許多人來說，想要全面了解這個赤貧的族群，要在他的歷史、在他世代相傳的生命經驗中認出這個族群，確實很難。困難首先可能是：雖然這個族群表面上看來是組成社會的一部分，但是要認出他們來，必須找到一些熟悉的特徵、一種親屬關係；這種親屬關係將使我們建立起友愛與交流的聯繫。然而，這些家庭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生活條件太過落後，以至於無法得到同胞的認同。在這種情形下，一般人很難想像自己必須為這些家庭的處境負責，他們甚至不覺得自己與他們有任何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一直對比無產階級更貧窮的族群，感到陌生與不解。

你說「我們的社會」，指的是歐洲社會嗎？

我說的是西方普遍的情況，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工業社會，所有忘記赤貧就存在自身內部的社會。

富有者的不負責任導致赤貧者也依樣畫葫蘆，當然，這些比無產階級更貧窮的人並

沒有意識到他們是他人歷史的一部分，也因此，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和其他人是這段歷史的共同負責人。他們爲人處世彷彿自成一國，接近他們就好像接近另一個世界，一個令人驚訝且難以理解的世界。這點從一般人的感覺就可以反映出來，人們看不出自己怎麼會和這些家庭扯上關係，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麼讓人難以認同。在外界的眼裡，這些家庭好像不斷在阻撓別人想跟他們一起成就的好事。

我們不要忘記，因爲他們特殊的歷史與生存條件，這些比無產階級更貧困的族群所擁有的生命智慧和我們大不相同，那是另一種智慧，那種智慧導致另一種行爲模式。他們的文化凝聚力也和我們不一樣，即使兩者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他們的行爲舉止，不能用其他人的歷史背景經驗來加以分析。以一個居住條件惡劣到難以想像的家庭爲例，他們可能住在簡陋的小屋、車庫、貨櫃車上，有人想要幫助他們脫離這樣的處境，努力幫他們找到一個住所，甚至將親朋好友都牽扯進來，並且爲這個家庭做擔保。然後，就在一切都安排妥當時，這個家庭卻拒絕搬遷。他們就算沒有臭罵你一頓，也會告訴你，他們並沒有跟你要求過什麼。又或者，他們就毫無預兆地消失了。

那位善心人士還留在那裡，手上有個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房子，自己的名譽也受到影響，所有的人都對他說：「我們早就警告過你了。」至於那個家庭，他們這麼做也有他們的道理，他們從未擁有過這樣的住所，他們隱約看到搬家後伴隨而來的新困境：待繳

的房租、新環境中的異樣眼光、和管理員產生無可避免的衝突、與一些老朋友、老鄰居失去聯繫，還可能斷了他們所仰賴的救濟管道。對一個擁有某種居住和鄰里文化的社會來說，很難理解沒有浸潤過這種文化意味著什麼；我們無法想像，在遷移一個一貧如洗的家庭的同時，我們也摧毀了他們原本就已經十分脆弱的社會網絡，正因為這層網絡如此薄弱，更顯得珍貴。我們也可能因此摧毀他們的家庭組織。我曾經看過一些父親在這樣的搬遷之後，丟掉了他們千辛萬苦才找到的工作，也看過一些母親在這樣的拔根遷移之後，選擇了新的伴侶。

對那些不熟悉赤貧階層的人來說，這一切都顯得難以理解：這個家庭過去不是已經有過多次漂泊搬遷的經驗嗎？沒錯，他們曾經從附有家具的租屋搬到地下室、從地下室搬到閣樓、從貨櫃屋搬到帳棚、從簡陋的小屋搬到廢棄的空屋。但是，在所有搬遷的過程中（這點我們很難體會），他們都不會離開赤貧階層。正是他們所屬的階層，提供這些棲身的所在，提供他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的資源。我們從外部介入，也就切斷了他們與原屬世界的聯繫，而將他們移植到另一個世界，那裡的人際關係是建立在另一種不同的契約上面。

我看過一些被遷移的家庭，把幫助自己遷居的人當成人質般對待，他們不斷地要求他當中間人，要他提供各種新的協助，而且一旦他稍有拒絕，就到處說他的不是。在兩

個不同的世界中，存在著難以應付的人際關係，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這樣的關係讓所有的善意落空，也阻斷了許多人無私的努力。人們經常誤以為自己所接觸到的只是原本世界的一部分，不過就是個遭遇困難的家庭，然而，當我們自以為鞏固了他們的安全感時，事實正好相反，我們其實是在摧毀他們的安全感。如果我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點，我們遲早會對他們發出責難：「為這群人付出，實在很不值得。」這句話並非輕率的說法，它是整個社會根深柢固的經驗，這個社會讓一部分的成員走上被排斥的路途，它已經不知道要如何與他們重新會合，它在面對這些家庭時顯得笨拙。遺憾的是，為此付出代價的並不是這個社會。那些善心人士，經歷一次的失望後，還有千百個機會可以重新來過，他們的名譽和安全感並不會真的受到影響。但這些家庭卻沒有後路，他們只會比以前更被排斥、更被糟蹋。

## 一群特殊的子民

我還是很難將這些家庭視為一個特殊的階層。我認識一些被孤立的赤貧家庭，他們和外界沒有任何聯繫。這些家庭真的形成一班子民嗎？

我們常常被眼睛所看到的東西所矇蔽。在城市和鄉村的演變過程中，在領土的整治

規劃過程中，這些家庭曾經如此地顛沛流離、分散各處，再重新聚集，然後再次分散。你可能会很驚訝地發現，無論發生什麼事，這些家庭仍保持著彼此間的關係，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了這些關係。首先是親戚關係，赤貧族群的結婚對象，通常是同一個生活圈裡的人，像是鄰居的女兒或是同事的妹妹。然後還有鄰里關係，在同一個貧民區一起長大的玩伴，更不用提他們共同的經歷：一樣沒有充分就業、同樣被救濟、孩子同樣被強制寄養、同樣因付不起房租而被驅逐，在面對匱乏、疾病或飢餓時，他們也有同樣的應對方式。第四世界的家庭會爭吵，而且可能經常如此，但是他們從來不會和自己的過去決裂，他們永遠不會切斷自己的退路。我還沒遇過完全被孤立的赤貧家庭，他們總會保留一些關係，例如他們的親戚、那些和他們處境類似的家庭，還有那些我們稱爲「慈善團體」的工作人員或義工，那些他們口中的「善心人」。

當我們從遠處觀看他們，我們經常會看錯，但這些家庭也會誤導我們，讓我們產生錯誤的想法。當他們幾十個人、甚至幾百個人一起生活在一個貧民區時，他們自己也有貶損那個環境的傾向。在面對外界的時候，鄰里關係便成了他們的藉口或自我辯解的理由，他們會說：「如果我的孩子在學校功課不好，那是因爲老師對我們的社區有偏見；不是我的孩子有問題，而是這個社區的孩子都不學好。這是老師的錯，他不喜歡我們，但這也沒什麼好驚訝的，看看住在這裡的人，都是些沒用的傢伙……」

每當社區有人打架鬧事或發生輕微的不法情事，鄰居就成了代罪羔羊：「這裡有好人也有壞人，就像每個地方一樣……」 「你們看看這些人，淨是些廢物。」此外，爲了讓社工人員或市府官員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這些家庭不得不讓自己與這個聲名狼藉的社區撇清關係：「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會流落到這裡，是因為運氣不好。」否認自己「屬於這群人」，其實意味著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份子，意味著這個階層確實存在。但這樣的背叛是必要的，是無可避免且不斷發生的。在這點上，第四世界的子民一直是耶穌門徒伯多祿<sup>1</sup>的翻版，他不斷重複：「我不認識這個人。」一如天主之子，他們也不斷地被自己身邊的人所背叛，身邊那些自己唯一能夠依靠的人。

但是，在這樣的背叛後面隱藏著一種祕密、晦暗、隱而不顯的生活，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生活。因爲，即使我們與這些家庭非常親近，他們也不會告訴我們所有的事。由於他們在自己本國的處境就如同異鄉人，人們相信這些家庭是因爲遇到一些意外或不幸的情況才聚居在一起，所以他們只告訴我們他們願意透露的部分，對他們有利的部分、那些攸關生存的部分。他們之間的關係對他們來說是一項財富，是他們費盡心思，爲自己守護的財富；他們不承認這些關係，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會竭盡全力去破壞他們。他們

譯註1：伯多祿，或譯為彼得，是耶穌的大門徒，在耶穌被逮捕後，曾因恐懼公開否認耶穌三次。



已經習慣聽到人們說：「當然啦，如果你們一天到晚跟這些帶你們去喝酒賭博的人混在一起……」總而言之，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赤貧家庭對這些批評耳熟能詳，所以盡可能地保護自己以免遭殃。

我跟你說過，我們一點也不了解赤貧族群真正的生活狀況，因為他們在我們面前所呈現的，是一張已經被嚴重糟蹋的面容，我們很難與他們建立起友愛與相互理解的關係。我們越努力嘗試，就越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一群子民，因為承認這群子民的存在，也就等於承認我們有錯，所以我們盡一切力量去阻止他們形成一個階層。事實上，我們從無法理解，變成拒絕理解，最後乾脆否認他們的存在。我們不但沒有肯定這個階層、沒有把它視為解放的基石、沒有承認它的價值、沒有接受他們活出這些價值的方式，反而聲稱要保護這些家庭，將他們分解成一個個孤立的個案，說這樣才能避免類似處境的家庭一起沉淪。這些家庭深知這點，他們加入這場遊戲，但同時也偷偷保留一部分與鄰里互助共存的關係。倘若有一些心懷善意卻不清楚狀況的人告訴你：「我對這個家庭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們什麼都告訴我，我們是好朋友。」你最好對他的話存疑，這個我們自以為已經徹底了解的家庭，有著太強烈的自尊心和對外人的防衛心，他們不會毫無保留地透露一切。

對於我們這些和他們一起生活在貧民區和平價住宅的人來說也是一樣，我認識一些

家庭，有好多年的時間，他們讓我相信一些子虛烏有的事。例如，有一位婦人，長達十五年的時間，一直讓我們相信她在這個世界上無依無靠、無家可歸，讓我們以為她從小生長在公立孤兒院，孤兒院裡的修女經常打她。她告訴我們許多細節，還有那些公立社福機構的名字；赤貧家庭對這些社福機構瞭若指掌，因為社會救濟一直都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這個家庭的母親為自己捏造了一個身分，爲了能夠在這個強制寄養她孩子的社會中繼續活下去。

你怎麼知道她說的不是真的呢？你如何去發現別人所沒看到的事？

透過共同的生活。我剛才提到的那位母親，要求我幫她找回孩子，爲了了解事情的原委，我們和她一起回溯她的生命歷程。慢慢地，我們發現她整個童年其實都和父母一起度過，她的父親是農村短工，穿梭在一個又一個農場。這個人口衆多卻又極端匱乏的家庭，在鄉間被排斥，孩子們被學校排擠，和教會也沒有聯繫。這位母親爲了逃離這種難以忍受的生活，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嫁給了同村的男孩，一個木匠的兒子。然而這是一段注定要失敗的婚姻，因爲這對新人無法了解彼此，而且整個村子的人都反過來批評這個出身卑賤的女孩，竟敢嫁給一個老老實實的年輕人。

最後，這個母親跟另一個男人跑了，一個背景和她相同的男人，他們落腳在一個赤

貧社區。長達十五年的時間，他們生活在那裡，一起經歷了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拳腳相向、相互對罵，經歷了飢餓以及孩子們被強制寄養的痛苦。然而，她深愛她的第二任丈夫，直到他過世。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她以慈母般的愛照顧生病的丈夫，她不會抱怨過什麼，因為他了解她。但是，在面對社福部門時，她必須捏造一個假身分，一個曾被公立孤兒院收養的孤女，有著一段受虐的童年。這麼做並不困難，因為第四世界裡多的是這樣的人、這樣的故事。

我還認識好幾個年輕女孩，十七、八歲就嫁給了年輕的工人，她們並不是爲了要脫離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脫離自己所處的階層。這樣的結合幾乎都以失敗收尾，除非這個年輕人融入她的妻子想要逃離的階層。如果兩個人離了婚，他們的孩子通常會被寄養，然後，這個妻子會再和某個能夠理解她、分享她的感受和生活習慣的男人，重新開始另一段生活。這就是爲什麼貧民區裡的親屬關係會如此錯綜複雜，但這些關係同時也是一種證據，這些婦女的命運也是，證明這個階層與這群子民的存在。這群子民間有著一種祕密的共融關係，讓男人和女人不需太多言語就能夠了解彼此，自然地共同前進，爲了自己，也爲了孩子。

老實說，在目前的條件下，要第四世界走到另一頭、走到工人階層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們找到與原生族群徹底斷絕關係的力量。要斷絕這些關係，要有很強的說服力。就

我所知，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我只想到一個赤貧階層的年輕女孩，她嫁給一個積極參與法國總工會（CGT）<sup>2</sup>的工人，她自己則成了共產黨員。因為加入政黨，讓她得以對自己的出身做出推陳出新的政治分析，不再因此感到自卑。但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第四世界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在自己的階層間通婚。

## 赤貧家庭的生活策略

你說過，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者以一種獨特的生命智慧自成一個族群，和我們截然不同。他們是如何互相援助、彼此團結呢？難道不足以成為效法的榜樣？

透過他們的智慧，我理解到一種生活策略，一種為自己預留後路的方法。就如同我之前提到的那個家庭，他們寧願逃走，也不願遷居到一個感受不到親切氛圍的社區。

但是，第四世界的互助與團結指的是什麼呢？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能力與利益來實踐團結。我們社會裡的基督徒，深知他們的團結必須推及到每一個人，甚至為別人犧

譯註 2：法國總工會 CGT (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為法國最大工會組織，與法國共產黨關係良好。

牲自己，因為每個人都是神聖的，都是天主之子。可惜的是，同樣的這個社會，讓這群人居住在擁擠狹窄的空間內，這讓他們很難以個人身分去接待他人，並和他人建立深厚的關係，也因此，他們之間的互助與團結變得困難重重。

現代人被淹沒在擁擠、陌生、可互相取代的人群中，所以他們必須做出選擇。現代社會強迫人們像中國古代孟母一樣「擇鄰處」，這種方式，顯得缺乏遠見。鄰居不再是生命安排在你身邊的人，而是由你自己來挑選。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因為人的成長，是透過和自己不一樣的人來往；我們的生命也隨著異鄉人和原本不認識的陌生人而更加豐富，透過交談來往，他讓我們知道他是誰，他在想什麼。表面上，我們因為援助那些不是自己選擇的鄰居而少了什麼，事實上，我們的生命因此變得更富有。然而，現代社會並不鼓勵這種里仁關係，和它所帶來的團結關懷。

可是，在赤貧的社區裡，人們別無選擇。反正，你的鄰居和你一樣，也是家徒四壁，你會因此更慷慨寬厚嗎？事實上，在沒有回報的情況下，慷慨寬厚更難實踐；因為在赤貧的世界裡，你的慷慨寬厚幾乎不可能是無私的。在那裡，給予是一種切身的需要。怎麼能不這麼做呢？因為有一天，你也會需要鄰居的幫助；今天怎麼能拒絕給予呢？也許明天就輪到你需要別人的幫助。第四世界的人，一直都是抱著這種期待對等回報的心態提供協助。

我的母親很窮，她一直和隔壁同樣窮苦的鄰居維持著非常良好的關係。不幸的是，隔壁那位太太有喝酒的習慣。她的兒子在傍晚回家時，常常發現自己的母親爛醉如泥，也沒有準備晚餐。那時我母親就會讓他來我們家吃飯。不過，母親會這麼做是有原因的，當她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她會第一個去敲隔壁太太的門。但是，母親似乎很難原諒她的「不知回報」，所以有時候她會報復，提高音量跟我們這些孩子說：「她也不想，她兒子餓肚子的時候，我為她做了什麼……」

分擔別人的重負，這種難處，我在赤貧世界隨處可見，因為，給予意味著你必須分享自己已經少得可憐的必需品，意味著你必須縮衣節食。這會使你的家庭更加拮据，生活陷入更深的窘境，而你的先生和孩子，還有社工人員也會因此責怪你，讓你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家人的事。

不過有時赤貧者也會大方得令人驚訝。例如，新年期間，當清潔工和消防隊員爲了領年終賞錢路過社區，或是郵差先生帶來補助金的匯票時，他們會給這些人包個大紅包，他們會送給正在籌措喪葬費用的鄰居一大筆錢。但，這是團結互助的表現嗎？或者應該說這是一種爭取認同和尊敬的瘋狂作風？這其實是一種扮演全能者的方式。當然，這些舉動並沒有事先的盤算，如果他們能夠暫時享受到成爲「要人」的滿足感，他們就不會爲自己的付出感到懊悔。還有一點很重要，他們也想要證明自己也會是勞動者，所以

他們了解工人、清潔隊員、郵差等勞動群眾的辛苦。如你所見，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條件的慷慨是很難做到的。赤貧並不會讓人走向真正的分享，也不會促進彼此的團結。

在友愛和傾聽方面也出現同樣的困難嗎？

人類之所以殫精竭慮企圖根除赤貧，徹底拒絕它，就是因為赤貧造成矮人一截、低人一等的自卑感，這讓真正的聆聽難以發生。我們直覺感受到，窮人在猜測別人的感覺，他們沒在聽。他們的用詞不足、詞彙貧乏，如何達到真正的交流？由於缺乏真實交談的能力，他們不可能建立一個共同的思維。他們通常在三十或三十五歲時，就已耗盡氣力，老態龍鍾。他們必須解決眼前的困難，必須面對家人在食物、金錢或居住方面的需要，這一切耗損他們的智力和思考能力。你能想像一個錢永遠都不夠花的人，一個生活在焦慮中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嗎？他焦慮是因為他必須不停操煩如何讓自己的孩子吃飽穿暖，煩惱著在孩子要求玩具或冰淇淋時如何回應他們。赤貧的人必須面對孩子的種種要求，他們需要一顆糖果、一件衣服……讓我們想像一下，對他們來說，當家裡連一粒米都不剩，女人煮不出一頓飯，偏偏家裡的男人說他如果沒有便當就不去工作，那種焦慮意味著什麼？意思是：「如果他不去工作，家裡就會鷄犬不寧。」

當一個人耗盡精力、思緒周而復始地在原地打轉時，除了蠢事，還有何事？所以，

出於焦慮和飢餓的自然反應，如果他們突然得到一大筆錢，就會馬上把它花個精光。在他們缺乏食物時會給予協助的鄰居將會得到報答；過去一直空盪盪的桌面，將會堆滿夢寐以求的食物：牛肉、羊肉、雞肉、香腸、草莓、昂貴的鮮蔬果等。所以社工人員會說這些家庭不懂得計畫，不會節省，不會管理預算。他們忘了這些人經常窮於應付眼前急迫的需求，像是如何支付房租、如何繳納學校的午餐費等。在這種情況下，從不會安穩度日、從不會被理解的人，怎麼可能會對別人所關注的事情或想法感興趣呢？這些家庭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心生憐憫，而且真情流露，但這些悲憫之情難以持續。在第四世界，這些家庭能夠苦人之苦、痛人之痛，這種同理的能力你很難在別處找到。但這並不會促成他們的團結關懷和長久的互助關係。赤貧者的互助關係是存在的，但只能是斷斷續續的發生在此時此刻。一旦情況改變，短暫的平和時刻一過，彼此針鋒相對的情況又會再次出現。他們會在某個點慷慨過頭，也會在那裡辱罵對方過頭。衝突和指責再次出現：「不要再和他們來往了，我們被他們給害慘了。」

要在第四世界創造一段共同的歷史，很難。這些家庭活出一段歷史，他們忍受歷史，卻無法編撰自己的歷史；這段在友情中展開的歷史隨著時光流逝逐漸朽壞。由於無法分享彼此的想法、無法相互溝通、無法一起計畫未來，第四世界只是一個因赤貧而匯聚的天地，總有一天，他們會無法忍受，覺得厭煩，接著就彼此猜忌、懷疑、指責。這些衝



突有些時候是真的，有些時候只是爲了製造一個爭執的藉口；而發生衝突的真正原因，卻是體力與精神不支，無法奔赴共同的計畫。例如，他們本來應該一起去市政府，或是幾個人一起去學校見校長，但是時間一到，他們全都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市長，不知道要如何和校長對談。

經驗告訴他們，他們是最弱勢的，他們永遠都是錯的一方；那麼，爲什麼要去市政府？何必去學校呢？爲了替自己的臨陣脫逃辯護，他們會說那是因爲鄰居們口是心非。除了說鄰居們隱瞞真相、自私自利，他們還能編出什麼樣的理由？雖然並不是每次都這樣，可惜的是，他們通常不會弄錯！

之所以半途而廢也是因爲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嗎？我想到一個你曾經寫過的故事，有一個男人費心修繕自己的家，卻在快完成的時候，用斧頭把它給毀了。

當時那個男人剛出獄，覺得一切充滿希望，心想從今以後一切都將步入正軌，他開始動手安裝一個下方附有整理櫃的水槽。他的妻子開心地迎接他回來，一個鄰居還給了他一點錢，他心想：「生活就要不一樣了。」然後，有一天晚上，爭吵又開始了。分開那麼久，他的妻子有點不習慣他的樣子，就講了他幾句；他抄起一把斧頭，便把一切都毀了。剛出獄時，他相信生活會變好，他想告訴他的妻兒，他也改變了。少了一點溫柔，

就足以讓他動手破壞自己辛苦安裝的水槽，羞辱自己的家人；足以讓他絕望地說生活還是一模一樣，什麼都沒改變，他心想：「我真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她，但她一點都不值得我這麼做。」

如此難以建立、難以維持人與人間、夫婦間的信任關係，這種挫敗感，讓所有的努力都落了空。即便是夫妻間親密的生活也難以爲繼，要彼此相愛、建立起共同的生活，實在難如上青天。那麼，是什麼樣的情誼得以支撐鄰里間的友好關係呢？那個洗碗槽不就是鄰居送的嗎？油漆不也是另一位鄰居提供的？曾有短暫的片刻，理解似乎在夫妻和家庭中出現了，與鄰居的相處也很和睦。但是，當一切都毀於一旦時，有誰能夠了解？我們更堅信笨到不行的人才會伸手去幫助這些人，堅信他們都安於現狀不願改變，而且一切的苦難不幸也是他們自找的。我們如何能在這些破裂的關係背後，看到一群子民痛苦緩慢地前進？

這種共同的生命軌跡，難道不足以解釋你所提到的那種世代代、父子相傳的赤貧？

的確，那種被忽略、永遠不會有所成就的意識一直代代相傳著。但是，會造成第四世界這種世代相傳的赤貧現象，是因爲在每一個新的世代，周遭世界對他們都是同樣的缺乏理解，同樣的拒絕，這是大眾的成見代代謠傳造成的嚴重後果。因爲輿論一直認爲

這些貧窮的家庭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沒有意志力，沒有愛孩子的能力，沒有渴望改變的能力，甚至沒有靈性。

但是，我是這事的見證人，這些比無產階級更貧困的家庭，他們之所以願意相信、願意祈禱，正是因為沒有放棄，是爲了支撐尚存的希望。可是，別人不斷告訴他們：「你又做錯了，這又不對了。」他們不斷因爲自己的軟弱感到自卑，他們願意相信一個慈悲和寬恕的天主。由於刻板印象的影響，我們習慣忽略他們的衝勁，一直無知於他們爲了彼此而默默做出的各種努力，不停地責怪他們缺乏人的素質。是我們的這些作爲使他們變得更弱勢，是我們將他們推入惡劣的生活之中，我們阻礙他們去相信一個慈悲、寬恕的天主。如果我們還有一點點人道精神，我們就會承認，我們強加給他們的生活是如何破壞他們身上最美好的品質。我們把他們集中在狹小陰暗的社區，給他們有害健康的工作，付給他們微不足道的工資；我們拒絕給他們合理生活、相互關懷、彼此信任與自我肯定所需的一切。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我們首先要承認的是他們有被寬恕的權利？

第四世界家庭需要被寬恕，這是一種不會間斷的需要，但社會對此卻十分吝嗇。多年來，這個社會從未忘記，且不斷地爲了一些輕微的罪狀來指控他們，剝奪他們所有改過自新的機會。這當然也就無法促進這些家庭彼此間的寬恕。然而，這些家庭被堆擠在這些貧民住宅中，終日困厄不安，時時防備著彼此，又總是讓彼此失望，如果這些家庭

不互相原諒，就無法生存下去。他們的存在讓我們知道，寬恕的權利也包含寬恕鄰人的權利。不互相原諒的話，他們怎麼能夠繼續當鄰居？但是，當生活不時提醒著昨日發生的爭執、責備、決裂，像是孩子們打架、夜裡隔壁鄰居傳來令人無法忍受的噪音等等，又該如何做到原諒？

我們都說要走向天主，今天比昨天更難。但是，對我來說，我親眼見證最窮困的人們已經上路，而且可能遠超過其他人，因為他們渴望被赦免。但是，為了讓他們相信這點，教會必須說服他們，為此，教會需要重新學習仁慈與寬恕。很可惜，教會不再表明告解不只是一項尋求淨化的聖事，也是天主對祂的兒女溫柔的表現，是天主遺忘罪過的行動。

## 從罪惡感中解放

現今相當流行窮人有權審判壓迫者的想法，你的說法 and 這股思潮相互矛盾，因為我想他們不可能同時是懺悔者與審判者。你難道不擔心別人說你破壞了窮人解放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應該由最貧窮的人來決定，不是我們。他們的一生都在呼求寬恕：「我並不想動手打我太太；我不想責罵我先生；我不願意承認我兒子是個小偷……可是我還是

做了。」他們日復一日不停地想著：「是我的錯嗎？告訴我，這並不是我的錯……」

讓我來告訴你，我們在大巴黎地區一個貧民窟設置第一個法律扶助站的經驗。第四世界運動的法律專家之所以會設立這個服務站，是爲了幫助當地的居民維權，但是孔帕（La Campa）貧民窟的家庭很快就讓他們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那些家庭擠爆了服務處，他們希望得到的首要協助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是幫助他們符合世間的規範，他們來認錯：「我偷了幾個輪胎」、「我無照駕駛」、「我騙了老闆」、「我拿光鄰居信箱裡的東西」等等。你可能會說這都是些小過失而已，但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這群人透過這樣的舉動，告訴我們他們最大的渴望是忠於他們所相信的事。

你也許會問，我有什麼權利斷言他們也渴望符合天上的法則。的確，過去最貧苦的人很少上教堂禮拜，今天會這麼做的人肯定更少。但是，當家庭之間進行和解時，我看到他們中間總是有人在我的辦公室逗留，最後告訴我：「我已經有十年、二十年沒辦告解了。」然後，他們會跪下來。耶穌基督熟知人心，每次遇到窮人，除了治病或贈餅，祂總是寬恕他們。而所有真正讓窮人往前邁進的人，總是先讓窮人從深沉的罪惡感中解放出來，他們把尊嚴與自信還給窮人。他們相信窮人，並且說服他們：他們不必承擔歷史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重負，赤貧不是他們的罪過。

你問我這種赤貧是否會世代相傳，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人員近三十年來都在討論這

一個問題；坊間也有一些論及貧窮文化的書籍，論述窮人代代相傳的習慣、思考方式、語言模式等等。基本上，赤貧者世代相傳著一個信念，一個由社會輿論所扶植的信念，那就是他們應該為自己的處境負責，他們是罪有應得。他們很難去反駁這一點，因為他們不斷地做出連他們自己都不贊同的舉動。一直處在與自己的信念相互矛盾的情況，導致他們無法生存、無法愛人，這種「無能為力」透過赤貧者共同經歷的點點滴滴，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有一天早上，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哭著對我說：「您知道嗎，神父，昨晚我爸爸又想要糾纏我母親，但是她不想，他們起了爭執，又吵又打的。所以，爲了讓母親得到清靜，我拿起桌上的空罐頭朝我父親臉上丟過去，他整個人向我撲過來。我跑過了整個營區，他一直追我追了好遠，所以等他回到家時，他已經累歪了，不再想上床的事，這樣媽媽就不會再多生一個寶寶了。」

幾乎所有第四世界的孩子都能說出類似的故事，這些事件將他們彼此牽絆在混亂的生活中，在那裡，一切都攤在陽光下，包括衝突、夫妻關係、愛與恨、哀愁和希望。我想到另一個八歲的小女孩，經常拿著母親給她的小紙條來跟我要錢。有一天，我生氣地趕她回去：「聽著，回家告訴妳媽媽，如果她想要什麼東西的話，讓她自己來找我。」小女孩離開，然後又轉過身來看著我說：「那我呢，神父，我沒有吃飯的權利嗎？」

就是這種訛詐，一種爲了生存所做的要挾，自小習得的生存方式。一如在遭受不義時，他們也一起分享了那種深刻與黑暗的感覺。許多事情沒有被說出來，但是透過每天發生的大小事，他們共同經歷了一切。另一個女孩的故事可以再次說明這種生存狀態，我在她七歲時就認識她，也看著她長大，現在她已經結了婚，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小時候，她總是穿著善心人士捐贈的舊衣服。有一天，我很驚訝地看到她細心照顧著她那睡在廢紙堆裡、剛出生沒幾天的弟弟，她用一件舊外套包裹著他。有多少小女孩像她一樣照顧著睡在廢紙板或是舊衣堆中的新生兄弟，而那些廢紙板和舊衣堆就是窮人的床墊？我最近在法國北部的一個家庭又再次看到相同的景象，這個家庭卻以虐待兒童的罪名被起訴：同一幕難以置信的窮困景象，卻被解讀爲父母的疏失！

因此，貧窮經由他們共同經歷的事件傳承下去，透過拼不成套與破舊不堪的衣物，透過種種事物和情況，透過孩子和大人共同承擔的角色，赤貧一代代的傳承。但是被傳承下去的，不僅是赤貧，也包涵了奮鬥，一場爲了生存下去所做的奮鬥，因爲赤貧世界的人們不輕言放棄，當事情攸關孩子時，他們更不可能放棄。即使父母親都因爲寒冷、恐懼和憂慮而失去活力，孩子們仍繼續努力著，就算只是去超級市場偷東西都好。也許對那些不是那麼貧窮的孩子來說，偷竊是一件壞事，但如果是爲了去找米或麵條來餵飽全家大小，那就另當別論了。這是他們爲了生存所做的奮鬥，有時甚至需要英雄般的勇

氣。去認可這樣的奮鬥可以是一種寬恕的方式，但是誰會認可這樣的努力呢？

幾天前，在法國某個地方，一戶赤貧家庭的三個孩子因為偷了幾包通心粉、麵條和米而被逮捕。他們也在一條巧克力棒上咬了幾口，但沒有把巧克力棒帶走，他們只拿走了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他們因此被帶離父母身邊，被判機構安置。然而，偷竊在這些情況中，說明了一種責任感：「好歹得給母親帶點食物回去。」這又再次證明了，父母的經驗和孩子密不可分地糾結在一起。大人們到哪裡都必須帶著年幼的孩子，他們不能把孩子獨自留在家裡，因為他們在家裡可能會惹麻煩，或因為玩火而燒傷自己。最近有一位婦人告訴我：「我一歲半時，就在我母親肩膀上開始了我的生活。當時她被起訴，她爲了餵養我們偷了一百法郎，必須到法院去。」她自己當然不可能記得這些事，但是在她的童年裡，類似的事件一定讓她的母親有機會不斷地重複：「對我們來說，每件事都很糟、很不順利。女兒還沒兩歲，我就必須抱著她上法院……」

參與父母親生活中的大小事，在孩子的生命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不管是與鄰居的來往，還是與外界的接觸。社工人員、幼兒保育員、來抄瓦斯、電錶或水錶的人……，這些人一定都用某種態度來對待他們的父母。他們會將目光放在屋子裡的擺設，或是特別注意小孩的穿著和說話方式。孩子們可以感覺到這些人並不是他們的朋友，在他們眼中，這些人不見得是敵人，但他們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他們的到訪通常都是帶來不幸，



他們用一大堆建議來擾亂父母，或是向身無分文的父母討債，或是要求他們解釋為何沒做到已經交代過的事。母親沒有照他們的指示去做，也許是因為害怕出醜；她沒有填寫那份表格是因為她不太會寫字。社工員要求母親在她面前填寫表格，就會看出她不會寫字，那多丟臉！這一切孩子都看在眼裡，他會覺得：「媽媽會哭，是因為她必須在社工面前寫字，但是她不會寫。媽媽只好說：『聽著，潔爾梅娜，妳來寫。』然後，她覺得很丟臉，社工離開後，媽媽就哭了。」

這就是一群子民形成的過程，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語言、自己對事情的理解與詮釋，以及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最沉重的是那種罪惡感，由周圍環境滋養增強的感受：「你們不知道，但是你們應該要知道……」、「你們沒有做，但是你們應該要做……」有人花了幾個小時排隊，當她排到櫃檯時，卻受到櫃檯人員的斥責：「啊，是你，妳老公很愛喝酒，不是嗎？……」「又生了一個小孩！你不知道有避孕藥嗎！……」我曾經陪一些父母一起排隊，一排就是好幾個小時，輪到我們的時候，那個公務員卻不理他們，只跟我說話，完全無視於他們的存在。如果幸運一點，一個母親不必被當面質疑：「唉呀，妳還把孩子留在身邊？怎麼會這樣呢？現在領養手續很容易辦的。」爲了幾百塊法郎的補助，那些辦理救助的公務員會說：「你知道你花了納稅人多少錢嗎？」

以前，大家會嫌棄窮人，說他們髒：「他們不洗澡。」這樣的批評我從小聽到大。

現在，大家會說：「他們連避孕藥都不會用。」在我母親的那個年代，別人也會在她背後說這樣的話，因為她已經生了五個小孩，其中有四個存活下來。但現在，他們會直接當著窮人的面，而且是在孩子也在的情況下說：「太太，妳真的應該考慮墮胎。」小時候別人對我母親的種種批評，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與內心，我從不會忘記過，現在的孩子肯定也不會忘記。這種揮之不去的罪惡感、這種犯了錯永遠不會被原諒的感覺，一直留在他們心裡。

然而，在這種罪惡感背後，是一群子民，他們的歸屬感來自一個活生生的階層經驗，這個階層有他們自己的道德觀。這個道德觀也同樣地由父母傳承給子女，這應該讓我們學會尊重這群子民。因為，一種道德規範透過他們共同生活靜靜流傳著，即便這生活在我們眼中似乎沒有什麼教育功能。這些父母傳承給孩子羞恥心，在粗話背後隱藏著一種敏感度與一種道德的純淨和自尊。偷竊行為並不表示他們不了解私有財產的意義，日常的需要不會扼殺他們的價值觀，它只是促使他們違反常規，導致羞辱。這就是赤貧折磨人的地方：「我們想要變得不一樣，可是沒有辦法。儘管如此，榮譽感迫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開始。」

這樣的需要，在這些家庭中世代相傳，甚至傳給那些幾乎不認識自己雙親的孩子——我想到被安置在社福單位的孩子。不久前，我接待了至少七個生活在這個地區的第四世

界家庭，他們散居在蓬圖瓦茲市（Pontoise）<sup>3</sup>附近。其中有五對夫妻，他們當中至少有一方，或者夫妻雙方，在青少年時期都被社福機構安置在農場工作。他們認識彼此，其中兩個家庭甚至有親戚關係，但是社福單位卻將他們視為獨立的個案來處理。我前面已經說過，共同的歷史和盤根錯節的關係讓這些家庭形成一個族群，這些共同點凝聚他們，卻也撕裂他們。讓他們成爲一個族群的主要因素是：他們都覺得自己罪有應得，同樣渴望被寬恕，而且內心深處都有個隱而不見的譜——自己是不義的受害者。

我一直深信，教會應該傾聽赤貧者對寬恕的呼求。身爲天主的子民，他們已經上路，一步步走向祂。如果教會願意去了解、去寬恕，他們就會走進教會，這不就是基督賦予教會最根本的使命嗎？「你們在地上所寬恕的，在天上也會被寬恕……」第四世界對教會的期待，就是獲得被洗滌潔淨的保證，沒有別的。一連串從未間斷的屈辱，卻轉嫁在他們身上，變成一連串的錯誤，變成一大堆沒有盡到的義務，這就是極端貧窮和相對性的物質貧窮之間的區別。這也是一個單純不公不義的社會和一個殘酷無情的社會之間的區別。有時候我會想，我們有能力去衡量兩者的差別嗎？以相對貧窮爲例，你可以看到他們被剝削的情況，這些受害者至少還能揭發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薪水太低，我失業了，這都是資本主義和老闆唯利是圖的結果！」但是，在極端貧窮的這一邊，你看到的是全然的壓迫，是被合法化且完全沒辦法反抗的壓迫：「你很清楚，這些人變不了，做

什麼都沒有用！」赤貧，並不是因為被剝奪了權利而低人一等，而是它毀損了你身為人的品質。赤貧階層在各方面都得到次等的對待，他們被看成「次等人」，連在金融危機的時刻，人們還指責他們不去工作。赤貧階層的勞動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是沒有工作的。其他階層的失業者，則成爲大家團結關懷和各種奮鬥的目標群體，但赤貧勞工連在國家的就業服務中心都得不到有禮的對待；我們會說：「他們什麼都不會，反正，他們就是不願意流汗，都是些遊手好閒的懶人！」你能想像現今一個失業者，被迫爲了失業而頻頻致歉，被迫在社福單位請求別人原諒嗎？

譯註3：蓬圖瓦茲市位於巴黎西方，瓦茲河（Oise）右岸，是法國北部巴黎大區瓦勒德瓦茲（Val-d'Oise）省的省會。

## 第五章 他們來自何方？

矛盾的是，西歐世界身為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卻不願意去講述這些人的歷史。



1986年，若瑟神父拜訪法國窩氏河谷省（Val d'Oise）的家庭。

吉爾·阿努以：

你談到了下層無產階級<sup>1</sup>的勞工和失業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回到強加在第四世界的就業處境；你也強調，唯有認識過去的歷史才能了解現今的情況。

若瑟神父：

我之所以想要談第四世界的勞動狀況，是因為他們的確是勞動者；即使飽受赤貧的摧殘，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屬於勞動界。但你說的沒錯，在談論他們的勞動史之前，必須先簡短地談談他們的整個歷史。

數十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赤貧一直與我們形影不離。我們會知道這件事，要感謝那些在每一個時代聞聲救苦的人。我們也許不了解窮人的歷史，但至少我們知道那些捍衛他們的善心人的故事。透過這些人，我們知道赤貧呈現出多種面貌，有時我們發現赤貧者顛沛流離、成了離鄉背井的移工或是遊民，有時則是因緣際會成群湊在一起；有時赤貧者散佈在農村，默默承受飢餓之苦，或者落腳在城市中擁擠、嘈雜又不衛生的角落。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人走到這樣的窮途末路？就這次的訪談目的來說，我們可以提出以下的觀點。每個時代，不管是貧困或富足的時代，毫無例外，最窮困的人總是為當時的進步、衰退和災禍付出代價。我們之前提過現今興建在都市邊緣的平價住宅，它把低

收入的家庭打散後又重新聚攏在一起。這些政府強制進行的拆遷計畫就是他們付出的代價，都是爲了改善都市設施以符合其他人的利益。在此之前，其他人責怪他們破壞了都市某些區的價值，所以他們被趕到棚戶區、地窖或是最髒最臭的閣樓。就這樣，不管都市化的結果是好是壞，承擔後果的永遠是最貧困的族群。從中世紀甚至更早以前，城市的興起、富裕和擴張都是犧牲他們才成就起來的。曾經有個時代，他們被命令必須在天黑、在城門關閉之前離開城內。有些時期，他們被囚禁在收容所、老人院或救濟院。城市中甚至有些特別圈定給窮人出沒、聚集的地區，像是巴黎的聖蹟區<sup>2</sup>、率資路（Francs-Bourgeois）附近的路段或丐幫街（Tranderie）那一帶。這麼一來就可以淨空街道，隔離乞討者、殘障者、小偷和流浪漢，以便讓賢良婦女放心上市場或去教會晚禱。

幾世紀以來，他們不僅是都市化的犧牲者，還頻頻遭受疾病的侵襲。瘟疫發生時，

譯註1：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下層無產階級」（sous-proletariat）指失去社會地位，被其他階級排拒，處於最底層的勞動階級，也包括游民、拾荒者、乞丐還有罪犯之類的邊緣人。「下層無產階級」並不等於「無產階級」（proletariat）；後者是指投入工業生產者，不一定貧窮，也未必微賤。在工業革命時代，一些西方國家用這個字指稱天底下最窮困的人。

譯註2：舊巴黎的聖蹟區（les cours des miracles），該區乞丐集中，裝扮成各種殘廢外出乞討，回區後即恢復正常，彷彿突然因聖蹟而治癒一般，該區因此得名。現可喻為乞丐小偷集中之地。

誰受到最嚴重的衝擊？當然是最脆弱的人口，他們飽受飢餓之苦，生活在過度擁擠又缺乏各種衛生條件的環境中。沒有人試圖去到那些地方醫治病患，或是預防疫情擴大。

戰爭就像大飢荒一樣，最受打擊的還是最貧窮的族群。想想百年戰爭<sup>3</sup>，一旦固有的堂區組織與社群生活都被破壞殆盡，誰最容易因為飢荒而潰散逃亡甚至餓死在路途中的？再想想因為拿破崙戰爭而耗盡國力的法國：那些空無一人的鄉村、那些年輕無依的寡婦，以及那些被拋棄而流落各地的孩子。光說法國人民被打倒了是不夠的，哪些法國人最容易被送上光榮的戰場？誰剛好是那三十五萬名被派去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布列塔尼人？敵軍殲滅的，並非整個布列塔尼、整個法國版圖或所有的法國人民，大多數陣亡的士兵來自最貧苦的社會底層。不管他們願不願意，這些戰爭變成一種解決問題的策略。當時的制度准許富人用錢收買窮人的孩子，好替富家子弟上戰場，這是造成窮人大量傷亡的原因之一。就這樣，底層的百姓為大時代的苦難和垢病付出最慘痛的代價。我們也常常忘記，他們並非全都這麼簡單就消失了：他們也許負傷，或許殘廢，不但無法支撐家計，還成為家庭的重擔；如果他們陣亡了，身後便留下每況愈下的一家人。

但是，不管怎麼說，法國歷史還是記載了這些事件，你不能說這些都已經被我們給遺忘了。

留下幾個蛛絲馬跡和書寫歷史是不一樣的，雪泥鴻爪無法構成一段歷史。一張拄著



柺杖從拿破崙戰役中歸來的士兵照片，沒有辦法告訴我們他的家人到底如何過活，或是父親殘疾的兒女將要面對的命運，它更不可能告訴我們某個村鎮、某個社群，甚至是整個物資匱乏的社會底層，他們的男丁們大規模傷亡的景況。

矛盾的是，西歐世界身為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卻不願意去講述這些人的歷史。多世紀以來，他們繼續承受耶穌所選擇的人類處境。我們或許約略知道有些人為戰爭付出了代價，但是戰爭對窮人和他們的子孫造成的影響，我們可能一無所知。

大家也不會提到，為人類進步付出代價的，也是同樣的一群人。在發現新大陸以及擴展商船航線的那個時代，他們不是在船隻上死於壞血病，就是在戰船上擔任划槳的苦役。之後的那個時代，人們對兒童的需要有了新的意識，承擔代價的還是底層的女孩，雨果和左拉的小說對她們有生動的描述。對這些故事中的<sup>1</sup>人物，我們都願意抱以同情的態度。可是雨果和左拉所呈現的卻是現實生活中的殘酷真相：那些年輕的婦女，因為貧窮，被迫放棄甚至殺害自己的骨肉，然後被外界以殺人的罪名起訴。什麼原因讓她們走到這種極端的地步？因為對嬰幼兒的赤貧有著比旁人更敏銳的體悟，使得這些父母成了

譯註3：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發生於一三三七年至一四五三年，英格蘭和法國交戰，後來又加入勃艮第公國（Bourgogne）等。它是世界最長的戰爭之一，長達一百一十六年。

千夫所指的頭號罪犯。今天依然如此，這些母親繼續因為貧窮被棄，揪心扒肝地讓自己的孩子死去。

這個社會在健康和衛生領域的各種進步，也都是犧牲那些最窮、最缺乏知識來源的家庭換來的。一直到今天，這樣的例子還是俯拾皆是。在六〇年代，當結核病疫情普遍緩和下來的时候，赤貧地區的詳細檢查就停止了。醫療單位的篩檢車還是會到那些地方去，但醫護人員只是虛應故事，無法確保全面確實的檢驗。也因此，在諾瓦集貧民區這樣的地方，結核病依然猖獗，幾乎百分之八十的家庭，老中青三代都會受到感染。只要發現一件病例，幾乎整個家庭都會受到指責，地方政府也會急忙寄養兒童，而不是把整個家庭安置到一個適合人居的地方。

拳打腳踢、無恥的剝削、天然災害或傳染疾病，不論何種緣由，遭受蹂躪的永遠是最窮困的那群。這樣的蹂躪不論是不是故意的，依照每一個新世代冠冕堂皇的說法，都是為了窮人好：「這群烏合之眾，我們不是應該把他們分散到平價住宅嗎？這樣對他們比較好。」「他們生很多小孩，我們難道不該安置寄養這些孩子，或是阻止他們繼續生小孩嗎？這也是為了他們好。」現在領養和認輔的方案取代了過去的救濟院、孤兒院和收容所，但都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過去和現在相比，赤貧者並沒有贏得更多的自由。歐洲共同體的所有會員國繼續因循舊習，認為孩子就像樹苗一樣，可以從一個環境移植

到另一個環境。這種對待兒童親生父母的方式，或者應該說「粗暴的」對待方式，反映了貧窮家庭的生活一直那麼相似於逃亡的聖家，就像當年若瑟和瑪利亞帶著飽受威脅的小耶穌逃往埃及<sup>4</sup>一樣。

## 窮人的歷史

依照你的說法，史書缺乏窮人的記載，而且因為不認識他們的歷史，我們也無法了解自己的歷史。

想要了解數十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就必須透過底層的第四世界來解讀，然後我們就更能了解這個社會對赤貧者的恐懼：它一直想要消滅他們，如果消滅不成，就退而教育他們、監管他們、限制他們、操弄他們。他們之所以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社會住宅」（transit）或「緊急收容所」，並非偶然，這個社會希望藉此擺脫他們、讓他們消失。貧民窟的歷史，就是伯利恆洞穴<sup>5</sup>的歷史。木匠若瑟被帶到洞穴並非偶然，若瑟只

譯註4：耶穌誕生後，猶大的黑落德王為保王位，下令殺死所有猶大的新生嬰兒，天使為聖家族帶來了追殺令的警報，因此若瑟和瑪利亞帶著耶穌逃往埃及。

譯註5：《聖經》記載，耶穌在伯利恆（Bethlehem）一處洞穴的馬槽誕生。

是納匝肋的小工，什麼雜活都攬，一個在自己莊園村落裡和家人安穩度日的父親是未必這樣操勞的。那時的客棧老闆不會拒絕一個收入穩定的工匠，現在的住房服務中心也不會提供簡陋的破屋、地窖或是廢棄的車庫給一個技工家庭。

在諾瓦集，我們生活在最嚴重的困乏中，沒有任何資產，沒有任何資源。我們的行動在那裡開始發生一些影響力的時候，政府當局提供我們一些位於巴黎之外的住宅配額和津貼：只要這些家庭同意搬遷到某個遙遠偏僻的鄉村，他們就能獲得一個不錯的居所。整整八年的時間，面對這些拒絕被放逐、選擇繼續留在巴黎城門口的家庭，政府始終拒絕就地安置。我當時一直以爲，執政者是因爲巴黎貴爲首善之區，所以才擔心赤貧家庭落腳在近郊。可是，攻佔巴士底監獄或是衝撞巴黎公社護欄的那些人，不都是從赤貧郊區湧現出來的？不過，我弄錯了。仔細想想，拒絕赤貧者是人類歷史上的慣律，赤貧者一直被當成麻煩、危險和代罪羔羊。

那麼第四世界的百姓是一群革命者嗎？到目前為止，你所說的似乎正好相反。

雖然第四世界的百姓被迫生活在混亂、無條理中，不過由於謹慎加上實際的特質，他們是喜歡社會秩序的。因爲希望不斷落空，一直被看輕、受排擠，所以他們最好戒慎恐懼、如履薄冰，不是嗎？而且，由於長期處在混亂和難以預測的折磨中，他們的內心

渴望和諧。這大概就是爲什麼在各種以社會秩序當藉口的暴力行動中，赤貧者總是被利用的緣由，例如被用來阻撓罷工行動或是鎮壓叛變。我們一方面以革命的名義號召他們，讓他們滿懷希望，以爲可以就此和別人團結一致，奔赴共同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們卻經常在過程中，因爲這個社會既定的秩序而被操弄。當然，他們出現在正史的時間常常只是曇花一現，而且，他們多半必須爲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群人有時被操弄，有時被排擠，在這群犧牲者和那群操弄者之間，教會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如果我們想辦法深入認識第四世界的歷史，就能更加洞悉教會的歷史。在每一個時代，教會不斷舉揚人的價值，爲的是將每一個人重新領回人類大家庭，教會所走的每一步都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們有理由責備教會沒有阻止人類對窮人的排斥與厭棄嗎？我不這麼認爲。在許多社會裡面，人與人的關係長久以來都建立在暴力之上，在暴力如同家常便飯的社會中，教會能夠阻止窮人被監禁、被放逐嗎？她有這個權能嗎？我不這麼認爲。或許我們應該換個方式來問：除了與被排擠者站在同一陣線，還給他們應有尊嚴

譯註 6：納匝肋 (Nazareth) 又譯拿撒勒，位於以色列北方，是耶穌的故鄉。

和權利，教會能夠用其他的方式來對抗社會排斥嗎？

但是，教會真的有和最貧窮的百姓站在一起嗎？

教會一直都在。她一直在赤貧農村的中心，一直都在都市貧困者的身旁。我們忽略這些，因為我們不了解基層神職人員的歷史，他們是教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對這些修女、神父和平信徒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過著隱身、謙遜卻充滿熱火、忠信到底的生活，那是教會每一天的日課。透過他們的生活和奮鬥，福音在百姓的心靈傳頌扎根。

後來，聖文生<sup>7</sup>也為窮人和所有教友提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計畫。如果沒有當代人的支持，他就沒有辦法成就此事，也就是向世人宣告：「窮人，吾師。」（*The poor, our masters*）。實際上，他將教會每天在做的事簡單扼要地表現出來，並且把它推向高峰。十九世紀時，教會仍肩負著教育百姓的使命。

## 補破洞的慈善事業

在我看來，從古至今，教會這些補破洞的慈善事業，都是富人利益遊戲的配套措施。

你或許可以說，教會對於影響勞動階層的重大變革，總是表現出謹慎保守的態度。

事實上，她總是小心翼翼地提防劇變，不過最深的緣由並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樣。我一開始就說過：教會對於最貧苦的人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敏感度，教會就是赤貧者，她知道他們替歷史上各種翻天覆地的驟變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教會也為此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現今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激進的轉變永遠都是對那些能夠掌握它的人有利，弱勢者卻要承受它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教會有理由懷疑各種暴力革命。

話說回來，到底是誰在批評教會？是有錢人和知識分子，不是窮人。這些批評者同樣也指責第四世界運動想要將這群所謂的「邊緣人」融入這個追求利益的消費社會。如果接納被排擠的人無法徹底更新這個社會，那麼這些批評者的指責就沒有錯。

既然提到解讀與各自表述，我們也可以批評教會在教育行動方面不夠有創意。爲了要讓窮人取得知識的行囊，教會仰賴的是當代社會提供的方法，例如救濟院、收容所和學校等。我不知道教會過去在教育方法上是否勇於創新，但是我尊敬教會教育窮人的精神，也肯定她從過去到現在所做的付出。神父和修女們獻出他們所擁有的，分享他們所知道的，他們是否應該別出心裁、另闢蹊徑？或許吧，但是，透過理想的傳遞與知識的

譯註 7：聖文生（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遣使會及仁愛修女會會祖，在教會內以

鍾愛窮人著稱。

反覆灌輸，他們讓無知的情況倒退，他們讓好幾個世代的窮人在脫貧的奮戰中有了知識當盾牌。如果沒有教會，實在難以想像今日世界的景況。

從前，善牧修女會的修女收容那些被警察拘留的年輕女孩，讓她們一邊清洗門窗一邊高聲頌念玫瑰經，這樣的做法當然不具創意；但是修女們生活清貧，試著要給這些女孩一技之長，同時也給她們一個信仰。修女們收容的這些女孩，大部分我都認識，雖然她們後來大多沒有依循修女的道德教誨，但是，觀察這群女孩待人處世，處處透露出她們受過親切、敏銳和體貼的教導；今天，這些特質，卻不容易從公立教養中心出來的少女身上看到。在接待收容她們的時候，教會不僅試著給她們一技之長，讓她們得以自立，不必再依賴行乞和救濟，她也在生命教育和靈修指導方面用心費力。

善牧修女會的修女們並沒有成功地從貧窮中解放這些婦女，你同意嗎？

我沒有說修女解放了她們，也沒有說她們的做法是那個時代的最佳典範。我只是聲明，教會不會任憑窮人自生自滅，而不提供求生的裝備。想想波提耶神父（Père Brothier）<sup>8</sup>、奧圖孤兒院，法蘭西第一帝國瓦解後創立的衆多修會，以及每個時代難以細數的教友們，他們前仆後繼，為沒有享受到祖先遺惠的同胞獻身，他們全都懷抱著完整的計畫：提供一個理想和一技之長，讓孩童或年輕人追求獨立自主。或許在當時看不出來



這樣的理想多麼具有革命性。

說到底，教會一直試圖保護赤貧者，尤其反對名不副實的解放。教會和窮人一樣，都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各種解放；他們並沒有拒絕解放，當然沒有。而且教會還必須真實全面地，想方設法去尋找跛者、殘者和盲者，擁抱痲瘋病患，並且把最卑微的放在最重要的位子。真正的解放會給被排斥者獲得自由的各種方法，不會讓他們反過來成爲壓迫者。

不管是透過謹慎的態度或創新的行動，教會在人類集體的記憶中堅持拒絕不義和赤貧帶來的苦難。她這麼做沒有任何私心。如果沒有教會，不管怎麼說，我們都不會有現在所認知的自由、公平和真理。這當然是我個人的解讀，但是我堅信不疑。反正，面對史實，當是各自表述，歷史學家並不費心求證。

新興的歷史學家和貧民史及教會史擦身而過。想要穿透這段史實，就必須對今日的赤貧具有強烈的敏感度和認知，才能藉以想像昨日的赤貧印記，並從中辨識出貧民的歷史。

譯註8：奧圖孤兒院（Orphelin d'Auteuil）是十九世紀由路易·胡塞爾（Louis Roussel）神父創辦，用以收留

流浪兒的地方，設有工作坊讓孩子學習一技之長。波提耶神父（Père Daniel Brothier, 1897-1936）則於

一九二三年開始主持孤兒院，後來工作坊的訓練項目逐漸增多，孤兒院也在多處設立，如今以基金會的型態持續幫助有困難的孩子們，目前基金會之下有一百七十個社福以及教育機構。

史。我想到朝聖史，四處流浪的赤貧者被當成故事的背景，被描繪成朝聖人潮中可憐的抓手。對赤貧敏感度夠強的人就能從中看出端倪；其他書寫朝聖主題的作者，甚至不知道自己錯過赤貧者的生命之詩。

## 歷史中的赤貧人民

你得承認，史學家對十九世紀的貧民史並不是那麼無知。至少，這段歷史，我們從小就琅琅上口。

這點，我十分懷疑。赤貧者的命運，充其量，大家只知道一點皮毛。誰能準確說出他們命運的轉捩點？誰是他們的見證人？

歷史人物，總是在事件發生後才注意到最貧苦的百姓。籌畫醞釀事件時，他們忽視這群外表看來毫無用處的人，他們會說：「這些人我們以後再處理。」連那些以窮人的名義發起的變革，也是如此。二十世紀初，列寧企圖改善弊端，他先加入農民，接著又與工人站在一起。列寧之前不是沒有人試過，不過，摩擦一出現，好意很快就消磨殆盡。顯而易見，倘若不了解赤貧百姓的生命經驗，要如何與之並肩奮鬥？知識分子束於教，任憑自己占上風的想法四處傳播，最後的結局總是越俎代庖。列寧和他身邊的知識分子

也難脫窠臼。

或許我們不該爲此責怪他，但是身爲基督徒，我們應該嚴以律己。我們有基督爲典範，祂肯定是唯一徹底實現解放的人，而且是最貧窮的人一起。可惜一直到今天，信徒並不總是像祂那樣貫徹到底。他們同樣落入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窠臼中，他們所參與的大多數社會運動確實如此。他們肯定無意傷害下層無產階級，但是他們認爲自己沒有時間爲他停留。赤貧者對他們來說是個負擔，不但拖累行動，也會弄皺漂亮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是剝削理論的專家，他們有這樣的態度可以理解，但是基督徒不該如此。他們應該用另一種方式質疑古往今來的一貫作風，如果他們不這麼做，只會讓謬誤的歷史解讀繼續籠罩，讓人誤以爲下層無產階級的處境等同於工人處境。如果從十九世紀一直到現在，這兩個族群所穿越的歷史多少相近，那就沒話說。不過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沒有察覺到勞工的歷史和下層無產階級的歷史早已分道揚鑣，導致我們無法理解赤貧者今日的遭遇。對基督徒來說，這樣的無知是說不過去的，他們應該比別人更急切、更想認出天主教在每個時代的面容。

在你心裡，找尋耶穌基督、找尋歷史真相和找尋這個時代最貧窮的人，是同一件事。

我看不出這三者有什麼不同，而且我相信，想要解放全世界的赤貧者，就必須了解

他們的歷史。至少，就西方社會來說，唯有透過歷史，才能夠解釋那些不斷面臨失業威脅的男男女女，他們若不是最可能被解雇的一群，就是長期失業者。

你會問我赤貧世代相傳的問題，我跟你說那是基於共同生活經驗所造成的父子相傳。現在就來談談這些經驗，其中最糟的，就是為求餬口、討生活的工作經驗。因為即便在工作場所，別人還是沒有對他們一視同仁，他們還是被當成劣等人，這是自卑感最要命的來由。這樣的自卑感也讓他們在生活中處處感到羞愧，無論面對妻兒、社工或老師，無論是到醫院就診，或是上街購物，自卑的感覺如影隨形。不僅面對老闆感到自卑，面對同事更加自卑，別人總是更能幹、更靈巧，也更有自信——這便是下層無產階級最難堪的處境，是貧民區最難承受的生活重擔。

六〇年代，第四世界運動想讓赤貧家庭重拾自尊，以勞動者的身分受到肯定，以「下層無產階級」的身分為榮。但光是用「第四世界」這四個字來稱呼這些勞動者是不夠的。一七八七年，法國大革命前杜傅尼·德·維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議員稱他們為「第四階級」，他們從事最卑微、最幽暗、最不穩定的工作，我們應該公開聲明他們屬於當代的勞動界，「下層無產階級」這個詞表明了這點，同時也說出了不人道的勞動處境。他們確實是勞動者，馬克思稱他們或他們的子孫是「衣衫襤褸的無產階級」<sup>10</sup>。

## 世代相傳的貧窮

你的意思是，赤貧家庭一代又一代地複製嗎？

他們的歷史比想像的還要複雜，但這方面，歷史學家還是沒提供多少幫助。第四世界運動和赤貧地區的家庭一起做了許多研究，特別是他們之中最貧窮的家庭。我們追溯

譯註9：法國大革命時，杜傅尼·德·維力耶等議員企圖在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上爭取「第四階級」的參與，以代表農村短工、乞丐、貧病者等處境最不利者組成的階級，但是其他三個階級拒絕了他的要求。兩個世紀之後，出身赤貧的若瑟·赫里斯基和其他家庭在這個歷史典故中得到認同：他們也不斷遭到拒絕、排斥，卻不放棄為每個人的尊嚴、權利及價值而奮鬥，所以他們決定給這個運動取名為「第四世界」。

譯註10：Lumpenproletariat 是個德文字，漢法字典譯為「流氓無產階級」或「游民無產者」，並不十分正確。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定義此字，lumpen 的意思是破布，所以 Lumpenproletariat 字面的意思是「衣衫襤褸的無產階級」，翻譯成法文就變成 sous-proletariat，意即「下層無產階級」。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這本書裡，馬克思說這群人是其他階級所排拒的。

他們的家譜，重建上千個家庭的歷史。藉此，我們一起發現了他們的婚姻、親屬與子嗣等脈絡，循著這些家譜，一再出現的是貧窮、飢餓、顛沛流離、卑微或羞愧的職業，經常被廟堂會眾所厭棄，卻又是施捨的對象。與此黏結的還包括無知，因為赤貧和文盲往往如影隨形。

這對許多與社會渾然融合的勞工家庭不也是一樣？

我不會持反對意見，但也不那麼確定。十九世紀的勞苦大眾，在工種與工人之間，還是有層級之分，有非常貧窮的底層百姓，從事最繁重的苦力；有些平民則沒那麼辛苦，兩群人不見得會互相往來。現今社會中的貧民會是誰的後代？

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在那些重新建立起家譜的第四世界家庭中，絕大多數都有非常貧窮的直系血親。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可以說，要變得比無產階級更窮是需要一些時間的，一個人不會輕易讓自己就這樣被推向底層，我自己和其他許多家庭都是見證人。

以我自己的家庭為例，我們還有可能跌得更深嗎？我們嘗盡沒錢沒米的滋味，在沒有燈光的破屋裡，施捨與羞辱是家常便飯。我們從小就必須幫忙貼補家用，每天晚上，包括週末，都要忙著把逍遙牌（Zig-Zag）的捲菸紙裝進菸盒裡。在我們家，兒童從家庭代工開始進入勞動市場；每逢星期四，我們會帶著裝好的菸盒去工廠換幾個銅板。每天

晚上放學後，都得裝完一個紙箱的菸盒才能下班，連不上學的星期四早上，去教堂的課輔中心或是出門玩耍前也不例外。

多虧母親的堅韌，我們才度過難關，這樣的堅韌源自她的西班牙文化與天主教信仰。她捍衛我們，咬緊牙根走過困境，因為她自己在故鄉馬德里的童年並非一窮二白。爲了不讓自己落入乞討的境地，她每天徒步走到昂熱上城區，去做幾個小時的幫傭；讓自己的孩子捲菸紙做代工也是一種拒絕乞討的方式。慈善救濟把我們團團圍住，我們試著抵抗，卻無法完全抵擋。大哥和我都是教堂的輔祭，我們每天早上都會去善牧修女會的彌撒當輔祭，這樣可以賺到幾個銅板，而且修女還會把她們的菜湯和吃食分給我們。從四歲半到十四歲，我就這樣協助母親養家活口，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別人給的。但是對我的母親來說，自尊是很重要的，而尊嚴則取決於接受贈予的方式。並不是別人給什麼她就收什麼，她拒絕無禮的對待。多少次她因爲受到屈辱而哭泣，但是我也見過她在街上拒絕問候那些先前對她無禮的人，旁人看得一清二楚。

之後，我也常在第四世界看到這種不肯折腰的抵抗精神。當然，第四世界的家庭是窮得非常徹底的，這樣的窮可以追溯到非常悠遠的歲月，我們曾經和他們一起追溯到十八世紀的直系血親，有些甚至到十七世紀。這些人好像漂浮在茫茫大海，拚了命想活下去，卻沒有浮木可抓；而其他則人則是近代才被推到社會底層。在第四世界運動的團隊所

認識的數千個家庭中，沒有發現任何瞬間變窮的家庭。原本家境良好卻落入第四世界的例子少之又少，我們發現這些人在搬到貧民住宅之前，生活條件就已經很差了。名醫變成流浪漢、堅實的勞工家庭突然變得一貧如洗，這比較像是傳奇故事。這樣的故事忽視了人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能力（這也適合說明移工的處境），也反映出我們對落入社會階梯最底層的同胞的輕視。這些故事忽略他們在陷入窮途末路前所承受的一切，忽略了他們分分秒秒都在奮力掙脫不幸的枷鎖。

## 流離失所的貧民

所以你認為，人們是從勞動階級的最底層被推入第四世界。那麼城鄉間的移民潮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在六〇年代，它被認為是社會邊緣化的幫凶之一。

在自己的國境內流離遷徙一直是赤貧者的命運之一，我跟你提過他們如何遭受驅逐或被蠻橫遷移的情況。即使不是出於被迫，爲了謀生求活，很多人還是會步上離鄉的路途。巴黎有許多非常貧困的家庭都來自外省，但是探尋他們的原鄉在哪裡，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不管他們來自城市或農村，更要緊的或許是去了解他們原來的職業、他們上一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原來的工作若非極端不幸，就是非常卑微，甚至是



異常繁重的苦力。

讓我舉個布列塔尼農場工人的例子。他的父親是個伐木工，在戰前的布列塔尼，那是窮人的活計，他從父親身上學到怎麼掌握一把斧頭。但是父親不到五十歲就過世了，他必須支撐母親弟妹，卻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後來，他娶了村裡一名年輕女孩，同樣來自貧苦家庭。我們在堂區的援助名冊裡發現這兩個家庭的名字，在嚴冬，教會救濟了他們。這對年輕夫婦到底是誰？窮人還是赤貧者？至少他們來自一個村莊，有名有姓，受過幫扶。有一天，他們決定出去見見世面，築個「愛的小窩」。幾年後，他們流落到巴黎郊區的貧民窟，我在那裡和他們結識，當時他們已經有好幾個小孩，日子苦不堪言。看著他們的蝸居，我常聯想到我母親的韌性。因為在他們只有兩間房的前房有個衣櫃，裡頭的衣服總是擺得整整齊齊，這個衣櫃就是他們抵抗厄運的記號。認識這個家庭的這些年，不論他們受到多少屈辱，摔得多慘多痛，那個衣櫃始終屹立在那兒。這個男人已經失業很久了，孩子們被社福單位寄養，女主人最後也棄守，開始喝酒；只剩下那個布列塔尼的衣櫥仍然屹立不搖，像是抵抗厄運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還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很多人喜歡說不幸是喝酒造成的，我不這麼認為。只是當一個人跌落到某種程度後，便無法再和左鄰右舍維持友好關係；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大到你看不到自己和這個漠視你的社會還有什麼共通之處。但這樣的劣勢幾乎是在神

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發生，那是一種緩慢的淪落，而不是突然的墜落。在這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中，第一代通常還留著原生家庭的根，他們盡可能地保留原鄉的文化、行事風格。但是，他們就像是從田地上被連根拔起的移植盆栽，當原來的泥土慢慢失去養分，植物便逐漸枯萎；一旦滑落到第四世界，土壤逐漸貧瘠，不再有人施肥換土。

因為在底層，有一群窮困潦倒的人，他們接待你，卻無法滋養你，但好歹他們在。不過，乞丐只能跟乞丐要冷飯。也因為還有個底層在，貧窮的勞工家庭才有餘地往下跌。但我必須重申：我從來沒見過原本寬裕的家庭從天外掉落到赤貧的境地。這讓我們再一次覺察到，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動者自成一族，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和歷程十分相似，包括類似的工作經歷：零工、短工，就業不足和失業。凡此種種造成一個特殊的族群，他們對外界有著相同的敏感度，承受著同樣的痛楚：被當成勞動界最差為人知的面向。生活圈裡的親戚朋友、鄰里關係，加上與同樣的社福救濟團體來往，把他們層層圈限在一個國度裡。

農村的改變和都市化是否讓赤貧家庭大量增加呢？

農村的變化和都市化讓以前隱而不露的赤貧浮出檯面，赤貧今在，昔在，只是往昔不像現今這麼明顯。這些變化確實讓已經很窮的家庭更加辛苦，但似乎沒有導致大量貧

戶落入赤貧的境地。六、七〇年代的情況正好相反，當時大家認為適應不良和社會排斥是一種普遍的威脅。但是，在法國或鄰近國家的貧民窟，我並沒有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倒是經濟開始衰退後，貧民窟來了許多陌生的臉孔，徹徹底底一無所有。社福單位束手無策，不知如何回應他們的需求，所以打發他們到貧民住宅區來。我不認為失業必然導致赤貧，我特別觀察到兩件事：比起其他階層，經濟危機對於已經是赤貧的底層工人來說，殺傷力更強；對其他勞工來說，比如許多非技術性勞工，如果失業時間延長，再加上付不出房租、被房東攆出門外、疾病或是家庭失和等，他們就會面臨落入底層的嚴重威脅。總之，被開除對非技術性勞工造成的羞辱，會耗盡他們的精神與體力；尤其是沒有任何社會文化資產的家庭，到最後，米缸見底，又沒有任何存款可以應急。

民間和宗教團體應該特別關心保護這些家庭。但是，社會最底層的長期失業狀況是大家最不知道如何描繪的受苦現場，這些犧牲者沒有發聲管道，他們滑向底層的時候，大眾也只是冷漠以對。

## 就業不足

我很訝異你沒有提到移民工，輿論對他們十分關注。難道他們不屬於第四世界？

基於尊重，我們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絕大多數的移民工不屬於第四世界。這並不是說他們的物質和社會條件比較好，但他們至少有一個公認的身分，以及大家能夠同情並理解的處境。如果他們失業，理由清晰可辨，他們也無可奈何，大家都知道那是經濟環境或就業市場結構造成的結果。但是，面對法國本國的底層勞工卻是另一種目光，金融危機發生前，他們已經沒有穩定的工作，甚至找不到活路，他們的失業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被理解，大家會說：「他們做一行怨一行……一直是這樣……」「那小子表面上是在找工作，但背地裡祈求老天爺讓他繼續遊手好閒……」

一開始你強調必須肯定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動身分，可是你談話的主要內容卻是就業不足和失業。

我之所以強調他們的勞工身分，是因為一旦貼近現場，我們就會發現下層無產階級背後都有過漫長的工作經歷，而他們從事的通常都是最卑微、最費力、最被嫌棄的工作。有一大部分第四世界的人在邊緣勞動市場受雇，承擔公共工程或建築工地的粗活：挖地工、水泥工的助手、掃地工、拆卸工等勞力工作。另一部分則在一些已經被邊緣化的小企業或是夕陽工業的工廠裡勞動：皮革、食品、冶金、化工業、紡織業、家具工廠等。最後還有一些人只能在農場找到短工，或是在非生產部門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收垃圾、

裝卸、搬運、在下水道或化糞池當夜班雜役、在道路養護工事中清掃卡車、在葬儀業挖墳打雜、在醫院處理惡臭的污物，或是在夜間清掃車廂、在商船清洗船艙、在都會跑腿送貨、在路上當三明治廣告人<sup>11</sup>、發廣告傳單、在餐廳當洗碗工、切菜工、在大樓當洗窗工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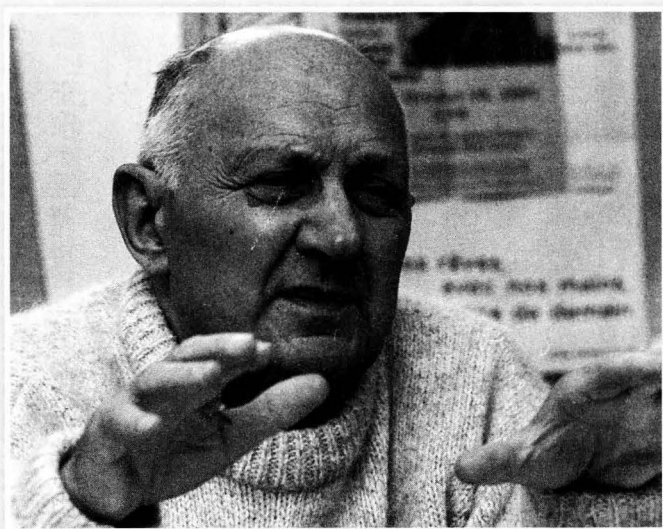
但，光是列出底層無產階級的工作是不夠的，想深入了解這些勞動者的處境，還必須關注他們的工作生涯是如何開展的。然後我們會發現，在這個底層，往往是子承父業；而且他們年紀越大，沒有工作的時間就越長，由於體力日衰，健康每況愈下，工作表現越來越差，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升遷。下層無產階級勞動生涯的另一個特點是，這些最繁重的工作往往不在勞動契約的保障範圍內，也就是說，他們不受勞基法的保護。因此，雇主並不關切這群底層勞工的命運，因為他們不須擔負什麼法律責任。

譯註11：三明治人（Homme-sandwich），人身前後各掛一片廣告看板，似三明治，故名。

第六章

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  
工人世界的苦痛面貌

普遍來說，第四世界工人的姿態像是  
勞動界的失根者。



若瑟神父 1984 年在法國梅里（Méry-sur-Oise）辦公室，第四世界運動總部。

吉爾·阿努以：

下層無產階級的處境是一種全面的生活景況，你常說必須綜觀全貌。可是你又說，是否擁有一技之長決定了第四世界所有其他面向的生活，那麼，工會組織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若瑟神父：

我從沒遇過任何工人會對身邊最弱勢的同事不聞不問，無論他們是否有加入工會。有機會跟他們交談，就可以了解到，在他們的記憶裡面，他們父母的歷史、他們的背景和經歷，都有某種和貧困交接的熟悉感。下層無產階級勞工歸屬於勞動階層，在還不太遙遠的過去，他們彼此的生活經歷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人們會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祖父的兄弟也是農村的長工，我父親說當時養家活口很不容易，因為他生了七個孩子，可是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

勞工運動對最底層的工人肯定也有這種敏感度。在內心深處，他們無法接受工會不是所有工人的後盾，不為每一個勞工爭取權利。但是，他們必須設身處地站在這些工會組織的立場；因為即便工作條件已經獲得改善，他們還是得時刻警戒，日夜操煩。他們得繼續捍衛已獲得的成果，不斷為勞工「爭奪」新的權利；他們必須活在當下，面對眼前的挑戰，嚴陣以待。這就產生一種奮鬥的認同，也產生了一種迫切需要的團結，你必

須選擇優先順序，緊密有序的前進，才能卓有成效。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能夠把焦點完全放在現代社會中那些被職場淘汰且麻煩纏身的同胞身上嗎？工會人士頂多感到尷尬，如果有人提醒他們說並非所有的勞工都得到護衛，而且最貧窮的人還是被拋在後頭，他們當然會防衛。這樣的說法會被說成是在分化勞動階層，已經有人這樣責難過我，我能理解這樣的不安。工會人士想替所有勞工維權的初衷不容置疑，如果沒有成功，也不該將這筆帳算在工運鬥士的頭上。我想再次強調，大家都有責任，整個社會、整個國家、整個國際社會都有責任。

## 工會的成員與其他勞工

大型工會組織的成員會關心處境最不利的勞工嗎？

我在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遇過工會的代表，我關切的議題對他們來說似乎並不陌生。但是，我自己年輕時也當過工人，在基層的工會奮鬥過，我想我能理解他們在勞動階層遭遇的困難。在勞動現場，工人真心誠意在為所有的工人奮鬥。「所有的工人」，在他們每天的奮鬥中，指的就是「所有工廠裡的同事」、「工廠所有的夥伴」、「所有的技術工人」……但，不是每個人都是技術工人，工運人士並沒有涉足每個行業，有些差事



在勞動市場的分類中沒有被編列進去，這一切都不是他們所能掌握的。做爲一個活躍的工會人士，已經耗費許多精力、時間和勇氣了，我不確定這些工會成員在自己的勞動位子能夠有雙千里眼，能將視野延展到下層無產階級勞工；在這個勞動底層，流動著一批批短工、臨時工或非正式的粗工。

讓我舉個例子，我想到特尼（Ternier）小鎮一個活躍的鐵路工會成員，夫妻倆將整個生命、工作和閒暇都投入工會抗爭，甚至沒有時間關照自己院子裡的花圃。在工地，他備受推崇，但在他那小小的鐵路員工宿舍，卻是另一回事。鄰居看不慣他們荒廢花圃，成天忙著開會或出席代表大會。如果我來和他討論吐泥野和遠泥野（Fargnier）最窮困的社區，你認爲他會有心思細聽嗎？對他的工會夥伴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很多人甚至不會因爲要開會而放下手邊的花鏟。但是，他們也有日常的操煩，不只是工作，還有家庭、孩子和健康的問題。

但，並不是所有的工會成員都那麼疲於奔命，相較之下，有些人是從容不迫的。

一個活躍的工會成員很難從容不迫。一切的設計都是要把工會的工人限縮在工廠，牢牢地把他們關在勞動現場；一旦踰越了工作本份，就會被指控爲政治行動。世間流傳的論點是大家要緊守本分，工人就該待在工廠，就像以前大家說神父就該待在教堂，教

宗就該在教會內活動一樣。非常荒謬的瞎話，但是對政治人物來說，這是一種擺脫麻煩人物的方式。你必須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要工會維護那些被組織化的經濟活動排除在外的工人，很難。

如果我沒會錯意，工會之所以沒有把最底層的勞工包括進去，其實是一個無意的疏漏。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無知造成的結果。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處境最不利的族群和他們周遭的世界總是格格不入，像個異類，在職場上也是如此。雖然赤貧的現實是工人揮之不去的記憶，但是在自己的工地或工廠遇見非技術性工人又是另一回事；他們越是笨拙就越愛吹噓，這就貽笑大方了。偏偏，越沒技術的工人越容易遲到，這讓其他夥伴很難接受，因為工人的集體榮譽感被破壞了。老闆可以不去上班，但一起的夥伴可不行。最近，一位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去工廠當作業員，她因為試圖捍衛非技術工人而成了衆矢之的。我也記得某個貧困社區的一些婦女，在法國鐵路局清潔車廂，我們運動的一個持久志願者和她們站在一起，試圖捍衛她們的權益，卻不斷碰壁。

譯註1：原文還提到位於特尼和遠泥野的兩個叫做紅蘋果（La Pomme Rouge）和保安妥（Beautor）的低收入住

宅區，中譯本略去。

普遍來說，第四世界工人的姿態像是勞動界的失根者。他跟工作的世界失之交臂，即使有交會，勞動環境也無法讓他學會一般工人說話、做事還有擺放工具的方式。他在勞動界既格格不入，又別具一格，在一些必須透過工人代表處理的事情上，他卻去尋求工頭的同意，或逕自找老闆接洽。他真的不懂當工人的規矩，也沒有任何學習的途徑。

事實上，在進入勞動世界的時候他開錯了門，那是一道童工之門。我也是過來人，我跟你說過，我每天都要捲逍遙牌的菸紙，連星期天也不例外。不管是這種家庭手工或其他任何童工，都無法讓你產生工作的幹勁或是體會工人奮鬥的精神。但是，現在還是有許多孩子每天睡眼惺忪地上學，因為他們太晚睡或太早起，已經幫父母親工作了好幾個小時。這些孩子從小就在幫忙補貼家計，但是，當他們真正需要步入社會找工作時，即使有一份適合的工作，他們卻已經失去健康的本錢，失去工作的熱誠。

### 從小就工作有助於就業嗎？

所以從小就開始工作對於他們未來的就業準備並無幫助？上一輩的說法恰恰相反。

這一點過去和現在並沒有差別。過去，工人或農村的孩子有辦法對未來的工作駕輕就熟，因為他們從小和大人一起工作，從大人身上學到了工作的藝術。問題是，今天，

第四世界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和他們將來能否擁有一技之長完全無關，他們早年的工作經驗幾乎幫了倒忙。現在這個時代，真正的社交與職業生涯的培育都發生在學校，那裡是勞工子女接受訓練的地方。在課堂上，他們不僅準備了文化行囊，也獲得社會經驗。過去，下層無產階級的年輕人即使不上學，也可以當麵包店或街角肉鋪的學徒來彌補這個缺憾，但是現在，學校變成學習技職的唯一機會。

失去技職教育的機會，年輕人和成年人就註定要失業嗎？

長久以來，最底層的工人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個沒有充分就業或失業的人，要不然就是瀕臨失業或在家待業。今天，這些年輕人面臨的甚至不是長期失業的問題，而是在找到工作之前，終身失業的陰影就已經籠罩前途。

例如，第四世界運動的研究中心針對法國過去四十年所做的一項分析顯示，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幾乎一直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兩倍，而下層無產階級勞工的失業率又是非技術工人的兩倍。

在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這十年間，全國失業率為〇·五至一·九%，失業總人口中有五十%是非技術工人，但他們只佔全國工作人口的十三%。這期間沒有下層無產階級的失業統計。

一九六八年，法國平均失業率是二·一三%，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為五·四%，而當時法國一個赤貧社區的失業率卻高達九·二%。一九七九年，平均失業率為七·六%，非技術勞工失業率為十三%，然而到了一九八一年五月，赤貧階層的失業率卻高達三十一·八%。同樣的攀升數據也出現在赤貧青年身上，一九八一年時，法國有四座城市的第四世界青年失業率高達四十四·三%。

不過，在法國我們多少意識到失業對勞工有著不同程度的打擊。最近，在巴黎地區也展開了一項特別針對長期失業者的行動。

沒錯，但有兩個盲點。首先，長期失業者涵蓋的是一個相當廣泛且多樣的類別。這讓參與行動的雇主有很多的選擇，他們當然會先選最好用的。一旦徵選的對象是「婦女」、「年輕人」、「五十歲以上的人」、「失業者」，就要非常小心。如果沒有特別提到「較無技能」、「較無競爭力」、「身體較弱」等特質，這些群體就不會特別被關注到。如果沒有做出特別的努力，他們就會被再次排擠。

他們不僅無法從中受益，而且沒有人會知道他們被排除在外。在法國，我們無能評估各種奮鬥的結果，對赤貧者來說，這是一場惡作劇。到底是誰得到了好處？問題不在於有多少公民可以從那項政策或那個機構獲益，重點是哪些公民獲益？這個問題在北歐、

荷比盧、英美等國經常被提出來。在法國，我們只是淪於空談，我們以為自己的論證善良正義，就必然會有美好、公平的結果。我們也沒有耐性，等不及讓這些措施扎根後開花結果。我擔心這個對抗長期失業的行動也是如此。也許有一天我們會知道有多少工人因此受益，但是我們不知他們是誰。

評估的失準、失真也發生在工人運動嗎？

工會不會公開所有的評估報告，但我注意到，他們的出版物，不會特別強調那些缺乏技術和較難融入勞動市場的勞動者是否加入了工會。最弱勢的勞工是否參與，並沒有被當成主要目標；一般工人在爭取權益時，並沒有總是想到那群工作沒有聲望、工資又低的工人有什麼需要，這些工種可能在下一波現代化中消失。也因此，勞工代表在要求提高薪資待遇時，不一定會把最底層的勞工包括進去。而且，大多數受薪者的權利都伴隨著最起碼的義務，可是這群幾乎被淘汰的勞工連這個都跟不上。例如，必須連續工作數個月才有資格得到某項津貼或撫卹金。日復一日，勞動世界的組織運作方式，對第四世界越來越不利，有時甚至極度不公。這個難以察覺卻順勢發展的走向顯然不是工會成員所願意的，但是，情況變得岌岌可危的時候，如何改變方向重回正軌呢？其實，一開始就應該注意到，優先順序在起跑之時就應該安排好，把赤貧者置於優先這件事，無法

在起跑後獲得。

工會的戰果對赤貧者有助益嗎？

降低工時、工人自治、生產線的變革，這些工會爭取到的戰果沒有一樣對赤貧同胞有利嗎？

對赤貧者不利的運作方式由來已久，如何改弦易轍？你提到工作條件的改善，那些只對有工可做的勞工有影響，正因如此，那些不靈巧、缺乏創意、動作不精準、反應慢的工人，就越來越不容易找到工作。底層的第四世界勞工因生活條件不佳而飽受風濕症之苦，長年頭疼胃痛，多數的健康狀況都很差，簡單的動作也沒辦法做得精確，跟不上勞動生產的節奏。只要看看這些男人和婦女工作的樣子，就可以理解他們為何無法享受你所提的那些戰果。這些成果只有對工作經驗豐富的人有利，他們過去的工作紀錄良好，也因此累積了本錢與耐力去學習日益精密的各種行業。

你忘了就業之前，還有學校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培育。難道對最底層的年輕世代來說，一切還是無法改變？

確實可以改變，但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決心。截至目前，赤貧的孩子還沒搭上參與未來經濟生活的列車。我們發現，越來越多赤貧孩子越來越早被送進特殊教育系統，這些教育的「特殊」之處，就是對孩子沒有任何期待。這些孩子自覺比不上其他同齡的小孩，因為這樣的傷害使得他們永遠失去了學習的興味。學校不僅剝奪了他們的學習，同時也剝奪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他們沒機會體驗集體生活，他們和整個學校格格不入，甚至連他們的午餐時間也和那些「正常」班級的孩子不同。

至於職業訓練，歐洲共同體的社會基金已連續多年資助那些所謂的模範計畫、實驗計畫，試圖協助沒有專長也沒有學歷的年輕人。逐一研究這些計畫之後，我們發現沒有任何一個計畫將小學都沒有讀完的年輕人列入考慮。要知道，那些住在下層無產階級社區、舊卡車、破房子、廢棄車廂裡的孩子是沒有機會完成小學教育的，甚至沒能學會閱讀和書寫。同樣的老問題一再上演，我們一直沒有系統化地追問：我們真的有把每一個人都包括進來嗎？我們會尋找那些跟不上腳步的人嗎？他們是誰？他們在哪兒？

你是在責怪現代人只是不斷提問，卻沒有點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如果我們繼續認為自己是孕育人權思想的文明繼承者，那麼不斷詰問是無可避免的；我們的文明也曾經孕育以赤貧者為優先的想法。無論如何，耶穌基督和教會都要求我們



不斷追問：天主在哪裡？

## 如何「遇見」耶穌

在你看來，天主在第四世界嗎？

我們不能這樣辨識天主，我們必須「遇見」耶穌基督。這無關理性思維或個人看法，卻攸關切身經驗。主或許不會在我們預期尋獲的地方出現，祂通常會引導我們去到我們不想去的地方。

窮其一生，耶穌一直是與眾不同，一直在他處，他不去套用那個時代的人期待他成爲的樣貌。耶穌不會被操弄，這就是爲什麼，在面對一些想把耶穌基督當做革命英雄的年輕人時，我遲疑；面對一些工運人士宣稱耶穌必定是他們的一員時，我也遲疑。幾天前，我聽一位牧師講道，他認爲基督化身爲環保人士，反對世人不負責任的浪費資源。如果他們告訴我：那是我個人的經驗，我在那裡遇見了基督，我會比較放心。倘若如此，那就無庸置疑，因爲主以祂認爲好的方式，顯現給我們每一個人。

此外，就是要去尋找祂。在這方面，最好善用福音給我們的指南針。福音似乎不會帶領我們偏好某個政治陣營，或是指引我們特別親近某個社會階級。她總是引領我們邁

向超越，去到城外，走上沒人願意涉足的偏僻小徑。當我說：「天主在哪裡？」我的意思是：「我們上哪兒找祂？」也許我們三顧茅廬，祂還是避不見面，但這是我們的使命，在評估我們所有的政策和所有的努力時，都要追問：「我們真的有走到盡頭，去接觸到最受排斥的同胞，好能採集到所有與基督相遇的良機？」

這些良機給了第四世界？

我個人膽敢這麼說，天主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天我就得出發到更遠的地方去尋找祂，也許我應該走到那些最被鄰里看不起的工人中間，他們就住在西非海岸邊難得平靜的一座貧民窟。即便如此，耶穌已在他處等待我們，也許祂已去到拉丁美洲最偏遠的村莊，那裡的村民被迫陷入赤貧的絕境，我們甚至難以辨識他們的身分，他們甚至失去自己的文化，失去原住民的認同。那裡便是這些年來第四世界志願者尋找赤貧者的所在。

與此同時，怎能不相信在這個心靈受創的男人身上看到吾主呢？在法國北部的蘭斯（Reims）或崗城（Caen），這個男人因為又一次被解僱，垂頭喪氣回到社區。他早有準備，他知道自己只是個臨時工，整整六個禮拜，他在一家公司幫忙遞送文件，雖然骨子裡不太願意承認，但他的確覺得自己在那裡像個外人。他很清楚自己不算「正式的

員工」，但至少在自己的社區，他可以抬頭挺胸。他的妻子對任何願意聽她說話的人說：「人家我先生去上班了！」可是這會兒又被解僱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找到粗活幹。以前覺得羨慕的鄰居，現在冷言冷語：「這下這黃臉婆可以閉嘴了……有什麼好炫耀的？」

不同於其他失業者的情況，這個男人不用等到失業就已經負債累累了。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最嚴重的是一如往常，新傷覆蓋著舊傷，他，帶著羞愧回到社區。這個男人被解僱，卻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他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技術工人身上。他甚至參加過技術工人的罷工活動，當時他們遭逢裁員的威脅；但是他離職時，卻沒有人為他說一句公道話。現在和過去都一樣，他一直被視為次等人，一個同事眼中可有可無的人。在自己的社區，他一樣沒被看在眼裡。鄰居同時也是搶飯碗的對手，他在鄰里間也找不到可靠的團結關懷。晚上，當我繞過去看他時候，他不說話，他的妻子啜泣。再度流落街頭的焦慮襲上心頭，那是她從小就難以擺脫的惡夢，而且孩子可能被強制安置的恐懼再次籠罩這個家庭。

身處這些社區，我無法不感受到木匠若瑟<sup>2</sup>的再次現身，這個兩千多年前逃到異國的工人，那裡的律法禁止他耕作，所以他可以幹什麼活？砌石、運土，等著當下一波飢民？有人說，在納匝肋<sup>3</sup>，他其實是個辛苦的勞動者，生活在如此貧窮、外人都覺得不

會出什麼好事的聚落，靠粗工維生的他到底該怎麼辦？在一個每個男丁都會製作家用木工的村莊，一個木匠有什麼用武之地？在一個由男主人負責尊貴木工的農村，會留下什麼雜活給木匠？當我想到若瑟的生活條件，想到那些牧羊人，我不禁自問，即使在福音裡面，我們是否依然漠視赤貧者的位子。我們知道他們是誰嗎？

## 「下面那些傢伙」

我想回到工會組織。既然你提到了福音，你認為，即使是受基督宗教啟發的勞工組織也沒有捍衛到最貧窮的人？

他們當然有捍衛最窮困的人，我已經說過：我想所有的勞工運動都試圖做到這點。但還是老問題：在他們眼裡，誰是最貧窮的？他們有看到我們看到的那些人嗎？

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那是我當修士時親身經歷的。我當時在一家油漆工廠做工，

譯註2：以天主教的角度，若瑟是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淨配、耶穌的養父。若瑟生於達味家族，住在納匝肋，是個木匠。

譯註3：《新約聖經》時期納匝肋是個名聲不好的地方，人們打聽耶穌時會質疑：「納匝肋能出什麼好東西？」

（《若望福音（約翰福音）》一：46）。

負責在地下室的缸甕中搗碎色塊，廠裡其他同事並不認識地下室的工人。我們這群最下層的工人自成一圈，沒有人來建議我們加入工會；既沒有人前來和我們攀談，也沒人下來關心我們的勞動條件。甚至在食堂，我們也沒被打散。

有一天，公司裡的人知道我要離職，因為我其實是個修士，不得不回到修院。消息傳開，離開那天，一位在工廠裡負責在油漆桶黏貼標籤的老工人向我走來，他說：「聽說你是修士，而且就要走了。你怎麼沒跟我說你是修士？」然後他拿出一疊基督徒勞工聯盟（CFLC）<sup>4</sup> 的入會申請表，對我說：「如果你早點告訴我，我早就給了你這些表格，讓你也分給下面那些傢伙。」

就是這條鴻溝：一個工會成員沒想到要直接和「下面那些傢伙」說話。在他心中，除非有人引薦，否則這些傢伙不能加入工會。在工廠裡，這些在地下室缸甕裡搗磨顏料的人，跟其他工人的地位不一樣。我認為，事實上，工會成員看不出自己可以和下層無產階級的工人有所作為，他們認為這些男人和女人都已經脫節，跟不上了。其實這中間有很大的誤會，導致彼此的分離。事實上，下層無產階級勞工只有一個願望：以工人的身分被肯定，不是在其他工人的外圍自成一列，而是完全融入其他工人的行列中。下層無產階級看到，勞工屬於一個比較安全、有尊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有人為他們發聲，有人捍衛他們的權益。在紛擾的世事中，這是他們最需要也最在乎的「集體的」尊

榮，他們希望被接納為團體的一分子。

在鴻溝的另一邊，有組織的勞動界可能沒有經常意識到下層無產階級想要加入他們的強烈渴望，因為勞工代表著共同的尊嚴。他們不知道即使飽受剝削，下層無產階級還是渴望分享他們的奮鬥，因為勞工承繼了一種堅強與莊重的傳統，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艱辛且強健的勞動學校」。他們的歷史是由一連串的奮鬥、堅忍，並帶著尊榮拒絕遭受不義所塑造出來的。並非每個人都積極參與抗爭，但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每個人都可以說：「這是我們奮鬥的果實，這是我們的權利。」這就是工人彼此交談的方式，無論是在家裡、食堂或咖啡店。但是，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沒繼承到這種遺惠，他們沒有這樣的語言，也沒有這樣的思維。他們的歷史已經和勞分工分道揚鑣，如今，他們只好自嘆：我們什麼都沒繼承到，什麼權利都沒有我們的份。他們到臨時工介紹所乞求工作，有時甚至需要付錢來換取工作機會。他們的祖先曾在聖馬丁節<sup>5</sup>來到各個市集，把自己賣給農民當一年的長工；現在，他們則是到人力仲介公司賣身當三個禮拜的短工。因為

譯註 4：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基督徒勞工聯盟。

譯註 5：聖馬丁節（Saint-Martin）。過去在法國許多農業區，有所謂的熱市集與冷市集（foire foide），聖馬丁節的時間正值冷市集，農民在這個時候開始雇用冬季所需的長工。

他們找的是非技術的粗工，於是，他們和自己的曾祖父得到如出一轍的對待，別人對他們品頭論足：「這傢伙看起來不怎麼強壯，挺得住嗎？」屈辱的極致，沒人要僱用他們；他們只好讓社工進到家門，而他們害怕社工。但是一個有辦法養家活口的工人家庭不必接觸社工，他們一定會拒絕社工進門干涉他們的家務事。

我們必須了解不同生活圈的人在日常用語、態度甚至做事方法上的區別，在勞動階層，工人確信他們有權利，即使這些權利並沒有受到尊重；在下層無產階級，卻沒有任何權利保障，永遠沒有穩定的工作，幾乎總是臨時工。不安全感本身已經夠難承受了，但最痛苦的是和別人不一樣，永遠無法和別人平起平坐。這是一種不斷被貶低的生活經驗，而且永遠都看不到盡頭。

就因為沒有被納入工人的抗爭，才使得下層無產階級一直無法翻身？

正是如此，而且我確定，如果勞工界願意承認他們的話，下層無產階級會走出困境。這是他們解放的關鍵所在，而且這是可能實現的。我認識很多在基層活躍的工會成員，他們都有一種堅定的素質，和他們一起應該可以有所進展。他們通常和政治人物相當不一樣，他們腳踏實地，而且具有一種不可或缺或缺的敏感度。我一直不解，為何基督宗教所啓發的組織遲遲不對赤貧展開奮力的拚搏。

## 直接與最上層對話

由於沒有工會意識，最弱勢的族群不會主動去敲門。如果沒有招募下層無產階級勞工，這些組織有辦法戰勝赤貧嗎？若非如此，他們如何填補隔絕彼此的鴻溝？

很多人不加思索地認為窮人沒有政治意識，說他們無法理解各種機構。世界各地都流傳這種說法。我卻相信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實事求是，他們的態度，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

說穿了，結構到底是何物？在日常生活中，它是一個櫃檯、一間辦公室、一場會議。如果你沒辦法主張自己的權利，卻被迫像個乞求者來到這些地方，如果你的表達能力不好，覺得自己處處比不上別人，你怎麼有辦法氣定神閒？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成功得到你想要的，完全取決於接待你的人。他們是傲慢的，還是友善且有同理心的？他們會責備你，還是幫助你？對一個下層無產階級的家庭來說，一個組織結構的實況就是這樣。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遇錯人，法規倒是其次；因為這些家庭能否如願以償，幾乎完全取決於櫃檯後面的工作人員。並不是因為補助款還沒撥下來，市府的公務員就無法批准他們申請的補助；如果因為搬家的緣故導致補助中斷，家庭津貼管理處是可以批准預先



者的代議士，而且也沒有自力救濟的管道。一位父親這麼告訴我：「我跟總統要的不是月亮，我只是想要回我該得的家庭津貼。」他沒有要求社會改變，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我們的民主制度賦予國家元首確保憲法實踐的責任，但沒有提供他改變這些制度的方法。如果現行的民主結構對赤貧者極不公平，要改變社會勢必要透過議會和代議士。下層無產階級的家庭深知，他們從來就不是議會關心的主題。

我們民主國家的歷史，證實第四世界勞工是對的。想要消除不公不義，你既不能倚靠制度，也不能依靠什麼學說或主義。在每一個新的世代，一切都取決於人。赤貧者告訴我們這點，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而是因為他們對現實的敏感度，那是累積起來的歷史性的理解。透過父子相傳的具體生活經驗，整個群體對人治的重要性有著特殊的感受力。

這種敏感度我最近在倫敦再次感受到，那是一場有著五十多個赤貧家庭參與的聚會。一位法學專家來和他們談論孩子被強制寄養的問題，只要談到他們生活的現實、焦慮以及父母和孩子的無奈，討論就十分熱烈。當專家開始提出有組織、有計畫的辯護程序，場子就冷了。

那麼，到底該怎麼做？工會可以做什麼呢？就連馬克思都抱怨無產階級沒有準備好要組

織起來，無法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的結論是：無產階級沒有鬥志，需要有人來替他們奮鬥。

這是一個草率的結論。衡量一個族群的鬥志和願景的標準，不是看他們能不能像富人或知識分子那麼迅速地組織起來。要知道，如果你在整個歷史的進程中，一直面對著看起來龐大、神祕而且完全匿名的機制，卻得不到保護，這是什麼滋味？不要看布萊希特（Brecht）的作品，要讀卡夫卡，才能想像像弱勢無產階級勞工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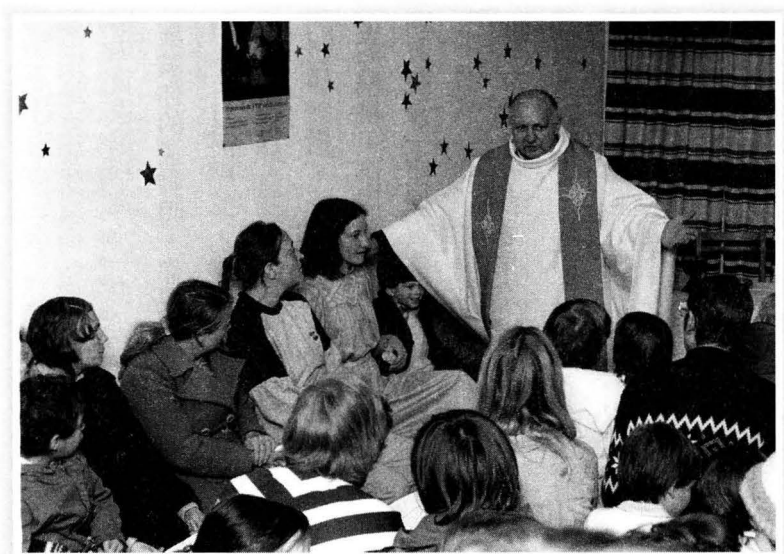
你能想像一直處在不知情的狀況，永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卻心知肚明，無論走到哪裡，歧視和差別待遇如影隨形，這是什麼樣的人情冷暖？在雜貨店、在咖啡館，人家服務你的態度與眾不同，你感受得到的。在教堂、在職場，你也不會被一視同仁地對待。要忍受這一切，還要繼續和現有的制度過招，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你所經歷的一切讓你學會了最好保持低調，忍氣吞聲。

你問我工會可以做什麼？他們可以培育有能力向下層勞工學習的人，重建勞工運動，懂得邀請他們參與其中。

## 第七章

# 這個時代的坎坷路

這群子民不知下一餐在哪裡，  
連去哪裡落腳也沒發言權。



1986年聖誕節，若瑟神父在法國窩瓦河谷省（Val d'Oise）愛荷不賴社區（Herblay）主持聖誕節彌撒。

吉爾·阿努以：

我們已經討論了教會與勞工運動。接下來我們很快地就要討論你所創立的第四世界運動。在這之前，我想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當你將赤貧家庭稱為「一群子民」時，指的是什麼？他們在哪裡？我們應該去哪裡找他們？在談論你的運動時，你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若瑟神父：

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概的情況，或者，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為你獻上一個指南針，據此，你可發現今天依然存在的坎珂路。我們已經說過，下層無產階級的處境不能以地理的語彙來理解，那是一個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處境。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置身於社會階梯的最底層。但最底層在哪裡？它無處不在，在每一座城市，在各地的農村；我們卻看不到他們，因為通往底層的路徑人跡罕至。

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出製作法國赤貧者分布圖的方法。話說回來，即使有，這張分布圖也是變幻莫測的。我已經跟你說過，爲了其他人的方便，或都市更新計畫、地方政府以及企業建蓋新廠的欲望和需要，這些家庭是如何被驅離和錯置。我曾經看過貧民窟的居民，只因爲公園以及綠地的需要，就被迫遷移或流離失所。這種情況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也都發生過：最貧窮的人總是被逼入絕境，遷離他們落腳的地方。不管是一磚一石的敲毀或是用怪手強拆，古往今來，歷史如出一轍。在過去，赤貧者總是被驅趕到城門

外，禁止進入「善良百姓」的社區，這種情況今天依然不勝枚舉。耶穌基督的生命在這件事上給了我們一枚指南針，他的一生，有多少歲月在加里肋亞<sup>1</sup>、猶太山區與撒瑪黎雅<sup>2</sup>的路上逃亡？

## 落腳何處

逃亡？要逃到哪裡？這些家庭要去哪裡落腳？

我想，第四世界總是被迫在都市、鄉村，或兩者之間，或長或短地落戶、聚居在某特定的區塊：一些控管區，例如巴黎聖馬丁或聖丹尼斯附近；在不具經濟效益，逐漸沒落的地區；在沒有或還沒被看出開發價值的閒置荒地。一旦非常困頓的男子或家庭大量聚居在一個地方，其他公民就開始擔心；一波波的威嚇與「清除」行動就會順勢展開。就算有千萬個不願意，窮人還是必須收拾包袱；一旦被驅離，他們就暫時離開大家的視

譯註1：加里肋亞（又譯為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個大區，耶穌基督的故鄉納匝肋就在這個大區裡。

譯註2：在《聖經》裡面，撒瑪黎雅（Samaria）（又譯撒馬利亞）地區的南邊有猶太山區，北有加里肋亞。是

個由群山組成的地區。

線，沒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要緊的是清空那些地方，鄰里找回安全感，眼不見為淨，把案子處理掉。而被驅離的家庭在隱微中繼續相隨，直到下一回合的聚集；這就是缺乏明確地標的緣由。我們的運動花了許多時間，才辨識出他們飄泊的路徑。

在法國，我們看到一群依附在大都會邊緣的人口，隨著都市化的擴張，他們就周期性地被推向更邊緣的地帶。你熟知老巴黎貧民區的歷史，我們在里昂、馬賽、崗城和蘭斯追溯到幾乎如出一轍的歷史。在每一個地方，第四世界的家庭總是因著相同的理由被迫遷移。有時候，他們在倉惶失措的情況下搬遷，當權者以為從今以後，這群人已經遠離，散落四方。但是，過了一些時日，令當局目瞪口呆，他們又聚居在同一個地方。

這群子民不知下一餐在哪裡，連去哪裡落腳也沒發言權。他們去別人強迫他們去的地方，而且常常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或者，就乾脆去到不會有人來追趕的地盤：一片荒地、自己動手搭蓋的寮屋或藏身在地窖中。他們的選擇有限，因為一個貧窮家庭承擔不起與世隔絕的代價，為了生存，他們需要幫助，需要別人。所以，在廉價的居住區段，我們遲早會發現這些家庭又再次聚集。

在巴黎與其他城市，配製家具的出租房在某個時期成為赤貧者的居所。如果我們留心觀看，會在我剛才描述過的城市邊緣發現他們的先祖。在巴黎大區，這些貧困區段被宣布為國防的保留地之前，本來是赤貧者的棲身之處。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此落腳的家

庭在都市從事最卑微的活計，或是在採石場、礦坑與農村當長工或臨時工掙飯吃，大家都在類似的荒地搭寮棲身。

總之，哪裡可以謀生，他們就待在哪裡？

他們之所以在那些地方落腳，是因為他們在城裡找不到住處，在鄰近的鄉間也不受歡迎。不過，你說對了，如果其他人不打擾這些家庭，一旦他們找到餬口的活計，他們就會落戶。過去，工作的前景或是任何可以掙錢的機會可能會導致窮人動身上路。在航海貿易繁盛的時期，也就是從西班牙到荷蘭各省的大探勘之後，他們會出發到各港口去。但後來住宅與就業市場的各種規定限制了這種流動，至少對赤貧者來說是如此。在西歐，也許除了西班牙和義大利，移工不再由最窮困的人口組成。因為想要遷移，你需要合法的文件或是多餘的錢，才有辦法進行非法移民。就境內遷徙來說，越來越難看到底層的勞工在田間幫忙收割與採收，機器和年輕的學生輕易地取代了他們。

在過去，修院或主教座堂的慈善救濟也會影響到赤貧者的搬遷。在穆斯林國家，每週五清真寺發放救濟品時，情況仍是如此。每逢初冬，乞丐、小販、在市集耍猴戲的藝人就會出發到蘭斯、圖爾市<sup>3</sup>、巴塞隆納等地。救濟院與綜合醫院提供的可能庇護口耳相傳。聖特拉斯堡主教座堂（編案：設有主教座位的教堂）因為招架不住窮人相繼尋求庇護，

曾經封死門塚。當代，在底特律、阿姆斯特丹和巴黎開設的「愛心餐廳」和「施湯站」，都是救濟傳統的延續。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的冬天，這些救濟站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貧無立錐之地的窮人和流浪漢就口耳相傳，從各地蜂擁過來找活路。

近來，皮耶神父（Abbe Pierre）無疑是這種慈善最典型的例子，他在那個冬天發出的呼籲是教會歷史的重大時刻。基督的愛透過皮耶神父變得真實，在那樣的愛中，最後的要成爲最先的，富有的要成爲他們的服事者。必須指出的是，在同時，也有其他神父與平信徒開始將窮人集結起來。在圖爾市的窮人談論著比諾神父（Abbe Pineau），在法國的這個大區，「到圖爾市」意味著去見這個他們所信靠的人。在這個國家有不少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皮耶神父是這波運動的精神領袖。

### 進入暫時棲身之處

不過，眼看著數千個家庭從四面八方湧進巴黎，對教會來說，並不光采。

問題是，基督徒能夠防止無家可歸者身陷苦境，並在他們湧進巴黎城門之前就展開行動嗎？在戰後這段時間，他們有什麼辦法？誰聽教會說話？我還是認爲，皮耶神父一舉就將原本散落四方的善意凝聚起來。他流露出強烈的愛，眼見百姓居住的權利被蹂躪



而義憤填膺，他意志堅定，催促政府負起責任。

那個年代，在我負責的艾斯那（Aisne）的一個堂區，有一個最窮困的家庭跑來找我，說他們想要加入皮耶神父。我必須承認，堂區的教友得知這個子女衆多的吵雜鄰居要離開，感到十分開心，沒有多久，大家就幫他們湊足了旅費。其他堂區的神父和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這就是爲什麼我到各個倉促搭蓋的收容營區時，會遇到那麼多熟悉教會的男男女女。皮耶神父吸引了某一類型的人，容我說，就是教會中最窮困的子民。後來，巴黎社會住宅局興建了一批低租金住宅，在那裡，我就比較少遇到跟教會來往的家庭。話說回來，最重要的是，輿論與政府都回應了皮耶神父的呼籲。在那段時期，無家可歸的人被草率聚集，住進當時搭蓋的各種緊急收容營區或中繼屋。搭蓋這些地方的當時，都假設無家可歸者只會暫時棲身。

暫時棲身？某些貧民區不是還在嗎？針對當年這批應運而生的貧民住宅，大家不是經常嘲諷說，甩不掉的正是倉促打造的？

譯註3：蘭斯（Reims）是位於法國東北部的一座城市，距巴黎市約一百三十公里。圖爾（Tours）位於法國中部偏西，是法國著名歷史藝術古城。

在法國苦惱於房屋荒的六〇年代，這些倉促打造的臨時貧民區持續了很久，有些甚至存留至今。在法國沒有一個地方不會出現這些所謂的「皮耶神父」貧民區，這些區段一直在拆遷和進住之間徘徊。一開始，當局以為這些家庭之所以變成無殼蝸牛只是暫時走霉運，因為當時法國房屋市場僧多粥少。那些單純只是因為景氣不好而無屋可住的人，慢慢得到安置。留下來的是那些最貧窮、長期失業又沒有人脈的人。一些臨時貧民區人去樓空，地方政府就把那些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處置的家庭再送進來，不管是法國人還是移工。

就這樣，在六〇年代，地方當局面對著一處處他們極力想要擺脫的聚落。在當時，我已經全心投入這場奮戰，不是為了住宅，而是為了根除非人的處境。那幾年的回憶是痛苦的，我們參加跨部會的會議，在沒完沒了的會議中討論該「驅散多少家庭到半都會區（semi-urban）」？理想的數字是多少？那是當時的流行用語。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指導這些公務員「可忍受門檻」的概念，在總人口數中，可接受五%、十%，還是十二%的「邊緣」家庭？在一個為其他市民構思的都市計畫中，可容忍多少「問題」家庭？這是專家的提問。事實上，面對這群讓他們頭痛的人口，地方當局所尋求的，一直是一個瓦解、分裂的手段。在這些會議中，我越來越明白窮人在政治舞台缺乏代言人意味著什麼。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家庭的同意，這些拆遷計畫有辦法完成嗎？

過去不會有人來詢問他們的意見，現在也沒人想到要這麼做。從過去到現在，第四世界的家庭都被剝奪了自由選擇居所的權利。當然，其他公民也不是一直都有如願的選擇；無論如何，底層的家庭沒有任何選擇遷徙的自由，也沒有選擇居所的自由。想知道去哪裡可以找到他們，就不應該忘記這一點：這些家庭沒有選擇居住地與住宅型態的自由。公家或私人機構將令人感到卑屈、蒙羞的居所強加在他們身上。在諾瓦集貧困區進行拆遷計畫的時候，一個參與其事的互助組織和我談替「下等」家庭設計的「下等」居所，那是六〇年代的事。當時，在圖爾市，市政府蓋了一批狹窄的社會住宅，居民就在水泥地面鋪上床墊充當臥室。他們替這批住宅安裝鐵門，木製的百葉窗則在完工前被拆除，當局怕這些家庭會拿去當柴燒。過去這十五年來，貧窮家庭被推向更偏遠的地帶，一小撮一小撮地被塞進最低水平的住所中，被分散之後他們比較不容易被看見或聽見。在都市更新之前，我們可以在都市較破落的區段、配備傢俱的客房與貧民公寓看見他們；他們被夾在火車站與屠宰場之間，或是裝貨月台與倉庫之間。都市更新之後，你一定可以在都市的夾縫找到他們：運河與高速公路之間、工廠與垃圾場中間、墓園後面與鐵路沿線的狹小空地。這些家庭因不同的理由在那些地方逗留，經常是臨時性的，而且他們的租約常有一些少見的條款；這是另一個不該忘記的特徵。如果你到市政廳去詢問被冠

上違章建築的所有區段，你就會知道要到上哪兒去找最底層的房客。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低收入戶的平價住宅，幾十年來未曾改變。有關單位不再考慮重建類似的住宅，而那些存留下來的平價住宅，我看不到它們將來被拆除的可能性，裡面的居民好像已經定居下來，我還不敢說這是什麼道理。即使是那些初來乍到的家庭，尚未久經底層的生活境況，也帶來一些我先前沒見識過的問題。這些家庭看起來更加焦慮，比較不容易找到拚命活下來的理由。過去，物質的匱乏比現在更嚴重，但這種匱乏給底層家庭一種求生的堅忍，但現今，這種堅忍已不復見。這只是一種感覺，大家要非常謹慎，不要輕率做出結論。我只是想說，我在西德和荷蘭的某些街區與貧宅，看到這種缺乏活力、冷淡厭世的沉重氛圍。在那些地方，這些家庭好像在獲得物資的同時，失去了生命力。

剛剛談的是過去遺留下來的緊急收容營區，加上為低收入戶興建的平價住宅，以及過於破爛而無法提供給其他承租者的區段。我想，今日一如昨日，一切作爲都是爲了驅散和瓦解。住宅處的官員也許認爲把這些家庭安置到公寓中，是爲這些居於劣勢的家庭做了好事；而這些家庭卻無法定期支付公寓的房租。但，這也是暫時擺脫手山芋的策略，表面上，問題好像消失了。在邊陲地帶興建社會住宅，則是讓這些家庭在檯面上消失的另一種方式；把他們分散安置也有同樣的效果。

## 持續尋找赤貧者

你會試著再次找到他們嗎？

當然，而且繼續留在這些貧民區的家庭可以為我們指引方向。他們通常是親戚，或是過去的鄰居。此外，我相信只消住在當地，聽聽那些街坊鄰居、商店老闆，以及社工之間的對話，就會知道第四世界在哪裡。從伯利恆的牧羊人到現在的整部歷史，有一件事從未改變：只有「好窮人」能被接受，最困頓的被界定為「壞窮人」，而且被冠上其他名號：「懶鬼」、「混混」，他們沒有被視為正在經歷困境的家庭，而是被當成麻煩的「問題家庭」。我跟你說過一個工人神父可以把握這樣的良機：在他陪著工人同事一起回家的時候，很可能會在社區發現另一個找不到工作的家庭，甚至是最底層的家庭。只要這個神父停下來跟社區的人聊聊天，就會知道受苦最深的家庭住在哪裡。

大巴黎地區不是聚集了最多赤貧的家庭嗎？

我不這麼認為，從近代的歷史來看，巴黎不會收留最窮困的市民，首善之都把最潦倒的市民擠出外圍，最多也只保留了移工。在巴黎市中心進行都更的過程中，我親眼目

賭有關當局進行一項交易，把都更時發掘的一群世居巴黎的底層市民遷移到巴黎城外。政府介入這項交易，付錢把這群市民遷往鄰近的城鎮；現在，這些城鎮又想盡辦法要把他們弄走。六〇年代，巴黎市郊曾經是最貧窮的法國人聚居的地方，今天，這一代有八十五%的房客是移工家庭，他們定期支付的房租使得這些住屋得以重新粉刷，周圍的環境也稍有改善，只不過這一帶的名聲並沒有變好，但是，最貧窮的家庭已經離開。

如果你想知道的是數字，你就碰到一個根本的政治問題。第四世界就像是一個政治的真空，誰想了解它？誰會費心思索過它的影響所及？底層的人口是一個統計上的誤解，而不只是一個計算上的錯誤。它總是出現在較為一般性的標題下，令人無法辨識他們的面貌。沒有工作、居住情況惡劣，或者沒有收入、沒有文憑……這些情況可能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把這些類別及數字都概括進去，就遮蔽了處於絕望深處者的真實情況，李歐內爾·史安雷虎（Lionel Stoléru）、何內·樂挪（René Lenoir）及後來的賽爵·米拉諾（Serge Milano）、若貝爾·里昂（Robert Lion）等作者所做的統計及分類，就犯了這種錯誤。輿論接受這樣的訊息，沒有人追問：同胞中有誰既沒有房子、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收入，同時還生病、沒有文憑，在政治舞台上也沒有代言人？

在這種普遍的冷漠中，不想知道真相的政府可以用不確定的數字做爲擋箭牌，我常聽他們說：「告訴我們有多少窮人，然後我們再看看能做什麼……。」有些對話者就乾

脆責備我所知有限：「他們這些第四世界的人講話不夠精確……。」另一方面，所有真誠的官員都承認：法國及歐洲的主計處都無法回答到底有多少窮人？大家沒替這個問題做好準備，而且也沒人費心追求解答。

## 歐洲的赤貧族群

此話怎講？不是已經有人提出數據；媒體曾經提到歐洲共同體有八百萬到一千萬的赤貧人口，法國則有兩百萬。

歐洲共同體的這些數據資料取自第四世界，我們曾以極大的謹慎與複雜的說明來建立這些數據。說一九七一年法國有兩百萬個窮人，是一個刻意的保守估計，我們想避免各種可能的誇大，避免被指責為煽動群眾的宣傳；今天媒體卻重複使用這個沒被更新過的數字。

老實說，提出數據又怎樣？窮人在哪裡、有多少，真的是最重要的問題嗎？我越來越意識到這是陷阱問題，躲在數字背後，我們就不必追問自己：這些家庭的存在意謂著什麼？不管他們的數目有多少，最重要的難道不是看出他們的存在揭露了我們的背叛，映照出我們的弄虛作假。他們催促我們要貫徹自己宣告的信念。領悟到他們要引領我們

做出什麼樣的改變，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退避到數字裡面，只會讓我們忽視窮人的掙扎。但是，大家繼續在數字上打轉。

第四世界是否也出現在農村，你考察過嗎？

大部分處境最不利的家庭，都會在城市的邊緣落戶；不過，在每一個法國農村、每一個鄉鎮，我們也有機會遇到他們。有一天，在普瓦捷（Poitiers）附近，朋友載我到好幾個以前農村長工棲身的地方，那是過去地主搭蓋給長工的住所。現在，村委會把這些住所出租給最底層的家庭，這種小型孤島在法國處處可見。而且，大部分的家庭像無根的浮萍，漂泊於好幾個不同的村莊；同一個家庭的孩子有可能在不同的村落出生。當今，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家庭試著回到丈夫或妻子還保有家庭連繫的村莊；不見得是他們出生的村莊，也不是他們只做短暫停留的地方，而是他們仍有親人與舊識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們回去的確切理由，顯然他們希望可以在那裡獲得接待，但常常換來失望的結局。對一個非常窮困的家庭來說，融入一個村莊常常比在城市落戶來得困難。

我們還是很難得知這些家庭的出身背景，他們到底是來自城市還是鄉間？通常他們自己也無法立刻回答這個問題，常常需要一起耐心追溯過往，因為光是知道出生地是不夠的。由於深怕孩子被強制寄養，或是因為拖欠房租或背負債務而被房東驅離、被鄰居



威脅，種種因素導致他們到處流浪，常年顛沛流離。有時他們就落戶在我方才提過的貧宅，當相關局處打算拆除的時候，這些家庭又得搬遷到其他貧宅，但這些地方同樣籠罩在怪手的陰影下。不斷搬遷的結果，就會漸漸與社會失去聯繫，最後只好自己想辦法找遮風避雨的地方。他們寄居在手足或朋友的屋簷下，委身在樹林背後的寮房，或是分租一間老舊的車庫。目前看來，他們的數目有增無減。但是，就我對他們的認識，他們流浪的路線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國家並沒有為這些低過貧窮線的族群預設住房，所以他們住過的都是徒手搭蓋的寮房棚屋，是大家敲敲打打拼湊起來的違建。

所以，皮耶神父的運動和遍及全國的動員並沒有成功？

皮耶神父動員了全國上下，並讓公權力重拾自己應負的責任；現在沒有人會否認「住者有其屋」是政府的本分。對他來說，那些急就章的貧宅，還有在諾瓦集替無家可歸者搭蓋的營區，都只是暫時的。無論如何，他以崇高的精神提出的超凡號召「優先服務受苦最深的人」，推動他展開一場普世性的奮鬥，那些被孤立的人，也就是被汙名化的流浪漢或遊民成了見證者。皮耶神父成爲他們的夥伴，使得他們的聲音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被聽見，大家也不應該忘記這點。

發現到一整個主要由極端貧困家庭所組成的子民，是後來的事；正是這些家庭催促

「第四世界運動尋找自己獨特的道路。」

「我們談到了諾瓦集，也就是皮耶神父所創建的緊急收容營區。」

那是由厄瑪烏拾荒者所創立的營區，皮耶神父當初並沒有預計要讓它維持十五年之久。這個地方甚至不能稱為臨時的避難所，那只是兩百五十間「冰窟」：瓦楞圓頂鐵皮庫房，裡面是硬泥地，沒水沒電。本來只是讓家庭在等待短期中繼屋期間，暫時歇腳幾個星期的處所。

諾瓦集很快就成為那些因為過於貧困而處處受拒的子民的象徵。這些家庭來自法國各地，特別是西部、中部與北部。他們來自城市與鄉間，有一些來自巴黎市中心。光憑他們竟然接受這種臨時搭蓋的住處，就已經是個記號：在法國，那通常是圈養動物的地方。其他聽說皮耶神父的呼籲之後才趕來的家庭，並沒有接受這樣的居住條件。幾個比較不是那麼困窘的家庭，不小心淪落到那裡，也在幾年後得到安置；其他的家庭，不只一直留在那裡，還將這個營地轉變為皮耶神父始料未及的樣子：一個接待窮途末路的家國家庭繼續前來的地方。

被喚醒的輿論難道沒有表達憤慨嗎？

輿論只是做了大家都會對赤貧者做的事：承認這個事實，卻歸罪這些家庭。他們來自法國各地，但不習慣過社區或集體的生活。他們的匱乏與無知，很快成爲引人注目焦點。最不公平的是，在這個只有幾個公共水龍頭的地方，大家卻譴責他們衛生習慣不良。地方當局和周邊鄰里譴責這些家庭，說他們懶得在屋子旁邊的小塊泥地開墾出像樣的「園圃」；大家期待這些身體已被磨損到極點的男人可以用僅存的力氣，在一塊只借給他們幾個星期的土壤上種出萵苣或是天竺葵。他們的「園圃」成了垃圾堆，是那幾坪擠滿妻子兒女的鐵皮屋的延伸地。整個營區看起來就像個大型垃圾場，這在周邊居民的眼中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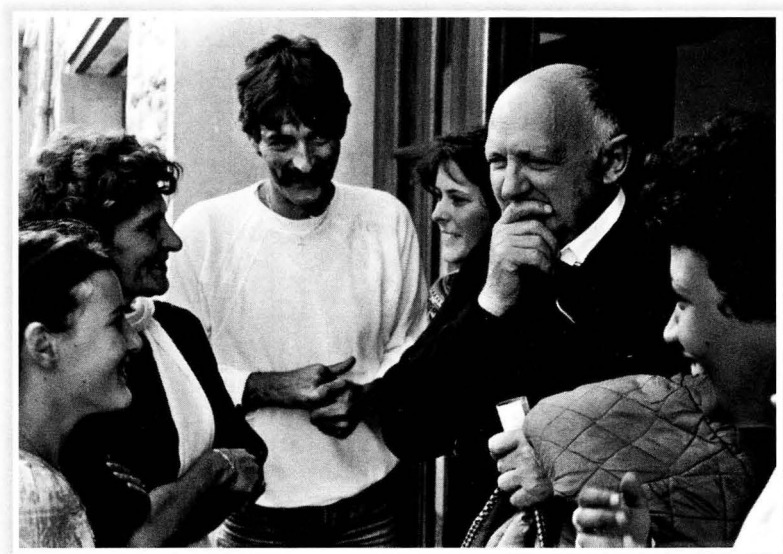
事實上，大家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這些家庭身上：說他們缺乏社區營造與敦親睦鄰的精神，而且髒亂失序。好像在爛泥巴裡面生活，住在冰窟形狀的鐵皮屋，腳踩硬泥地，都是他們自己的錯，好像有人天生心甘情願喜歡這樣。

正因爲他們缺乏替自己辯護的途徑，所以，大家可以輕而易舉地歸罪他們，把他們視爲一樁樁「社會案件」來處理，說赤貧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說他們不像其他無家可歸的人，但是，此話怎講？他們無法說自己是哪個落後地區或某種夕陽產業沒落的受害者，他們既不是老人，也不是自然災害的受災戶。因此，在法國，對極端貧窮的通用解釋，就剩下精神疾病、人格不健全和意志不堅；這些家庭被同時貼上這些標籤。諾瓦

集營區被當成一場意外，一群社會個案、一群「壞窮人」無意間湊合在一起。一九五六年，我耳聞的就是這樣。這一年，我的主教建議我到諾瓦集營區試試，再告訴他我是否願意留下。

第八章  
第一批盟友：  
讓自己受牽連的勇氣

有一天，這些家庭要踏上梵蒂岡、聯合國、總統府及國際勞工組織的石階。



1986年，在第四世界運動總部，若瑟神父與一群第四世界運動的年輕人。

吉爾·阿努以：

在一九五六年，你抵達了諾瓦集貧民窟，然後留了下來。你怎麼會想到要創立一個運動？什麼時候開始，還有為什麼你決定不只策劃一些孤立的行動，更要建立一個組織？

若瑟神父：

在一九五六年，那二百五十二個住在名為「法國城堡」內的貧困家庭被孤立任教區外。所以當時教會的主事者向好幾個堂區發出呼籲，看看哪個堂區願意讓出一位神父。我的主教想到我：「你去，能留多久就留多久，什麼時候想回來都可以。你還是屬於原來的堂區，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回來。」所以我放下埃納（Aisne）省的七個村莊，事實上，我每個星期天還是回去主禮彌撒、上教理課，這樣的情形持續了四個月之久。但是我已跟你說過，自從第一次和這些家庭接觸，我就想，這事關係到一整個族群、一羣子民。童年與學徒的經驗、成爲年輕工人及在神學院就學期間的體驗，然後擔任農村的本堂，這一切在我與這群百姓接觸時，終於理出了條理和意義。童年時期，我在一個緊貼著赤貧社區的工人社區長大。在神學院讀書的時候，每次一有機會，我就到蘇瓦松的一個赤貧社區走動。我曾經在我受雇的地窖遇到無產階級以下最受剝削的階層；在農村當本堂時，我曾經與那些極端匱乏的家庭來往。別人開始在背後叫我「人渣與賤民的神父」。在諾瓦集棚戶區，這一切都有了意義，我告訴自己，這是一羣子民，一羣赤貧的

子民。他們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不是因著一個共同的計畫，也不是因為共享了什麼福祉，而是因為痛苦。痛苦將他們聚在那裡，封閉他們，而且讓他們受到輕視。

你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考慮要創建一個組織嗎？

還沒，我必須先生活在他們當中。慢慢地，一些活生生的事實迫使我不得不採取行動。首先是自我捨棄，從一開始，這些家庭就迫使我必須「放下」；沒有他們，我自己無法產生「放下」的力量。就這樣，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某一天，一個被凡爾賽省政府送過來的家庭落腳在諾瓦集：一對父母和五個孩子，一家人都凍僵了，他們手邊竟然沒有任何行李。我只有一个選擇，把自己的棉被給他們。我告訴自己，反正我可以在翌日或往後的幾天找到其他的被子。不過，事情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容易。所以，在那年的嚴冬，在一個結冰的鐵皮冰屋內，覆蓋我的，只有我的黑色教袍和披風。

我在農村當本堂時曾體驗過貧窮的滋味，抵達杜日（Druzel）堂區的前幾個月，我總是飢腸轆轆，當時手邊也沒什麼行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拿著平底鍋當餐盤進食。但，這都還只是表面的匱乏，身邊總是有人可以幫我脫困。在諾瓦集，那種極端的匱乏落到了底，因為所有住在那裡的家庭都落入同樣的赤貧中。我找不到可以幫我脫困應急的人，這讓我和這個族群更深刻的連結在一起。

之後發生的一件事迫使我下定決心。我記得在一個天色昏暗的傍晚，一個孤單的母親帶著三個女兒、兩個兒子來到諾瓦集，除了和他們分享我另一半的冰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接待他們。由另外兩個男人陪同，我帶著這個母親來到這寬僅四呎半、長僅五呎二的破舊小屋。這位女士並沒有低頭看冰窟的硬泥地面，她的眼光停留在這兩個看似凶神惡煞的男人臉上，然後露出驚恐的神情。她發現自己進入一個絕望的世界，並覺察出她將難以脫身。所以我告訴她：「夫人，聽著，看著您的孩子，我有一個想法：換成我的母親，她會怎麼做？她會帶著孩子去市政府，站在市府的大門前，然後跟裡面的人說，如果你們不給我一個住的地方，我就不走。」想到我自己的母親，我理解到，對所有的家庭來說，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迫使這個社會接待最貧窮的人。最後，我替這個家庭付了旅館費用。但是，那一晚，迫使這個社會負起責任的想法一直存留在我腦海。

### 這個社會必須負起責任

當時難道沒有任何一個協會在當地承辦任何業務嗎？

當時有二十七個機構介入諾瓦集，但是，除了厄瑪烏協會，沒有任何組織處理赤貧者的住宅問題。我感覺到這些組織是在對這些家庭施恩。只有皮耶神父的態度不一樣，



但是，體力日衰的他力不從心。這讓我明白一件事，「人」遠比「組織」更影響窮人。如果組織內的一個人離開了，就可能讓窮人所擁有的一點點安全跟著消失。

在諾瓦集，這些家庭被食品供應商不擇手段的剝削，他們在諾瓦集購買的食物總是比城裡還貴。他們甚至被某些提供救助的組織利用，其中有一個特別過分，他們替孩子拍照，還特地要求孩子的父母不要替孩子梳洗、不要給孩子乾淨的衣服穿。這個組織想要讓這些孩子看起來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好讓捐款者認同他們的行動。就像很多其他的組織一樣，他們發放金錢與衣物，給新生兒送牛奶；但是，他們發放最多的還是羞恥的印痕。當然，也有人發放食物，但是這些物資的發放在如此悲慘的情境中毫無意義。有好多家長，帶著他們的大鍋子，刻意繞過我的冰屋，轉了一大圈去領取食物。因為他們覺得很丟臉，他們也知道我替他們感到丟臉。如果不小心被我碰到了，他們就會說：「這是給家裡的狗吃的。」所有這些救濟的舉動所表達的，其實是對這些家庭的放棄，是把他們關閉在痛苦的天地裡，拒絕去做真正該做的事。這些舉動只是讓這些家庭一天比一天更窮，一天比一天更抬不起頭來。見證這一切讓我下決心要跟營區的居民一起創建一個協會。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才能趕走那些入侵者，才能讓這塊營區只留下那些最本質、最重要的支持。

所以，你就和窮人一起創立了這個運動？

還有別的選擇嗎？不要以為我有先進的參與概念。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屬於這個族群。跟他們一樣，我冷過、餓過，我因為沒有好好利用神父的職位而被他們嘲笑過。記得有一天，我坐在路邊，一位婦女上前和我搭訕，向我要錢，但我身上一毛錢也沒有，而且我明明白白告訴她我沒錢。她轉身向過往的行人大叫：「大家來看這個神父，他竟然連一毛錢也沒辦法給我。」另一個家庭的父親來跟我要煤炭，我不得不告訴他自己也受冷，而且我什麼都沒辦法給他，他差點就揮拳打到我，但是我動作比他快，把他壓倒在地，這一舉給我帶來了柔道黑帶的稱號。

除了這些家庭，我要跟誰結盟呢？我和這些家庭一起生活在令人無法忍受的境況中。我不是在跟你報導一些社會新聞，那種生活是無法忍受的，因為它一直持續。六個月，還可以忍受；一年，你熬不過；兩年之後，如果不是反抗，就是放棄，再不然，就是和這個族群一起沉到谷底。出於這個恐懼，第一個協會誕生了，那是一個分享日常悲劇的方法。其他相繼而來的舉措都出於同一個本源：活生生的現實、過多的不公義，還有害怕一起遭赤貧滅頂的恐懼。一切都出於共享的生活經驗，從來就不是理論。

建立持久志願者團體的想法幾乎同時出現，沒有這個誕生於諾瓦集貧民窟的志願者聯盟，我們不可能完成今天所達成的一切。我和這些家庭想要摧毀赤貧與自卑，這兩者

如影隨形；但是，如果沒有這些男女志願者和我們抱持相同的渴望，願意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不可能找到出路。我當時強烈感覺到這個真切的需要，但是還不知道這個以赤貧者為核心的志願者團體正在誕生。

持久志願者團體誕生之前，貧民窟的家庭對我提出一些具體的要求。比方說，我們不能任憑幼兒在泥濘中爬行、在夏天中暑脫水、在冬天一直生病。而且他們也缺乏賴以維生的基本物資：食物、衣服及木炭。如果我們不發展出一個對抗極端貧困的計畫，就不可能拒絕救濟機構所發放的食物與舊衣。但是，要建立一個幼兒園、一個募集煤炭的聯合活動，還有一個舊衣新穿的商店，都需要有人支援，需要組織起來，需要這些家庭的投入及外來的合作夥伴。

早在一九五七年，貧民窟的一些居民已在所謂的「家庭辦公室」聚會，他們心知肚明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也因此，我們建立了第一個協會。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直覺及預感，我們替協會取了這個名字：「歐洲文化與行動團體」，我們當時還沒意識到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國際性的維權組織。一九五七到五八年的這個酷寒的冬天，窮困到極點的家庭陸續來到這個集中營般的貧民窟，在這種景況中，我們到底抱持著什麼樣的遠景？是的，我們每個人至少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要擊破封閉與孤立。在那個年代，歐洲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議題，所以，把我們的協會定名為歐洲行動團體，這是一種讓自己

匯入當代潮流的方式，一種加入維權運動，避免讓自己落入慈善救濟框架的方法。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具體的表達：有一天，這些家庭要踏上梵蒂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統府、聯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石階。

## 單靠自己，什麼也無法成就

但是，諾瓦集的居民能有什麼力量和權勢？你的舉動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不是嗎？

我很快就意識到，單靠自己，我們什麼也無法成就。協會才剛成立，情報局就傳喚我，要求我提供帳目。由於協會的成員中有些人是登記有案的累犯，坐過牢，甚至被褫奪公權，所以情報局懷疑我意圖不軌，懷疑這個協會是罪犯與暴動者的結合。因此，他們不同意協會的成立。我必須推薦幾個沒有官司纏身的成員才行，所以我找了一位基督敎朋友，我們成立了一個新的協會。這個朋友要求將協會命名為「協助一切沮喪絕望者」，貧民窟的家庭同意了，因為這絲毫沒改變我們的目標。

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讓這個緊急收容營區改頭換面，讓每個家庭都能夠獲得適宜的居所，協助那些想回

家的外省人返鄉；同時也是在學習理解自己和整個族群的生命：理解生命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是誰？我們的上一輩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們當時還沒有發展出今天的語彙，也還無法預見各種應該採取的行動。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如果我們忠於初衷——執意要停止不公義的情況，並讓生命的自然之流引領——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相信，這個運動的基本雛型已儼然形成：意圖創造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創建讓居民能夠接觸到文化的場所，和外界建立團結關懷的聯繫；然後，藉著這一切，在人類歷史及未來的遠景中，讓大家意識到赤貧族群的存在，並和他們一起找到一個正確合理的位子。

在這個住著超過二百五十個家庭的營區，起初只有十幾個取水幫浦，所以我們便開始打造更多水龍頭，替一些鐵皮屋的室內硬泥地灌上水泥，接上電力，加厚某些住戶的牆板，挖掘一些小型的污水管道……等等。同時，我們也開始建立一些知性的場所：一所幼兒園、一座圖書館，然後一個家庭聚會所。因為這個運動所有行動的靈感都建基於這些家庭的憂慮與盼望，赤貧讓我們明瞭，人類最絕對的需要，在於擁有安全的家庭生活。在諾瓦集營區，這個需求關係著家庭的存亡，他們的家庭生活面臨各種威脅，外來的介入擊碎了家庭的完整，這些父母不得不使出原始野蠻的方法來保護自己。此外，我們經常遭遇火災。由木板屋改裝的第一間家庭聚會所，在慶祝落成當天就被放火燒掉了。接下來幾個月，我們又在原地蓋了另一個聚會所。

一方面，這些家庭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另一方面，內政部遲遲不肯行文同意協會的成立。我們並不是處於非法狀態，因為我們沒有傷害任何人，但是，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處於法律的規範之外，我能想像這將是一場漫長的奮鬥。在等待情況好轉之前，這些家庭的尊嚴和安全要求我們至少應該立下一些基礎，以達成這三個目標：生活在一個符合人性的物質環境中、發展心智、得到其他公民的肯定與認同。

既沒有官方的認可，又沒有資源，你要怎麼達成這些目標？在沒有經過認可的情況下行動，不會招來更多麻煩嗎？

我們冒著風險行動，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你不可能什麼都不做。我們在銀行開了一個戶頭，請了一位會計。福協太太，一位營區的母親，在下班後幫忙記帳。我則開始對社會發出呼籲，描述這些家庭的痛苦與尊嚴。這個舉動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輿論開始意識到極端貧窮頑固地存在著，就這樣，興起了一股支持的輿論風潮。在巴黎，我只認識露西·山木（Lucile Sumpf）小姐，她當時已上了年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在西陀修道院遇見她。她出身將門，兩次大戰期間，曾經是巴黎第十五區的社工員，當時肺結核依然肆虐著貧窮的家庭。她為我打開了許多巴黎的豪門。

難道我因此就走回典型的傳統老路：富人救濟窮人？當然不是。事實上，這些富人

開始爲了窮人的利益奔走，並讓自己受牽連。因爲當時，貧民窟已經聲名大噪，因爲這些家庭聲名狼藉，而且我們得罪了許多慈善組織。也難怪內政部不肯同意協會的成立。所以，這些出身上流社會的朋友必得要有某種特立獨行的個性，把自己重新放在某種高度，才能和我們合夥。不要忘記當時在巴黎，皮耶神父革命性的訊息<sup>1</sup>並沒有得到非常正面的回應。他說這個世界應該改變看待赤貧的眼光，這樣的改變必須伴隨著一個新的社會計畫。但是巴黎並沒有把他這段話聽進去，而且在貧民窟內，皮耶神父一離開，厄瑪烏協會（Emmaüs）<sup>2</sup>的人便繼續送米施粥。我已經說過，對這些家庭來說，繼續停留在這種接受救濟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說這些話的人在當時一點都不受歡迎。

很多人都以為你曾經屬於厄瑪烏協會，後來才退出？

事實上，我的主教把我放在這些家庭手中，我從未曾加入厄瑪烏協會。去到諾凡集時，我的確走向皮耶神父，就像我之前爲了尋找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曾走向高登神父

譯註1：皮耶神父，於一九五四年的寒冬在廣播電台為法國無家可歸者發出呼籲，得到廣大的回響，法國國會因此在幾週後決定建造一萬二千間臨時住宅。

譯註2：厄瑪烏團體於一九四九由皮耶神父創立於法國。協助無家可歸者取得住屋或搭建臨時庇護所，是這個協會重要的社會行動之一。

(L' Abbé Godin) 及德皮耶 (L' Abbé Depierre) 神父一樣。在我眼中，這些人是窮人無邊的希望，我因為教會能夠孕育出這些人才而感到驕傲。我自覺是這個對赤貧者洋溢著愛的教會的繼承者。對當時仍在鄉村當本堂神父的我來說，這些神父給我許多啓發，他們讓自己成為受壓迫者的見證人與代言人。

讓我們再度回顧歷史，想像五〇年代的法國對窮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戰後的家園殘破不堪，許多房屋處於無法想像的破敗狀態。小康之家取得了可以勉強棲身的住屋，至於最貧窮的家庭則在條件惡劣的殘破老屋苟活。農業的機械化讓這批人口離開鄉村，逃往城市。但是，在大都市，勞動市場卻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可以雇用國內的民工潮。政治人物忙著其他的議題，民政部門假裝沒看到極端貧窮的存在。我說的並非從中南半島與阿爾及利亞回國的軍人；他們之中許多人抱病回國，沒有工作，看不到前途。大家不會忘記，有很長一段時間，進入軍隊與憲兵隊是法國窮人的出路之一。一九五五、五六年左右，許多的兒童吃不飽。面對這些情況，必須有人站出來抵抗。皮耶神父就是這波社會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沒有時間估量整個災難造成的影響。他看到的是許多子女成羣的家庭露宿街頭，而貝里·達衛 (Pierre-Daville)<sup>3</sup> 則大聲揭發社會對那些處境堪虞者的不聞不問。我剛才說過，皮耶神父當時疾病纏身，以致於沒有機會對他所發現的社會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貧民窟的家庭永遠不會忘記他所發出的呼籲。



## 令人驚訝的盟友

你是否意味著自己填補了不全之處、逆轉了局勢？

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其他人已經開始的事業，繼續行動，不讓虛無主義籠罩。赤貧重壓著這些家庭的肩膀，而公部門卻假裝不知道。一些孩子在垃圾桶尋找食物，另一些孩子在秋風中幾乎半裸的在馬路上嬉戲。超過三分之一的學齡兒童沒去上課。營區裡面，幾乎所有的父親都沒工作，母親們耗盡積蓄，有些不得不在星期六黃昏從娼，好賺幾個法郎養活孩子。儘管如此，公部門還是譴責我們太過誇張。

眼見這些家庭被棄置一旁，沒有得到任何護衛，怎麼可能袖手旁觀，我們的運動不得不誕生。這些家庭被丟棄在諾瓦集營區，接著其他緊急避難屋的相同景況也浮出檯面，這一連串的臨時措施迫使我們展開新的分析與行動。必須有人站出來聲明赤貧不只是住宅的問題，也不只是零散的幾樁個案，赤貧關係到一整個族群；必須全面看待，必須考量其中的每個家庭。這群人口，事實上包含著成人、小孩、老人和被孤立的人。這個運

譯註3：貝里·達衛是法國費加羅日報（Figaro）的記者。

動必須出現，赤貧者的歷史催促我們採取行動。時候到了，這個運動能夠追問整個社會，徹底質問、抗議它運作的正當性。一邊是一群絕望的百姓，一邊是不願任憑同胞繼續絕望的男男女女，兩個世界發生了某種連結。

形勢比人強，一連串事件促成了十分令人驚訝的結盟：被貶低的窮人和巴黎的富裕圈之間搭起了橋梁，而這富裕階層原本不認為自己對任何人有責任。我常回想這事，深信應該從中汲取教導。這些巴黎的名人——包括歐洲合作發展組織的高層官員——或許一開始以為自己不過是參加一種傳統的救助行動，但後來卻發現自己越涉越深。他們不僅在護衛一群難以護衛的族群，而且透過他們自己的一些創舉，也帶頭得罪了一些老牌仁慈組織，他們之中有幾位甚至感慨自問：是否任憑自己越陷越深？有些人起而反抗一些頗富聲望的機構，而這些機構正是由他們的親朋好友掌舵。面對自己的舒適生活圈，這種沒有前例可循的投身方式要引領他們走到哪裡去？他們甚至受到種種威脅。

面對自己的圈子，處境變得如此尷尬，這些名流有辦法長期忍受嗎？

有幾個人放棄了我們，其他人則成為赤膽忠心的朋友。我想他們全都學習到謙遜的功課。之前他們以為自己頗具影響力，暗箭與誹謗傷不到他們；不過一旦你和最貧窮的人站在一起，這一切就不那麼必然了。而且和窮人有關的行政決定層級通常很低，對諾

瓦集貧困區的命運擁有決定權的法國衛生部官員層級不高。這個由低階行政官員施展的權力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缺乏任何政治監控，連長期的監控都沒有。民主機制裡面的民意代表們對這群這麼缺乏「效率」的族群不感興趣（「效率」是當時非常流行的語言）。結果這群習慣和部會首長或企業界龍頭會面的朋友突然發現自己用牛刀在殺雞；爲了窮人，他們必須面對低階的公務員，而這些公務員經常充滿善意，但缺乏更寬闊的視野與能力。我們董事會的成員之一，一家大型飛機集團的第二把交椅，去到衛生部，有人命令他離開處長辦公室，否則就叫警衛來把他趕走。於是他很尷尬的和一位較低階的公務員會面，請她去餐廳吃飯；如果沒有這個插曲，這名公務員可能永遠都不知道諾瓦集貧困區的存在。我遇過很多可笑的類似情況，今日回想令人莞爾，但當時實在哭笑不得。種種誹謗是貧困家庭的家常便飯，這些過去習於安全與尊榮、優渥的朋友們也真實地嘗到了一小口，學到謙遜的功課。

一直到今天，第四世界的盟友，也就是積極投入這個運動的成員，他們的特質之一便是與窮困者分擔來自外界的羞辱。現在這些盟友清楚知道這點，而且也有了心理準備；但是第一批盟友全憑自己摸索，富裕的圈內人無法諒解他們，他們也沒辦法次次分析出個中緣由。

我很難想像這些人去到貧民窟，他們有機會跟那裡的家庭往來嗎？

他們親自來到營區，而且和那裡的家庭相遇。在那個年代，事情並不複雜，每個來拜訪的人都必然會遇到圍繞在我身邊的人；有些巴黎的朋友來營區參加彌撒，我們先是在一座權充祈禱室的冰窟祈禱，後來才蓋了一間小教堂。

但是來到現場，窮困赤裸裸攤在面前，對這些富裕的朋友來說也是另一種危險。因為怎麼抵擋誘惑，不讓自己因循舊習變成捐錢、施粥、給衣的救濟者？誘惑是強烈的，眼見這麼多愁苦與困頓，怎麼能夠不捨捨？弔詭的是，當我們不想用施捨來羞辱同胞時，就只能獻上自我，獻上生命。這個運動的盟友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此，他們不給自己施捨物資的藉口，讓獻出生命的持久志願者站在第一線，謙遜地讓自己站在第二線；過去如此，現在依然。

這些老朋友到現在還是朋友，至今依然存留在我腦海中的，是他們的信德；我找不到更適合的辭彙來表達他們的信任。他們眼見著這些家庭被巨大的沮喪攫獲，他們聽見嘶聲厲喊，聞到赤貧濃重的氣味；他們看我穿著褪色磨損的教袍，在晚禱時經常被打斷，被拉出去勸架，拳腳也落在我身上；他們來小教堂祈禱，但是經常被打鬧的小孩搞得不得安寧；講道的時候，不是這個先生就是那個爸爸出聲打斷，跟我說他們覺得很對。這一切其實可以讓這些來自巴黎十六區<sup>4</sup>的朋友感到不快，因為他們原本的生活圈是多麼

愜意與安寧，該區最長的幫浦路（Rue de la Pompe）上的西班牙小教堂充滿著虔誠的靜默。但是他們什麼也沒說，我們之間有一種共鳴，一種深刻的互信，不須多做解釋。

透過這些人，你最後就成功建立了一個被認可的運動？

運動的建立還是在持久志願者團體穩固之後才發生的事，在當時，我們先是成立了一個協會，符合法國一九〇一年頒布的社團法。還得一個勇於承擔的人來擔任主席才行，這個人就是安德勒·艾弟思（André Esse），一家大型企業的重要主管。

一九六〇年，安德勒·艾弟思透過一份週刊的報導得知諾瓦集的存在。同年的七月十四日，他送一包衣服來貧困區，我看到他開門下車，來不及問明來意，就請他提供緊急協助。因為營區一個男人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在酷暑中躺在一個床架上，背後已經長蛆，我跟他說：「您既然有車，請趕快幫忙找法醫來，我們一直連絡不上他。」安德勒·艾弟思做了我要求他做的，然後又向市政府申請埋葬許可證。等候許可下來的時間，他又幫我把死者抬到小教堂去，因為怎能讓孩子眼睜睜地在冰窟中守著屍體。因為市政府一直不肯支付喪葬費，我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才為這個男人出殯。我在小教堂主持殯

譯註4：巴黎第十六區通常被視為巴黎最富裕的部分，擁有一些法國最昂貴的房地產。

葬彌撒，安德勒·艾弟思也參加了，他看到老鼠在屍體周圍穿梭。

你看，這個人原本只是想送一包衣服給窮人，結果目睹了至死依然揮之不去的悲慘世界。第二天，我請他擔任我們協會的主席，他希望先回去詢問太太的同意，因為他意識到未來要承擔的將是一份非比尋常的任務。就這樣，透過一位市政府拒絕支付喪葬費的死者，我們找到了協會的第一任主席。對這些家庭與當時的志願者來說，這是我們展開公開活動的開端。

還有其他他跟安德勒一樣的盟友嗎？

一生二，二生三，他們很快就變得為數眾多。首批盟友之一是龐西翁（Brancion）女士，她是山木小姐和戴高樂·熱妮葉佛（Geneviève de Gaulle）s 的好友。一九五八年嚴冬，戴高樂夫人看到一排排的冰窟暴露在寒風中，以為自己重新回到雷文斯布鲁克集中營（Ravensbruck）<sup>6</sup>，二戰期間她曾經因為參加反納粹的抵抗運動被關押在此。她對我們一直不離不棄，現在她是我們法國第四世界運動的主席。

回顧當時這些盟友，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兩個共同點：他們既非在慈善機構任事的所謂的慈善家，也不是在教會扮演要角的宗教人士；這點恰恰可以解釋為何他們完全沒有這領域的人會有的偏見或定見。他們過去不曾參與任何介入諾瓦集營區的計畫，這就是

爲何他們的投入顯得質樸、清新且坦率。同理也可解釋首批的志願者，他們形塑了志願者聯盟。至於當時的我，對組織架構、法律問題以及組織公開活動的複雜性一無所知。

## 現有慈善機構的態度

你似乎不是那麼認同投入慈善機構的人？

這不是重點，第四世界要求我們嘗試未曾有過的創舉。必須像一張白紙一樣，這些家庭才能夠在上面寫下他們的理想；必須像海綿一樣易受滲透，全心聆聽，承認這些家庭是我們的導師。當時這些盟友沒有先入爲主的想法，有些人還是工程師，比方說羅傑·希西（Roger Siot）。他們根據實際狀況來做判斷，而不是硬套學理。他們都有很開闊的

譯註 5：戴高樂·熱妮葉佛（1920-2002）生於法國，戴高樂將軍的姪女。打從一九四〇年即加入抵抗運動，一九四三年被捕，先關押在福爾蘭監獄，接著轉送到雷文斯布魯克集中營。一九五八年，她參與了ATD 第四世界運動的創建，擔任這個運動的法國主席長達三十多年。

譯註 6：雷文斯布魯克集中營（Ravensbrück），是納粹德國時期的一個集中營，位於柏林以北九十公里附近。雷文斯布魯克集中營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啟用。關押對象多為婦女。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約有十萬名女囚在此關押，其中僅有約四萬名倖存。

視野，沒有人封閉在理論的井底。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在現存的機構中找不到好朋友，但是，對這些機構來說，如此困頓的族群繼續存在實在是難以回應的挑戰。也許是，我們這個當時還如此脆弱的ATD 協會（編案：「協助一切沮喪絕望者運動」，即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以自己臨在的方式，挑戰了他們慣有的模式。即便如此脆弱，我們讓他們處於不安的狀態。因為我們質疑全無赤貧者參與的各種組織結構，但是，我們並沒有提供答案。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各種機構可以順著那個方向找到答案的想法。在六〇年代，我們自己的生存都有困難，所以我們只能提出自己的追問與探詢。而當時這種情況不足以留住其他組織的朋友。

所以你們也沒有吸引到類似「天主教徒行動」或「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團體？

有些人以個人名義留下來了，和其他協會之間的結盟是後來才發生的事。首批留下來的人真是令人欽佩，因為他們在忠於傳統和投入新奮鬥間掙扎。有些人離開原來的組織加入我們，那些年我看到真實的掙扎，我想這樣的撕裂今天仍然持續發生。

細加思索，我想是對家庭的依戀，讓那些留下來的人如此強烈地凝聚在一起。在諾瓦集以及之後我們相繼投入的貧困區，我們發現，窮人最後的堡壘、最後的避風港，當然是家庭。家是他抵禦外界敵意、羞辱、排斥與自我毀滅的最後一道防線。那是他在風



雨中頑強挺立的最後棲身處。各種施捨與救濟以及最笨拙的助人行動都無法完全摧毀它。

教會花了一些時間才重新認識家庭。

教會並非重新去認識家庭，她一直有耶穌的家庭做為範例，比如聖家逃亡到埃及，教會就是這個在脆弱中被追殺的家庭。

總之，不管是不是信友，凝聚我們的，就是拒絕接受這些家庭被摧毀。你知道在那個時代，大家都說：「這些父母已經無藥可救；兒童，還可能救得起來。」這種思維一直流傳到今天。在拯救孩子的同時，卻摧毀他們的父母和家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草創時期，家庭的概念把我們凝聚在一起。最貧窮的人形成一群子民，這個概念對當時的志願者還有首批盟友來說，已經非常重要。不過對大部分的朋友來說，這還不是普遍的共識。有一天，有人跟我說：「如果他們是一群子民，這可是天大地的改變。」他想說的是：這想法改變了他生命的一切，他必須重新思考之前的態度與作為。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有這樣的發現。特別是在六〇年代初期，我們的朋友開始增加，卻還沒有發展出那樣的共識。讓我們連結在一起的，就是這個摧毀家庭、讓愛沒有出路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赤貧。

重讀自己過去書寫的泛黃信件，在那個年代發出的呼叫，我看到家庭這個概念的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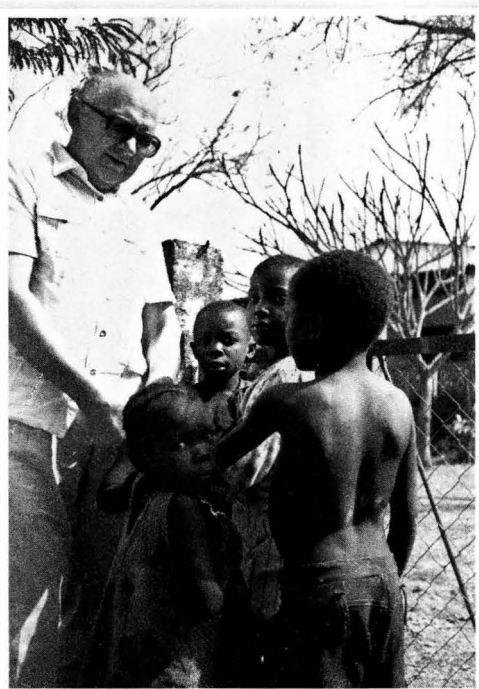
跡。這些信件不可小覷，一如「陶侃搬磚」、「愚公移山」，我們的運動就是靠著一封又一封的信，一個又一個朋友串連起來的。當然，身為神父，每個人都是珍貴的，這點從我寫信的方式約略可以看出來：經常在晚間，依靠福協（Foucher）及拔潔（Paget）兩位女士的協助，有時候寫到凌晨一、兩點。我很快就收到很多私人回函，並且一一回覆。這並不是一種負擔，對我來說，每一位新的通信者都是一個強有力的朋友。爲了家庭，我別無他途。對這些家庭來說，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朋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這個運動的運作方式一直非常個別化，用今天的用語來說就是「個人化」（personalized）。透過這些信，一整個世代，甚至是好幾代的人在表述自己，而且這樣的通信沒有中斷過。回望過去，在振筆描述這些家庭時，讓我感動的是那些人回應的方式。

今天，教會更新了她對家庭的護衛。依我看來，教會從未停止過她對家庭的關切，即使過去她不敢像今天這樣發言；而且我不認爲世間有任何人停止過對家庭的關切。不管怎樣，打從一九五七年開始，不論宗教信仰與政治信念爲何，這個運動最忠誠的朋友都相信家庭的價值。或許單憑家庭這個概念，就足以奠定我們奮鬥的基礎。這樣說還不夠，事實上我們中間已經有一些人分享了另一個信念：這些家庭是值得大家赴湯蹈火的族群，這個族群強烈需要一個願意終身投入的志願者團體。

第九章

「划向深處去，  
撒你們的網捕魚吧！」

離開原地，前往廣闊的海洋。



若瑟神父訪問中非的第四世界家庭。

吉爾·阿努以：

讓我們來談談第四世界志願團體。你創造了它，志願者對你非常重要，我猜在你心裡，他們跟第四世界家庭一樣有份量。但你談到他們時，卻好像他們和你有別，你說：「他們成就了一切，因為他們，我們才能夠……」

若瑟神父：

我召喚了他們，但他們打造自己，塑造了志願者團體。成爲神父時，我選了一個座右銘：「划向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sup>1</sup>對我來說，那意味著我並非漫無目的任意而行。「划向深處去」意味著離開原地前往廣闊的海洋，然後「撒下你的網」。埋根諾瓦集，和最貧窮的人同生共死，這在某種程度上和航向遠洋背道而馳，或許這也和我本性相違背。反正，無論我多麼真誠地想要如此做，神看得更遠，祂另有安排。祂領導我爲窮人做見證，並召喚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

一方面埋根底層，另一方面划向寬闊的海洋，兩者其實並不矛盾。我曾經一頭栽進諾瓦集的赤貧深處，也要求第一批志願者照樣做。但真心誠意埋根在一群如此窮困的百姓中，使我了解到：我們不可能真正地與赤貧者共赴死亡，除非這個死亡能給他們帶來復活；窮人自己必須成爲傳播人性的使者。事實上，雙手空空、手無寸鐵地投入一個如此匱乏的地方，迫使我比以往更甚地「划向寬闊的海洋」。

你召喚志願者；他們前來，而且跟隨了你的腳步。為什麼你說，他們將自己打造為一個志願者團體？

他們回應了我的呼叫；但我不是他們，他們必須打造自己。我們來自不同的生活圈，我可以告訴他們窮人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但他們必須依此重建自己的生活與思考。我可以引導他們，但沒辦法越俎代庖。我甚至無法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去安安靜靜打造自己；我總是讓他們不得喘息。他們才剛到，我就必須告訴他們，輪到他們出發到寬闊的海洋，分駐到其他貧困區。他們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彼此身上，成立自己的小集團，故步自封。划向寬闊的海洋意味著在甲板上度日，任憑海風四面吹襲。它也意味著和一群背景、年齡與信仰都不相同的男男女女一起生活。你可以想像在這樣的處境下打造一個志願者團體意味著什麼嗎？

我強調，的確是他們自己打造了這個志願者團體，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也沒有前例可循。

譯註1：《新約聖經》〈路加福音〉五：4。

## 涵容不同信仰的志願者團體

你召喚信仰各不相同的人組成志願者團體，這事有兩個矛盾的地方。首先，當你說教會是窮人的教會時，人們無法理解你為何在教會之外創立一個志願者團體。其次，極端貧窮的難題向大家提出的挑戰，不僅僅是行動的訴求，也是意識形態的召喚。這時，一個涵容不同信仰的志願者團體究竟意味著什麼？

如果你從赤貧者及一般人的角度來看，事情就變得比較簡單。看見一個由不同信仰與意識形態的男男女女形成一個志願者團體，是一種人性的基本需求，同時也是一種權利——處境最弱勢者的權利，他們有權成爲各種信仰與意識形態的核心。而且這也是每個人的權利，儘管存在著種種差異，仍能團結合一。藉著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夠參與的運動，我相信自己是以教會之名行動，遵從耶穌向天父的祈禱：「願衆人都合而爲一。」<sup>2</sup> 這對我、對志願者，或是對那些從旁觀察我們的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了解的事。老實說，我相信只有貧窮的家庭可以理解。一個出自教會的事工，卻在她的外圍另闢天地，而且切願這個新創的團體完全屬於每個人，這意味著對人有著無邊的信心；這種信任要有感染力才行。教會信任了我，我也把自己交由她引導，就這樣，有一天，我發現自己

在她的牆外做工。牆外是無人的荒野，我號召其他人加入，但是我們沒有太多前例可資借鏡。

即使是在教會外行動，你還是一樣在建設教會？

我切望如此。在這個運動，其他人按照他們的想法和信仰與我一起搬磚。從一開始，我們就力行平等，我切盼永遠如此。基督徒藉著認同基督的赤貧，試圖貫徹自己的信仰；其他人同樣試著貫徹自己所思所望。我們之所以能夠超越差異，團結一致，是因為我們選擇了同一個見證人。最貧窮的人就是我們是否真誠的見證人，他們所見證的不是我們的聰明才智，而是我們的真誠，也就是我們做人的品質。

在第四世界，我們不是宗教合一運動（ecumenism）的專家。我們試著日復一日活出團結合一，不是經由信仰的內容尋求合一，而是藉由真誠、藉由每個人貫徹自己對赤貧者的投身。合一早已實現了，它就在最貧窮的家庭中。把舵轉向他們，我們必然都會合而為一，平等相待。

一到諾瓦集，我就想替所有懷抱善意的人提供一個相遇的平台。基督徒並非經常意

譯註 2：《新約聖經》〈若望福音（約翰福音）〉十七：21。

識到自己是多麼幸運。打從搖籃開始，他們就學習到：重點不在服務他人，而是與他人合一共融。從孩提開始，他們就學習要愛人如己，也學習到：光是服務、團結關懷與投身還不夠，還必須捨身忘我，好讓他人得以成長。

這點只對天主教徒有特別意義嗎？

這是他們特有的一種敏感度，是天賜的良機，不過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在這個運動與志願者團體中，每個人以其本然的樣子被接納，每個人也與他人分享自己本然的面貌。重要的是彼此的真誠，誰都不該好為人師，每個人都要敏於聽教，而且由同一個老師授課。以窮人為師不只是教會的要求；第四世界運動的志願者努力讓它成爲要求自身真誠的參考。

在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在累積了許多經驗後，你可以這樣說，但是，針對第一批志願者又怎麼說？

我們所言所行，都來自赤貧家庭親自口授。必須依照他們生命的實際處境來生活與回應，唯有如此，我們才有辦法把事情解釋清楚。一開始，我們只是分享了一個共通的意願：要以這些家庭爲核心，和他們團結合一。我們的團結植根於一種體認：如果我們



想與這些家庭合一，彼此卻不合一，是沒有意義的。第四世界對志願者團體的需要是這樣的顯而易見，因此，這個團體必須成爲一個歷史事實。

第一批志願者都是清一色的年輕女性。在早期，要有很多的愛，要願意接受許多風險，並且看得夠遠：不只測度這些家庭所忍受的痛苦，也尋思這些父母和他們孩子的未來。爲了一個可能只是想像與盼望的未來，必須棄絕許多東西，甘冒前途黯淡的風險。她們的親戚朋友篤定斷言：「妳是在浪費生命！妳做的事沒有前途！」面對這些質疑，志願者無法辯駁，也提不出相反的證明。她們的投身是對人、對生命下了賭注。這召喚我們超越平凡，進行想像與創造。也許是這個原因，一直到一九六五還是一九六六年，才有男性的志願者加入，當時，最艱險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這些女性彼此的社會、文化背景、信仰與國籍都非常不一樣，原本在自己的生活圈都過著充實的生活，擔負各樣的責任，習於團隊合作。她們不會讓自己掉入競爭對立、與人衝突或抽象討論的陷阱裡。日復一日，她們鋪設志願者團體的基石，是她們創建了這個運動。

我說過，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伯娜德·果紐爾（Bernadette Cornau）是法國人，艾瑞卡（Erika）來自德國，法蘭絲（Francine）是比利時人，奧莉雯（Alwind de Vos）則來自荷蘭。是伯娜德這位法國女性催促我們貫徹合一。她不只不相信教會，而且根本

就無法忍受教會，諷刺的是，我偏偏是個神父！一開始，她每個週末都來當義工，她的假期也都給了貧困區的孩子。就像其他志願者一樣，她也花了一段時間才決定離開原來的工作，來到這裡，過團體生活。與所有人一樣，加入志願者團體對她來說是一種考驗。在那個初期階段，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樣，但她們對未來都有某種預感。此外，伯娜德之所以花了一段時間才做出決定，也因為她生性正直，她跟我說：「我沒有辦法留下來，首先，我有自己的生活要過，而且我心有所屬。再加上，您是個神父，我卻不信任，而且我不贊同教會。如果這些孩子跟我談起宗教，我必須跟他們說真話，這樣一來，我的作為就和您相互矛盾。」我告訴她，讓這些孩子有機會遇見真誠相待，看法互異但又能相輔相成並貫徹到底的人，非常重要。不過，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伯娜德一開始也是逃避，聽從公司安排外派到英國。然後，有一天，在沒有任何預兆下，她回來了，離開她的家庭、愛人與專業，加入了我們。

伯娜德仍然是一個體現尊重不同意見的典範，不僅如此，她也信任想法和自己互異的人，信任到把自己的未來交託在他們手中。事實上，加入這個醞釀中的志願者團體，從一開始就意味著：讓自己的生命不但由赤貧者所支配，也交在其他志願者手中，而這些人和你的思維方式不盡相同。這意味著不替自己保留任何安全感。當你與想法互異的人分享生活時，你很難想像這個決定所要求的信任，以及需要承擔的風險。就某種程度

來說，這就像交出自己，完全捨棄自己，把自己放在與赤貧者類似的境況中。也許這就是爲什麼志願者團體在一開始引來那麼多的讚賞，同時，也招致了那麼多的質疑。

## 終身志願者

除了伯娜德·果紐爾，其他人的狀況如何呢？

艾瑞卡·萬德（Erika Wandelt）是德國人，路德教派的教友，擁有語言博士學位。她當時十八歲，到法國來提升她的法語能力。某個午后她來到諾瓦集營區，之後兩年，她的寒暑假都和我們一起度過。然後，她開始感到畏懼，沒有再回來。但是，完成學業後，她加入了志願者團體。又過了兩年，她結了婚，和丈夫搬到一個人間地獄：德國哈士塔市（Rastatt），一個廢棄的軍營，那裡住了一些被稱爲「不適應社會生活」的家庭，當時法國也給貧窮家庭貼上這樣的標籤。面對這些家庭，德國當局給的不是一般住房，而是臨時住所。住在那裡的時候，艾瑞卡生下兩個孩子，並且皈依爲天主教徒。幾年前她因爲癌症過世，一直到最後，她仍然忠於她平安喜樂的行事態度，請人把赤貧家庭的

譯註 3：哈士塔市（Rastatt）位於德國與法國邊界。

卷宗帶到病榻前。藉著不斷更新這些紀錄，她知道自已為窮人留下歷史，也為他們的解放做出貢獻。

此外，還有來自比利時的法蘭絲·第狄順（Francine Didisheim），父親是猶太人，血液裡流著整個猶太人的文化與特質。和荷蘭的奧莉雯·佛絲一樣，法蘭絲後來也皈依了天主教；奧莉雯是荷蘭首批女性外交官之一。這些女性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和自主的精神。她們和過去劃下句點，卻無法向親友提出太多的解釋。當時，志願者團體和這個運動都還在草創時期，這些女性離開原來的生活圈和自己的專業，到底是為了什麼？要走到哪裡去？她們需要堅定的信念，才不至於不被他人的意見所動搖，也才能有勇氣面對惡意批評與誤解。每當我想起這批拓荒的志願者，心中無法不升起滿滿的情感與深深的感謝。

很難想像這些女性在放棄自己的專業與生活條件時，卻無法清楚解釋自己選擇了另一條生命路徑，她們如何為自己所採取的行動辯護？

她們沒有提出辯護；除了這些家庭，沒有其他能夠被接受的辯護。我已經說過，這些家庭被送到諾瓦集，不是出於計畫，而是由於赤貧與苦難。對首批志願者及一九六八年前以前加入志願者團體的人來說，是這些家庭的痛苦讓他們留下來。因為一直到一九六

八年，由於沒有其他合適的地方，我們只能在諾瓦集營區接待大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所有來過諾瓦集的人都渴望成爲志願者並留下來。數以百計的成人與年輕人來來去去；那些留下來成爲志願者的人，我想，都是被苦難深深觸動的人。人人皆有惻隱之心，你不可能長期看著旁人受苦卻無動於衷。你要不就因爲他們令你難以招架而決定棄之不顧，要不就把他們的苦當做自己的苦，與他們一起承擔，以求除卻這些苦痛。

我想舉一個比利時老師佳碧葉·艾必肯（Gabrielle Epicum）的例子。某年的萬聖節，她來營區待了一整個下午，她想吸引一群孩子參加活動，他們卻讓她非常難堪：罵她髒話，丟她石頭。她黯然回到比利時，覺得自己再也不能獨自享受從家庭、信仰、教育及親友那裡領受的種種。她發現到，營區孩子的父母飽受赤貧煩擾，永遠也沒辦法讓孩子領受那些財富。這樣的不公義讓她無法忍受，這樣的憤慨啓發了她，也激勵所有早期的志願者留下。她們詰問自己：爲什麼是我？爲什麼不是他們？爲了回答自己的追問，她們決定貫徹到底，如同福音所說的：「你們白白領受的，也要白白施予，不求自己的利益」。4事實上，這些志願者以非革命的方式開啓了一種社會雛型：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首要的義務是將自己所領受的歸還給其他人，一個「何必曰利」的社會雛型。瑪莉·

譯註 4：《新約聖經》〈馬竇福音（馬太福音）〉十：8。

何拔力提 (Mary Rabagliati) 的例子可以說明這點，她十九歲來到諾瓦集後，就拒絕回到倫敦，因為她不想把自己的一生花在賺錢上面。

面對第四世界，只有一種選擇：要麼，把他們排擠在我們的生活圈以外，把他們當成愚夫愚婦，因為他們的處境和言行舉止在我們眼中顯得難以忍受；我們不把他們當人看，甚至剝削他們，這是用變相的方式來否認他們是同胞。或者，我們拒絕揮霍自己從家庭、社會、環境、朋友和上天那裡所領受的一切；讓那些分毫未曾領受的人能獲得灌溉、枝繁葉茂，這個選擇貌似喪失，實是獲得，因為他人也能獲得的時候，我們就收割了更多的愛。如果可能，我們甚至希望他們的收穫超過我們所領受的。我們不願繼續從既得的優勢中得利。我們只想付出，不求回報。這種想要恢復正義的意志不是烏托邦。志願者團體試圖活出這個志向，並為這個正義而奮鬥。

志願者不但擁有被充分肯定的各種權利，也有辦法為自己爭取權利。他們也可以為了他人而使用這些權利——爲了那些被安置在社會住宅的家庭，那些因爲失業而終日無所事事的男人，那些目睹孩子忍飢受餓的父親，以及他們鬱鬱寡歡、看不到未來的妻子。這些人的權利都被否定、被剝奪了，這證明了權利的獲得並非天生自然，光是生存著這個事實，並不足以獲得人權；權利必須得到其他人的認可方能存在。這些志願者不只揭露了這個事實，更翻轉了這個處境。他們善用自己的自由與權利，好讓赤貧者在他們的

生命中、在志願者團體的天命中，保有一個最重要的位子。這和我稍早提過的並無二致，在苦人所苦的同時，不可能不去分享他們的希望。你衷心希望他們能停止受苦，你恨不得他們的情況馬上改善。你不可能與他們同死，卻不和他們一起復活。我認為志願者團體藉著他們的存在與行動，建立並實現赤貧者的權利。這個團體是社會計畫的起點與核心。這個計畫已經開始實現。

## 發生了什麼變化

你所說的概念，聽起來很抽象。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家庭的生活發生了什麼改變？志願者又採取了什麼具體行動嗎？

這些家庭經常期待我們以教育者或是社工員的姿態出現。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於是，在他們的期待下，我們設立了學前學校、醫療站與文化站、職業訓練工作坊，還有識字課程。這個運動的分支，塔波里兒童運動（Tapori）<sup>5</sup>，和第四世界青年運動以及青年的知識俱樂部，都來自同樣的發想。各種會議、遊行以及各式各樣能夠讓這些家庭公

譯註 5：這是若瑟神父於一九六七年發起的國際性兒童運動，透過這個運動，希望不同生活圈的孩子能與最貧窮的兒童建立友誼與團結關懷的聯繫。參見 <http://www.tapori.org/>

開表達自己的活動，在在讓他們練習表達自己，和別人一起思考以達成共識，這些都出自工會的精神。

這些行動的目的，是希望別人也能擁有我們所承繼的種種遺惠。想要早日目睹這些家庭成爲權利的主體，就必須具體投入人群，置身在第四世界的家庭中間，同時與社會連結。這樣的志向引領我們三頭並進：一方面揭露他們的權利被侵犯的事實，一方面重建這些權利，並同時敦促其他人承認赤貧者理應享有的權利。這一直是雙重的努力：你與我都擁有了，他們卻沒有；你與我的權利都被肯定了，卻沒有任何人替他們說話。接下來的追問也是雙重的：我們打算怎麼辦？你要與我們做些什麼，好讓他們重獲正義？我們擁有的比需要的多，面對那些晚飯沒著落的家庭，你打算和我們一起做什麼，好讓他們有飯可吃？我們的孩子順利升上大學，而你與我，我們可以做什麼，好讓連讀寫都不會的孩子學到一技之長？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向別人提出異議，不會有動人的力量。除了揭發事實，還必須化爲行動，讓人看到，赤貧的消滅是可能的。我們的運動展開行動，以激勵別人也開始動員。這就是爲何我們要發起這些「見證性計畫」，以證明恢復窮人的權利是可能的。渴望成爲權利主體的家庭當然也加入這場奮鬥，爲權利獲得肯認奔走。第四世界在底層展開的各種行動都是在聲張人權，爲了這些家庭，爲了志願者團體，也爲了這個社會。這些行動在揭發不義的同時，重修正義，不信正義喚不回。



我曾經說過，第四世界是感恩祭（Eucharist）的一部分，因為它繼續不斷重現基督的受難與復活。的確，它一直做見證，不僅見證人類在最惡劣的處境中掙扎求生的意志，也見證他宣告尊嚴的決志。第四世界的家庭用千百種方式，不斷重申：一個人，不管處境多麼悲慘，繼續渴盼成為有用的人，不願被隔絕於政治、宗教與文化生活之外。我沒見過任何一個人願意被看不起，願意被視為劣等。人們要的並不是一個象徵性、缺乏實質內涵的尊重；他們不想被「犧牲」（*christified*）。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有一個不必寄人籬下的居所，一門真正的技能，一個能夠被社會認可的勞工身分，這樣一來，他們可以說：「我是泥水匠，我是板金工，我對社會有貢獻，所以，在政治參與上也有我的角色。」與赤貧者分擔苦痛，帶領我們奮鬥，好讓社會承認他們確實是權利的主體。

譯註 6：在天主教會的感恩祭（Eucharist）中，麵餅成為耶穌的身體，酒成為耶穌的血。信友在感恩祭中，體驗到經過死亡及復活的耶穌基督的臨在。參見：《神學詞語彙編》，頁三五—。台北：光啟文化事業。二〇〇五。

## 嶄新的社會模型

在諾瓦集剛開始的那幾年，你不太可能開展這樣的計畫？

我記得，我和第一批志願者很早就意識到：必須活出另一種社會模型，具體見證這些家庭啓發我們形塑的那種社會。他們教導了我們兩件必要的事：時時刻刻捨得放下，好能以另一種方式得到富足；以及尋找一種共生共榮的生活方式，以見證另一種社會的可能性。

從那時起，我們的行動聚焦於家庭，以及任何可以鞏固家庭的元素。就像我說過的，從一開始，我們就想成爲一個家庭性的運動，一個可以支撐家庭的希望的運動，支撐他們對於彼此相愛所懷抱的深刻期待。我們遭逢許多反對聲浪，因爲當時的社會越來越不信任家庭，特別是這些貧困的家庭。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是單單對家庭下賭注。這些志願者相信家庭的價值，因爲他們親眼看到，所以確信若不重申家庭的價值，不可能讓第四世界獲得解放。這個事實如此真切，因此，「家庭」已經成爲志願者的特別用語，指的是處於最底層的整個族群。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慢慢發展的用語中的第一個語彙。「家庭」指的便是最貧窮的人、比無產階級更底層的族群，以及融合其中的運動本身。

的確，這個運動使用了一種特別的語言。事實上，你們也因此遭致批評，不少人說你們異口同聲：「無論聽張三，還是聽李四，都是同一套言詞……」

就某些基本的選擇來說，這是真的。不過，正因為我們的處境並不尋常，所以大家不必感到驚訝。某些聆聽我們主張的人，發現這些基本信念有時與主流的看法背道而馳，或許會覺得左右為難。

除了特別關注家庭之外，我們的基本信念也明確主張要以最貧窮的人為優先，要讓位給最貧窮的人。不只是在我們的生活中以第四世界為優先，在第四世界內也是如此：那個最消沉的街友，那個社區中最破碎、最被輕視的家庭，必須是志願者團隊存在與所有努力的核心。志願者總是說，如果這些和貧窮家庭一起實施的計畫只對團體中最有活力的成員有好處，如果我們容許某些人以全體為代價獲得利益，因此破壞彼此的團結關懷，或是導致強者獨善其身，抽離自己所屬的群體，那麼這些計畫便失去價值。如果一個計畫拋棄最弱勢的人，這樣的行動有什麼價值？如果我們責難這個社會以各種標準選擇性地排斥最貧窮的同胞，自己卻在行動中重蹈覆轍，那有什麼意義？為了走向一個新社會，我們的努力必須使得最強的站在最弱的這一邊。這是個很難達成的目標，而且我們只獲得非常片面的成就。然而，這是所有志願者想要奮力追求的目標；這就是他們的力量所在，而他們扮演的角色不容爭論。

## 窮人與家庭優先

我不禁想說，在六〇年代那個「榮景空前的社會」裡，你卻強調家庭，強調把窮人置於優先，這擺明了是自找麻煩。

這不是我們憑空杜撰的。這些家庭以及他們的生存處境，耳提面命，敦促我們成爲一個家庭運動，而且把最貧窮的人置於核心，做爲一切行動的驅力。對志願者來說，這是絕對必要，不是他們自己憑空發想出來的。另一個絕對的必要，也在當時若隱若現：向世界揭露這些家庭的存在，以及不斷受苦的事實。這個任務縈繞我心，而這些志願者心領神會，分擔我的牽掛。

成爲見證人，首先要見證的是這些家庭的生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驅迫、他們受苦的緣由，以及他們拒絕承受的種種。決心要宣示他們的希望以及能力，是後來的事。首先，我憂心忡忡地想要說服權威人士和大衆輿論：這些家庭是一面明鏡，反映出社會與歷史的不公不義。但是，我不是讀書人，而且天生是個行動者，不善於研究。雖然我努力想要提高自己的論理能力，發展我的知識，但我們所需要的，遠比這些更多，我們需要科學的論據。就這樣，某個寒冬的新年，奧莉雯·佛絲來到這裡，我要她把外界送來

的救濟衣物分門別類。然後，她問我：「接下來我要做什麼？」我要她去進行研究。她大吃一驚，就像安德勒·艾弟思一樣，原本他只是來贈送衣物，我卻要他照料一位死者，接著又請他擔任協會的主席。因為奧莉雯擁有外交官身分，我要她去研究其他國家發生的事，這個要求讓她陷入沉思。因為她是荷蘭人，隔天我請她幫忙接待一位荷蘭記者。她因此了解到，想要說服別人，想要解釋清楚，自己必須先有足夠的認識。研究中心就這樣誕生了，第一個由法國抵抗赤貧的協會所創辦的研究中心。

為了回應貧民窟的存在而成立的研究機構，誰能理解這樣的作為呢？

草創時期，在一片不叫好的聲浪中，這個研究機構赤手空拳，不是沒有淚水。奧莉雯開始在信紙上替自己印上「社會研究室」的字樣，接著她開始做她的專業教導她的事：推動公共關係，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荷蘭組織一個研究參訪團，緊接著舉辦一個國際研討會。她邀請專家到諾瓦集來，我們只好就地提供食宿；一些研究小組的研討工作就在簡陋的鐵皮屋進行，大家就坐在堆疊起來的床墊上。

你的提醒一點也沒錯，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法國，研究貧窮不被看好。光是提出「貧窮」這個詞，就會被潑冷水。在巴黎家庭津貼總局，他們比較喜歡用「社會失調」的詞語，他們給首批志願者的評語則是：「這肯定是另一波為窮人施粥捨衣的善男信女」。

其他人則認為，研究貧窮是一種剝削貧窮家庭的方式。這種毀謗與敵意反而讓當時為數不多的志願者更加緊密團結。

她們難道不會被動搖，然後漸漸被懷疑所擊倒嗎？

每位志願者肯定都會經懷疑過，有些人多次徘徊，去了又來。但是，每當有人陷入懷疑，其他人就會繼續堅持。她們互相支持，所以整個團體維持下來，而且日漸茁壯。

在六〇年代初期，我們稱之為慘淡時期，我們不屈不撓的決心來自一項特別的訓練：每天的觀察日誌，還有共同的研究。在一次英國參訪後，我建議志願者開始書寫每天的觀察日誌。我在波納多之家（Barnardo's Home）見識到家庭的檔案紀錄，那個機構旨在安置遭遇困境的家庭。我的想法是，每天傍晚寫下這些家庭在白天告訴我們，或是讓我們發現的事情，好讓我們重新思量每個動作、每句話，還有發生的每件事，書寫幫助我們內化這一切。我想像一種完全划向這些家庭的日常省察。然後，約翰·拉本思教授（Jean Labbens）<sup>7</sup>來到我們中間，他教導我們如何把這樣的實踐轉化為一種更有系統的研究。我們一起決定，把所有的友誼，所提供的服務，所有的交流都記錄下來。在當時，大約是一九六三年，我們也記錄歷代所有與底層有關的任何事。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開始將他們帶入其他人的歷史，進入人類的歷史。

我們常說，那是我們「行動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一起走一條長路，有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讓這些家庭有機會訴說自己的歷史，他們的父母以及祖父母的歷史，並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的生活經驗是令人敬佩的。當這些家庭告訴我們越來越多關於他們過去的故事時，我們越發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們越是專注，他們就透露更多自己的歷史。藉由口述重新走過這些歷史，對自己的經歷感到驕傲而非羞愧，是這個運動當時非常突出的方法學。在他們中間工作的志願者得到他們的信賴，這樣的信任說服他們，他們所分享的，正是在替自己維護權益。過去，這些家庭被社福單位問過千百種問題，他們得回答許多行政上的追問審查；這一切，在在強迫他們暴露自己的短處。社會調查人員對他們是那麼缺乏尊重，甚至侵犯他們的隱私，一些詢問變成圈套：「你和鄰居處得好嗎？你希望他們和你一起搬遷嗎？」研究的科學社群扮演起行政管理者的角色，敗壞了自己的名聲；他們一心想要證明法國的窮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共同歷史，並且主張他們不是貧窮，而是生病，或意志軟弱。經歷過這些可恥的調查之後，這些家庭被籠罩在羞愧的餘波中，要怎麼重新開啓對話呢？這都要歸功於這些家庭以及那個時期的志願者，充滿耐心的同舟共濟，一起重建這些家庭的歷史真相。

譯註7：約翰·拉本思生於一九一二年，法國里昂天主教學院的教授，在該院創立社會學研究中心。

對志願者團體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時光，他們讓自己成爲赤貧者的歷史學家。一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志願者繼續獻身書寫第四世界的歷史。我不知道今天在受苦現場的志願者有沒有傳承這樣的熱情：和這些家庭發現一個從未被正確表述的過去。

這個罕見的熱情，對家庭和志願者來說，都是喜悅的來源：要有多大的福樂，才能發現這樣一個充滿生存意志的歷史，那種護衛尊嚴、維護家庭權利的硬頸精神。還有每次談到爲了生存，爲了抵擋社會結構與政府服務的不公不義而發明出來的種種招數，就感到自豪。

我跟你提過苦痛的分擔，但我們也共享了種種發現的喜悅和許多幽默的趣事。要多麼豐富的想像力，要使出多少把戲，才能在資格審查時拐個彎，既不會失去濟助，也不至於被慈善團體訓斥說教。還有，原本失去聯繫的親人，在重新探尋家族歷史後，親情得以重新連結，與父母或姊妹團圓，真是不亦樂乎。在六〇年代，志願者的生活充滿了喜悅，他們會在週六晚上到馬恩河畔（River Maine）跳舞，放假的時候去愛爾蘭、以色列或非洲旅行，雖然口袋裡只有幾塊法郎。不認識志願者的人，會以爲他們個個心情沉重，最後卻發現他們年輕、幽默，充滿幹勁與膽識。

看來你對整個運動的努力賦予相當的份量，我注意到你們的研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受



到重視。

我們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結果，在六〇年代初期，誰會想在富裕國家舉辦探究貧窮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聯合國對這個提議感到驚訝，但願意被說服。一旦被說服，它就一直是第四世界並肩作戰的盟友。從此以後，我們的運動和聯合國這個專業部門繼續並肩奮鬥。幾年之後，它授與第四世界正式的諮詢地位。

不過，在這些會議裡面，我們強調的並非我們的研究，而是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讓其他人認識我們，進行說服，透過不容置疑的公開活動建立聲望，好讓其他人也投身涉入。這是一場硬仗，所以我們必須保護這些成果，就某種程度來說，好讓它們變成無可反駁的。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八三年，我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或與其合辦了五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每場研討會之後，我們可以說：「我們不是唯一聲明這些主張的人，這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學術研討會提出來的。」

聽起來有點天真，但從政治的層次來說，這個策略不但有效，而且相當實際。透過這樣的方式，擁有威望的人士或機構將他們的威信借給一群沒有聲望的人。例如學術圈的約翰·拉本思教授和克里斯汀·德布思特（Christian Debyst）教授，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機構，都慢慢給我們加持，和我們共冒風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甚至以我們的團隊在第一線收集到的資料為基礎，揭露工業化國

家的文盲狀況。

你常常提到採取立場得冒風險，今天，談論貧窮還有受牽連的風險嗎？

辨認出其他人不願看見的現象，就是在採取立場，讓自己涉入。我可以說，那些年我們投注心力，和一個又一個公務員交涉，因此得以認識並影響一些國家與國際機構的行政部門。就這點來說，那些國際會議幫了很多忙。

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舉行的第一場研討會，爲了得到認可，我們必須與法國當局所使用的語彙妥協。他們不喜歡我們討論貧窮，而我們無法接受「反社會」與「問題家庭」這些西歐國家當時慣用的辭彙，我們接受了「適應不良的家庭」這個折衷的字眼。在這個研討會之後，我們組織了一個正式的研究小組，公部門也有參與。從那時起，對貧窮進行研究的想法被接受了，我們也開始稱呼自己「科學與服務的團隊」。但是，有些人以貶抑的口吻說志願者是「利用貧窮家庭的科學家」。「貧窮」這個辭彙在一九七〇年代才真正浮出檯面，美國政府於一九六五年所帶領的「對貧窮宣戰」，大大地幫助我們進行辭彙的改變，正名之後，也就帶動了想法的改變。

爲了讓大家承認赤貧族群，志願者團體必須在各個領域耐心奮鬥，這個團體也因此得到塑造、鍛鍊與穩固。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天，這個團體甦醒過來，覺得自己不再只

是「科學與服務團隊」，而是人權的護衛者。分享赤貧族群的生活，再次推動這個團體，這回走向人權的領域。

## 變為人權團體

一個貧窮的志願者團體置身在窮人中間，後來轉變成倡議人權的團體，有些人會問這葫蘆裡面到底賣什麼藥。

志願者團體經歷了幾個階段，首先是與貧窮家庭的共融，同甘共苦的情誼。在那個時期，甚至有人說他們是悲慘主義者，說他們過於強調社會的陰暗面；旁人質疑：你們把自己淹沒在痛苦與混亂的赤貧泥沼中，有什麼用呢？在六〇年代，我們的行動延伸到巴黎東北郊的康波貧民窟（La Campa），往北進到史坦（Stains）垃圾場邊的「櫻桃園」貧困區（La Cerisais），不久之後，延展到紐約。在那個時期，我們談了許多貧窮家庭的痛苦，所以，如果人們認為我們是悲慘主義者，是可以理解的。

在那以後，你們改變了嗎？

我想，我們往前邁進了。發生學潮和大罷工的一九六八年。非常關鍵，那一年，我

們有一個與其他年代不同的經驗。在那時候，就像一九三六年一樣，大部分的勞工階層都認為那是一個重新獲得解放的年代，就要邁向一個更公義的社會。事實上，在低收入住宅社區，我們發現赤貧者不只權利被剝奪，他們也被排除在維權的奮鬥之外。他們在每個地方都缺席了，也沒有代表。在一九六八年，我們開始公開談論「族群」的概念，以及他們擁有代表的權利。

赤貧者有加入街頭抗議嗎？

一些比較年輕的加入了，樂於把握融入他人的機會。但大部分的人沒辦法有行動，他們被飢餓苦苦折磨。於是我們了解到，要參與奮鬥，你不能是個「飢寒交迫」的人，你得有點本錢才行。這段時間，最貧窮的人失去他們千辛萬苦才找到的工作，而各種補助與津貼卻都停止發放。我看到，在許多個貧困區，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家必須靠著偷竊與救濟物資過活。市政府的社會服務部門原本應該優先支持這些家庭，卻以他們並非正規勞工為藉口，不提供任何補助。

有時，大學生會帶著罷工工人吃剩的冷飯殘羹到貧民窟，這些食物常常都已經變味了。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們送來一箱已經快要腐敗的魚。這些魚被丟在地上，居民卻爭相搶奪，大家都想分到一份。多年置身在赤貧子民中間，我還很少經歷過這麼強烈的感

受，感受到他們被同一種匱乏與羞辱纏綁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的五、六月對貧困區的居民來說，是飢餓肆虐的月份。七月十四號法國國慶，我們在史坦的櫻桃園貧困區舉辦了第一個人權節。五月我們就已經展開一個「下放知識到街頭」的學生運動；爲了國慶日的活動，學生編寫並上演了一齣舞台劇，描寫最貧窮的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故事。我們的志願者團體真正成爲人權的護衛者。

這些家庭肯定沒辦法產生足夠的政治意識來參與這類的抗爭，這樣一來，你們的行動不就超出這些家庭能力所及，也就放棄了你們的初衷？

窮人缺乏政治意識是富人發明的神話。對那些長期被迫面對具體困境，以維護生存與尊嚴的男男女女來說，如果我們引用抽象的理論來處理政治問題，肯定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但是，只要你和他們坐下來一起分享並分析真實的生命處境，你就能意識到第四世界家庭對政治的現實有著多麼透徹的理解，這也向我們揭露了其他舒適生活圈的人過於抽象與不切實際的程度。

所以，你也大可追問，爲什麼我們沒有早一點處理人權的議題；對赤貧者不聞不問的情況，以及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缺席，不是由來已久嗎？確實是這樣，第四世界的孩

譯註8：一九六八年五月在法國巴黎發生的大規模學潮，後來導致全國性的大型罷課、罷工事件。

子在學校飽嘗挫敗，學校卻一直不痛不癢，繼續如常運行。一如工會一直沒有最底層的勞工參與，它還是如常運作。窮人沒上教會，教會的禮拜與儀式依然如常進行；商界也不擔心他們單薄的消費能力。赤貧者在各個生活領域長期缺席的情況，是一種存在已久的事實，大家變得習以為常；我們當然必須詰問自己，要從哪裡開始著手。這個運動必須先和這些家庭一起目睹並共同經歷風雨，才有辦法同舟共濟，也就是親眼目睹政治新自由主義者漠視赤貧者的存在，不但放棄他們，甚至還污辱他們。

這個令人無法忍受的處境迫使我们改變航向，在這些家庭的推動與同意下，我們決定轉向。飢荒迫使我们募集捐款與食物，我們邀請家庭組成社區自治委員會，按照每個人的需要，統籌善款與食物的分配。這是第一次，在法國最貧困的社區，實踐了責任的共同分擔。大家一起在社區廣場討論，核心議題是：應該優先考慮最貧窮的、餓得最嚴重的以及最受忽視的兒童。在那幾個星期，我們所到之處，這些家庭都以非常可敬的方式來執行這些任務。在過程中，他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族群。那些已經認識我們很久的家庭，認為我們自然應該將行動擴展到其他的貧困區。不同地方的居民交流彼此想要申訴的內容。多年以來，我們已經了解，我們的使命是讓這個族群走出陰影，幫助他們在歷史上印刻出自己的身分，承擔自己面對其他公民的角色。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和六月形成一種氛圍，讓我們將這些目標化為實踐人權的行動。處於這種新氣氛，發現這

個新工具以及新策略，志願者團體也變得更穩固。

從那時候起，志願者團體獲得嶄新的視野，他們再也不能容許人權被系統性地窄化成公民與政治自由權。第四世界教導我們看見，這樣窄化的人權完全是杜撰出來的，這個現象到八〇年代還十分普遍。談論政治自由，卻不重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權利，對舒適生活圈的人來說或許頗為高尚，但對勞工階級，特別是赤貧者來說，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就開始揭露各種所謂人權運動的狹隘性格，這些運動把人權簡化為政治權利。

## 關於政治面向

這樣做的時候，你就走向具有政治性質的道路。在當時，你能夠衡量出採取這種立場的危險嗎？尤其是將某些政治選擇強加在窮人身上？

我不知道政治活動與派別政治的確切界線在哪裡。這個運動與志願者團體並不是在一九六八年才有了政治面向，從一開始，這個面向就存在了，否則他們不會讓許多人不安，也不會被那麼多人毀謗。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志願者團體毫不保留地參與了政治行動與抗爭。那時，志願者追隨了杜傅尼·德·維力耶的腳步，他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匯編

了〈陳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提交至三級會議。出於同樣的精神，我們收集了來自法國與西班牙那瓦拉省各個貧困區的「陳情書」，並將它出版，書名是《這群子民發聲了》(Un Peuple Parle)。從那時起，第四世界運動就在法國每個地方性、全國性或歐洲層級的選舉活動中出現。不過，或許問題重點不在於我們的政治活動要深入到什麼程度，而是這一切是否植根於赤貧族群的熱望。如果不是這樣，有什麼能夠保證我們可以秉持初衷，也就是立基於他們主要的渴望之上？有什麼能夠避免我們陷入褊狹的抗爭，或是黨派之爭，最後甚至轉變成為對赤貧者的政治宰制？

在今天，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什麼？志願者團體給自己怎樣的保證呢？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著終極的對策。我們可以說，這些家庭本身就是保證，但就連這點，也不確定。我曾經說過，他們在現存的結構中並不自在。他們無法真正地和這些結構對質，因為這些結構兀自運作，無視於他們的存在。因此，他們沒辦法立即告訴我們結構該如何改變、政治該如何轉化才符合他們的需要。

這個社會也沒辦法說出改變該如何進行，因為它不會以赤貧者的角度，來堆砌自己的結構。爲了處理赤貧者的困境，我們的社會因循舊習，總是採取個別干預的方式，也就是說，某個人，憑著自己的本事，試著補破網。因此，這些貧窮的人，雖然在各種機



制中缺席，還是繼續在其他同胞的生活中出現。和結構相比，個人比較不會那麼輕易就拒絕另一個人。所以我們會看到老師、社工或是神職人員介入，有時甚至把觸手伸向小孩，而且很難確保干預結果的好壞。我們可以說，這裡存在著一種根深柢固的惻隱之心，一個人無法完全對自己的同胞不聞不問。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介入這些家庭的生活。他們不夠深入，不一定懂得拿捏行動的分寸，不過，他們介入了。這是因為人無法接受他者的混亂，以及自己無法理解他人的事實。我常常聽到人們信心滿滿的說：「這些家庭，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的每件事都逃不過我的眼睛。」事實上，說這些話的社工和修女並不認識這些家庭，但是，要怎麼坦承這點呢？那不就是否認了自己部分的人性嗎？我很確信，大部分愚魯的行為與強迫性的措施都來自於不願意承認，我們不了解他者的人性。我們以為，如果他們的行為表現和我們不一樣，那一定是他們的人性缺了什麼東西，因此，我們以為自己有責任要幫助他們，甚至是幫他們走向正路。

因此，缺乏適當的結構並不意味著沒有人去介入這些家庭的生活。就連他們自己，也一直在尋求他者。這顯示了，每個人都需要他人來補足自己，對每個人的生命來說，這不僅是自然的，更是本質的。由於赤貧者無法從匿名、非個人化的結構那裡得到協助，他們或許比其他人更能清楚地告訴我們，每個人不管怎麼樣，總是希望能夠碰觸到其他人。這就是為什麼我越來越不能了解，教會為何沒有派遣更多人到窮人的世界去。比起一般

人，窮人更需要見到神父、修女、投身的基督徒、傳道員或善男信女；有必要時，他們可以跟這些人使個障眼法，耍個小詭計，想辦法扭轉局勢。進行慈善，卻取消了人與人的直接接觸，丟棄了關係，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錯誤。我在這裡談的慈善工作，是透過自然的敦親睦鄰所形成的助人關係，不管對赤貧者還是施予者，這都是一種生存的需求。放棄了互助過程中醞釀出來的人情味，教會也就放棄了在真實處境中人對人的回應。教會沒有用其他形式的投身來取代這樣的關係，反而創造了組織化、結構化的扶助；這比起過去的扶助關係還要糟糕。過往的扶助關係或許不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帶來人與人的實際接觸，最底層的家庭需要這樣的人情味。如果教會想在塵世的結構中給這些家庭一個優先的位子，她當然也需要這樣的關係。

我想回到結構的問題，以及第四世界志願者團體政治化的危險。如果志願者繼續和這些家庭實實在在血肉相連，如果他們願意日復一日繼續從這些家庭身上學習，就必然會把他們帶回面面相對的第一線，不至於躲到理論後面談兵法，或只爲了理論的樂趣而提倡結構的改變。我並不是說，志願者已經成功地抵抗了這個誘惑，每一個人都免不了想要逃離赤貧的現場。我們可以住在一個低收入社區或貧民窟，卻設法不受他們的影響與支配。有時，藉著安排我們的家庭生活、我們的空閒時間、假期以及公休，我們就可以不必受到他們左右。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再側耳聆聽這個族群的聲音，我們不再被他

們支配；聆聽他們，不再是一件要緊的事。

## 深根大會

如果連和這些家庭同住，都不足以保證一種人對人的關係，難道你不擔心未來？

是的，我非常憂慮，但還是有信心。如果存在著任何保證，那也只能來自志願者團體，他們必須成爲彼此的保證。我相信，這是他們在年度的深根大會（the General Assembly process）中學習到的。所有投身超過五年，並同意承擔起團體責任的志願者，每年夏天齊聚一堂。他們一起反思，不是反思他們應該做什麼，而是反思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應該成爲怎樣的人。參與深根大會意味著個人的承諾，願意保證整個志願者團體對赤貧者的信實。而且，只有做爲整體的志願者團體能夠保證每個志願者的信實、真誠及人性；這些家庭也自我要求這樣的人品，但他們無法提供保證。

因此，時時保持開放與警醒的心、更多的謙卑、冷靜，以及某種程度的忘我，便成爲前提。除了深根大會以外，我們還發展了稱爲「計畫與評估」的會議，要求自己提出明確目標，「根據家庭的希望來做計畫」，年復一年評估努力的成果。這些訓練，幫助志願者團體避免陷入脆弱。計畫評估的主要益處，也許是自我詰問多於自我肯定。

志願者團體想要獻身於窮人的解放，如果有一天窮人不需要他們，他們是否能接受自己的消失？這還有待觀察。

在一開始的那些年，我們就一直強調：有一天，這個族群會得到自由，他們就不需要我們了。當時我們將自由理解為路途的終點，也許是錯的。事實上，在底層，每一個貧困區裡的每一個家庭，從一開始就應該是獨立自主的。這是一開始的遊戲規則，這些家庭和志願者團體進入一個命運共同體，在那裡，自由必須得到確認；不只是某個家庭或某個貧困區的自由，也是其他我們還不認識的家庭與團體的自由。我已經說過，每一個窮人背後都隱藏了一個更窮的人。在法國各個貧困區的背後，隱藏了德國與英國的貧困區，在他們背後，又隱藏了被飢餓肆虐、被議論紛紛的西非貧民窟。

當我們分派到美國、到拉丁美洲、非洲，以及遠東地區時，有些人批評我們分散精力，他們錯了。那正是擴展歐洲家庭視野的大好時機，這樣他們才能得知自己也被串連起來，要和象牙海岸及上沃爾特<sup>9</sup>的赤貧者家庭一起站起來，這是他們的權利。赤貧者成爲人性的使徒，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必須轉化成行動。來自凡爾賽與克特耶<sup>10</sup>赤貧社區的家庭，以及來自英國格拉斯哥<sup>11</sup>與荷蘭鹿特丹<sup>12</sup>最底層的家庭，擁有最絕對的權利，他們有權站在奮鬥的前線，爲一個不再有人被排斥的世界奮戰。

一九六五年我到印度時，諾瓦集貧困區穿著二手衣物的家庭爲印度孟買窮人募集

衣食。剛才，你提到政治化的危險，那一直是個真實的危險。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志願者團體，總是處在當下的緊急狀況，他可能被困在裡面。但是，解決方式不是讓自己置身於黨派的政治之外，而是必須超越這個情況。有朝一日，赤貧者與我們一起成功打造了新世界，他們會選擇自己的地方團體或是國家社稷。事實上，那就是這個命令：「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這意味著：不要停留在當今社會的種種限制中，讓我們划向深處，關心這個世界。

譯註 9：上沃爾特 (Upper Volta) 即現在的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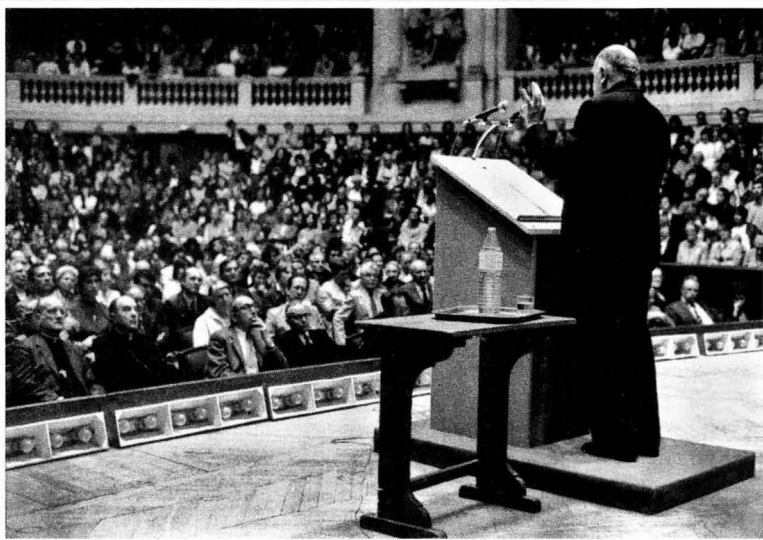
譯註 10：克特耶 (Craïell)，位於巴黎東南郊。

譯註 11：格拉斯哥 (Glasgow) 是蘇格蘭第一大城與第一大商港，也是英國第三大城市。

譯註 12：鹿特丹是荷蘭第二大城市。

## 第十章 赤貧者優先

最高階的是最貧窮的人，還有那些  
為了赤貧者的願景而獻身的人。



1983年若瑟神父在巴黎大學發表演講，講題為「讓赤貧節節敗退」。

吉爾·阿努以：

「運動」這個字對你非常重要？你說：「我和第一批盟友建立了一個協會，志願者團體促使我創立一個運動。」兩者有何不同？

若瑟神父：

不同之處，肯定是運動的概念。一個協會可以立基於一個合法的地位，擁有一個角色，一個被定義得很清楚的行動模式。當然，這並不說它就變得僵化、動彈不得，或容易過時。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爲了穩定、安全，它付出的代價是不易更新。一開始，一個協會可以是充滿創意的，但它不容易一直保有這樣的內涵。在我的想法裡，一個運動是爲了保持行進的狀態而組織起來的，它隨時準備好要出發，在帳棚下過夜。運動的構思是爲了保持動態，所以它的行李簡便：信念、經驗，再加上知識，此外，別無長物。

護衛赤貧者人權的志願者團體要的就是這個，爲了保障同胞的生存權，他們必須成爲這群百姓的明鏡和代言人。這個團體當時還不知道這些家庭是誰，也不知道他們要往哪裡去。這一點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我們說：這個社會，特別是勞工界，應該認識第四世界，他們應該讓最貧窮的家庭成爲各種奮鬥的核心。志願者團體應該追隨這個目標，並且一直擔任不同國界間的橋樑。在國界的兩端都有人，我們要接觸的便是這些人。志願者團體所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他應該進入這些人的歷史與思想中。面對國界

兩端的人，志願者沒有任何支配權或決定權，他只能說服對方。爲此，根據不同的時間與地點，他必須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使用柔韌與明智的言語。在阿姆斯特丹或紐約當志願者，和在大巴黎地區當志願者有所差別；賽內加爾的達喀爾，或上沃爾特的瓦加杜古，也可能天差地別。但不變的是：尋找赤貧者的意願，和他們一起前進，去發現周遭的人是怎麼圍繞著窮人在思考與做事。在第四世界運動，計畫一個行動意味著提出的問題多於答案。我們如何讓這個族群得以不斷向我們召示他們在健康、工作等領域的渴望？爲了發生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們該做什麼？

這個運動是一個追尋的過程，它本身不是答案。這是一個永恆的邀請，邀請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尋找。尋找最貧窮的人，尋找那些圍繞在窮人周圍的人，尋找第四世界的身分。成爲一個超越各種信仰的運動意味著什麼？要怎麼做，才能讓歸屬於各種不同意識型態的人感到自在？這個運動明天將會如何？

## 關於組織架構

這意味著你們沒有什麼組織架構？有些人覺得你們缺乏組織。

有些人希望我們的運動裡找到傳統的架構、上司與下屬間的層級、基礎結構，甚



至某些慣見的管理與控制。他們有時很驚訝地發現，這個設在總部的秘書處，並不清楚某地某計畫的執行細節。我們難道就以此論斷這個運動一團散亂嗎？有時，某些情況可能更令人困惑，我們看到同一個秘書處，竟然介入地方性行動，而且看起來不過是個細節。有時連我們的盟友都感到驚訝。

這並非散亂無序，而是另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建立在其他的優先之上。這個秩序想要保留的是本質，避免被不必要的行囊拖累。以最貧窮的人為優先，與他們相遇、認識，並在他們身上投注我們所有的心力，對我們來說是重中之重，是一個絕對的必要。他們需要一個完全以他們為核心的志願者團體，這是最重要的本質。我們不可偏離這些原則，即使在細節上也不可以。但是，似乎沒有任何組織架構或官僚體系可以確保這個優先選擇。西方社會與教會的歷史清楚地向我們指出這點，有史以來，不可勝數的機構在一開始都是為了窮人而設立的，他們中有多少個仍然秉持初衷？在創立之初，他們以人為核心，這些人讓他們一步步往前進，並和他們一起進步。即便一開始這些機構都是為了窮人而構思、設立，但是後來並沒有阻止他們改變伙伴，和窮人形同陌路。我們的運動不敢宣稱自己能夠做得比別人好，但是我們願意從別人的經驗中取得教訓，以確保初衷。透過持續不斷的在職進修，透過深根大會，透過評估與計畫的會議，持久志願者藉此齊聚一堂，把自己放在其他人面前，大家一起構思、發展與更新行動的準繩，以確保初衷。

盟友們接受這些準繩，只因為他們信任志願者，因為志願者更接近貧窮家庭。他們相信志願者團體的真誠，因為這個團體願意不斷地對這群子民的訊息進行解碼，以期真正符合他們的原意。沒有這份信任，他們便不是盟友。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團體沒有等級制度，而是另一種分級方式。最高階的是最貧窮的人，還有爲了赤貧者的願景而獻身的人。所謂的專業分級制度，在我們這邊用上，那些在赤貧與分享的領域長時間接受陶成、深度投入的人，就帶領大家一起奮鬥。

這不會阻礙你們進行由公權力所支持的計畫嗎？他們是否能接受人的投身程度勝過專業能力的分級方式？

我沒有提到能力，我談的是專業分級制度。在發展專業訓練及專業分級制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把對赤貧者的認識考慮進去，那麼，在面對他們時就無法有專業的保證。在第四世界，沒有對赤貧家庭的投身與認識，老師、醫生及社工員都不算有真才實學。公權力與專業人士同意訓練的必要性，但是關於投身的必要，他們就不見得有共鳴。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可以阻礙公權力支持我們的計畫。我們試著讓行政作業保有必要的嚴謹，但是避免它鳩占鵲巢，侵占行動的領域。和公部門合作，同時也必須向所有支持我們的人有所交代，這在在要求一種極佳的管理。然而，等候著第四世界最危險的

陷阱之一，便是所謂的管理。管理讓人安心，也讓事物平庸化，它簡化問題與答案。人類的解放是複雜的，而且不會是直線進展。解放是往前走兩步之後，又往後退一步或走偏一步。我們一直想預測後退或走偏的那一步，別人就責備我們，說我們做人處事太複雜。我們不得不小心謹慎，避免讓自己的行動變成一種制度、方法論。不過，我們一點也不懼怕那些文書、檔案或資訊處理，但是我們對這些文書工作有同樣的要求，它們也必須盡可能地對赤貧者生活的改變做出最直接的貢獻，必須不斷地更新以符合現況。

## 志願者必須經常轉換跑道

有些人談到你們的時候會說：「我每次去看他們，都會發現有一些事情又改變了。」他們也怪你們經常轉換志願者的跑道。

轉換的頻率還不夠高，有些志願者在一個貧困區停留太久，很難說服他們離開。

我曾經跟你提到面對赤貧可能有的選擇。我們或者拒絕遭受赤貧的人，或者跟著一起承擔痛苦。還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對赤貧視而不見。人可以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人也可以由於長時間埋身在赤貧裡面，而不再聞到它的氣味，不再覺察到赤貧如何磨損人。爲了理解赤貧，有時你必須懂得抽離。爲了真正的在愛中茁壯，必須懂得保持

距離。不懂得保持距離的人，總有一天會讓生活變成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公事。別人對他來說變得可有可無，而且他們已經分辨不出自己缺少了什麼。

這個運動的持久志願者所拒絕的，就是這種慣性。慣性最後會讓我們脫離社會，變得貧瘠，而這完全相反於赤貧者對我們的期待。只有當我們自己在心智與靈修上都回歸本性、回歸真我時，最貧窮的人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完整與受尊敬。如果第四世界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豐富心智與靈修的湧泉，那麼，我們所過的貧窮生活就只是一種矯揉造作的模仿，這對窮人來說是一種羞辱；我們把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當成一種裝飾，當成一件華麗的外衣。

面對赤貧，接近與距離都要有。接近他們，因為赤貧者是我們共同的焦點，他們凝聚了我們，是我們存在的理由。他們應該能夠幫助我們認清我們到底是誰，所以，也必須保持距離。對第四世界來說，最大的運氣就是，它奮鬥的緣由既是受苦的人，同時也是一群行進中的子民，這迫使我們不斷前進。

受苦者阻止我們把人當成物品、把一個族群當成奮鬥的藉口或工具。受苦的人迫使我们以他們的節奏為節奏，以他們的心跳、希望與思想為依歸。這群子民讓我們不得不反躬自省，而且他們可以自在地告訴我們：「因為你們沒有經歷過我們所經歷過的，所以不管你們怎麼做，你們永遠無法理解。」如果他們沒辦法告訴我們這點，我們就沒有

義務要把麥克風交給他們。最貧窮的人有權監督、修正，但是唯有每個人都站在自己該站的位子上，他們才能執行這些權利。爲了讓大家都各司其位，我們必須迫使自己轉換使命，離開第一線，從事書寫，或是去面對輿論和公權力。

可是這麼一來，這些志願者怎麼能夠保持與生活現場的接觸？而盟友們又怎麼得到真實現場的滋養？

我們有某種選擇關懷議題的方式，受苦現場的志願者定期收到邀請與追問：第四世界家庭在學校的經驗爲何？他們對工作的期待又是什麼？志願者在這些追問下得以保持警醒，他們知道，自己在這個運動裡面是這些家庭生命與期盼的見證人；其他志願者與盟友則有責任把這些見證傳達出去。但是，我們無法傳達自己沒有真正內化的東西，我們必須思考，並以活生生的事實爲思考的養分，才能說服別人。否則，我們很容易背離初衷，南轅北轍地展開一場個人的奮鬥；這麼一來，窮人成爲奮鬥的客體，失去鬥士的身分，不再是奮鬥的緣由與導師。

## 關於貧窮的研究

按你的說法，整個運動都處於一種研究與追問的狀態，但並非一般意義裡的科學研究。不過，打從一九六〇年，你就開始談科學研究，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地位？它的使命難道不是揭示出赤貧的真相？

一切都得看研究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基本上，科學研究一直陷入一種危險，就是把一個族群當成研究的客體，研究者意圖維持獨一無二的領導角色，只臣服於自己的好奇心與對精準的要求。面對窮人，他好像故意維持一種安全的距離，不過，那是一種偷窺者的距離，而非一種全心等待相遇的距離。大家所認識的那種科學，以自己為導師，所以無法同時為另一個導師服務。在志願者團體裡面，我們試著體認：以最貧窮者為導師意味著什麼？他們用心聆聽最貧窮的家庭。每一個志願者都涉入研究。研究者貢獻出分析與綜合的能力，並不自視為集體的領導者，也不認為自己擁有詮釋資訊的主導權，他們的使命在於確保思想結構的穩固，與資料來源的豐富可靠。他們是我們對抗偏見與避免知識被濫用的盾牌。總之，在這個運動，研究者和管理者以及來自其他專業領域的人都站在同一個水平線，每個人都得重塑他的專業，因為他之前所受的訓練缺乏對赤貧者

的健全認知。我們的研究者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中推陳出新。

你曾經說過，使人癱瘓的各種結構、過於簡化的管理，以及使窮人屈從的科學帶來的危險；你還看到什麼其他的危險？

我們每個人都很容易落入活動主義的陷阱，因為進行活動讓我們安心、滿足。如果今天活動辦不成功，明天很可能就成功了。活動讓我們很容易忘記他人的脆弱，還有他們可能遇到的阻礙。在活動時，我們不再敏感於他們內在的反抗，不再把他們當成一個完整的主體，他們慢慢變成我們成功的媒介，成爲一個客體、一個配角。在奮鬥的過程中，太多時候我們自以爲在解放別人，事實上，我們解放的是自己。但是問題不在於誰得到解放，問題在於：最貧窮的人是不是和我們一起得到解放。

爲此，一個志願者在貧民窟最大的德行是靜默。他也應該讓其他志願者質問他：你的行動，到底造成什麼樣的解放？貧窮家庭是否能透過你的行動感覺到自己是團體或社區的一份子？聖文生神父說：「我們必須請求窮人原諒我們給他們的麵包。」我想我們也應該說：「應該請窮人原諒我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解放，這個解放在那麼多時候反過來壓迫他們。」

對受苦現場的志願者來說，他們的危險是忘卻投身他處的志願者。身在他處的人苦

於無法和這些家庭一起活在第一線，因為接受了其他職務，擔任後備部隊。間接的行動讓他們無法每天在現場和這些家庭接觸，無法感受到那種在前線一起奮鬥的革命情感。他們沒辦法說：我爲了某某社區、某某部落奮鬥，而且我親身體驗了那些困難。

## 內部的分裂與衝突

依我看來，這個運動聚足了許多難以避免的衝突，在不同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之間，在盟友與志願者之間，在第一線的志願者與在辦公廳的志願者之間……是否有過內部的分裂與衝突？衝突看來不可避免。

我們一起背負的重擔，是如此強烈、獨特。當然，由於大家的意識形態與專業訓練背景不同，看待赤貧的不同眼光可能成爲衝突的來源；但是，赤貧者的希望與以赤貧者爲優先的志向，可以使我們合一。這個運動的力量就在這裡，「以最貧窮的人爲優先」引領我們開展各種奮鬥，將我們拋向無限的空間。這讓我們腳踏實地，一腳踏在赤貧底層最不堪的髒亂中，另一隻腳不得不邁向自己沒有想像過的高度。難道不是這個緣由讓我們的生命合一？我們遠非宗教團體，也不是一般所謂的生活公社（commune），志願者比較像是志同道合的夥伴，爲了同一場奮鬥，在投身中緊緊相連，自由且充滿活力。



我們沒有經歷過分裂。很多人從我們身上取得靈感，創建了其他的運動與協會，他們從來就不是因為反對我們才另起爐灶。而且，不管意向多麼良善，一個人很難公開聲稱他反對這個運動。它是一個永恆的邀請，你或者接受，或者拒絕。你很難說你反對赤貧者得到解放，除非別人以密教的儀式強加於你，或者提出另一種策略。至於我們，既沒有教條，也沒有不變的計畫。

這個運動的合一難道不是圍繞著你而形塑的？你就是圓心，化解衝突的溶劑？

我不確知自己扮演了什麼角色，不過事情可能比想像的複雜。這個運動一直是不受控制的自由之所，不管創立人的個人魅力如何。少有組織釋放給它的成員這樣的自由度，而且他們也不須為了一個傳奇式的創立人獻上什麼供品。

我不是什麼傳奇人物，他們也不需要維護我的形象。我自己做我早餐的果醬，去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開會，參加第四世界家庭的會議，主持彌撒，閱讀文件報告；我跟他們一樣自由，從每一個角度來說我都不是什麼要人。

不管怎麼說，你都是他們追隨的對象。

如果是，也只是因為我對第四世界的敏感度，因為我的直覺。他們信任我，我想他

們認同我所歸屬的第四世界，包括它背負的良機與厄運。他們知道我什麼都可以承受，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不准對家庭造成傷害。爲此，他們接受我更甚於其他人。我沒有什麼學歷，也不傑出，更沒有名望。但是，他們真心相信我背負著一群子民的意識。這意識並不是個人財富，或一種無法轉讓的權利，也不是可資繼承的遺惠，或是被選派任命的，而是單純的因爲歷史注定有人要成爲這個意識。

我曾經跟你說過，在我們這裡，沒有權力，沒有掌控，也沒有什麼需要維護的形象。這個運動可以轉身走往一個我根本沒有選擇的方向，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這個運動背離家庭，我會揮袖離開，創造另一個運動。我的天命是爲了人，不是爲了一個組織。這個運動的合一，正是來自大家都意識到這個使命的本質超越其他使命。

## 第四世界運動與左翼政黨的差別

你說「如果這個運動背離家庭」，你想說的可能是：「如果它不再是他們的代言人」。這讓我想到有些政黨也說自己化身在百姓之中，比如社會黨或共產黨。我想，在某些國家，他們的確說自己代表無產階級與下層無產階級。第四世界運動跟他們有什麼不同？

這些政黨誠懇地想替一個族群代言，他們提出一些預設，可是這個族群對攸關自身

的論述卻無從置喙。這些政黨聲稱自己擁有真理與最佳的理解；這樣的危險窺伺著所有選擇為某個族群投身的人。但是，他們既然做了選擇，就該貫徹到底，追尋這個族群的解放，一旦解放完成，還要甘冒被他們捨棄的可能；以失去自己的自由為代價，讓這個族群獲致大膽駁斥他們的勇氣。否則，他們很可能只是承諾一個空洞的希望，而且遲早會反過來剝削這群人。無依無靠的同胞當然依賴我們的慷慨，但是，如果這些慷慨沒有發展成真正帶來解放的行動，是因為我們半途而廢，安於既定的想法，不再讓他們的生計衝擊我們，那麼將主客易位，行動的主體反而變成客體與藉口。

第四世界運動的幸運之處是，它對赤貧族群並沒有預設的想法；預設的想法會讓一群人屈服在既定的框架裡。這個運動不斷地匯集各種新發現，不斷地自我質疑。它並不認為自己擁有答案或是自己對下層無產階級的發言已經齊備。志願者團體想做的只是一個不斷更新自己的解說員，激勵這群子民透過不斷的追問，以他們所選擇的方式來發展他們的思考與願景。如果有一天，這個運動認為自己擁有下層無產階級的真理，它就變成了赤貧同胞身上的懸瘤，是個累贅。

我跟你說過，這個運動的基本架構就是陶成訓練、深根大會、評估與計畫。這些都是追問的架構，是共識的建立，是知識重新建構的過程。在這個架構裡，每個計畫的主體都是這群子民，接下來才是這個運動以及它所做的承諾。

沒有任何一個意識形態或社會計畫的重要性超過人。窮人的解放沒有一個預先設定好的藍圖，它是一個持續進行的工程，必須考慮到他們多變的處境及當下的想法，一再地加以檢驗。這有點像柏拉圖的影子：光在後面，在過去所累積的認識裡，影子在前方，在他們今天和明天將要教導我們的一切中；這場持久的文化革命是心靈的長征。

你是否能舉幾個例子，具體說明出自赤貧百姓口授的進展？

我曾跟你提過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工運與學運，當時第四世界家庭表達了他們的惶恐。又一次，他們被整個社會燃起的希望排除在外。有些下層無產階級的勞工被折磨得骨瘦形銷，已經失業了好久，卻假裝跟大家一起罷工。這催促我們決意全力爭取社會參與和擁有議事代表的基本權利。

但是，赤貧家庭也帶領我們在其他領域表達立場，例如在教育 and 知識的領域。我可以跟你談談知識。這些家庭一直苦於無知，所以我們和他們一起創建了一些知識的平台。這得先從草根的層面做起，在各地的分支團隊中扎根。七〇年代時，幾乎在所有歐盟國家，這個族群的物質生活條件暫時有了改善，所以各處的家庭表達出這樣的訊息：時刻已到，現在該是在全國和國際的層次展開公開造勢行動的時候。也因此，我們在一九七七年公開提出這樣的挑戰：「十年內，在我們的社區，不再有文盲，不再有人身無一技

之長；知道的要教給不知道的。」這是第四世界的家庭表達的意願，普遍來說，他們也準備好要承擔這個願景所要求的責任。我們大可閉門造車，自己發明這個挑戰，而這個族群則只是半信半疑假裝跟隨。我們也可以坐失良機，漠視他們所發出的訊息。不過，我們很幸運能夠像海綿般易受滲透，敏銳感受到各個貧困區顯示出來的跡象。

你與志願者團體展開這些非常規律的會議，似乎就是這個運動的一種精神糧食。

它們的確擁有自己獨特的進行方式，從簡單的會議形式開始，在草創的那些年就是如此。縈繞大伙心頭的是如何理解這群子民。爲了高聲宣告他們的存在，爲了替他們贏得站出來發言的各種憑藉，這樣的渴望孕育了這個運動。這些會議本身就是不斷的追問，有點像是志願者團體的呼吸器官。這些會議的規模慢慢擴大，不變的是，它一直都是人與人之間真實的相遇，是站在同一個「水平線」的相遇，目的是一起划向深處。它讓這個運動「群而不黨」，不至於成爲一種金字塔式的階層。約有上百名投身五年以上的志願者參與深根大會<sup>1</sup>，參加評估計畫會期的則有兩百多名持久志願者，他們來自十四個不同的國家，各個年齡層都有。

同樣的這個志願者團體，打六〇年代開始就發起「假期工坊」<sup>2</sup>，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年輕人參與，這些年輕人帶來不同的想法，提出新的問題。即使參與者提供多日的

勞務，但是志願者在工作坊承擔的責任仍大過實際獲得的協助。然而不可諱言地，透過這些年輕人，志願者有機會更新自己，接觸到激勵新生代的思潮。

## 改革或是革命

我猜這些年輕人肯定會向你提出我接下來要提出的問題：改革與革命，你選擇什麼？

這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嗎？最貧窮的人眼見各式各樣的革命與改革發生，卻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都只是同樣的玩家重新發牌而已。要讓新的玩家進場，光是重新發牌是不夠的，還必須改變遊戲規則。別人常常責怪我們的運動不參加遊戲，不跟已經被認可的玩家玩牌；沒錯，它要引介新的玩家到牌桌上，這舉動還是一樣讓大家不舒服。

改革與革命兩種陣營，我們到底要怎麼選擇？我們的義務是追問每一個陣營：最貧窮的人在哪裡？在這一點上，這個運動想要扮演守夜的更夫。當它向每一個人提出赤貧

譯註1：若瑟神父談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狀況；到了二〇一一年，這個運動就有超過三百名投身五年以上的志願者，來自三十四個不同的國家。

譯註2：假期工作坊指在放假期間，透過勞動等方式義務支援某項計畫或活動。

者的議題時，它也表達了自己的信念：每個人都可以對遊戲新規則的創造有所貢獻。下面這兩個原則目前都還沒有形成風潮，首先是知道我們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承認我們必須重新評估各種與被排斥者相關的舉措，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穎的社會價值，只是我們一直都還沒有付諸實行。第二，聲明所有的同胞、各政黨與工會、各種機構還有各宗教團體，都能夠對這個追尋有所貢獻，都能夠把最貧窮的人引介到他們的生命中；這樣的聲明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當今的世界，以最被排斥的人為核心來創造合一的努力，還沒有成為遊戲規則的一部分。

這個運動把尋找最貧窮的人，當成自己的志業？

這個運動努力體現這個追尋，改革者與革命者也都應該參與好以此檢驗他們的信念。這個運動努力對一切不利於赤貧族群的舉措提出異議，讓赤貧族群得以見證各種社會排斥的存在，一如它也見證試圖改變這種不義的奮鬥。它並沒有企圖取代他人去做補正的功課。每個人必須恪遵其職，為此付出。這個運動的確試著以紮實的知識提出異議，教育也好，職業訓練、最低收入保證系統也罷，日復一日，它向赤貧家庭取經，從中解譯出各種行動的準繩，好回應他們的希望。每個階層、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專家；在某種程度上，志願者為了第四世界的子民，試著成為專家，為此，他們日夜努力不懈。但是，

他們的任何所爲所是，都無法取代其他人應該做的努力。

有些人試著把志願者帶離真正的導師。部會、政府或聯合國的特殊機構要他們詳細說明提出的建議案：在社會安全體制裡面，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具體改變？一個良好的掃盲計畫的詳細步驟是什麼？爲了孩童的健康，到底應該做什麼？公部門經常要求一些非常精確的回答，但是卻沒有做出相應的回饋與投身，有時甚至不給任何報酬。志願者切盼赤貧家庭的處境得以改善，便任憑公部門予取予求。他們陷入各種指責圈畫起來的陷阱，別人說他們含糊不清、不夠具體。這是一種錯誤的指責，經常用來替自己的不投入找藉口：「你們要我怎麼展開行動，你們又沒說清楚詳細的步驟。」

由於屈從於遊戲規則，想要加快事情進展，志願者有時會錯失良機，沒花時間和赤貧家庭一起深思熟慮。公部門在貧困社區還來不及認識一個志願者團隊，甚至還沒搞清楚他們是誰的時候，就命令志願者：「你們要去關照年輕人，注意新生兒的福祉……」公部門可能是良善的，他們經常想幫助我們。就像一位法國海外合作部的處長在上沃爾特<sup>3</sup>觀察第四世界的行動計畫時的評論：「政府無法資助發展計畫的前置作業。」這是相當可惜的，由於不給計畫相關人時間，加上缺乏準備的功夫，外界的行動有時真的是

譯註3：上沃爾特是布吉納法索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期間的國名。



恣意妄為，對這群百姓的感受一無所知，卻任意介入他們的生活，無視於他們可能的反應。這就暴露出極度的不敬。介入者甚至沒有想到這些百姓是有思想、有感受的，而這些都應該受到尊敬。他們沒有意識到，對一個族群來說，自由決定是否投入一個行動，是多麼重要，他們有權改變行動的方向，抵制或拒絕。意識到這點已經是一種革命。

在地方或中央政府的要求下，當志願者團體決定呈送一個步驟詳細的計畫案，甚至開始展開行動的時候，別人可能會責怪他和政府合作，被政黨利用；這並不完全錯，卻不是重點所在。事實上，爲了赤貧族群而改變遊戲規則，會讓各種政權感到害怕，不管他們是改革者還是革命者。

## 最令人恐懼的改變：顛覆現有的優先順序

什麼樣的改變最令人害怕？

重點不在於指出哪一個細節應該改變，也不是哪一方面應該多做努力。應該要改變的是確保窮人完整的尊嚴，以他們的思想做爲各種政策的指標，以他們的盼望做爲各種行動的標竿，不再把人當成問題來切割。在最貧窮的同胞的要求下，重新界定整個社會，並改變我們看待人的目光與方式，這一點令大家感到不安。在每一條路的轉角，在每一

個相遇的時刻，都會面對這個追問：「你們對我做了什麼？」這個追問擊垮各種知性與物質的安全感。我們必須在另一個層次上建立安全感。這就是這個運動所謂的顛覆現有的優先順序。

好一個精神與實踐上的顛覆，說穿了就是一種革命。

針對這一點，我們還是受到指責，就像那對騎驢的父子一樣，一會兒說我們不夠具體，一會兒又說我們要求太多。事實上，我們要求各國與國際社會做出全面的實踐，而不是停留在零碎的嘗試。沒錯，我們要求大家和最貧窮的族群一起展開全面的行動，意思是開始思考收入保障的時候，就要想到職業訓練；展開就業保障計畫的時候，就已經要考慮住宅權利的確保。

一旦展開全面的行動，所有的公民都會得到好處；這一點很難讓大家明白。在充分就業的六〇年代，我們大聲提出警告：「如果你們放著一部分公民不管，讓他們空無技能，就是任憑蘋果被蟲啃噬，最後蘋果一定會爛掉。」看看今天我們走到什麼地步，這個社會竟然出現大規模的失業。今天我們發現到，原來我們的社會不願意把充分就業當成一種絕對的權利，失業被解釋成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我們也說過，在每一個工業化國家，如果我們任憑一部分學童在離開學校的時候還認不了幾個大字，就是讓所有的孩

子都遭受風險，就是一個接受文盲繼續存在的社會。明天，如果我們還是任憑一部分的公民遠遠落在電腦科技之後，而且不覺得羞愧，就繼續會有成千上萬的同胞成爲電腦文盲，任憑他們沒有任何機會藉著電腦與人溝通。

如果一個社會認爲自己可以任憑某個國民沒工作、不識字、無家可歸、無法參與政治、無法祈禱、沒有機會認識神明，遲早也會讓其他人陷入同樣的境地。這是一個沒有地基的社會、學校和教會，大人和小孩都可能從下層陷落。富有者肯定能往上爬，但是清寒而沒有太多儲備的人民和家庭將會掉進深坑。這就是爲什麼要放棄同業公會以及利益分割的各種奮鬥，才能顛覆優先順序。讓無產階級以下的人民成爲我們思想的源泉、行動的驅力，就是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受益。今天，最貧窮的下層無產階級抗議社會的不公不義，已經在預示並宣告明日的不公不義。

## 揭發對自己同胞的無知

這是一個被遮蔽的不義，你揭發了我們的無知，有多少法國人知道仍然有人目不識丁，知道他們的同胞仍然是文盲？

我不知道能否拿無知當藉口，是可忍，孰不可忍？在當今社會，文盲肯定處處碰壁，

所以，怎能不時關心在學校被遺忘的孩子，怎能不處處尋找被虧待的孩子？一個不懂得保持警醒的社會，能被接受嗎？一個國家不知道有多少家庭餐風露宿，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從這間違建搬到另一所棚屋，只因為國家在做住宅統計的時候，並不想知道誰住在裡面，誰住在外面，對漂泊的家庭略而不計。國家沒有詢問統計數字的依據，也不要求公權力對最本質的事務，也就是赤貧公民的處境，提出報告。國家只知道它想知道的，它的領導團隊不回答沒有向他們提出來的質詢。

在这一切之中，我們怎麼面對〈真福八端〉4？「我無家可歸的時候，你們收留了我。」5這不僅是道德的，更是政治上的絕對必要。你以為耶穌基督只在其他國家無遮風蔽雨之處嗎？無家可歸的祂，就在你我的大門前，而且祂追問：居住權只是一樁和收入多寡與擇鄰能力有關的事情嗎？還是說，單單「存在」這個理由，就應該讓一個家庭

譯註4：《新約聖經》的〈真福八端〉又稱〈山中聖訓〉，全文如下：「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憐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憐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譯註5：《新約聖經》〈馬竇福音（馬太福音）〉二十五：34-46。

有屋可住？

我們以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是，上主顛覆了我們對權利義務關係的認定？

耶穌基督並沒有免除我們的義務。祂說：「我餓了，你給我吃的；我迷路了，你四處找我。」有一天我跟一個部長辦公室的主任談到住宅問題，他跟我說，確保家家戶戶有屋可住，卻不考慮他們的能力與資格，根本就是枉顧住宅本身的概念，枉顧所有法國住宅的結構。當我要求教育部在資源班引進電腦教學——那是貧窮孩子在法國學校體制的最後機會——他們的回答如出一轍：「您以為教育單位只有這件事要忙嗎？」我真的這樣想，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如果他只關心這事：替法國的教育奠定最堅實的基礎。不是隨便哪一種老套的最低標準，而是一個讓最貧窮的人能夠翻身的地基。不管在哪一個部會，我都聽到同一種論點：「我們不是只有這件事要忙。」但是我堅信，他們最應該要忙的就是這件事。

人家會跟你說「忙窮」的代價太高，救急不救窮啊！

人家或許也會跟我說，這件事已經在蘇聯和匈牙利嘗試過了，白忙一場。事實上，我們一無所知。代價太高的念頭來自我們沒有想像力，我們以為富人都還沒有的東西，

怎麼可以先給窮人。在資源班安裝先進的電腦設備不會花很多錢，不過，要是在各級學校也安裝，甚至先安裝，花費當然就比較高。這是很普遍的想法。「最窮的人最優先」對我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想法，因為它看起來和各種政治與經濟效率的概念格格不入。

至於前蘇聯實施的「人人有房住」和匈牙利的「均等新資」，兩者都沒有持續很久，而且還是離不開論功行賞的思考套路，都沒有「以最貧窮的人為優先」，而是用同一措施對待百樣人，這與第四世界的作風有天壤之別。大家都不曾見識過任何一個「赤貧者優先」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模型還沒有出現，就像天國的模型也還沒成形，得摸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走。

說了一串，還是沒回答你的問題：改革或是革命。

你建議我們一步一步走，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向。

我想到一個家庭的母親，養育了八個孩子，她在申請家庭津貼、社會住宅和免費營養午餐的過程中，遇到層層關卡。她的先生沒有工作，而且他們也沒有正式結婚。在市政府，別人說她：「生了八個孩子，不用腦筋、不負責任的人才會這樣！她以為她是誰？把市政府當廚房，這樣來來去去，要這個、要那個。」

不管走到哪裡，這位母親都引起騷動，被當成麻煩人物，讓社會救助科和平價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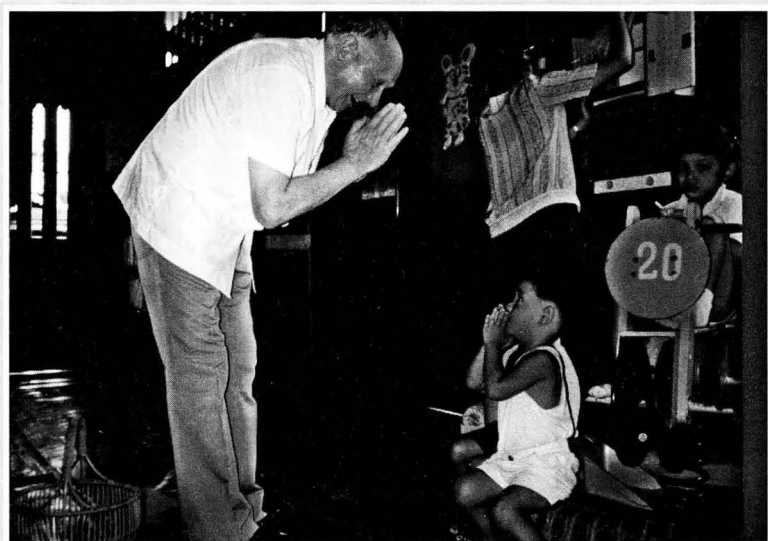
處的工作人員覺得困惑難解。沒錢沒勢，帶著眾多子女，這個女人給整個社會還有我們看人的目光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她測試了我們維護人權的真誠。她的先生不識字，在整個生存的歷程中跌得鼻青臉腫，不知道如何保住飯碗。在勞動的世界裡，他不會被接納，也沒有掌握到職場一絲不苟的要求和邏輯。在考慮要不要給他一份工作和職業訓練的時候，我們想的只是划不划算嗎？或者只是因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就有權利獲得尊嚴？或者我們告訴他，就像我常說的：「你存在，我們存在，我們分享一個共同的命運，一個彼此的良機。」

事實上，不僅社會救助科提供的幫助微不足道，每個社福機構總能找到各種不給扶助的藉口。在各個層次，這戶人家繼續被當成次等人對待。那麼，人權到底是爲了誰而存在？我們到底要解放誰？

你曾經問我許多關於這個運動的問題。只要這個運動繼續把最貧窮的人當成最重要的參考架構，只要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這群子民的昂首挺立與持續盼望，我們就可以信任它。只要下層無產階層跟它說：「你們說了我想說的，但是我一直說不上來。」這個運動就走在解放赤貧者的路上。

## 第十一章 解放神學

解放神學只能建立在聖若望宗徒的  
這句話上：「天主是愛。」



若瑟神父訪問泰國的第四世界家庭。



吉爾·阿努以：

你談窮人的解放，這個主題在教會內有著熱烈的討論，特別是針對解放神學。你在這方面的立場是什麼？讓我念一段厄瓜多主教普羅亞紐（Proano）寫過的一段話，然後請談談你的看法：「在拉丁美洲，不論是我們的心智還是社會結構，多少都還是處於奴役狀態。基督來到世上，不只是為了拯救個別的我們，更是要拯救集體的我們。一九六八年，在哥倫比亞麥德林（Medellin）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是一種罪過的處境。教會必須植根於社會實況，否則我們就會成為不義的共犯。解放神學不僅僅要和知識分子一起建構，更必須和窮人協力，因為他們的處境最能擷取基督最本質的訊息，而且，唯有立身在窮人中，我們才能夠真確地說出：窮人向我們傳報福音。」

若瑟神父：

怎麼能夠不同意一個同時包含靈性與社會性的解放呢？可是，依我看來，在拉丁美洲仍有許多混淆。

歷任教宗曾說教會無法坐視不義的情況，她站出來，毫不妥協，堅決反對過低的薪資、反對任憑同胞流落街頭、反對任憑部分兒童在學校遠遠落後。教會的義務是拒絕任何造成壓迫的體制，這些體制使得最貧窮的百姓一輩子當次等人，沒有任何改善現狀的希望；針對這點，我們都同意。而且，我也能理解拉丁美洲基督徒的反抗，還有神職人

員的憤慨，他們對強加在窮人身上的不義感同身受。即便如此，在反對體制的時候，還是可以有不同的行動方式出現。教會不能允許人身攻擊，不管這個人是貧是富。用教會的眼光來看，攻擊富人也意味著攻擊窮人，如果我們刻意讓窮人去輕視富人，我們只是在換掉主人的同時，創造了新的奴隸。

基督說：「最先的要成為最後的。」這是斷言，也是預言。耶穌基督已完成變革，而且有一天，人們要以不同的方式安排位子和責任。但是上主從來沒說過應該輪到富人被羞辱、遭迫害。對基督徒來說，窮人的解放當然是一場奮鬥，但絕對不是隨便的奮鬥。

基本上，神學談的是天主與人的科學，這兩者不能分割，因為天、人的盟約業已確立。故此，解放神學應該去察看人的解放與天主的解放之間的關聯；爲了解自由的人，必須知道誰是自由的天主。因此，在拉丁美洲，我不斷追問：何許人的解放？這個解放建立在何種天人關係中？我從未得到回覆。

人們跟我提到的「人」，常是不愁吃穿的人，他可以糟蹋神明、教會及整個社會而不會危及性命，因爲他有後路、有靠山。但是，我看到有些地方，整個社群的男女老少，都陷入一種文化、精神及經濟的赤貧中；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常常是一些知識分子，懷抱著激烈的政治意識，我不得不懷疑他們所聲稱的是否真的是底層百姓的意識。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教會是良知中的良知。」我非常喜歡這個概念，對投身於

解放的基督徒來說，這個概念很有價值。總是有人為解放付出代價，我們可以自問：誰付出代價？是因為我認識了赤貧，並且終其一生與赤貧同胞為伍？面對知識分子的行動方式，我常有一種威脅感，並本能地產生自衛反應，我會問：他們有沒有忘記去認識最貧窮的人，並詢問他們的看法？如果是，那麼知識分子的良知是誰的良知？

我擔心赤貧者和知識分子之間存有許多的隔閡與誤解。誰也不敢保證，解放神學家所建議的解放是否真能成為赤貧者的良機？我們要問：赤貧者是否在很長、很深的交往中被認識？解放的計畫是否真正和赤貧者一起製訂？依我看，這些計畫，不論是和平、反核、解放或其他議題，都是預先謀劃好的，沒有窮人的參與，亙古以來一直如此。

唯有透過和赤貧者長期來往，建立深度關係，才有機會認識他們的盼望。第四世界運動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盡一切的努力去了解赤貧者的意願、他們說了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這麼說。對我來說，這樣的努力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絕對必要的。知道最貧窮的人想什麼，是最本質的專門知識，因為這正是耶穌基督期待我們獲得的專門知識。

## 去詢問最貧窮的人

當你說：「為了何許神解放何許人？」你指的神，是那位我們可以藉由降生在赤貧中的

耶穌來認識的神。為了獲得基督徒的解放神學，我們所應該做的是去詢問最貧窮的人？還有別的路徑可以建立神學嗎？我們必須懂得從赤貧者的經驗中汲取思考及行動的泉源，不是從我們對他們的存在所預設的概念，而是他們真實的日常生活情況。到底是誰日以繼夜地生活在赤貧的核心？在那裡過活的人，是否像在大學學府的人那樣，不斷有人前來聆聽就教？我們的神學是以什麼角度、由什麼樣的真實見證形成的？

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應該與神為一，神可以從中再次找到自己，無法否認。這迫使我門要從最被拋棄的族群身上汲取知識的泉源，但是，這對我們來說難如登天，理由何在？在歐洲，我已經說過，這些族群不會被詢問過意見；歐洲赤貧者的歷史是一段靜默無聲的歷史，它被拋棄在蕁麻叢中，而且我們沒有嘗試去分享這群底層百姓的敏銳性。雖然大家對拉丁美洲的赤貧族群已有不少討論，但他們的情況也和歐洲相去不遠，赤貧者本身沒有做見證，意思是，他們未曾被耐心詢問過。他們太少被邀請去做見證，因此難以發展公民生活、群體生活及整體人類生活的意識。由於這些理由，我不知道基督徒是怎麼從他們身上汲取解放神學的泉源。

普羅亞紐主教說：「窮人向我們傳報福音。」而你補充：「沒有赤貧者參與的神學怎麼站得住腳？」這中間有沒有矛盾的地方？

我補充：沒有赤貧者參與的神學無法存在，而赤貧者只在某些情況下才會教導我們。普羅亞紐主教提醒我們：「在拉丁美洲，大家多少都處於奴隸狀態。」但是，爲了和天主相遇，卻必須走向最受壓迫的人。我們知道去哪裡找他們嗎？我們知道在什麼情況下，他們才會和我們深談？

以尼加拉瓜爲例，在馬那瓜湖，舊政權被推翻時，反抗的工人及革命者在主教座堂得到庇護，當時在教堂外面，有一群窮得無法成爲革命者或連工作都沒有的百姓，因飢餓面臨死亡。教會臨在於各處，神父及修女們不只供應食物給教堂內的革命者，也給貧民窟的百姓醫療照顧，並和他們分享食物，因爲在城裡的貧困社區，市場已空無一物。但是我們都沒注意到這些，教會當然一直都很謹慎，但重要的是要去了解：教會優先關懷的對象是誰，而且怎麼使這些人成爲教會神學的保證。

不久之後，也是在尼加拉瓜，不同的情勢產生了，也就是掃除文盲。人們開始說：這個民族得到解放了，他們開始學習讀書寫字了。這並不完全正確，在赤貧地區，掃除文盲大隊還未到達。他們一直沒有蒞臨。那麼，以學習讀寫來解放窮人意謂著什麼？這些文字會由誰來使用？

你想說的是尼加拉瓜並不是實踐解放神學的最佳典範？

在尼加拉瓜一定有不少典範，只是我們知道得不夠清楚。拉丁美洲的主教重申：在必須選擇的時候，教會總是和窮人站在一起。這些地方的緊張情勢為神學研究帶來一種新的刺激，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建立神學。也許在尼加拉瓜的信友們是想透過教導讀寫的行動嘗試，來建立他們的神學。這樣的嘗試是否真能讓赤貧者開始表達自己？是否能揭示窮人生命與思想的深度？這是我不斷追問的。

在西歐，義務教育行之有年，可是我們發現，如果學習讀寫的赤貧者沒有受邀表達自己的生命，他們就會繼續陷入無知中，舉步維艱。如果你真心相信窮人的話語對你來說是重要的，他們才會感受到你真心想聽他們說話；如果窮人對你是重中之重，他們便會對你說出最本質的東西。別人的重視讓你得以確認自我思想的重量，你便會努力整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必須邀請這群子民學習讀寫，好能表達他們生活與盼望的動力是什麼；沒有這種邀請，赤貧族群將繼續被拋棄在智識的領域之外，遠遠落在人後。對窮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意識到他們的生命見證會給整個人類帶來最本質的東西。在這點上，我們已站在解放神學的核心。

你提到，對教會來說，建立解放神學在於和最受壓迫的人分享生命及思想，這是不是如

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的：「所有的神學並不必然來自基督宗教的靈感。」

教宗曾論及自由：「個人及社會生活必須建立在自由之上。」因此，教會生活也應該建立在自由之上。在羅馬，在一次和第四世界年輕人的對話中，教宗告訴我們：「教會是基督的教會，而基督誕生在赤貧中。」因著基督，教會注定要和赤貧的處境相連，這是無法規避的事實，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指出這點。現在，我們必須從中為神學做出結論。

在談論解放神學之前，必須先談人類身為天主子女的神學，意即所有關於人類是天主後裔、天主兒女的神學。沒有從內心深處意識到這點，我們不會去聆聽那些徹底喪失地位、最不易相處、最不易了解的同胞，我們不會像兄弟姊妹般去接納他們、愛他們。沒有默想貧窮、被誣蔑、被羞辱及喪失地位的基督，我們不會想去認識最貧窮的人，我們不會想去向他們要求任何東西，我們將「代替他們講話」，我們將站在一個較優越的位置來建構解放，而這樣的解放是他們永遠構不到的。

因為沒有站穩在「大家都是老天爺的孩子」這個真理上，我們才會那麼輕看別人的經驗，才會藐視、歧視他人，甚至對他人心存恐懼。這特別容易發生在赤貧者身上，也就是那些完全處於我們的生活圈之外的人，我們之間沒有相同的認知，沒有相同的表達方式，彼此的思考邏輯迥異，以致於我們把他們的經驗和思想看成一文不值。讓我訝異

的常常是，一些解放者輕視他們所要解放的人。當然不是輕視那些和他們層級、地位相同的人，而是其他人，特別是最貧窮的人。

解放，很好，但解放誰？當然是解放天主的子女，那些最受蹂躪、最被糟蹋的子女。而這位天主是誰？當然是福音中的天主，不然，我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 任何形式的壓迫都該停止

你認為光是經濟的解放，也就是說光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不好？

關鍵問題一直是：誰的解放？拉丁美洲的情況是要從一個經濟與社會的體系中解放出來，在這樣的體系下，普羅亞紐主教認為所有的人多少都是受奴役的。但是，在衆多形式的壓迫中，要對抗哪一個呢？在衆多受壓迫者中，誰來為我們指示解放呢？

如果我們倡言要終止壓迫，那麼任何形式的壓迫都該停止。不能只是解除某些同業工會、礦工或是佃農所受的壓迫，壓迫本身應該徹底消失。因此，人與人的相遇，應該走到最深處，承擔彼此的命運，直到赤貧者的那一份。否則，一切都是徒勞的，壓迫將會繼續，而且是我們使它繼續。愛人如己，就必須接受與愛相隨的一切，甚至包括面臨像赤貧者一樣的匱乏。如果我們沒有貫徹到底、接受所有結果，我們就只是在轉換剝削



的方式。相反地，不管是經濟還是其他的解放行動，我們若能貫徹到底，保持和赤貧者的結盟，早晚我們會發現自己也和天主結盟。

那些談論解放的多數是年輕人，他們並不懷疑我們真誠表達的基本信念，但是他們無法理解爲什麼我們沒有貫徹到底，爲什麼我們違背了初衷，排斥了當初引發靈感、激發我們奮鬥的人群。天主以最貧窮的人爲優先，祂自己就是最貧窮的人。我們卻把天主排除在我們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範疇之外，而且我們常常自信滿滿地說：福音本來就不是一種政治性的指示。這樣一來，我們就給自己充分的理由不去把每個人都包括進來，尤其是那些最貧窮的人。我們自作聰明，挑選了我們自己覺得滿意的窮人，這樣一來，天主就缺席了，因爲我們在淘汰窮人的同時，也把天主排除在外了。

## 何謂「自由的天主」

對你來說，最貧窮的人不只是天主的參照，他們更是貧窮與自由的耶穌基督的化身，祂爲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但是，何謂「自由的天主」？

很難談論天主，因爲這需要教會內一個集體的來往和交談。只有教會能談天主，我們當中的每一位只能模糊描述。

對我來說，自由的天主像一股清流，水善利萬物，吸引著所有的生命。相對於天主，一個自由的人意謂著他眼中沒有任何人是乏味、無用的；那些妨礙我們去發揮天性及了解他人的絆腳石，他一一清除。天主的自由是：連罪過都不再是阻礙。我常想，所謂的革命，也只能是這樣：即使是罪過都無法阻止天主愛我們。即使是地獄都不會是全然可怕的，因為天父忘不了我們是祂的孩子。

天主只能保持關注，沒有別的選擇；祂全然自由地關注，並且關注到底。對我們來說，如是跟隨祂乃生命大計。我想，解放神學只能建立在聖若望宗徒（又譯使徒約翰）的這句話上：「天主是愛。」並非有所偏袒的愛，而是完完全全的愛。同樣的，人的解放也只能是這樣，從一切阻擋我們去愛他人的事物中解放出來，這個他者包括最貧窮與最富有的人。日前，你曾經提過有關革命的問題，現在我想回答你：在天主眼中，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決裂不能存在；耶穌基督正是爲了避免這樣的決裂而犧牲的。

記者雅克·良機（Jacques Chance）「有一天在廣播節目中問我：「您想要說服別人，可是別人願意跟隨您嗎？」人們不斷用這個問題來套問教會：「你既然無法宣稱別人願意跟隨你，那麼早晚必須用暴力手段來使別人屈從。」至於我，坦白說，我遇過許

譯註1：雅克·良機（1928），法國知名電視與廣播節目主持人、記者和作家。

多對赤貧一無所知的人，但是我沒見過在發現赤貧後還保持冷漠的。

不過，福音中的富少年在耶穌要他捨棄一切跟隨他時，卻轉頭回家去了？

他在這條探尋的路上沒有貫徹到底。可是，天主並沒有說，因為他們無法改變就要發動革命。祂只說，富人要進入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但是基督從未放棄過這位少年，祂相信有一天少年能夠改變。對耶穌來說，富人和窮人都要加入祂的行列，不是在天國裡，而是在這世上，好能在塵世的生命中開始建立天國的理想。你可能認為我是沉浸在虔信主義裡面，說我在談來世中窮人和富人的關係。但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相信，我們沒有權利對別人感到失望；在塵世，人們就已經願意共聚一堂，人們渴求和平、追求理解和仁慈；對人類來說，否定他者違反自然本性。

我曾經花許多精力想去說服別人，由於我以窮人對我的期待去期望別人，結果往往令我失望。我沒有意識到，不論是什麼樣的奮鬥，每個人都在當下做了他所能做的。我曾期望每一個人都像志願者一樣，認定只有最貧窮的人能夠教導他們認識天主。我強加了一個使命在他們身上，而這使命未必適合他們。由於對他們有太多的期待，以致於沒有覺察到他們已經做的努力。

從此之後，我常問自己：在拉丁美洲或其他地方，那些認為非革命不可的人，是否

嘗試過其他可能的方法來說服握有資產者？如果我們對待富人就像我們聲稱對待窮人那般有耐心和恆心，如果我們也努力去了解富人，我相信這個世界會改變。如果我們愛得更多、投入更多，這個世界會不一樣。你會問我，我是否要讓窮人在等待的過程中繼續受苦？同樣的陷阱一再出現，讓窮人脫離不幸刻不容緩，沒錯；這也是爲什麼我們不該再等待、遲疑，我們應該脫去舊我，和他們分享我們自己。如果我們讓自己去承擔他們的痛苦，沒有保留，那麼我們馬上要付出的代價便是我們對富人的耐心。誰敢說我們加入了赤貧地區的居民後，窮人的世界不會因此而完全改變呢？如果我們以爲，把生命獻給窮人並不會改變他們的生命，那就表示我們不了解窮人，我們在傷害他們。如果我們說要讓窮人得到自由，卻不爲他們獻上我們個人的自由，那麼，這樣的解放有什麼意義呢？重要的是完全獻上我們的自由，爲了讓他們重新回到筵席；讓他們不僅和教會重聚，也加入工會以及爲新社會奮鬥的行列，加入有志之士的日常生活。

說到底，天主的子女就好比天主那愛的激流中的一股水流，愛的激流不會只承載某些人而拋下其他人。活水源泉，隱身於衆水之中；只有那些願意花時間細看與等待的人，才能看到源頭湧出的水泉。

事實上，人類極度傲慢，他們想要替天行道，他們說：「這事將在我們這一代完成。」不然就說：「那事將永遠不可能達成。」這是一種謬誤。事實上，每一個時代都

承擔著部分的解放任務，要懂得辨認出來，去繼承它，並善加發揮。可悲的是我們不懂得如何估量，假若結果不如預期，我們就斷定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如果我們虛懷若谷，滿懷敬意，走近細看，我們會看到進步。

我認識一些曾加入第四世界運動，後來又離開的人。十年後，他們跟我說：「您知道嗎，我雖然沒有留下來，但是，我看世界的眼光不再相同。」這個社會強迫窮人接受它的解救方式，它告訴窮人：「你們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那樣做。」我們也是，我們選擇自認為好的方式，強迫這個社會改變。這並不是解放，這是以暴易暴，用另一種壓迫來取代原有的壓迫。

領悟到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孩子，會讓我們更有耐心嗎？你認為那些眼見自己的同胞生活在赤貧中而忿忿不平的基督徒有辦法耐心等待嗎？

我想，只要人們在面對赤貧時沒有採取觀望的態度，沒有在原地踏步，我們就應該耐心等待。在斷裂的纜繩及潰決的堤壩上，天主繼續存在。祂是一端激流，洶湧澎湃地穿越人類的歷史，一代又一代，從不停止。我向你保證，從現在起，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成爲這湍激流的一部分，可以對窮人的解放有貢獻，只要我們不把進步單單保留給自己。最貧窮的人有權利知道，所有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會做過富少年的嘗試。這個抉擇

或隱藏在內心，或外顯出來，端看我們是否細心留意。耶穌教導我們盼望的真諦，並向我們肯定，我們可以懷抱希望，而且我們的盼望會有結果。所以，我們有什麼權利灌輸窮人革命的思想？所謂革命就是徹底表達對人性的絕望。我們怎麼可以把這麼嚴重的錯誤轉嫁在他們身上？每一個人，無論窮富，都在尋找天主；在這尋找的路途上，不都在追求彼此的和諧嗎？窮人是第一個渴求和平的人。革命，卻把所有人推向毀滅。

當我們真正去注視人，以及人所創設的制度中最美好的東西時，我們會發現這個很棒的事實：每個人要的其實都是同樣的東西。如此一來，無論選擇哪一條路，所有的人都懷抱著同一個天命：尋求人的完滿；我們沒有權利否認任何一個想要完成天命的意願。這並不阻止我們去看到一些偏離正道的事，也不會阻礙我們對惡事的揭露，但是我們主要的精力應該放在別的地方。假如我們相信天主是生氣蓬勃的，而且強而有力，不斷彰顯祂自己，那麼，我們首要的關懷將是為祂的力量做見證，而這個力量出現在每個人身上。持續不斷的抗議，不該轉變成對人的攻擊，它只是對人類各種行動的不足之處做出提醒。這個抗議不能成為對他人的敵意或絕望。

## 面對其他宗教信徒時

你的運動遍布各大洲，周遊列國時，你也召喚來自不同社會體制的人。依你看，每個人身上的「最好」必然引領他們走向福音中的天主嗎？不然，你所謂的自由的天主只是某一群人才聽得懂的方言；但是，對我們來說，祂卻是絕對的普世真理。祂在佛教徒的眼中也那麼絕對嗎？

在問這個問題的同時，你假設福音曾在某個時期，在世界上的某個地區的某個文化中如魚得水。猶太基督宗教文明的概念似乎確認了這個假設，這其實是個誤解。

如果你問，一個來自佛教界或者佛教文化的人，能夠想像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嗎？我可以告訴你，在猶太教的文化中，這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國王之子自願成爲窮人一段時間，是可以想像的；但國王之子像窮鬼般死去，卻是違反歷史規律、違反傳說故事的。依照慣例，愛是不會走到那種地步的，歷史總會在緊要關頭轉變成幸福快樂的結局。也因此，在各種文化中，每個人跟耶穌基督的相遇都是一個奧祕。這是天主的事，是祂聖愛的奧祕：我們無法得知祂的愛明天會轉變成何種形式。一直到現在，這個愛總是以各種方式帶領我們走向最貧窮的人。透過耶穌基督，天主以一種前所未見、徹頭徹

尾的方式顯示祂的愛：刻意失勢喪權的基督。

對我來說，有兩件事是肯定的：在歷史的某一刻，基督天主子帶著重要的答覆來到世間，是人類迫切需要且不斷高聲要求的答覆；耶穌基督就是天主顯現與答覆的高峰。今天，天主仍然這樣答覆我們，我既然受召力行這些答覆，就必須活出它來。這個雙重的肯定對我已經足夠。與其花時間探求天主在其他宗教中如何發言，不如去愛人，愛到他們發自內心分享出自己的最好。

老實說，我從來沒問過自己，我的伊斯蘭兄弟和佛教朋友們要如何在天主內相遇。事實上，我深信合一的記號已經顯現：在塞內加爾東部被飢荒陰影籠罩的村落裡，我們發現它；在布吉納法索，從一群被赤貧吞噬的百姓的殘疾孩子身上，我們發現這個記號；在泰國，從那些因極端匱乏而被嚴重詆毀的家庭中間，我們也發現這個合一。說得具體些，在他們身邊較富裕的同胞裡面，我從沒遇過一個對自己的赤貧同胞絲毫不感興趣的人。相反的，圍繞著最貧困的兄弟姊妹，我們交流出每個人最本質、最美好的事物。

我在這裡談的是一個具體的經驗，在第一線，在行動的現場，我們從沒遇過任何一個護衛富人的宗教或是意識形態；相反的，我們在每個地方都遇見這樣的朋友，他們承認赤貧者在他們的生命中缺席，而且原本事情不該如此；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認為這樣的缺席是天意。這點再次提醒我們，耶穌基督已經建立了合一，而且祂把它托付給我們。



合一已經實現；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步上最疲憊的弟兄所走的路徑，通往合一的道；祂就是道，就是合一。

不是經由革命，而是透過人與人的相遇來達成窮人的解放，這樣的信念引領你建立了一個包含各種宗教信仰的志願者團體，它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社會，不過它能成為這個時代令人信服的典範嗎？

毋寧說是一種生活範式，或是所謂的生命共同體：你是猶太人，我就跟你一起當猶太人；你是伊斯蘭教徒，我們就一起當伊斯蘭教徒；你不相信天主，但相信人，我就跟著你貫徹對人的信心。這比單純的互敬更為深刻。在某次志願者深根大會，一個不信神的志願者首先聲明窮人過靈性生活的權利。他這樣說的意思是，靈性生活並非信徒獨有。他更進一步說：「你們信仰上帝的人，為什麼還不將你們的最好貢獻給第四世界呢？我身為一個非信徒，要求你們貫徹自己的信念。」

這個志願者表達出他對人類堅定的相信。看到這個志願者團體有辦法堅持不懈，並且能夠凝聚背景如此多樣、異質性這麼高的男女老少，馬諦樞機主教說：「這個運動或許不是屬於教會的運動，但，它或許是未來教會一個最真實的表達。」

這一點又將我帶回解放神學，它不只是神學的修正版，而是一種深化。對最貧窮的

人來說這是一件好事。他們無法了解手中握有合一與和平資源的人，為何沒有善加利用。他們談起改善未來的時候，他們的孩子聊起自己的願望時，同樣的話語一再出現：「希望大家都能夠彼此理解；大家應該要攜手合作。」我們憑什麼不去認真看待這些渴望？怎麼能夠向他們提議一些既不是由他們構思、也不是由他們選擇的鬥爭與革命？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懂得不再鳩占鵲巢，不再阻撓他們展現自己的獨特貢獻？

## 邀請他們參與盛筵

那些向窮人提議各種鬥爭的人或許也沒有選擇的餘地，特別在拉丁美洲，現實的處境讓他們無法相信富人會願意在政治上作出什麼轉變。

對此，我不是最適合評論的人。志願者團體去到拉丁美洲一些完全被遺棄的印第安村落，那裡似乎連外界發起的各種鬥爭都進不去。對我們來說，重點是：如何在那些沒有開發道路的深山地區找到他們，邀請他們參加盛筵？怎麼讓他們轉化我們的信念？而他們的渴望與期待又是什麼？我們有沒有辦法和他們一起回歸社會、重建社會？

譯註 2：《新約聖經》的婚宴的比喻，（馬竇福音（馬太福音））二十二：1-14。

總之，我們越急著想改造社會，越容易忘記窮人的焦慮，忘記他們也希望能夠被轉變。「向窮人傳報福音」之所以是命令句，有好幾個原因。耶穌基督知道，只要他們一直被禁錮在匱乏中，他們就無法想像自由與解放。我們已經談過他們急切需要寬恕。他們需要相信自己，才能夠自由地面對天主和其他人。或許必須生活在他們中間，才能夠理解到他們最大的痛苦在於：永遠感覺到自己比不上別人，甚至比不上自己；總是得不到愛與正義；相信和平卻無法達成和平。想讓這個社會從暴力、功利和虛假中解放出來當然合情合理，但窮人難道不是第一個有權從這一切中解放出來的人？

我們看著這個社會，老王的勝利是建築在老李的失敗上面，我們趕走老王以便取而代之，或者我們貶抑老李，免得他搶走我們的位子。你爭我奪成了家常便飯，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我們肯定很難意識到這個社會、這個人類大家庭還是活出一種精神，光照著爭名奪利的我們。知識分子，不論信仰為何，總會試圖追求一種靈性生活，最後他們總能找到一些存在的意義，像是爲人道、爲正義而活，這此讓他們超越自己、自我成長。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有辦法合理化自己的自私行爲：我是以自由創業的精神在拚搏；基於我的勤奮和節儉，我收取了應得的報酬。他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慰藉：上主愛我，祂必會協助我……但是最貧窮的人沒有任何支柱來架構這樣的生活、建立這種內在的安全感。事實上，最嚴重的壓迫是，沒有和貧窮人分享我們的教育、靈修或天主，而我們全都要

爲這個壓迫負起責任。

窮人跟任何人一樣，可能去貶低自己的鄰里、講他們的壞話、嫉妒獲得幫助的鄰居；即使自己因爲孩子被強制寄養而心靈受創，他們還是會去向兒少保護局揭發另一個沒能讓孩子吃飽的家庭。不過，這並不阻礙他們同時做出超越常人的慷慨舉動，一如我們之前提過的。可惜，沒有任何人來告訴他們：他們這些非比尋常的慷慨會帶領他們走向天主，一如天主之子，他們將走向天父。耶穌的門徒膽小懦弱，而且他們的行爲完全是窮人在面對掌控者時非常有現實感的反應。可是，天主讓他們明白，即便如此，沒有什麼可以阻礙他們成爲救贖計畫的代理人。每個人都會懦弱失能，但是我們拋棄了最貧窮的人，任憑他們處於失能狀態，就剝奪了他們的靈修路徑，讓他們無法藉以解讀自己種種的軟弱。所以我對這個向窮人極力推薦的解放充滿質疑，它並沒有讓窮人進入新社會、讓他們肯定自己或是自由在地抬頭挺胸。列寧說過：我們沒辦法和奴隸一起發起革命。依我看，我們無法跟一群充滿罪惡感與自卑感的人建立新世界。

我們會不會把窮人過度描繪成「義人」？

我談的主要是最貧窮的人，他們並沒有被當成義人；相反地，他們被視爲「壞窮人」。當他們開始爭吵、背叛彼此的時候，我們就把這些口實當成箭靶來攻擊他們：「你

看看，他們就是沒辦法和睦相處，沒辦法當個老實人，還偷對方的東西！」他們遭遇的困難讓我們理直氣壯地排斥他們：「我就說嘛，盡是些扶不起的阿斗！」在法國和其他國家，社會學家的研究加深了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當中有一位曾來到諾瓦集營區，斷言這些家庭不願意共同生活，他們攻擊彼此、不是你偷就是我搶。

## 文化性的革命

所以你認為，人的解放首先是一個罪過的解放？有些人會說這是反動立場。

我想，反動者指的是那些窄化了人權概念、卻又大肆吹噓的人，他們把人權限縮為公民與政治自由，但是，這樣的人權對窮人沒有任何效用。對那些無法獲得教育、靈性生活與內在安全的族群來說，資源掌控者與握有論述權的人並沒有護衛到他們，以至於政治參與的自由成了一種令人憤慨的奴役。這是在矮化窮人，把他們當成次等公民，當成我們表現仁慈仁政的對象，完全相反於解放。

對我來說，解放首先是向最貧窮的人傳報福音，把他們放在世界福傳的核心位置。耶穌基督不只是說：「走上人跡罕至的路途。」祂更要求我們去把路上的盲人和殘障者帶回筵席<sup>3</sup>。向最貧窮的人傳報福音，並不是說我們要和他们一起陷在原本的困境裡，

而是把他們在福音中應有的位子還給他們，就是耶穌基督給拉匝祿<sup>4</sup>、撒瑪利雅婦人<sup>5</sup>和伯利恆牧羊人的位置。

如果我們要告別過往，那也必須以基督的方式來進行，進行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如果是這樣，我就深表贊同。我已經跟你說過，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透過生命與死亡將文化性的革命帶進這個世界。但是，當時的文化還沒做好心靈準備，即使是當時的先知也無法跟進，耶穌顯示自己的方式沒人能夠馬上理解。祂徹底撼動了各式各樣的思想流派，撼動了那個時代的思維框架與模式。他造成劃時代的改變，激起猶太民族的文化斷裂。基督宗教和猶太教決裂，這個斷裂並沒有在信徒的心神中延續。

但是，耶穌基督不僅是帶來一個文化性的革命，祂還召叫我們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文化革命。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完全承擔了基督的革命事業，也就是把大位讓給最貧窮的人。

文化革命也可以變得非常暴力。

譯註 3：參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筵席的比喻。

譯註 4：參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

譯註 5：參看〈若望福音〉（約翰福音）第四章：向撒瑪利雅婦人顯示自己。

基督宗教的文化革命在於打破既定的想法，而不是對人施加暴力。我想說的是，這樣的革命不需要對人施以暴力。基督用祂的生命與死亡實現了心靈的革命，同時也是一個記號。這場革命已經實現，耶穌把祂的教會留給我們，好讓所有的人都有機會和祂再度興革。教會不能對任何人說：革命不需要你，我們已經替你革好命，或是我們革命來反對你，革命沒你的份。

這應該是一場開放給每個人、且持續不懈的心靈革命。和教會一起為此投身，肯定意味著重新創造革命的形式以及人類的教育。要重新思考它的內涵與方法，並指出導師，因為傳報福音的目的是解放，是爲了讓人們效法基督，這意味著要準備人們的心靈，確保最好的環境與條件。有史以來，教會一直都這麼做，因時制宜，隨著時代的不同調整自己的做法、禮儀、語言和體制。教會在調整與改變的同時，總是深深地尊敬人類發展的進程，引導卻不超前。教會尊敬世人緩慢的進程，隨著他們的眼光改變，變換自己使用的語言；她因此被批評成總是落在世人後頭，看似老態龍鍾地在後面拚命追趕。這就錯了。教會不是我們所參與的各種重大視野轉變的源頭嗎？她或許不是唯一的源頭，但肯定不是影響力最小的。有時候教會在言行舉止上的確慢了半拍，這也很正常，因為她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她總是站在第一線護衛窮人，因為耶穌基督一直讓自己置身在所有窮人的面前，而教會必須化身爲窮人方能加入基督。教會不必跟

上世界的潮流，但她必須以窮人、以這個還沒被世界所接納的人為指標，重塑自己。也因為這樣，她可以帶動總是走在前面的人，回望省思，而此舉不斷帶來解放。基督徒，如同歷史上許多人，總會在歷史長河中停頓下來，以某一個窮人為目標，追尋貧窮和簡樸；他們藉此找到特定的位置安頓下來，然後閉門造車進行各種奮鬥。雖然不能否認其中包含的正義，但這些奮鬥常常已經不合時宜了。教會說，不能再這樣浪費時間，現在必須擺脫鎖鏈，放下身上過重的包袱，才能走得更遠。

請具體說明這點。

具體來說，教會應該重新檢視並善用歷史上所有與極端貧窮有關的經驗，才能辨識出貧窮的今日樣貌。教會及其成員都保存了一段記憶，必須讓這段記憶開花結果。幾世紀以來，我們的社會也保存了一些記憶，是關乎對赤貧者、也就是被排斥者的認識。我曾經跟你談過窮人的家系，我跟你說他們的歷史並沒有被傳述。事實上，我們擁有一份被埋藏的記憶，一些非常真實的經驗。福音就在那裡，等著幫忙重新整理，理出頭緒，以新的眼光重看過往的記憶與經驗。過去一些還沒被理解、甚至無法被理解的事實，今天已有了新的進展。以大家今天講話的方式為例，我們已經不再只是說「開發中國家的貧國」，而是說「窮國中的窮國」。今天大家普遍承認：最貧窮的國家並不是那些被開



發與被剝削的國家，而是我們沒有把蘊藏資源的被開發國家當成地主國在尊敬。這樣一來，記憶甦醒了，許多想法，許多關於排斥的古老經驗，開始在我們之間傳遞。

你似乎是說人類有在進步。

人類當然一直在進步，他的敏感度在進步。人與人教學相長，不停地獲得新的見解、領悟新的價值及發展新的行爲。但是我們習慣貶抑、批評他人，所以目光如豆，以爲太陽底下不再發生什麼好事，我們的目光膠著在人類殘酷的經濟模式、軍備競賽、以及對自然資源的浪費等。我們忘記人類在對大自然的認識上、在反軍備示威上以及在爭取新型國際經濟秩序上，都有極大的進步。過去，我們的理想從未被提升到這樣的高度。

我們誤以爲革命才能讓世界進步；當我們透過赤貧者的眼睛去看，我們會看到各種革命只是改朝換代而已，如今所謂的進步過去已經發生過。人類依靠著前人耐心累積與印刻在共同記憶中的經驗前進。在第四世界，我們決意要書寫赤貧者的歷史，是爲了讓這段歷史能夠融入集體的記憶裡面，確信人類會從中獲益，並讓它結實累累。

我不相信矮化、貶抑人能帶來什麼好處，這只會讓人變得更糟。人不停的學習、體驗、遭遇失敗，但是失敗和成功一樣，都能幫助他往前走。我不只是相信進步，我看到進步。

前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和大規模滅絕猶太人又怎麼說？難道不是發生了一些讓人極度悔恨的倒退？

各種暴行是恐怖的，獸性一直存在於人性之中；人總是有辦法做出傷天害理的事，為此，我們當然該有心理準備。當我說人的敏感度在進步時，我並沒有說每個人都跟得上自己所領會到的。天主的子民往前邁進，但是從來就不強迫別人要迎合共同的理想；一旦時候到了，在人生歷程的某一個時刻，每個人總是有機會領會那個理想。我並不是因為奮鬥的需要才故意保持樂觀，我只是不懂我們怎麼會看不出人類一直朝理想邁進。

在這方面，最貧窮的人不會搞錯，他們提醒我們：人類大團體已經獲得了各種福祉，民主有了進步，人權也逐漸擴展，但是，我們卻沒有和他們分享這些進步的成果。依你所見，巴西總主教多姆·赫爾德·加馬拉（Dom Helder Camara）<sup>6</sup>五十年前的言論有不能和他今天的發言相提並論嗎？歐洲有可能邀請他來公開演講嗎？這樣的進步掃除將壓迫合理化的剩餘理由。

譯註6：多姆·赫爾德·加馬拉（1909-1999），曾任巴西歐林達（Olinda）和雷西佛（Recife）教區的總主教。

他的這句名言經常被引述：「當我關心貧窮者，給予麵包時，大家都說我是個聖者；但當我詰問貧窮為何發生時，大家卻說我是共產黨。」

我們應該透過人類的自我詰問來衡量人類的進展，透過人類對問題的回答，看到人類視野的改變。勞改營一直存在，只是今天大家更強烈地意識到它的殘酷。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Pinchet）、阿富汗的壓迫行動與紅色高棉的殺戮，在在讓每個人感受到人性的墜落。我們無法再用這樣的藉口：「這些事情與我無關，我又能怎麼樣？」今天，自由要求我們必須聲明這些罪行是全體人類的錯誤。

加音 7 是否因為殺害手足而感到羞愧？

加音不能再躲起來了，社會不再容忍殺害手足的事，這件事已進入人類集體的記憶與思想中。未來發生的罪行將不再被容忍。

現在我們看到，傲慢正一步一步瓦解。不久前在西方國家，我們一度相信貧窮已經消失，我們爲了新建的團結關懷網絡與社會福利制度而沾沾自喜；我們自以爲成就空前，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媲美。我們的視野被遮蔽而不自知，許多刻板印象、偏見與先入爲主的想法依然橫阻在眼前。關於謙遜這堂課，我們還停留在初學階段。我們依然以十分高傲的態度面對發展中國家，以爲自己的民主經驗與科學知識足以成爲世界思想潮流的領導者。雖然我們也會用一種故做優雅的謙遜，冠冕堂皇地說：「窮人可以教我們許多東西。」其實言不由衷。不過，我們之所以玩弄這種謙虛，還是有他的道理。我們感覺到，

這種好爲人師的態度已經不被其他夥伴國家所接受。

在人類集體的記憶中也記錄了一項事實：我們透過組織結構來尋求解藥，以爲可以省去個人的努力，結果徒勞無功。我們也發現到，各種機制變得平等，具有排他性，違背立法者的初衷。這種覺察幫助我們回望過去，透過各個時代被各種機制排除在外的同胞，重新檢視我們的歷史。

找回謙遜，能夠教導我們以新的眼光看待窮人。多少世代以來，我們指責他們，說他們不思振作，毫無效率，說他們必須爲自己的貧窮負責。我們需要時間才能發生轉化，才能改變眼光，並淨化自己。深知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變得完美，所以要有更多的寬容，就像我們對自己的孩子一樣。

譯註 7：加音（又譯該隱）是《聖經》（創世紀）中的人物，他殺了弟弟亞伯爾（又譯亞伯）。

## 第十二章 獻身的生活

離開紅塵、離開羊欄去尋找失落的  
羊，多麼艱難！然而，奉獻自己的生  
命，是一種人權。



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的孩童談話。

吉爾·阿努以：

最後，如果必須概括你對教會的期盼，你會說什麼？

若瑟神父：

從一開始的訪談，我就表達了始終縈繞我心的熱望，希望教會認同這個時代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赤貧界，再一次認出自己的原貌，贏得赤貧者的愛，並將這份切身體驗過的愛情傳遞給世界。如果赤貧者從教會身上認出基督的面容——鼻青臉腫、焦頭爛額、被衆人所唾棄——他們會給教會帶來深刻的愛；而教會傳達給世界的訊息也將滿溢著這份愛。因為從死者中復活的，正是這個狼狽的基督。在那些嚴重被排擠者的真實生活中，神不只表達自身，祂更顯明了自己，祂表露出來的，既不是陪襯的客體，也不是空泛的想法，而是一個爲了被愛而受造的存在。我衷心希望，今天教會能夠活出這樣的面貌，並重新聲明這點。

如果把福音奠基於獻身赤貧世界的男女志士身上，我確信教會有辦法更新福音傳播的工作。教會會發現傳播福音的新形式，不僅擁抱貧窮，更迎娶赤貧。這個世界已經成立了許多機構來回應人類的問題，儘管充滿好意，但是到後來，這些機構堆砌出來的，更多是防止窮人湧入的城牆。從窮人的立場來說，各式各樣的計畫一直沒有發揮效用。但是，教會能夠而且應該讓窮人湧入。她要迫使自己重新發現摯愛赤貧者的方式，究竟

該如何愛，才能讓赤貧者藉由真實臨在的男女志士深切體驗到：愛是可能的，而且這愛帶來自由。

在這個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赤貧界，這個渴望與他人連結的赤貧界，教會理應派遣一群「擺渡者」，將第四世界的家庭渡回教會身邊。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才能說：「你們都是神的子女，分享共同的命運，不可歧視自己的同胞，不可視同胞如敝屣。」教會只能透過真實的經驗來言說：在教會內，友愛必須是一種實證的經驗。正因爲如此，教會必須派遣男女志士到第四世界去。

你說，在教會內，各個機構必須充滿友愛。規則與友愛如何恰到好處地結合？

這是教會兩千多年以來一直試著要做到的事。但是，爲了不讓規則破壞、甚至癱瘓整個機構，必須投入龐大的人力。缺乏人的投入，即使是教會，也會像其他機構一樣，變成防堵窮人的地方。然而，教會虧欠窮人的，正是這個心的教導，這個遵照神的誠命活出真愛的教導。教會在這個世界十分脆弱，因爲她無法強行灌輸任何東西給這個世界，而且世人經常嘲弄她所傳遞的訊息。只有最貧窮的人和教會一樣，彼此相濡以沫。教會與窮人一起，將再次發現：不管世代如何更迭，唯有愛是最重要的。

今天，教會不再聲明愛的優先性；回顧過去那些世代，教會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以

她於百姓中的臨在表達了這點。過去，教會宣講神的愛比較具有說服力，因為她不只參與各種奮鬥，也進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那時候神父還不會覺得花盡所有時間去拜訪貧窮家庭，是沒有意義的事；修女也不會覺得自己在學校是多餘的。在過去，他們都代表了一個有信心、勇於協調、充滿友愛與春風化雨的教會。我們當然不需要因循舊習，但是，為了達成使命，教會必須派遣男女志士進入這個世界，完全獻身於人與人的相遇，致力於把自己的最好和上主無邊的溫柔結合起來。

## 關於獻身

你所說的獻身，指的是神父或修女的聖召嗎？這難道不會和普遍的輿論相違背？——現在大家都認為所有的信徒都同樣被賦予使命。

這應該由教會來發想，不是按照富貴者的觀點，而是按照赤貧者的需要，因為他們也是教會的眷屬。我常想，教會在當今這個時代對神職人員的獨身要求，讓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困窘和險惡的境況中。為什麼會這樣？有人說教會好發命令，絕非如此。有史以來，教會和衆生，尤其是窮人，密切往來；因此，她深知，如果我們要為主的自我掏空做見證，光是物質的掏空是不夠的。世物的捨棄不可小覷，但，比起肉身的捨棄，它實



在微不足道。獨身所領受的正是被釘基督的五傷（編案：指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身上的五個傷口），正是教會對人類深刻尊重的見證。她表達了自己準備好捨棄某個人性最本質的部分，好能贏得屬於另一個層次的、「更深刻」的東西。

因此，教會有理由召回並祝聖那些以獨身的方式獻身給主的人。教會也必須清楚地向他們指出，那些在世間被監禁、挨餓、赤身裸體以及患病的人，就是基督的化身；這些人正是他們應該去愛的對象。爲了讓他們得到真正具有示範性的陶成，教會必須殫精竭慮，投注全部的心力。這樣的陶成，應該育成一顆能夠持續關愛、恆久投注的心神，因爲被貶得一無是處的赤貧者所渴望的正是這個。

你問我，對赤貧者與教會來說，獨身的聖召和特殊的使命是否有其必要？我的回覆是，首先，對教會來說，那些被祝聖的神職人員先是受召在困苦者身上敬愛上主。但是，這樣的敬愛既不是經由過去的施捨，也無法透過現代教會組織起來的新型慈善事業去實現。教會必須重新再造個人化的答覆來回應愛的呼聲，儘管這是舊式施捨救濟的一部分。教會必須找回恆久投身的部分，它曾經伴隨著施捨，或更正確地說，施捨曾經伴隨著投身。施捨的影子還在，只是隱身在更龐大、更有組織、更具有匿名性質的慈善機構背後。過去，面對第四世界的苦惱與焦慮還有他們對平安的呼求，教會以身體的臨在回應，但教會沒有繼續保留這樣的傳統。

而且不要忘記，我們的種種投身，赤貧者都看在眼裡，他們不會搞錯。當平信徒為了保護自己免受窮人打擾，說他們總得替自己著想，總得保有個人生活、尋求自我實現與未來的各種保障時，窮人心知肚明。因此，窮人無法完全信任他們，或是期待他們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在緊急收容營區與貧民窟的家庭常常跟我談到這些；即便如此，他們接受這些侷限，他們理解平信徒完全獻身的困難。但是，他們無法接受神職人員有所保留的投入。這些家庭不能接受神父或修女斤斤計較他們投入的時間，或是把自己的修會當成防堵窮人的護城河。

經驗告訴我，第四世界的家庭看得出這些差異；他們似乎了解到，修女和神父必須成為教會隱藏、幽暗與謙遜的部分。但窮人真的不理解教會為何要把許多限制加到修女身上，例如，要求她們在週末回到自己的修會，好像貧困區不是這些「好修女」可以過活的地方；他們不懂為什麼要在這些「好修女」的靈修與人性的投身上設限，這讓他們很受傷。

在我看來，第四世界教導我們，當獻身者的祝聖派遣與聖職都是以毫無保留、完全信任的方式獻給這些家庭時，他們在赤貧界的臨在才有說服力；一如那些在海外或是勞工中獻身的傳教士。

你應該不是在構思另一個托鉢修會吧？

我沒有說神父要成爲行乞者。托鉢修會是對世俗的抗衡，完全不是對赤貧的直接答覆。順帶一提，今天已經見不到托鉢修會挨家挨戶行乞，這或許是件憾事，因爲它提醒我們，失落在人類核心的赤貧，是各種社會組織與結構雙漏接的族群。這樣的實踐在世界的許多地方還是很普遍，它當然無損正義，甚至促進正義。我們肯定應該放棄這種對社會、經濟與政治表達異議的古老形式，可惜我們還不懂得以其他形式來取代這種體現基督教成肉身的理想，好能見證現世結構的不足與缺憾。赤貧者遺世獨立，爲了博取世人的救濟，比以往更感羞愧。

但我想強調的不是這點。我想到一些神父、修女與修道者被教會派遣這件事；教會爲了寬恕而存在，和赤貧者活出寬恕正是他們領受的使命。我們知道，真正的自由、最本質和不可或缺的自由，正是寬恕。這不是一個空泛的想法，而是第四世界每天傳遞給我們的訊息。我會告訴你，他們以最具體的方式活出福音的訊息。時刻到了，而且現在就是，我們要告訴他們，並幫助他們生活在喜悅中。

這不只是教會或神職人員的事。我深深相信，它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不

譯註1：托鉢修會（Mendicant orders）走出修道院，將福音傳給普通人，依靠百姓的賑濟和捐獻過活。

管他相信什麼，都可以這樣獻出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無論付出的是誰，每個生命的恩賜都有著同樣的重量，付出同樣的代價，帶來同樣的自由。不過必須承認，要在這樣的自我掏空中不屈不撓，需要持續、可觀的陶成與支撐。其他人可以選擇自由地付出，創造相稱的訓練與支持；教會則別無選擇，她把自己獻給最貧窮的人，她就是貧窮；而且教會團體以及她所給予的陶成，首先是爲了窮人而存在的。這個天命，再怎麼強調都不爲過。如果教會不出發到第四世界，就是任憑自己像糊塗的童女？一樣，沒讓領受到的豐富恩惠結出果實。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教會可以毫不費力地和第四世界相遇。她領受了使命，一份單靠人力無法達成的使命。

這個使命首先是對人的呼召，接著是陶成與支持。想想看，離開紅塵、離開羊欄去尋找失落的羊，多麼艱難！想想看，各種理智、心神與靈魂的撩撥，讓我們以爲可以留在塵世爲塵世服務！今天，我們都領受到自由、正義與和平的使命，如果我們稍有遲疑，沒有殫精竭慮，世人的眼光就會讓我們良心不安。在這個喧嘩擾攘的世界，充斥著各種呼籲，來自赤貧者的聲音和呼喚的力量，早已被淹沒在谷底。在這個時代，個人的天賦常被理解爲每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權利；這時，過獻身的生活，剩下什麼吸引力？然而，奉獻自己的生命，是一種人權；得以自由地奉獻自己的生命，是赤貧者絕對的權利。但是，在這個時代，這樣的聲明不容易被接受。

當教會提出聲明，說要給那些起身回應召喚的人必要的陶成和支持時，也遇到同樣的困難，這樣的難題在未來可能有增無減。在這樣的時代，許多人自稱爲人類事務的專家，每個人都可以成爲解放者，或是解放的領路人，要如何彰顯教會陶成的獨特之處？今日世界允許各種大膽的創新與實驗，好像每個人都背負著神聖的使命。今天我們目睹的進展，是前所未有的，人類自以爲有辦法承擔一切。但是，亮麗動章的陰暗面是：除了技術層次的養成，人們很難接受其他層次的教育。大家相信，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並且都具有惻隱之心，他自然知道自己該如何行事，所以，還需要什麼訓練？什麼特別的祝聖儀式？我們不太想過問教會承自基督的遺產蘊含這份對赤貧者的愛，而且這份愛需

譯註2：糊塗童女的比喻出自《新約聖經》〈馬竇福音（馬太福音）〉二十五：1-13。「那時，天國好比十個

童女，拿著自己的燈，出去迎接新郎。她們中五個是糊塗的，五個是明智的。糊塗的拿了燈，卻沒有隨身帶油；而明智的拿了燈，並且在壺裡帶了油。因為新郎遲延，她們都打盹睡著了。半夜有人喊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吧！那些童女遂都起來，裝備她們的燈。糊塗的對明智的說：把妳們的油，分些給我們吧！因為我們的燈快要滅了！明智的答說：怕為我們和妳們都不夠，更好妳們到賣油的那裡去，為自己買吧！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準備好了的，就同他進去，共赴婚宴；門遂關上了。末後，其餘的童女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吧！他卻答說：我實在告訴妳們：我不認識妳們。所以，你們該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時辰。」

要學習，因為它甚至違反人的本性，所以需要不斷的練習和滿滿的支持。

## 世俗與獻身之間

雖然我們不太想過問這份遺產，還是能夠感受到它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世俗中人一直不滿足？我就是其中一位。我們當中很多人都被生命的一體性深深吸引，一種宗教生活才能給出的絕對一體性；無法為此獻身，我們就難以滿足。但我們又很容易把這個想法擺在一邊，因為現實生活充滿各種好處，要求又不會太嚴格。

這些都是合法的好處，而且也可以蘊含恩典。這些都很正向，但它不該阻擋我們教導人們貫徹理想的追求。而且，這個教導從生命的早期就該啟動，從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開始。

這不是教會學校之所以存在的正當理由嗎？這個理由比人們平常設想的還要具體、還要堅強。這不只是提供家庭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這是教會自由選擇如何存在的問題、孩童權利的問題，以及赤貧者有權由此認識教會的問題。在每個世紀，教會一直信實地提供教育給赤貧者，並繼續為他們傳道授業解惑，這是她存在的理由。在每個世紀，教會都拒絕讓窮人淪為文盲，並為此努力不懈。對教會來說，在缺乏教育的地方施教，是

生死大計。重點不在取代國家教育，而是把教育帶到街頭，帶到貧民窟，帶到所有貧困區。教會必須提供典範，尤其因為她是我們國家唯一保有窮人記憶的機構；她就是窮人的記憶，沒有其他機構敢這樣說。

但，教會學校存在最重要的理由是，和年幼的孩童分享他們本來就明白的事：絕對、不妥協、真誠。孩童與教會的命運緊緊相連，長久以來，他們彼此已存在一種默契。孩童有權活出這樣的熱情，那些成人已漸漸失去的東西：和至善一起過活，和祂親密往來。爲了赤貧者和被遺棄者的好處而捨棄塵世的意願與承諾，就從幼兒開始。

你是在說宗教的承諾嗎？你說，這該由教會來發想，但你自己想的難道不是由教會所祝聖的修道生活？

我不知道這樣的承諾要以何種形式回應，也不知道教會要用哪個印璽替它蓋章。我只知道，第四世界迫切需要完全獻身的男女志士，而且，這些有志之士必須確知他們的使命出自一個團體，知道他們是由一個團體派遣與支持，而且這個團體願意承擔他們的陶成與投身的信實。赤貧本身不是合一的元素，光是反貧困的行動無法成爲人類共同的目標，這點再怎麼強調都不爲過。赤貧本身無法產出一種思想或一種倫理學。赤貧激發行動，但行動很快變質成活動主義，可能毀了行動的人。這是因爲，光靠行動無法帶來

合一；它帶來分歧，使人分裂。因此，那些教會派遣到受苦現場的人，需要一個堅強的團體。

## 祈禱與默觀的力量

教會最強大的力量不就是堅貞的默想與崇拜嗎？面對赤貧，默觀者的位子在哪裡？

他們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從一開始，在諾瓦集，我就希望來到這裡的有志之士專心致力於祈禱、崇拜和默觀，帶來靜默與平安，一個可以觸摸到的平安；你無法想像第四世界的家庭多麼需要這些。在他們充滿擾攘的生活中，帶入這些安定的元素與持久的平安，是最重要的。

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有辦法互相滲透嗎？

他們並非處於對立的兩端，他們唇齒相依，迫切需要彼此，他們的出現、存在本身已經足夠。我經常追問自己：如果窮人不知情，也無法融入其中，那麼儘管教會為窮人代禱、進行崇拜、詠唱光榮頌，有用嗎？如果窮人把教會的祈禱變成自己的，如果有一天，他們在這些祈禱中照見自己，看到自己被教會的祈禱緊緊擁抱，他們就可以完全融



入慈母教會。當我告訴你，我多麼渴盼教會可以認同這個時代的赤貧，我想到的也是默觀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這樣的存在是完全可行的；否定這個可能性，就是對窮人嚴重的傷害。只要教會想辦法讓人認識她，雙方肯定會歡迎彼此。我無法告訴你，到底有多少被修女撫養長大，之後遭遇諸多變故的婦女曾告訴我：「神父，您不曉得我有多後悔沒去當修女。」這樣的表述不是一般我們常看到的三分鐘熱度，也不是她們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她們打從孩提時代，就與日夜祈禱的修女們朝夕相處，她們觸摸到從默觀生活散發出來的平安、寧靜與滿全。

因為歷史因素，我們將默觀者打發到我們身外的世界。然而，他們卻是唯一能夠宣稱身處塵世卻不屬於塵世的一群。只有默觀者可以維持屹立不搖，不妥協，不被轉眼即逝的風潮或塵世的思念所撼動。在過去，默觀者的修院之所以建在鄉間，不是為了逃避世界，而是因為人們——尤其是窮人，在鄉間過活。今天的默觀者卻不在窮人過活的地方現身。

也許默觀者是今日教會最不被珍愛，也最不被了解的一群。尤甚於以往，他們是實現革責瑪尼（Gethsemane）<sup>3</sup>的滿全之士。在橄欖山<sup>4</sup>上，一切都發生得飛快，但上演的卻是整個救贖工程。看來無用的凡夫俗子的祈禱，不被聆聽、不被了解、不被接受，卻

是人類因此得救的祈禱：這就是教會的默觀者。也因此，他們是赤貧者的祈禱，而赤貧者，就是教會。

譯註3：革責瑪尼（又譯客西馬尼）的莊園是耶穌受難前祈禱的地方，見〈馬竇福音（馬太福音）〉二十六：

38。〈馬爾谷福音（馬可福音）〉十四：32。

譯註4：耶穌受難前由橄欖山進入耶路撒冷；與門徒最後晚餐後，也往此處去。根據〈路加福音〉，也是受難前祈禱的地方（〈路加福音〉二十二：39）。

【附錄一】

## 若瑟·赫忍斯基小傳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二日，若瑟·赫忍斯基於出生於法國昂熱一個貧困的社區，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從小，他就是一個印刻著赤貧的家庭中長大，他知道被排斥的滋味是什麼。

十三歲，他離開學校，成為糕餅店學徒，一直到十九歲。有一天，一個工人朋友帶他去參加職工青年會的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成為神父的渴望在他心中逐漸增長。為了達成夢想，他重新進入學校，和一群比他小七、八歲的孩子同班。

一九三六年，他進入小修院，次年即被徵召入伍。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若瑟還在軍隊中，一九四〇年，若瑟成為戰俘，但他成功地脫逃了，並繼續在蘇瓦松的大修院研讀哲學與神學的課程。

一九四六年，他二十九歲的時候在蘇瓦松被祝聖為神父。之後，他被派到一個工人小鎮特尼擔任堂區的助理司鐸，整整三年的時間，他試著尋找當地最貧困的工人家庭，

並進一步去認識和分享他們的生命。一九五〇年，他被派到杜易日當本堂神父，這裡的社會生活是特別的，有擁田百甲的地主，也有佃農、長工及生計極不穩定的季節性工人。神父不斷地工作，他加入季節性工人的行列，和他們一起下田拔甜菜；他傳福音、組織年輕人及祈禱的團體……，這一切都是爲了讓每個人有機會發現最貧窮的人所承受的重負。他的主教因此知道，在杜易日有一個不斷尋找赤貧者的神父。

一九五六年，主教建議若瑟到巴黎近郊的諾瓦集貧民窟去，在這個充滿泥濘與垃圾的地方住了兩百五十多個貧窮家庭。面對這個他所熟悉的痛苦，他決定留下來，並將自己的生命和這些家庭的生命連結在一起。一年之後，他和這些家庭一起創立了「協助一切沮喪絕望者運動」(ATD Movement)，也就是後來的第四世界運動。從那時候開始，若瑟神父的歷史和第四世界家庭的歷史已不可分離。

從一九六〇年開始，來自不同國家與不同信仰的年輕人開始加入他的行列，他們被他摧毀赤貧的堅定信念所吸引，一起建立了國際持久志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Voluntary)。今天，來自四十個不同國家的四百多名持久志願者分布在四大洲上的三十個國家。他們中有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蘭教徒，也有的不隸屬任何宗教。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教育和社會背景。

整整三十年，若瑟·赫忍斯基不停地以最貧窮的家庭爲核心，將不同階層、不同政

治理念及宗教信仰的人結合起來。截至二〇一三年，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們成爲最貧窮者的盟友。

此外，第四世界的塔波里兒童運動及青年運動，也不斷地推動兒童及年輕人，從小就注意自己身邊最被排斥和輕視的人。

和小人物、大人物相遇，到貧無立錐之地的家庭造訪，也到政府首長的廳堂去叩門，一直走到聯合國秘書長面前。無論在那裡，若瑟神父所懷抱的是相同的訊息：「赤貧是無法忍受的，我們必須一起投身，好能終止赤貧。」

一九八七年，若瑟神父去世前一年，他的生命中發生了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他在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發表了《極端貧窮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報告書（*Grande Pauvreté et Précarité E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報告被視爲對抗赤貧的重要文件，它不但影響了歐洲其它國家的反貧窮行動，也在國際間得到越來越多的回響。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十萬人聚集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若瑟神父在此爲全世界赤貧的犧牲者立了一塊紀念碑，並籲請所有的人團結一致，以摧毀赤貧。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若瑟病逝巴黎，並遵照他生前的要求，葬在第四世界總部梅里（Méry sur Oise），爲了向赤貧家庭及所有爲窮人投身的朋友表達他不變的忠信。

若瑟神父過世之後，第四世界運動繼續秉持創立人的精神往前邁進，它盡所有的力量去實踐他的諾言：「帶最窮的人由總統府走到聯合國，一直到梵蒂岡……」

也就在一九八九年，來自四大洲的赤貧家庭代表聚集在羅馬的梵蒂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見了他們。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第四世界運動的推動下，聯合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每年的十月十七日為「世界拒絕赤貧日」（又譯為「國際消滅貧窮日」）。在這之前，第四世界運動已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員，擁有第一級的發言權。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聯合國接見了三百位第四世界的代表，為了聆聽他們的經驗，並和他們一起思考國際組織在對抗赤貧的奮鬥中應負的責任，這樣的會見一直持續到現在。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從巴黎到渥太華，自布魯塞爾、羅馬一直到馬尼拉，一些以若瑟神父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逐漸展開。來自各種不同組織的實務工作者，和那些背負著政治、社會或宗教責任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赤貧者及若瑟的思想為前導，共同思考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就這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不分性別、年齡、階層或宗教信仰，越來越多的人響應若瑟·赫忍斯基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對人類每一份子所發出的呼籲：

「哪裡有人被迫生活在赤貧中，哪裡的人權就被忽視、剝奪。

團結起來為使人權受到尊重，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附錄二】

##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簡介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urth World)

◎ 第四世界運動是怎樣的一個運動？

第四世界運動不是一個宗教或政治組織，它歡迎每一個人。創辦人若瑟·赫忍斯基神父於一九五七年，和法國諾瓦集的赤貧家庭及一些志同道合者共同創立了這個運動。他深知根除貧困必須結合所有人的力量，並發現赤貧不只存在於第三世界，也存在於富裕的國家。這一群無法享受祖先遺惠與現代文明、日日為人性尊嚴而奮鬥的家庭，創立人稱他們為第四世界。

◎ 第四世界運動的思想導師是誰？

第四世界運動的思想導師，便是最貧困的人們。首先站起來對抗極端貧窮的，便是

赤貧者本身。五十年來，第四世界運動以赤貧者的思想為前導，在世界各地和極端貧困的族群一起奮鬥，並致力讓世人聽見他們的聲音。

為了讓大眾從赤貧族群的經驗與思想中獲益，第四世界一隻腳站在貧民窟與窮人同在，另一隻腳踏進地方與國際組織發聲，並在社會各層面建立伙伴關係。

◎為什麼叫做「第四世界」？

若瑟神父用「第四世界」來稱呼世界各地的赤貧者，目的在賦予這個族群積極的社會身分。這個名稱源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杜傅尼·德·維力耶等議員企圖在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上爭取「第四階級」的參與，這個階級包含農村短工、求乞者、貧病者等，但是其他三個階級（貴族、教士與一般公民）否決了他的要求。兩個世紀之後，出身赤貧的若瑟神父和其他貧困者在這個歷史典故中得到認同：他們也不斷地遭到拒絕、排斥，卻不放棄為每個人的尊嚴、權力及價值而奮鬥，所以他們決定給這個組織取名為「第四世界」。

◎是救濟還是平等的伙伴關係？

自小接受濟助的若瑟神父深知，窮人在接受救濟時，領受了更多羞恥的印記；除非



這個運動以摧毀赤貧為根本目標，否則一切都將無濟於事。所以，他和第一批全職投身的志願者以圖書館、幼稚園和小教堂，代替了食物和舊衣的發放。爲了要面對造成赤貧的根本原因，他創立了第一個研究機構。第四世界重要的創舉之一，在於打破傳統的救濟，並和赤貧者走向平等的伙伴關係。不再是單向地援助窮人或向窮人建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肯定窮人對抗貧困的豐富經驗，以他們不可勝數的努力爲基礎，與他們建立連結，並協助他們在平等的尊嚴中與外界建立聯繫。

◎第四世界運動的成員有哪些人？

#### ● 第四世界家庭

許多赤貧家庭在第四世界這個稱呼中得到歸屬與認同。透過這個屬於他們的組織，對抗赤貧不再是一場孤獨的奮戰，而是整個族群一起拒絕赤貧所造成的不公義。團結一致，他們培養自己在這場奮戰中需擔負的責任。

#### ● 朋友

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與最貧窮的家庭站在一起，社會上各個領域都有第四世界的朋友，他們的使命是改變大眾對赤貧者的態度與偏見，並喚起對窮困者的團結關懷，目的是希望赤貧家庭能在職業、社會、政治及精神生活等層面完全參與。大部分的朋友貢

獻公餘的時間，但也有些朋友獻上所有的時間，為使赤貧者的勇氣與渴望能被認識。

### ●全職志願者

全職志願工作，是一種另類生涯規畫。第四世界的志願者選擇和赤貧者的命運相連結，隨時準備出發到需要他們的地方。所有的志願者，不論年資深淺，每月領取同等的津貼，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並藉此表達對赤貧家庭的團結關懷。目前全世界共有四百多位長期投身的志願者，來自不同的國籍、職業、靈修及社會背景，有獨身者也有已婚者。他們分布在各大洲三十個國家，投身在許多不同的行動計畫中。

【附錄三】

家，是我的成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劉靜芳

（如小草出生般的平淡，二〇〇六年與第四世界持久志願者楊淑秀相遇，

開始接觸第四世界運動，認識若瑟神父的思想）

窮人的生命總是充滿各種困難與壓迫，他們時而為生活戰鬥，充滿希望，時而掉進黑暗的恐懼中，一出生就注定要被不正義的巨大河流所吞沒。在一切善舉與慈悲之中，每個人都注意到了這條不義之河的存在，但礙於法令、礙於程序，我們莫可奈何，常常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窮人死於非命。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正承受著朋友離世的悲痛。一位認識了三年，卻覺得已經認識了好多年的朋友，她死於恐懼的暴力之下。她從童年開始，一直到結婚生子，受盡暴力的折磨，暴力來自家庭，來自社會的冷漠，來自不符法令規定的資格，更來自你我的冷言冷語。話語能傷人，文字能傷人，規定能傷人，一直被認為是避風港的家，有

時更是暴力的來源。黑暗是可怕的，它的可怕之處在於我們不知道，在黑暗中藏著什麼東西。偶而，黑暗中會透出一束光，我們認為那是希望，但希望閃現，令人以為能抓到幸福，不料幸福卻越離越遠，我們不得已又踏進寂靜的泥沼裡，即使是春天也感覺不到大地復甦的氣息；深陷泥沼如何能展眉歡笑？如何欣賞大地回春？

若瑟神父在本書提醒世人「家」的重要，並在他有生之年每天記錄窮人的生活，他告訴我們那是爲了讓世人重新認識窮人在歷史上的地位，並以窮人爲優先，向窮人學習。我從沒想過自己能爲一本書寫介紹，第四世界的志願者把這位子留給了我，就像若瑟神父總是把窮人放在重要的位子上。

## 延伸閱讀

- ◎《貧窮的富裕》（二〇〇三），以馬內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著，華宇譯，心靈工坊。
- ◎《活著，爲了什麼？》（二〇〇五），以馬內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著，華宇譯，心靈工坊。
- ◎《德蘭修女：來作我的光》（二〇〇九），布賴恩·克洛迪舒克神父編著，駱香潔譯，心靈工坊。
- ◎《黑皮膚，白面具》（二〇〇七），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心靈工坊。
- ◎《黑色吶喊：法農肖像》（二〇〇八），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彭仁郁譯，心靈工坊。
- ◎《大地上的受苦者》（二〇〇九），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楊碧川譯，心靈工坊。
- ◎《黑色吶喊：法農肖像》（二〇〇八），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著，彭仁郁譯，心靈工坊。
- ◎《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二〇一一），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著，台灣勞工陣線。
- ◎《「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二〇一三）黃洪著，中華（香港）。
- ◎《富足世界不是夢：讓貧窮去逃亡吧！》（二〇一一）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曾育慧譯，博雅書屋。
- ◎《終結貧窮：可以在二〇二五以前達成》（二〇一〇）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鐵人雍譯，臉譜。
- ◎《尤努斯與鄉村銀行：創造免於貧窮的世界》（二〇〇七），亞希夫·多拉、狄波·巴魯亞（Asif Dowla / Dipal Barua），洪鑫譯，寶鼎。



Caring 076

## 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Les Pauvres Sont L'Eglise : entretiens entre le père Joseph Wresinski et  
Gilles Anouil (The Poor are the Church : 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 (Joseph Wresinski)

訪談者：吉爾·阿努以 (Gilles Anouil)

譯者：楊淑秀、蔡怡佳、林怡伶

出版者—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浩威 總編輯—王桂花

責任編輯—黃心宜 特約編輯—鄭秀娟

通訊地址—10684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53 巷 8 號 2 樓

郵政劃撥—19546215 戶名—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702-9186 傳真—(02) 2702-9286

Email—service@psygarden.com.tw

網址—www.psygarden.com.tw

製版·印刷—漾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傳真—(02) 2990-1658

通訊地址—248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二號

初版一刷—2013 年 12 月 ISBN—978-986-6112-89-8 定價—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Les pauvres sont l'Eglise

Copyright©2011 by Les Éditions du Cerf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Les Éditions du Cerf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2013 by Psygarden Publishing Co.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 若瑟·赫忍斯基 (Joseph Wresinski) 作；楊淑秀、蔡怡佳、林怡伶譯。

-- 初版 -- 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13.12

面：公分 -- (CA；76)

譯自：Les pauvres sont l'Eglise : entretiens entre le père Joseph Wresinski et Gilles Anouil

ISBN 978-986-6112-89-8 (平裝)

1. 基督教 2. 社會運動

240.1654

10202262

感謝您購買心靈工坊的叢書，爲了加強對您的服務，請您詳填本卡，  
直接投入郵筒（免貼郵票）或傳真，我們會珍視您的意見，  
並提供您最新的活動訊息，共同以書會友，追求身心靈的創意與成長。

書系編號—Caring 076

書名—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

姓名 \_\_\_\_\_ 是否已加入書香家族？ 是 現在加入

電話 (O) \_\_\_\_\_ (H) \_\_\_\_\_ 手機 \_\_\_\_\_

E-mail \_\_\_\_\_ 生日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地址

服務機構 \_\_\_\_\_ 職稱 \_\_\_\_\_

您的性別—1.女 2.男 3.其他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不婚 5.同志 6.喪偶 7.分居

請問您如何得知這本書？

1.書店 2.報章雜誌 3.廣播電視 4.親友推介 5.心靈工坊書訊  
6.廣告DM 7.心靈工坊網站 8.其他網路媒體 9.其他

您購買本書的方式？

1.書店 2.劃撥郵購 3.團體訂購 4.網路訂購 5.其他

您對本書的意見？

封面設計	<input type="checkbox"/> 1.須再改進	<input type="checkbox"/> 2.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3.滿意	<input type="checkbox"/> 4.非常滿意
版面編排	<input type="checkbox"/> 1.須再改進	<input type="checkbox"/> 2.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3.滿意	<input type="checkbox"/> 4.非常滿意
內容	<input type="checkbox"/> 1.須再改進	<input type="checkbox"/> 2.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3.滿意	<input type="checkbox"/> 4.非常滿意
文筆／翻譯	<input type="checkbox"/> 1.須再改進	<input type="checkbox"/> 2.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3.滿意	<input type="checkbox"/> 4.非常滿意
價格	<input type="checkbox"/> 1.須再改進	<input type="checkbox"/> 2.尚可	<input type="checkbox"/> 3.滿意	<input type="checkbox"/> 4.非常滿意

您對我們有何建議？

\_\_\_\_\_  
\_\_\_\_\_

▲您的意見，我們將轉貼在心靈工坊網站上，[www.psygarden.com.tw](http://www.psygarden.com.tw)



廣 告 回 信  
台 北 郵 政 登 記 證  
台 北 廣 字 第 1143 號  
免 貼 郵 票



10684台北市信義路四段53巷8號2樓

讀者服務組 收

免 貼 郵 票

(對折線)

加入心靈工坊書香家族會員  
共享知識的盛宴，成長的喜悅

請寄回這張回函卡（免貼郵票），  
您就成為心靈工坊的書香家族會員，您將可以——

◎隨時收到新書出版和活動訊息

◎獲得各項回饋和優惠方案





「如果世人知道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也許世界上就不會有赤貧存在。」——一位法國父親

「最可怕的不是貧窮，而是人心。讓人恐懼的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朋友。」——君群，曾是台北街友

在世界各國，不論是富裕的歐美、戰亂的中東或貧困國家，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安身立命的貧窮家庭。他們失去尊嚴、遭受歧視，被認為是懶惰或命運使然，才會「變成窮人」。

1956年，當西歐沉浸在高度經濟發展的歡樂中，出身貧苦的法國神父若瑟·赫忍斯基卻和許多被漠視、被誤解的赤貧家庭，在國慶日這天創立了「第四世界運動」，揭露赤貧的存在。這運動擴展到世界各地，現在已成為在聯合國擁有重要影響力的第一級諮商地位非政府組織。

第四世界運動的創舉之一，在於打破傳統的救濟，和赤貧家庭走向平等的伙伴關係。這個運動是以窮人為導師，肯定窮人擁有對抗貧困的豐富經驗，並和他們一起重新建構知識、發展行動，讓每個人的基本人權都獲得尊重。

《親吻窮人：若瑟神父與第四世界運動》是若瑟神父接受法國知名記者阿努以的訪談錄。若瑟神父詳述了他和這個運動在四大洲的赤貧現場，從窮人身上學到的一切；他並告訴世人，以最貧窮的同胞為優先意味著：當窮人得到和你我一樣的平等尊嚴與人權時，我們就學到了愛的真義。

### 誠懇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 丁松筠／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副社長  
王幼玲／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李家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孫大川／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山海文化雜誌社總編輯  
陳來紅／台灣兒童閱讀學會顧問、大溪愛鎮協會顧問、婦女運動先驅  
郭吉仁／律師、台灣貧困者扶助協會秘書長  
楊索／作家  
黎建球／大考中心主任、輔仁大學前校長  
鐘喬／差事劇團負責人  
顧瑜君／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Caring 076

心靈工坊出版 定價400元

ISBN: 978-986-612-89-8  
00400  
9 789866 112898